

中國思想運動史

(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

李洪林◇著

本書是中國著名理論學者李洪林先生的最新力作。作者在改革開放中曾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風雲人物，「六四」事件後被捕入獄。

1990年出獄後繼續從事寫作和研究，著重於對當代中國的歷史發展進行研究。本書的主旨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當代中國（1949-1989）的「鬥爭運動」，對四十年來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無休止的一波波的政治運動作一個全面系統的論述，剖析極「左」的思想運動戕害中國知識分子和思想異見者的原因及對社會的影響。是一本具有深度、不可多得的研究著作。

ISBN 962 950 680 7



9 789629 506803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70.00



李洪林，1925年生於遼寧，1946年畢業於西北農學院。曾任教於西北師範學院。1956年起，在中共中央從事理論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下放。1977年起，歷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

主要著作有《理論風雲》、《四種主義在中國》等。

一九四九—一九八九

中國思想運動史

李洪林 著

中國思想運動史

作者：李洪林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翠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九年·香港

前 言

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社會生活多了一件事情：思想鬥爭運動。它的任務是使人“自願擁護”黨的領導，即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方法是發動群眾開展批判鬥爭，也就是思想領域的群眾運動。

群眾性的鬥爭是以勢壓人，被鬥者當然不會心服。於是壓力便須不斷加強，規模便須不斷擴大，次數便須不斷增加——這已成為思想鬥爭運動的發展規律。

這種運動雖然不能使群眾自願擁護黨的領導，卻足以使他們被迫服從黨的專政。

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但因一黨專政照舊，所以思想鬥爭也照舊。不過名字改了，叫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然而時代變了。中國人經過多年思想鬥爭運動的教育，變得不太“聽黨的話”了。他們越來越討厭這種運動，而同情被批判者，有些人甚至站到“自由化”一邊，以致被批判者感到“春天對我如此厚愛”。

這使當局十分震怒，認為是“反自由化”手段太“軟”所致。于是大力加強“硬”度，最後發展到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解放軍的坦克和槍杆當然比“自由化”的筆杆“硬”得多，所以“六四”一役，解放軍大獲全勝，“自由化”全軍覆沒。

因為“自由化”已被一網打盡，所以“反自由化”的鬥爭已經沒有對象了。即使能找到批判對象，再想發動一場群眾性的思想鬥爭運動也不可能了。因為就思想批判而言，三十六般武藝已經用盡，不會再有新的招數了。

事實正是如此。“六四”以後，當局已是黔驢技窮，對付思想異

己的手段只剩下逮捕、審判和關押，後來又加上向海外流放，已經沒有一點思想批判的成分了。

這就是說，在中國大地肆虐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終於退出歷史舞臺了。現在不要說已經沒有人具有毛澤東或鄧小平那種權威，就是他們兩人再世，也不可能使這種運動捲土重來了。

中國有不少“世界之最”。思想鬥爭運動毫無疑問是一件“世界之最”。它是怎樣興起的，怎樣害苦了中華民族，又是怎樣走到末日的？儘管有人像保護瘡疤一樣不許別人碰它，但是全中國為之付出如此慘重代價的這段歷史，豈能當作個人隱私予以掩蓋？因此人們有權知道真象，也有權進行研究。

作者有幸處在思想鬥爭風暴的中心，也因此遭到沉重的打擊，所以有更深的感受。當然，研究歷史者不必親歷，親歷者也應超越個人感受。不過，只要忠于史德，秉筆直書，親歷者應更有條件也更有責任給當代和後世提供信史。

本着這種信念，作者從一九九三年着手寫作本書。歷時五年，今始脫稿。四十年史實浩繁，本書僅擇其要端，理出基本脈絡。以簡馭繁，力有不逮。雖期乎上，雖得乎中。深知疏漏謬誤之處必多，尚祈不吝賜教是幸。

作者謹識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錄

序 幕	延安整風運動(1942-1945).....	(1)
	一 歷史背景和運動始末.....	(1)
	二 審查幹部和“搶救”運動.....	(9)
	三 整風中的知識分子.....	(15)
	四 整風模式.....	(23)
第一章	建國初期的思想運動(1949-1952).....	(30)
	一 學習運動.....	(30)
	二 批判民主個人主義.....	(34)
	三 《武訓傳》批判.....	(37)
	四 陶行知的遭遇.....	(42)
	五 思想改造運動.....	(45)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1953-1955).....	(52)
	一 毛澤東和梁漱溟的鬥爭.....	(54)
	二 批判“《紅樓夢》研究”.....	(58)
	三 批判胡適.....	(63)
	四 胡風事件.....	(71)
	五 從“小集團”到“反革命集團”.....	(74)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83)
	一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84)
	二 人民內部矛盾.....	(89)
	三 整風和“鳴放”.....	(93)
	四 反右派鬥爭.....	(98)
	五 新的“反動階級”.....	(104)
	六 壓不彎的腰.....	(108)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1958 - 1959).....	(115)
一	一天等於二十年.....	(115)
二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118)
三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122)
四	拔白旗,插紅旗.....	(125)
五	批判馬寅初.....	(129)
六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133)
七	另一場反“右傾”鬥爭.....	(139)
第五章	階級鬥爭綱領(1960 - 1965).....	(145)
一	短暫的喘息時期.....	(145)
二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150)
三	文藝界的狂風.....	(154)
四	哲學戰場.....	(158)
五	經濟學戰場.....	(161)
六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16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1966 - 1971).....	(174)
一	“反修防修”的背後.....	(175)
二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79)
三	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	(183)
四	造神運動和“第三個里程碑”.....	(186)
五	文化浩劫.....	(190)
六	教育“革命”.....	(196)
七	文藝沙漠化.....	(200)
八	毛林體制的破裂.....	(204)
第七章	從批林到批鄧(1972 - 1976).....	(210)
一	左和右.....	(210)
二	古今“儒法鬥爭”.....	(214)
三	毛澤東的理論遺囑.....	(218)

目 錄

	四 批判鄧小平	(223)
第八章	思想解放運動(1977 - 1979)	(228)
	一 “兩個凡是”	(228)
	二 真理標準大討論	(231)
	三 西單民主牆	(237)
	四 三中全會——歷史轉折點	(244)
	五 理論工作務虛會	(248)
	六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254)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1979 - 1980)	(263)
	一 分道揚鑣	(263)
	二 堅持甚麼樣的“四項原則”	(267)
	三 郭羅基事件	(272)
	四 “生產目的”的討論	(277)
	五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問題	(281)
	六 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	(286)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1981 - 1982)	(292)
	一 收緊意識形態	(292)
	二 重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296)
	三 批判《苦戀》	(301)
	四 思想戰綫座談會	(306)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1982 - 1984)	(314)
	一 中央宣傳部易手	(314)
	二 軍人人主黨校	(321)
	三 新的“共產風”	(325)
	四 人道主義公案	(329)
	五 清除精神污染	(335)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1985 - 1987)	(345)
	一 “反自由化”間歇期的平靜	(345)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二	決戰前的外圍之戰	(349)
三	三反“自由化”的背景	(353)
四	“鄧胡趙體制”的破裂	(358)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一波清洗	(364)
六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二波清洗	(368)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1987 - 1991)	(376)
一	鄧力群的挫敗	(376)
二	“個人”的覺醒	(382)
三	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	(387)
四	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	(391)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總清算	(399)
六	尾聲——思想運動的終結	(404)
第十四章	結語	(413)
一	思想運動的根源	(413)
二	思想運動的後果	(419)
三	沒有主旋律時代的前夜	(426)
	名目索引	(433)
	人名索引	(442)

序幕 延安整風運動

(1942 - 1945)

把思想鬥爭作為一種運動，應該說是從延安整風開始的。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延安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整風運動。這個運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因而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社會生活。整風既是毛澤東為代表的土生土長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謂“土共”）反對完全聽命于莫斯科的“洋共”的鬥爭，又是這個黨整肅知識分子的鬥爭。這兩個方面的鬥爭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在反對“洋共”方面，它使中國共產黨擺脫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走上了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它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力量迅速壯大起來，並且最終打敗了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整肅知識分子方面，它使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共產黨在和知識分子的較量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使“桀驁不馴”的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從此“夾緊尾巴做人”。

因為整風起了這麼重大的作用，所以它所提供的一些經驗就獲得了“普遍”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所開展的歷次思想鬥爭運動，其基本做法，都是以整風運動為楷模的。因此，在談到當代中國思想運動史的時候，有必要回顧一下延安整風運動。

一 歷史背景和運動始末

整風運動的準備

整風運動是一九四二年開始的。不過準備工作早在前一年就動手了。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

一個〈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主旨是批判教條主義，提倡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把這種思想方法簡明扼要地概括成中國一句成語，就是“事實求是”。這篇報告給整風運動提供了理論前提，成為運動的思想準備。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土地革命時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黨的路綫問題。會議批評了王明所領導的黨中央在這個期間犯了左傾路綫錯誤，並決定在全黨發動一場思想革命。為此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學習研究組”，各地也成立“高級學習組”，組織高級幹部學習。

這時，學習還只限于黨的高級幹部。這是為即將到來的“思想革命”作組織上的準備，也還沒有叫作“整風”。^①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一個〈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這是整風運動的動員令。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領導整風運動。總學委的主任是毛澤東，副主任是康生。於是整風運動在全黨正式展開。^②

整風運動所要整頓的是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其實這“三風”都是針對王明的。

王明其人及其路綫

王明早年主要在蘇聯學習和工作，一九二九年回國從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強行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期只有一天，極為匆忙，大家根本沒有思想準備。米夫利用這種辦法硬把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補選為中央委員，並使他成為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當時中共的總書記是一個名叫向宗發的工人。他之所以被推上這個位子，純粹是這個黨為

了顯示自己的無產階級性質。實際上向宗發從來就是一個擺設，根本沒有起過領導作用。所以王明一進入書記處，便立刻變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了。其實那時他才二十七歲，馬列主義書本知識倒是有些，但是實際經驗很少，特別是中國革命的鬥爭實踐，可以說是一片空白。更嚴重的是他自以為是，目空一切，一上臺，便用一套左傾空談去指揮全黨，結果使中共的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連他自己的安全都無法保障。這一年六月，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向宗發被捕叛變，兩天後即被槍決。王明愈加惶恐，到了九月，決定去蘇聯。於是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改組領導機構，成立臨時中央，由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等人組成。這樣，走了一個王明，上來一個博古充當中共最高領導人。博古當時才二十四歲，比王明更年輕，同樣是個白面書生。王明去蘇聯是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時也是共產國際領導成員，對中國黨來說是個“太上皇”。博古在國內，實際上是以王明代理人的身份發號施令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才有了變化。所以在中共黨史上談到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的左傾路線，都用王明作為代表。

左傾路線把中共推到滅亡邊緣

本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和國民黨決裂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共”就向農村進軍，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鬥爭。由於這條路線符合中國實際，所以中共力量不斷壯大，並在江西等地開闢了大片根據地。但是莫斯科訓練的王明這些“洋共”上臺以後，就推行一套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路線。他們先是把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弄得一塌糊塗，使黨的秘密工作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連黨中央都不能在上海立足，只好搬到江西的中央根據地。到了根據地，又排斥和打擊毛澤東等“土共”，說是“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並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結果使紅軍在反對國

民黨第五次“圍剿”中失利，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根據地，舉行所謂“長征”。在“長征”中又遭到重大傷亡。總計這次王明左傾路線使根據地和紅軍以及黨員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如果再不改弦易轍，紅軍將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就是在這種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召開的。

遵義會議只解決了軍事問題

現在的通行說法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簡單。

遵義會議前，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是書記處，其成員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總負責人是博古。遵義會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共產國際代表，和博古共同指揮軍事），並撤消了他們的軍事指揮權。會議決定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而周恩來有最後決定權。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據胡喬木說，政治局常委即參加書記處）。不過書記處內博古仍然排名第一，即負總責。

會議以後在行軍途中，二月五日前後在四川雲南和貴州三省交界地帶，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中央總的責任（後來人們又把這個“負總責”的職位叫作總書記）。這個職務由張聞天擔任直到一九四三年。

接着三月十一日行軍到貴州一個地方，又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三人小組的成員是：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這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擔任的最高軍事職位。

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軍事工作也就是黨的最重要的工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黨史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至於政治路線問題，遵義會議並未討論，也沒有作出甚麼決定。只是全黨總負責人這個職務，博古顯然已無法繼續擔任，所以由原來的第二號人物張聞天接替。其實張聞天也是從蘇聯回來的“洋共”。不過他謙遜好學，注重實際，毫不熱衷權勢，在

工作中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實際上在黨中央起了主導作用。因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是這樣寫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③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撤換左傾領導人，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通訊聯系陷于中斷，莫斯科的指揮棒已經不靈了。這才由中國共產黨自己獨立地解決了一個命運攸關的大問題。

王明和毛澤東對領導權的爭奪

但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後，麻煩又來了。共產國際和中共的聯系又恢復了。也就是說，莫斯科的指揮棒又恢復了指揮權。特別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王明由蘇聯回國後，中共中央領導層變得撲朔迷離了。因為他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又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回國就是來領導中共的。而且他一回來就不可一世。正像毛澤東後來在整風報告中所嘲笑的那樣：“下車伊始，誇誇其談”，“老子天下第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題目叫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其中還批評了毛澤東所主張的抗日路線。他口氣很大，儼然是最高領導，至少也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他這種不可一世的表現曾一度唬住了黨內一些人。據胡喬木說，當時連毛澤東都被他弄得有點摸不着頭腦。^④當然，後來毛澤東還是頂住了王明的下馬威。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還批評了王明。

但是，王明的影響畢竟不是短期就能消除的，況且毛澤東雖然在黨中央握有實權，但是身分未明。特別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揮棒繼續發揮作用。據《中國共產黨大典》記載，毛澤東在黨中央領導層中，曾經處于少數地位。李維漢有一次去看望毛澤東，毛

對李發牢騷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審洞。”^⑤顯然，要使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完全歸于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共”手中，還必須把遵義會議不曾解決的政治路綫是非問題徹底弄清。而為了解決路綫是非，又必須從思想方法入手，認真解決一下理論和實際的關係問題。當然，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的解決，必然落實到組織問題，即黨的領導核心應當由甚麼人來組成，才能使革命取得勝利。

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歷史背景。

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即一九四二年，以學習文件檢查思想為主要內容。到這一年冬季，就逐步轉入第二階段，即以審查幹部、清理隊伍為主要內容。一般所說的延安整風運動，就包括整風和審幹這兩個階段。

此外，整風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利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在高級幹部範圍內討論黨的歷史。它的目的是分清路綫是非。這也就是政治局的整風會議。討論黨史和整風檢查穿插進行。這個會從一九四三年九月開始，斷斷續續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六屆七中全會開會時才結束。

一箭雙雕——批倒“兩個宗派”

政治局的整風，除了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綫之外，還提出了“兩個宗派”。一個是王明的“教條宗派”，另一個是“經驗宗派”，即曾經受王明影響而追隨過他的一些中央領導人。這樣，在國內工作的中央領導人，除了毛澤東以外，大概只剩下劉少奇是一貫正確的了。其餘的不是屬於“教條宗派”，就是屬於“經驗宗派”。於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原來在黨內地位比較高的領導人，便只有檢討的份，沒有多大發言權了。也就是說，他們的政治地位已經動搖，在組織上需要重新定位了。

整風過程中，還有兩件組織上的大事：一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改組，一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解散。

共產國際的解散，可以說是從組織上完成了中共從莫斯科指揮棒下解放出來的過程，也使王明等“洋共”最後失去了國際的後臺。這對整風運動無疑是個十分有利的條件。至于中共中央領導的改組，意義更加重大，因為它實現了權力轉移，使毛澤東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也成為黨的當然領袖了。

毛澤東取得中共黨內“最後決定權”

自從一九四一年政治局九月會議批評了王明左傾路線之後，中共中央幾個主要領導人都不再在中央工作：王明是一直稱病，不幹工作也不出席任何會議。博古則早就不負主要責任了，只是分工主管《解放日報》。至于張聞天這個總書記，早就不過問全黨的大事，而只分工管宣傳教育工作。整風開始以後，他感到自己再也無法在書記處繼續呆下去了，所以從一九四二年起就主動去農村作調查研究，不再參加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議。此外，書記處還有一個重要成員周恩來，可是他作為中共代表常駐重慶，一方面領導大後方的統戰工作，一方面和國民黨周旋，經常不在延安，所以不可能參與中央領導工作。於是書記處實際上就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在主持工作了。這樣，調整中央領導機構就有必要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政治局開會，推舉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組成書記處，毛澤東也擔任書記處主席。同時還決定：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⑤

把“最後決定權”授予毛澤東，這個決定對中共和日後的中國政局，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因為那時的書記處不是政治局的下屬辦事機構，而是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把“最後決定權”授予一個人，也就確立了個人專斷的體制。從此以後的三十三年，這種體制沒有任何改變，個人專斷愈演愈烈，這正是當代中國災難的根源。

整風結果——毛澤東大獲全勝

中央政治局的整風和對黨史的討論于一九四四年四月結束，它標志着全黨整風運動的結束。接着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任務是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這個中央全會開了一年，是歷史上最長的一次，主要是討論《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經過反復修改，最後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經全會原則通過。

這個決議用黨的文件的形式，全面批判了王明左傾領導的路綫錯誤，充分肯定了毛澤東路綫的正確，特別是高度贊揚了毛澤東思想。（注一）

這個決議給整風運動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它標志着整風運動以毛澤東大獲全勝而結束。連王明都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寫信表示：“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⑦

作為整風運動的結果，中共勝利地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政治路綫順利地獲得通過，毛澤東思想被接受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本人被大會一致擁戴為黨的領袖。一九三五年從遵義會議開始的中共歷史轉折，經過十年之後，到這裏完全實現了。

（注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附錄”予以發表。這是毛澤東的意思。不過在公開發表的這個《決議》中，所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全部由毛澤東本人刪掉了。

這是為甚麼呢？原來斯大林不喜歡“毛澤東思想”。在蘇聯，凡是發表中國的文件或有關報導，只要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一律刪掉。當時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都要仰

仗蘇聯。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斯大林對於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還是處在“老子黨”的地位。鐵托在南斯拉夫鬧獨立性以後，斯大林特別警惕所謂“民族主義”。因此他不能容忍中國共產黨推出一個“毛澤東思想”來和他那個牌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相對抗。

據胡喬木說，正是這種背景，使毛澤東自己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並且以後在中共的“八大”上也不再提毛澤東思想。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不提毛澤東思想”作為劉少奇一大罪狀，真是冤哉枉也。因為在延安的時候，劉少奇正是贊頌毛澤東思想的主將，並且在“七大”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時，對毛澤東思想以及為甚麼要把它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作了最權威和最周全的闡述。正因為劉少奇是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舉得最高的人，才被毛澤東看作最親密的戰友並親手把他選拔為自己的接班人。

二 審查幹部和“搶救”運動

審幹——為了找出“反革命”

整風開始不久，審查幹部就被推上日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宣布：“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⑧於是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一些機關學校先後開始審查幹部。

所謂“半條心”或“半心半意”，是對“一條心”或“全心全意”來說的，指的是共產黨員和幹部思想當中有或多少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這是“思想問題”，用毛澤東後來的語匯，此種情形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解決的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毛澤東當時努力倡導的整風的方針。

“兩條心”就嚴重了，這不但是政治問題，而且是反革命的問題。用毛澤東後來的語匯，就是“敵我矛盾”。對於反革命，就不能用整風的方針，而只能用打倒或消滅的辦法來對付了。

當時的審幹工作由康生負責。他是總學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澤東)，又是黨中央社會部(大致相當于現在的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的部長。他原來就領導反奸工作，善于捕風捉影，草木皆兵。審幹既然列入整風運動，康生的權力和作用就更大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做了一個鋤奸問題的報告，極度誇大敵情和幹部隊伍不純的情況，使人感到革命陣營內部到處都是國民黨打進來的特務。^⑨

後來一般都把“特務如麻”這種錯覺歸咎于康生一個人。其實當時不光是康生，整個中共中央也都是這樣看的。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就這樣說：“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所以《決定》規定了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有二，即“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在延安召開了兩萬多人的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會，動員反特鬥爭。於是整風運動中的審查幹部工作就轉變成群眾性的反特鬥爭了。^⑩

四十八年之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就坦率地承認，當時中共中央也自己就誇大了敵情，犯了錯誤。《大事記》說：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對於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滲入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以至導致後來的反特鬥爭擴大化。”^⑪

搶救運動造成冤案如山

這場反特鬥爭很快又發展成“搶救失足者運動”。康生在七月十五日專門作了一個《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一下子把鬥爭推向高

潮。(注一)所謂“搶救”就是“逼供信”運動。除鬥爭會上的威嚇追逼以外，有的還施用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結果在短期內打出大量“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一共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其餘百分之九十六都是“特務”。^⑭很多熱血青年從淪陷區和大後方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結果在“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就是老幹部，有的也不能幸免。陶鑄曾在地下工作時被國民黨逮捕，坐過監獄，這一次在審幹運動中也被整成“叛徒”。當時這場“搶救運動”在陝北弄得“特務如麻”，不光是大批幹部被打成“特務”，連陝北綏德師範十幾歲的學生也都大批大批被打成“特務”。據《解放日報》報道，這個學校開了九天大會，共挖出二百三十個“特務”，占該校總人數的73%。^⑮

毛澤東在審幹運動中曾給康生寫信，中共中央也曾制定方針，要求在防奸工作中堅持正確路綫，防止過火鬥爭和擴大化。但這都是在肯定敵情嚴重的前提下作出的約束，因而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有一位民主人士錢來蘇，是老同盟會會員，抗日戰爭中曾任第二戰區少將參議，因不滿蔣介石，一九四三年三月帶着女兒和女婿投奔延安。不料正值反奸鬥爭高潮，女兒女婿都被隔離審查。他的兒子早就參加革命，此時已被打成“特務”。一九四四年春節，錢來蘇一個人孤孤單單，心情悲傷。他激憤地責問說：“是不是在這裏每個人都要搞成特務才算？外邊來的人皆不能相信？”^⑯他說的是氣話，其實說對了。因為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實際上就有這個意思。文件一開頭就說：“特務之多，不足為怪。”因而決定“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這就意味着“一切人員”都有可能是特務，至少也是說“一切人員”都不可信。有了這種決定，怎能不造成大量冤案呢？^⑰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提出一條重要政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確實避免了許多人頭落地。不過由於鬥爭的過火，自殺的人還是不

少的。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⑭

一頁“叫人傷心的血淚史”

蔣南翔是當時中共青年工作委員會整風運動的領導人。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寫了一份《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給中央。這份意見書對“搶救運動”提出直率的批評，不僅批評了直接領導審幹的康生，而且批評了中共中央。他根據自己所在的青委“搶救運動”，斷定“這是一個根本失敗了的工作，絕對（我敢于說是絕對！）不能自欺欺人地說是成績多于缺點”。而且他認為“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搶救運動中是相當的普遍，青委絕不是唯一的例子。”^⑮

蔣南翔在《意見書》裏現身說法，生動地刻畫了這種大搞群眾運動的審幹和“搶救”：

領導方面——“用盡心機從被審查同志的身上找矛盾，找岔子……強迫‘反省’，強迫‘坦白’，企圖用各種方法強制被搶救的對方戴上自己憑空預製的帽子。”

群眾方面——“瞎子摸魚”，“捉迷藏似的在一切自己的隊伍之中亂找特務，亂作鬥爭”。“所謂依靠群眾的力量，事實上是成了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依靠群眾聲勢汹汹的態度”。“如不氣勢汹汹地威逼鎮壓，大喊大叫，那就……顯得落後，而且會被認為是對反特鬥爭消極怠工，是對特務沒有‘義憤’，是大有問題。”

鬥爭對象——“所有的坦白分子及嫌疑分子都竭力想表現自己，緊張積極，不敢絲毫懈怠。”^⑯

其實那些被審查者的所謂“表現自己”，也就是給自己戴上“特務”帽子，並且胡亂“檢舉”“揭發”，平空揪出更多的“特務”，以致大批無辜者受到株連。

據胡喬木說，審幹當中延安和陝甘寧邊區一年內清出的“特務”曾高達一萬五千多人，顯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冤案。^⑰現在還沒有公開的材料說明當時一共釀成多少冤案。但從零星透露的情

序幕 延安整風運動

況和參加過整風者對“搶救運動”談虎色變看來，冤案的數量一定是可驚的。有些人的冤案不久就得到平反。毛澤東主動承擔了主要責任，並向被冤屈者賠了禮，道了歉。但是也有一些人的冤案一直壓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更嚴重的是有的人已被處死，人頭落地，再也長不出來了。所以蔣南翔痛心地说：“這是一段提起來就叫人傷心的血泪史。”^②

（注一）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是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作的。當時應邀參加會議的蘇聯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次會議的情況：

會場裏擠滿了約一千共產黨員。彭真宣布會議開始。他告訴共產黨員們，形勢十分嚴重，有一大批“國民黨特務”已經暴露，並被逮捕。

彭真說：“特工部（按，應為社會部）抓不盡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務，因此，我們要求共產黨員們在這個事關重大的問題上給予幫助。”他講完後，幾個表示悔悟的“特務”排隊上了臺。

他們講了他們的活動，聽起來大多是愚蠢的和幼稚的。他們懇求寬恕，發誓說要在毛澤東領導下，在八路軍中忠實工作。

這樣的“特務”一共有十二個，在會上講了話。

彭真談到了如何識別國民黨特務，並說凡屬坦白認罪的，都將予以釋放：“只要他們不怕認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

彭真的高大身材，在會場上十分顯眼，他滿臉通紅，看起來像個屠夫。

第二個發言的是康生。這個情報局頭子怒氣冲冲。他咬牙切齒，發了瘋似的揮手叫嚷：“你們十分清楚，你們有很多朋

友被捕了！等你們一離開這個禮堂，就會發現你們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蹤！要是今天在這裏參加會的許多人明天被關起來，你們不要大驚小怪。”，

然後，開始要求會議的參加者和延安的所有黨員起來消除特務，挽救特區。

“你們所有在這裏的人都是替國民黨做特務！”康生大叫大嚷，“你們幹嗎要搞破壞？我們有甚麼地方虧待了你們？你們甚麼都有，有房子，有口糧……爲甚麼要置我們于死地？只要悔過，我們就饒恕你們，但你們也必須記住，悔過不都是真心實意的！再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康生的講話起了嚇唬人的效果。一種令人窒息的寂靜籠罩着禮堂，聽衆顯然都嚇呆了。

人們突然意識到，情報局頭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權力，而膽敢捍衛真理的人，又會落個甚麼下場。

就在彭真即將宣布結束會議時，朱德突然走上臺去，從他臉上的表情來看，這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對他這個政治局委員來說，是個新聞。

朱德以平靜的聲調問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開過會後，我就該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戰友了？”“這是不是說，從現在起，我就該擔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麼敢用這種方式來對待黨的積極分子？對待黨的優秀分子和骨幹？”

朱德說完話，掉頭就回到他的座位上。

彭真宣布會議結束，共產黨員們默不作聲地散去了。^②

三 整風中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

從某種角度說，整風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鬥爭對象的政治運動。

其實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幾乎全是知識分子，至少也有中等文化水平。各級幹部也有不少都是知識分子。不過一般提到知識分子時，不包括他們，因為長期的農村鬥爭實踐，已經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工農化”了。當然，“工農”並提，是個習慣用語。實際上中共黨內產業工人出身的極少。黨的主體，特別是黨的軍隊，主要都是農民。黨和軍隊的領導骨幹，不是農民出身，就是農民化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農民的立場觀察世界和處理問題。

抗日戰爭初期，有大量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或在敵後參加革命。他們或經短期培訓，或通過實際鍛煉，陸續成為各方面的幹部，為中共增添了新的力量。但是他們從淪陷區或大後方來到共產黨的解放區，經歷兩種天地，總有一個適應過程。特別是有些青年懷着過高的理想投奔解放區，結果發現並不盡如人意，於是便產生一些矛盾。這些矛盾在整風運動中明顯暴露出來了。

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當時領導上正在號召開展批評。而且毛澤東幾次整風的演說特別是《反對黨八股》，不但批評尖銳，而且文筆生動，都對活躍延安的空氣起了帶頭和推動作用。在這種條件下，批評的文章就多起來了。反響比較大的是丁玲在《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上發表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在這個報紙上發表的《野百合花》（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和二十三日，分兩次刊登）。這幾篇文

章主要是批評黨和領導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當時延安在節假日常組織文化娛樂活動，特別是舞會，也受到這些雜文的批評。批評者認為這種歌舞昇平的氣象與抗日戰爭的現實不和諧。王實味還指責幹部待遇的差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幹部服式不一樣；伙食分大竈、中竈、小竈等）。

其實王實味自己就屬於級別很高的幹部。他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別研究員，穿的衣服和一般幹部不同，吃的也是小竈。他的津貼是每月四元五角，比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五角錢。他是覺得爲了革命的利益才批評這種不平等的現象的。^②

中央研究院是培養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院長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張聞天兼任。整風開始時他正在農村作調查，就委託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兼管研究院。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李維漢在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上講話，其中有兩點遭到王實味當場反對。一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組成。李維漢的意見是院領導和各研究室主任爲“當然委員”；王實味主張要選舉。二是在壁報發表文章的署名問題。李維漢主張署真名；王實味主張可以用化名或匿名。雙方僵持不下，主持大會的副院長范文瀾把兩種意見提交大家表決，結果與會者有四分之三贊成王實味的意見。於是當場進行選舉。選舉的結果，李維漢所提的那些領導幹部，除了兩個人以外全部當選。但因爲是自由選舉的，所以人們很高興，王實味等大呼“民主的勝利！”此事不脛而走，立刻傳遍延安城。^③

中央研究院爲配合整風，在三月二十三日創辦了壁報《矢與的》（取“有的放矢”之意）。王實味在頭三期連發三篇文章，除了批評李維漢以外，還要求大家的眼光不要限于本院，“更應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黨”，並呼喚人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要敢于批評“大人物”。據李維漢說：這壁報“轟動了整個延安，有幾期甚至不是貼在牆上，而是貼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門外（鬧市區）懸挂起來，前往參觀者川流不息。”^④

大禍臨頭，茫然不知

知識分子的活躍，特別是他們直言不諱地批評領導，引起中共領導的密切注意。尤其是一些工農出身的老幹部感到十分不滿。賀龍和王震都曾尖銳地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②王震還拿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到毛澤東那裏去告狀。毛澤東曾連夜打着燈籠去看中央研究院牆報上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王實味等人得知此事，欣喜異常，說：“毛澤東同志支持我們！”其實他們完全弄顛倒了，不知大禍即將降臨。毛澤東當時就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③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說：“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上說話的。”他嚴厲地指責這些人用的是“冷嘲暗箭”。這話分量相當重，已經上升到“立場”問題。^④

接着胡喬木（時為毛澤東的秘書）找王實味談，並給他寫信，分析《野百合花》的錯誤：“那篇文章裏充滿了對於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⑤

四月七日，中宣部專門找研究院的領導和積極分子研究該院整風中的“偏向”，涉及王實味問題。於是研究院黨委決定對王實味進行批評。

同時，康生多次派人到研究院搜集王實味的材料，並告訴該院領導：“王實味是托派分子，有組織活動，還是藍衣社特務。”於是王實味的問題由思想問題升為政治問題了。

六月一日開始對王實味進行批判鬥爭。據李維漢回憶，“鬥爭持續開會十次。參加會議的人員最多時達一千餘人。座談會變成群眾大會，全延安七十多個機關學校都有代表參加……大家對他的認識逐步加深，由他的反黨立場，到他的反黨動機，由他的反動

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反黨行爲。”^②

光是王實味一個人“反黨”，還不夠意思，康生又設法把另外四個和王實味來往較多的人和王連在一起，打成“反黨五人集團”。到十月三十一日，王實味的問題正式定性，“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於是王實味被開除黨籍。但事情並未到此爲止，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康生下令中央社會部將王實味逮捕。他曾多次申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務，但是沒有用。他在監獄裏度過四年光陰。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進攻延安，王實味被轉移至晉綏根據地，後在山西省興縣被處死。（注一）

《野百合花》的力量

王實味是整風運動中下場最慘的典型。不過王實味之所以成爲整風運動中最著名的人物，不僅僅是因爲他被捕和遇害（運動中遭到康生毒手的何止王實味一個），主要是因爲他寫了《野百合花》和其他批評黨的領導的文章，在延安產生巨大影響。（注二）

毛澤東發動整風的目的是清算王明這些“洋共”的“國際路線”，使中國共產黨從莫斯科的指揮棒下解放出來，走上獨立自主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因此鬥爭的鋒芒指向王明。王明和博古都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在黨內掌握最高權力時只有二十幾歲，沒有實際鬥爭經驗，只有些書本知識，只會教條式地跟着共產國際的指揮棒轉。他們看不起毛澤東和那些土裏土氣的“土共”，理由是“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他們當權時，粗暴地壓制和打擊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並給這個黨和革命造成極大的損失。因此，延安整風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即土生土長的中國式的馬列主義反對莫斯科來的所謂“國際路線”的鬥爭。

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演講裏雖然沒有點名，但實際上是以王明博古以及他們背後的斯大林爲對象而展開猛烈批判的。整風報

告裏對光有書本知識的知識分子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當然也不單指王明博古等人。毛澤東在這裏對知識分子的貶抑，應該說同時反映了中共隊伍裏工農分子對知識分子的反感。這樣，整風既批判了王明，同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一打知識分子那種與農民格格不入的傲氣，特別是與黨格格不入的傲氣。

然而整風開始以後，事情的發展使毛澤東和他的戰友（例如前面提到的賀龍和王震）覺得有點不妙。鬥爭的鋒芒沒有集中到王明身上，而是集中到黨的領導身上了。王實味們對黨的領導的批評，一下子風靡了整個延安，成爲人們注意的中心。如果聽之任之，整風這把火究竟燒向何處，就很難說了。

召開文藝座談會——整肅知識分子

毛澤東之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把注意力轉向文藝界，恐怕和這個背景有相當關係。因爲當時思想最活躍的就是文藝界。文藝界的知識分子往往富於浪漫氣質，敢于說話，而且有地方發表文章，能夠影響群眾。所以毛澤東分別找了一些文藝工作者談話，並且在五月間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對文藝界所有不符合黨的要求的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心是講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他要求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結合，並且把結合與否提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高度。不過黨和革命的主體就是工農，而黨又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所以歸根結底，要解決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

毛澤東在講話中反復強調列寧的一個重要命題：“文藝是革命機器的一部分”（注三），或者說是“齒輪和螺絲釘”。^④文藝既然是“螺絲釘”，文藝工作者當然更是螺絲釘。但是這些人的立場和思想感情都不合乎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須來個根本改造。

胡喬木對於文藝座談會的宗旨領會得很準確。據他回憶，會議一開始，他就抓住了這個問題和蕭軍展開鬥爭：

“文藝座談會召開時，蕭軍第一個講話，意思是說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獨立’的，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的指揮。對這樣的意見，我忍不住了，起來反駁他，說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蕭軍就坐在我旁邊，爭論很激烈。他發言內容很多，引起我反駁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於我的發言，毛主席非常高興，開完會，讓我到他那裏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鬥爭。”^③

據胡喬木說，座談會後，“鬥得相當厲害”。“對蕭軍，搞到不讓他吃公糧。蕭軍這個人很倔強，他就住到延安東邊的一個孤孤單單的房子裏，自己搞生產。”^④

其實蕭軍還算是幸運的，不給飯吃就自己去種糧食，還沒有喪失人身自由。文藝座談會以後，整風轉入審幹，許多人被“隔離審查”，有的人被關進監獄，像王實味還被處死，那境遇就遠不如蕭軍了。

經過整風，經過開展“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不光是文藝界，整個知識分子隊伍已經意識到自己在革命機器中的位置，許多人已經懂得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從此就很少有“向黨鬧獨立性”的餘地了。

(注一)據說王實味被捕之後，毛澤東有過指示，不要殺王實味。^⑤(另一說法是：“不要放也不要殺。”^⑥)後得知王已被處決，毛大怒，“曾厲聲說要還他一個王實味。”^⑦

到底是誰下令處決王實味，一些資料都語焉不詳。

有個材料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當隊伍行進到山西興縣時，隨軍押解的‘反革命分子’王實味，隨着執法人員的一聲槍響應聲倒地。”^⑧

序幕 延安整風運動

不過有的材料說，不是槍決，而是斬首：“一個手提砍刀的幹部模樣的青年人走進一孔小窖，拖出一個同為幹部模樣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坳。手起刀落……殷紅的血沉甸甸地灑落到乾硬的黃土地上。死者：王實味。”^⑧

有的材料說：“晉綏行政公署公安總局在山西興縣蔡家崖將王實味處決。”^⑨

但王實味是整個整風審幹運動中的特大案件，如果不是頭號大案，至少也是由中共中央管理的案件，一個行政公署的公安總局決不可能擅自處決人犯，而只能是執行命令。

另據《中國“左”禍》披露的材料中有這樣一個記載：“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一位負責人指示，要求在歷史老案（指整風中關押起來的）中，罪行比較嚴重的處死一批。”該書在“一批”中提到了一個人名叫蘭克義，也是關押在晉綏公安總局。但未提到王實味。^⑩如果王實味也在這“一批”之內，那就也包括在“一位負責人”下的命令當中了。

這位下命令的“負責人”是誰？據第一位把王實味冤獄公諸于世的戴晴分析，命令只能出自賀龍。因為他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司令員。他在延安時就“立場鮮明，態度暴烈”，曾在大會上把《三八節有感》的作者丁玲罵為“臭婊子”，自然不會對“托匪、國民黨特務、反黨分子”王實味有絲毫憐憫之心。^⑪

不過，據當年參加審訊王實味並給他做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結論的凌雲回憶，王實味是經康生“口頭批准”處決的。凌雲在《王實味的最後五十個月》一文中說：王實味一九四三年四月起，一直被監禁在中央社會部。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王隨社會部幹部大隊一起過黃河到山西興縣，關押在晉綏公安總局。因為王實味行軍路上“不認罪”，“表現不好”，故公安總局于六月提出處決王實味的請求，得到當時

正在興縣的康生的“口頭批准”。七月一日，國民黨飛機轟炸了興縣。看守所要立即搬家，所以當晚將王實味處決。毛澤東一九四八年才知道此事，大怒。當時社會部長已不是康生，而是李克農。于是由李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書面報告，對此事承擔了責任。康生卻一句話也不說。^①

王實味屈死三十四年後，即一九八一年，李維漢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對王實味一案進行復查的要求。經過十一年，終於查清，甚麼“托派”、“奸細”，通通是誣陷。王實味是清白無辜的。于是由公安部在一九九二年作出了給王實味平反昭雪的決定。一樁四十九年的冤案大白于天下了。

(注二)延安整風時王實味影響之大，可以從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講的話裏得到證明。據戴晴在《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中記載，毛在中共“七大”時是這樣說的：“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否則意見分歧。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②毛澤東把話講到這種程度，足見王實味的處境已經多么危險了。

(注三)毛澤東這個基本命題，即“文藝是革命機器的一部分”，來源于列寧著作《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列寧原話的中文譯文是：“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一部統一的、偉大的、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③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有人對列寧那個“黨的文學”的譯文提出質疑。這篇文章原來是博古翻譯的。胡喬木說，他反復看原文，認為 Literature 很容易譯成“文學”，但它的意義很多，在列寧這篇文章裏不能譯成“文學”。尤其“齒輪和螺絲釘”明顯不是指文學。^④

這樣一來，被毛澤東當作經典的列寧那個命題，原來是從

一個錯誤的譯文裏推演出來的。這倒是不折不扣的“望文生義”。

四 整風模式

整風創造了思想鬥爭運動的典範

整風運動作為一次成功的黨內鬥爭，已經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不過它的影響並未限于黨內。直到現在，它仍然影響着中國大陸的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

可以這樣說，整風是中共所創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事物。外國的共產黨也有黨內鬥爭。但是鬥爭的規模如此之大，時間持續如此之久，把全黨動員起來，作為中心任務全力投入，從思想鬥爭入手，最後落實到組織處理和人事調整，從而實現權力轉移——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沒有做過的。當然，蘇聯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猛烈程度大大超過了中國共產黨。不過那只是斯大林對政敵和無辜者大規模的清洗和處決，根本談不上思想鬥爭。中共在三十年代前期王明等左傾分子當權時，也和蘇共一樣，在自己隊伍內部實行大規模的清洗和處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他們的得意方針。當時犧牲在這種鬥爭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難以統計。

而毛澤東所發動和領導的延安整風，雖然有權力鬥爭的深層背景，但它本身卻是一場思想鬥爭，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用的方法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後又達到黨內團結。就是進入審幹階段以後，盡管有很大偏差，畢竟堅持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所以避免了更嚴重的惡果。這和斯大林那種大殺大砍是根本不同的。從實際效果看，整風確實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思想條件。這正是它在中共黨史上功不可沒的地方。

另一方面，就中國歷史來說，整風也是從未有過的新事物。

中國歷史上的當政者都很重視控制人民的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用殺頭的辦法消滅異己思想。明代和清代大規模的文字獄，也都是企圖用砍頭的方法維持一統局面。但是這種野蠻的方法收效甚微，因為腦袋雖可砍掉，而這腦袋所產生的思想卻砍不掉。它被產生(即表達)出來之後，就不再依賴那顆腦袋而獨立存在了。這種思想如果有道理，就能影響其他人，被更多的腦袋所接受，而這些腦袋是砍不完的。所以聰明的統治者發現另一種辦法比砍頭更好，這就是“教化”，也就是用或軟或硬的辦法向人民灌輸當政者所需要的某種思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朝提倡理學，都屬於此種類型。比起野蠻的砍頭來說，“教化”要文明得多。

不過“教化”的效果也還是有限。因為提倡者盡管提倡，老百姓未必相信。正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你說你的，我幹我的。當局卻也無可奈何。因此，砍頭的方法還是不能完全拋棄。

延安整風是一場思想改造運動。它不是一般的“教化”(用當今的術語叫作“宣傳教育”，或中國共產黨特有的名詞“思想政治工作”)，而是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批評、討論、批判、鬥爭。這種思想改造都是由黨來發動和領導的。它的特點是：“只換思想不換人”，就是保留原來的腦袋，但把這個腦袋裏的思想予以更換或改造。這樣不但比砍頭更加文明，而且比“教化”更有效率。

延安整風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這個目的。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即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路綫”)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生土長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矛盾，以“土”勝“洋”敗結束了。運動結束得很圓滿。大家都表示接受毛澤東思想。黨的高層領導中，原來和毛站在一起的當然不用說了。曾經跟着王明的人，大部分也都表示要心悅誠服地接受毛澤東思想。就連王明本人也都表示擁護毛澤東。至于一般黨員和幹部，經過整風學習，可以說都站到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至于知識分子，經過延安文藝界的整風，思想確實起了很大變化。許多人都深入群眾，按照毛的教導走上與“工農兵結合”改造自己的道路。

以強制為後盾的思想改造

不過這種思想改造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以政治的、經濟的或組織的權力為後盾。延安整風時中共雖然尚未奪得全國政權，但是在解放區內，黨卻有絕對的權力。這權力是必須服從的，否則就會有嚴重的後果。蕭軍因為不接受這種思想改造，就不給他吃糧食，這還是很輕微的懲罰。當時在解放區，所有黨政軍和文化經濟單位，都是中共領導的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任何人離開這架“機器”便無法生存，更不要說別的了。所以，整風雖然只是一種“學習”或“思想改造”，但是誰都得參加，而且必須接受群眾的批評或鬥爭，必須接受組織的審查和結論，並且服從組織上對他的處理或安排。這是強制性的，沒有甚麼討價還價的餘地。

因此，整風的收穫或勝利，都是在權力的強制下取得的。當時處在“大後方”重慶的胡風，一向都屬於左翼作家，政治上站在中共一邊，但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不贊成。中共也拿他沒有辦法。因為他本人不在解放區，共產黨管不着他。經濟上胡風當時也不依賴共產黨給飯吃，所以他的思想就不曾被“改造”。

思想屬於人的主觀世界，是個人頭腦的自覺活動。一個人接受甚麼思想，不接受甚麼思想，願意改變原來的思想或不願意改變原來的思想，應該說都是自由的。但當權力介入這個領域的時候，自由便成為一句空話。整風運動之所以能夠奏效，最根本條件就在這裏。有了權力做後盾，用正確的思想去改造別人的思想，自然如順水推舟。就是用錯誤的思想去改造別人，雖然如逆水行船，也照樣能夠通行無阻。這一點，恰恰是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能在

全國順利推廣延安整風經驗，掀起一次又一次思想鬥爭運動的關鍵所在。

獲得普遍意義的“整風模式”

延安整風給以後的思想運動都提供了哪些經驗呢？

1. 實行思想統一——毛澤東在談到整風運動的必要性時說，這是爲了“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⁴⁹作爲一個政黨，組織上的統一和政治綱領上的統一當然是必要的。可是所謂“思想上的統一”就有些費解。延安整風運動使全黨接受毛澤東思想作爲黨的指導思想，這是可以的，但這並不等於每個黨員的思想都“統一”了。事實上共產黨吸收黨員也只能要求他承認黨綱，遵守黨章，服從組織，僅此而已。至於個人思想，是“統一”不起來的。如果說連黨員都不可能“思想統一”，又怎能要求人民群眾去統一思想呢？

在人民群眾中不分青紅皂白，要求“思想統一”，這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思想運動連綿不斷的根源。因爲思想是最多樣化的東西，既然“統一”不了，那就只好不斷地鬥了。

2. 領導“運動”群眾——整風是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思想鬥爭。它被說成是“群眾路綫”或“領導群眾相結合”。其實這種“群眾運動”完全是領導發動和組織的。建國以後歷次思想運動，從確定批判對象到安排運動進程以及組織批判隊伍，都是領導上有計劃進行的。

3. 思想批判和組織處理——思想鬥爭不會停留在思想領域。延安整風是把整頓思想和整頓組織結合在一起，結果整出大批特務，當然要作組織處理——不光是黨紀處理，而且要進行行政和司法處理。就是不進行審幹，那種窮追猛打的“思想批判”也要追溯“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很可能因此便挖出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或“歷史反革命”甚至“現行反革命”。或者，在思想批判中無限

上網，結果思想問題便升級為政治問題，這都要進行組織處理。當時有一個名叫彭爾寧的大學生，一九四〇從淪陷區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延安參加革命。整風時他為牆報報頭畫了一幅向日葵，康生硬說這是“心向日本帝國主義”。結果把他打成“日特”兼“國特”的“雙料特務”。（注一）後來建國後的思想運動，也都伴隨着組織處理，並且製造出大量冤案。

以上三點，可以叫作“整風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這種模式在歷次思想運動中一再體現。凡有重大政治鬥爭，一般都有思想鬥爭作為先導。或者，一些思想鬥爭本身也常常發展成政治運動。不論是權力之爭或是非之爭，“整風模式”都是很有效驗的，因此總是少不了它。當然，由於歷史條件已非戰爭年代可比，這個模式的體現程度也有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又有新的發展。比如在組織處理中多了一個“下放”，就是“整風模式”的新發展。不管思想批判之後能不能給以黨紀處分、行政處分或刑事處分，只要算得上“知識分子”的，“下放”便是最起碼的組織處理。而且被“下放”者本人還不能把它看成一種懲罰，因為這是“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凡是知識分子，人人都應該“自願”接受的。

（注一）彭爾寧這頂“雙料特務”帽子一直戴了三十八年。因為這個案子是康生定的，沒人敢動。直到一九八〇年康生問題被揭發後，這樁冤案才被平反。但彭已年逾古稀，一生大好時光都過去了。^①

※ ※ ※

序幕 引文出處

①《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123 頁

②同上，第 127 頁

- ③《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册,第 387 頁
- 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45 頁
- ⑤《中國共產黨大典》第 316 頁
- 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3 頁
- ⑦同上,第 298 頁
- ⑧《中國共產黨大事記》第 129 頁
- ⑨《中國共產黨大典》第 321 頁
- ⑩《中國共產黨大事記》第 131 頁
- ⑪同上,第 131 頁
- ⑫《中國“左”禍》第 114 - 115 頁
- ⑬同上,第 117 頁,第 119 頁
- ⑭同上,第 117 頁
- ⑮《“左派”理論家浮沉錄》第 103 - 104 頁
- ⑯《中國“左”禍》第 117 頁
- ⑰同上,第 132 - 133 頁
- ⑱同上,第 129 - 141 頁
- ⑲《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80 頁
- ⑳《中國“左”禍》第 149 頁
- ㉑《延安日記》第 131 - 133 頁
- ㉒《蒼涼的訴說》第 137 頁
- ㉓同上,第 138 頁
- ㉔同上,第 140 頁
- ㉕《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55 頁
- ㉖《蒼涼的訴說》第 140 頁
- ㉗同上,第 141 頁
- ㉘同上,第 141 頁
- ㉙同上,第 142 - 143 頁
- ㉚《毛澤東選集》第 867 頁
- ㉛《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54 頁
- ㉜同上,第 55 頁
- ㉝《蒼涼的訴說》第 143 頁

- ⑤《我的人獄》第 118 頁
- ⑥《中國“左”禍》第 124 頁
- ⑦《重大冤案實錄》第 55 頁
- ⑧《我的人獄》第 60 頁
- ⑨《蒼涼的訴說》第 132 頁
- ⑩《中國“左”禍》第 117 頁
- ⑪《我的人獄》第 119 - 120 頁
- ⑫《人物傳記》1994 年第 1 期,第 35 - 36 頁
- ⑬《我的人獄》第 94 頁
- ⑭《列寧選集》第 1 卷,第 647 頁
- ⑮《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58 頁
- ⑯《毛澤東選集》第 887 頁
- ⑰《中國“左”禍》第 116 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時合影。前排左起：項英，何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

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王明由蘇聯回國，實際上是來領導中共的。他一回來就不可一世。十二月這個政治局會議就是由他唱主角，主題報告也是他作的。這種格局從會議照片上也可以看出：王明擺出一副當然領袖的架式坐在前排中央。而毛澤東和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都被擠到後排站在兩邊。

序幕附圖



一九四三年九月開始，中共高級幹部討論黨史，分清路線是非，以便樹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是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和目的。

上圖為一九四三年十月高級幹部討論黨史時所攝。中間披大衣者為毛澤東，其對面戴眼鏡穿棉上衣者為秦邦憲（博古）。

第一章 建國初期的思想運動

(1949 - 1952)

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的頭三年。這三年，中國大陸是在連續不斷的階級鬥爭暴風雨中度過的。“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注一)，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不曾間斷過。除了國內的鬥爭以外，一九五〇年開始的朝鮮戰爭又把中國拖了進去。和這些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鬥爭同時展開的，是群眾性的大規模思想鬥爭運動。這是把延安整風模式運用到全國範圍的最初嘗試。

一 學習運動

學習理論，改造思想

這種嘗試最初是從“學習”開始的。

延安整風就是從“學習”開始的。毛澤東一九四一年那篇作為整風前奏的報告，就叫作《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不是泛指一般的學習，而是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的而由黨所布署和領導的政治學習。延安整風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使全黨擺脫王明路綫而站到毛澤東的路綫上來。為了弄清這種路綫是非，還專門編輯了一套文件，叫做《兩條路綫》。建國初期的“學習”，目的是使全國人民摒棄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為此專門由中共中央宣傳部——黨的(同時也是國家的)主管意識形態的機關——出版一本《學習》雜誌，作為指導全國政治學習的權威刊物。

當時學習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有關中國革命的著作和艾思奇的小冊子《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這些材料告訴人們：

1. 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由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的五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不可抗拒的規律。

2. 舊中國處在封建社會開始解體的階段，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又不能轉變成資本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3. 統治舊中國的國民黨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集中代表，是反動派，因此必須打倒。

4. 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新式民主革命，它所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社會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自有人類以來最美好的社會。

這種理論，對於多年呻吟在貧困和獨裁統治下的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其所以能有強大的吸引力，除了理論上講起來頭頭是道，足以使人深信不疑以外，更重要的是現實生活的感染力。在抗日戰爭和內戰期間，國民黨以它的獨裁和腐敗，已經失去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持。而擁護共產黨的人則越來越多。這當然是因為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深得人心。但還不止這些。它的黨員和幹部那種艱苦奮鬥的作風，特別是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更贏得人們的真誠擁護。“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這條古訓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奪中國政權的鬥爭中充分體現出來了。

知識分子的人心所向

作為人心向背一個重要指標的知識分子動向，很能說明問題。一九四八年，大批海內外知名的知識分子和更多的青年學生一批又一批來到共產黨的解放區。到了一九四九年，隨着人民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的威

信真是如日中天。人民解放軍的猛烈攻勢，共產黨幹部的艱苦樸素和平易近人，新的政權和新人新事，每天都感染着人們。積弱百年的中國，如今來到一個歷史轉折點了，真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雖然戰爭創傷仍在，但大地充滿生機，一切欣欣向榮。這種客觀實際，對知識分子來說，真是一個大熔爐，不能不使他們的思想情感發生巨大變化。

在這種客觀形勢下面，建國初期的“學習”運動開展得相當順利。當時人們普遍懷着興奮的心情去學習那些相當陌生的新鮮理論，以及共產黨的革命綱領和政策。

這種學習之所以收效較好，還有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願的。當時中共接掌政權不久，百廢待興。“學習”方面，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除了短期訓練班式的學校是集中學習以外，各個單位都採取比較松散的形式組織大家學習。一般是聽聽報告，參觀訪問，自己看看書報雜誌，開開座談會或討論會等等。那時的學習討論會還沒有開展群眾性的批判鬥爭，氣氛並不緊張。也正因為這樣，許多人的心情是舒暢的，學習的收穫也比較真實。

社會學家費孝通寫道：“一九四九年在我是一個‘學習年’。在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看見過的事，聽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聽到過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見常聞的，在這一年中也顯示出了以往沒有顯示過的意義，一個富於生命的大千世界莊嚴的在我眼前展開，一切使我低頭。”他特別談到一次夜間在公路上見到解放區群眾的運糧車隊，並沒有士兵押運，每輛車上一盞燈籠，“遠遠望去是一行紅星。——這印象打動了我……這成千成萬的人，無數的動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他認識到這力量不但可以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而且可把中國建設成現代國家。“當我看到和接觸到這個力量時，我怎能不低頭呢？”^①

像費孝通這種心情，是很多知識分子共同具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受儒家傳統較深，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有強烈的責任感。當他們看到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革命使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充滿了希望時，確實從內心深處感到佩服，因而向這個黨靠近。這是他們出自本心的自由選擇，而不是被強制的結果。

就是原來對共產黨不太了解的，經過學習觀察和思考，有些人也都轉變過來了。比如，語言學家羅常培在北平解放後曾對一個共產黨員說：“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後來，他看了《新民主主義論》，又聽了周恩來和彭真等人的講話，覺得共產黨並不可怕，很近人情，所以思想逐步轉變了。“下定了決心，朝向革命，跟着共產黨走！”就是他的政治選擇。^②

（注一）“三反”“五反”運動一九五二年一月開始，當年結束。

“三反”指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對象是國家工作人員。實際上運動開展起來以後，反浪費只是走走過場，反官僚主義甚至連過場也沒走。整個運動主要是反貪污。因為毛澤東號召“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大規模的”三反鬥爭，所運動十分迅猛，所有的黨政軍民機關都開展了猛烈的“打虎”戰鬥。（當時把貪污分子叫作“老虎”）運動中還槍決了兩個貪污分子劉青山和張子善，作為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的典型。（這兩人都是土地革命時入黨的老幹部，當時已是地委書記。）

“五反”是緊接着“三反”開展的群眾運動，鬥爭的對象是工商界。“五反”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三反”“五反”運動清理出一批貪污分子和違法的工商業

者，但也都發生了嚴重的逼供信問題。工商業者經過“五反”，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受到沉重打擊，元氣已喪，從此一蹶不振。這也是三四年以後他們“自願”交出資產，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前提。

二 批判民主個人主義

反美親蘇教育的由來

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中共發動了一波批判美國的高潮，成爲當時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美國政府本來是支持國民黨的。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國民政府退到廣州。蘇聯駐華使節跟到廣州，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等待人民解放軍。這個動向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密切注意，於是派黃華趕往南京，指示他可與司徒雷登接觸。二人會見後，司徒雷登又於六月初提出希望訪問北平，並與周恩來會面。六月底，黃華答復司徒雷登說，中共當局已同意他去北平會面。^③

可見當時美國政府和中共當局正在互相靠近，中共事實上已經決定：如果美國和國民黨斷交，新中國將考慮與美建交問題。但是歷史走進了另一條路。在中共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之後，美國最高當局很快作出決定：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④

接着，美國國務院在八月五日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這就是說，原來在中國內戰中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在這個歷史關節點上經過短期猶豫之後，又決定仍然站在國民黨一邊了。

這就是爲甚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間，突然掀起一波巨大的反美高潮的背景。

美國國務院這份白皮書究竟是甚麼樣子，一般中國人並不知道。不過這並不妨礙它被當作中國人的“反面教材”。

從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寫了五篇評論，批判這個白皮書。這些評論和前此發表的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一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最重要的學習文件。全國各界普遍進行了學習，並且紛紛發表談話和文章，形成了一次聲勢很大的反美高潮。

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嚴厲警告

毛澤東在這些著作裏提出或強調的一些觀點，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影響極大。貫穿這些評論的基本綫索，是要確立“美國是主要敵人”的戰略思想。不過這些評論對大洋彼岸的美國當然起不了甚麼作用，因為美國並不理會它。事實上這些評論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它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在白皮書中寄以希望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即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或用毛澤東的話講，“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⑤這些評論指名批判的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實際上是用很嚴峻的語句警告這些中國人的。毛澤東不但說這些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而且認為他們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社會基礎”，甚至可能是美國在中國物色“第五縱隊”（間諜）的對象。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好像已經把思想問題當作政治問題，至少也是預示：日後用政治手段處理思想問題，已經有言在先了。

對《白皮書》的批判和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理論的學習，構成了建國初期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第一次思想運動。事實上以後歷次思想運動大體上也都是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如果說這次思想運動有甚麼特點的話，那就是沒有專門點出某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名字作為批判對象。（雖然點了胡適的名字，但是他已不在大陸。）

禍國殃民的兩個觀點

這些評論除了再次強調《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一邊倒”(倒向蘇聯)等觀點以外,還提出兩個新觀點。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兩個觀點對中國的歷史影響極大。

一個觀點是:“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⑥它導致日後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使中國背上難以承受的人口包袱。

另一個觀點是關於階級鬥爭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作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⑦

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新解釋。這種解釋表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常識知道的並不多。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創立的。他自己有過經典式的表述。這個理論如果用最簡單的話來表示,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築。用這個觀點解釋歷史,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至于階級鬥爭的觀點,馬克思早就聲明過,那不是他的創見,而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功勞,然而這些歷史學家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

由于毛澤東把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階級鬥爭,自然就會得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結論。這正是當代中國陷入永無休止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源。既然階級鬥爭無所不在,那么思想領域一次批判接着一次批判,也就順理成章了。

“一邊倒”的政策

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的反美教育,因為一九五〇年爆發朝鮮戰爭又被推向一個高潮。反美教育和親蘇教育是相輔相成的。“一邊倒”,即倒向蘇聯一邊,不但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準則,而且是

國內事務的準則，“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向蘇聯學習”，成爲流行的口號。從國防到文化教育，都有蘇聯專家在指導。除了用蘇聯模式作爲榜樣指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以外，在思想生活上也以蘇聯共產黨的方針爲方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包括科學和文學藝術）方面實行極其嚴厲的鬥爭方針。它不但把一些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和他們的創作徹底否定，而且把階級鬥爭引入自然科學，對發達國家許多先進的科學成果採取排斥的態度。這種粗暴的作法對蘇聯自己沒有任何好處，然而卻被中國人當作“先進經驗”，照搬照用。幾十年來中國的思想文化園地總是狂風暴雨，固然只能怪自己，不應當把責任推到外國人身上，但是蘇聯的“先進經驗”確實起了模範作用。“一邊倒”的原則到後來發展成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準則了。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提出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也就是用來判定一個人是“敵人”還是“人民”的政治標準。其中第六條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⑧在“反右派運動”中實際應用這條標準時，就把它簡化成“對蘇聯的態度”了。一個人只要被認爲“反蘇”，就可以被打成“右派”了。

三 《武訓傳》批判

《武訓傳》的產生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思想批判運動。

武訓是清朝末年一個貧苦農民，痛感沒有文化之苦，下決心用行乞的辦法興辦學校，讓窮人孩子能夠學習文化。他乞討三十餘年，居然興辦起三座義學，但自己仍然流浪乞討，過着最窮困的生

活，有病都舍不得花錢去看病，最後病故在一座倒塌的房子裏。

把武訓生平拍成電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一九四四年建議的。電影導演孫瑜，寫出《武訓傳》劇本，並于一九四七年拍了一部分，因經費困難而停了下來。一九五〇年又重新拍攝。一九五一年二月影片上演後引起熱烈反響，許多報刊發表文章贊揚。《大眾電影》把《武訓傳》列為一九五〇年十部最佳國產影片之一。

《武訓傳》在教育界引起更強烈的反響，大家紛紛表示要學習武訓精神，獻身教育事業。一個曾經不安心工作的教師寫文章說，他看影片時被感動得流眼淚了，“雖然武訓的鬥爭方法與道路，不是我們要學習的，但他那堅韌不拔的性格，將引導我更踏實、更細致、更專一地為孩子們工作。”^⑩

這部影片也得到中共高層領導的肯定。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經周恩來批准，導演孫瑜攜《武訓傳》到中南海放映。朱德、周恩來、胡喬木等一百多人到場觀看，反應良好。朱德看完後和孫瑜握手說：“很有教育意義。”幾天後，毛澤東和江青也看了這部片子。^⑪

當代中國第一次思想風暴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五月。

三四月間，報刊上有過幾篇批評武訓的文章，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因為中國人從來不曾有過大規模思想批判運動的經驗，還意識不到某些文章的背景和意義，當然也無從知道它預示着風暴的來臨。

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原來發表在《文藝報》上著名揚耳的一篇文章《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揚耳說：“《武訓傳》‘歌頌了不該歌頌的人物’，‘它與我們偉大祖國的歷史不相稱，與我們偉大現實運動不相容。’”^⑫《人民日報》對這篇文章加了編者披語，希望引起討論。實際上這就是一次大規模

思想批判的“氣象預報”，而且是近期預報。

五月二十日，暴風雨來到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戰鬥檄文〈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了。〈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它的社論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這篇社論的口氣也是最終判決式的：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藝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社論認為武訓行乞興學是“丑惡的行爲”，因為他是在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爲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爲，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¹²

配和這篇社論，〈人民日報〉同時在“黨的生活”專欄發表短評，號召每個看過影片的黨員都不應沉默，每個歌頌過武訓的黨員都要檢討，擔任文教和宣傳工作的黨員都要參加“這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

於是〈武訓傳〉立即停演。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開展起來了。各地紛紛召開批判會，報刊上連續發表批判文章，報道批判動態。到一九五一年底，八個月裏全國共發表批判文章一千多篇，還出現了二十多部專著。分量最重的批判文章是楊耳的〈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文章認為，武訓沒有參加農民起義而去行乞興學，是“在偉大的農民革命浪潮中樹起降旗”。是“爲鞏固封建制度而鞠躬盡瘁”，是“萬劫不復的奴才”。文章同時猛烈地批判了電影〈武訓傳〉的編導者，說編導者是在“借武訓的僵屍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楊耳還尖銳地批判了那些贊美〈武訓傳〉的文章，說這些文章是在進行“公開的反動宣傳”。¹³

江青親自調查武訓歷史

批判展開以後，《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聯合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堂邑、臨清、館陶三個縣做了二十多天“調查”。調查團中有一個人既不屬於《人民日報》也不屬於文化部。此人名叫“李進”，就是江青。這個調查團是先有結論然後下去找材料的。山東省知道“李進”就是江青，也知道調查團的意圖和傾向，所以對調查團接待隆重而謹慎，並在被調查的地區預先做了布置和準備。^⑭不過即使事先做了“布置”，也未必都符合調查團的意圖。據當時奉派參加調查團工作的中共臨清鎮委員會宣傳部長趙國壁說，被調查的人起先都對武訓大加贊揚。有一個在清朝當過兵的老人，還見過武訓。他說：“武訓可是個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勞，攢錢為窮孩子辦義學！”當天晚上，村幹部對他說：“武訓挨批了，說話得留神點！”等到第二天，調查團又去找他，他說：“我耳朵聾，聽不懂你們的話。”以後就甚麼話也不說了。^⑮

當然，群眾談的真實情況並不能影響調查團預先作出的結論。他們把調查材料帶回北京，由江青主持寫成一個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在《人民日報》連載，結論是：

“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⑯

風行草偃——文化界一致檢討

在這場風暴當中，文化教育界許多名人，包括郭沫若、夏衍、田漢，以及《武訓傳》的編導孫瑜和主演趙丹，都作了公開檢討。郭沫若早年（一九四三年在重慶）就在陶行知主持的武訓紀念會上發表講話稱贊武訓，一九五〇年又給李士釗（注一）編的《武訓畫傳》題過辭。所以毛澤東寫的社論發表後，他趕緊寫文章自我檢討，表示“已下定決心加以痛改。”^⑰江青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七月二十八

日發表後，郭沫若又寫了一篇《讀〈武訓歷史調查記〉》在八月四日發表。他認為這篇《調查記》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一篇“實事求是的記載”，“為中國人民的史學增加了光輝的一頁”。他還說：“假使武訓還活在今天，我們要說他是反革命分子，他也會是啞口無言的。”郭沫若還批評已經逝世的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認為也是犯了很大的錯誤。”他還認為，如果陶行知活到今天，“他一定會極深刻地作出一番自我檢討的。”^⑩

在這場批判高潮裏進行自我檢討的，不光是文化教育界的知識分子。連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都被牽連在內。因為他批准影片《武訓傳》在中南海放映，所以也在黨中央作了自我檢討。^⑪

《武訓傳》批判雖然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文字獄，但那來勢之凶猛，批判之嚴厲，不光使稱贊過武訓的人都要檢討，而且對於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顯示了強大的震懾威力。這真是“殺雞儆猴”。人們箠食壺漿迎來的“王師”中國共產黨，運用起批判的武器時，竟是這樣翻臉不認人。所以在知識分子中，一種恐懼感產生了。

批判過後，也有一些“組織處理”，不過只限于武訓，尚未殃及活人；有些學校以武訓命名，一律改掉。紀念武訓的石刻、塑像等物要毀掉，畫像要抹掉。武訓紀念林要改名。（武訓墓和墓碑當時仍予保留。不過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造反派把武訓墓給挖了，拿着他遺骨游街示眾，並進行批判。）

《武訓傳》事件的一個後果，是成立一個由江青參加的“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前的一九五〇年，全國生產故事片三十九部。在這個“委員會”指導下的一九五二年，全國只生產故事片五部。^⑫

（注一）李士劍和孫瑜同為《武訓傳》作者。一九五七年因對江青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極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殘酷迫害。一九七九年被平反後，到北京開會見到闊別二十

八年的孫瑜。孫瑜時已八十五歲，兩個老人相抱痛哭失聲。孫瑜說：“我們的目的除了想宣傳普及教育而外，還有甚麼呢？”^②

四 陶行知的遭遇

“人民教育家”稱號的由來

對《武訓傳》的批判還直接引起了對已故教育家陶行知的批判。

曾被毛澤東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一八九一年生，一九四六年逝世)，早年留學美國，一九一七年回國後，積極推行平民教育，主張把教育從“少爺小姐”手裏解放出來，使之變為人民大眾的教育。他是最早注意到鄉村教育的人，一九二六年起草和發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呼吁改變農民得不到教育的處境。一九二七年他創辦南京試驗鄉村師範(即著名的曉莊師範)，實施他的教育理想。

陶行知認為中國教育的根本缺陷是與生活脫節，先生是“教死書”，學生是“死讀書”。這種教育，培養的是書呆子。他的教育思想是“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認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他反對傳統教育那種只教書不教人的做法，而是主張教師的責任是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他對自己的教育主張身體力行，終生為中國人民教育事業辛勤奔走。他十分敬佩武訓。他說：“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而創辦柳林、臨清、館陶三個義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會關係都比他好，連一個學校也不能維持，何以對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對得起中華民族？”^③

一九三九年他在四川省合川縣創辦育才學校，招收抗日戰爭中的流亡學童。育才學校在教學中提倡自由討論和手腦並用，培

養出不少革命人才。他還幫助一些青年投奔中共的革命根據地參加工作。所以他一直和中共有良好的關係。一九四六年逝世後，陸定一在延安追悼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稱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②事實也正是如此。陶行知要求教育與實際相結合，為人民大眾服務，這種教育方針和後來中共的教育方針並沒有實質上的差異。因此中共老教育家徐特立說，陶行知“為中國的新教育放下了一塊奠基石。”^③

批武訓，殃及陶行知

然而因為陶行知十分推崇武訓，所以在批判《武訓傳》的時候，他也被拉出來“陪綁”。而且中共對他的評價也起了根本變化。

最早打響批判武訓槍聲的《不足為訓的武訓》（作者賈霽，載於1951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4卷1期），在批判武訓的時候，曾經提到陶行知。賈霽試圖把陶行知和武訓加以區別，認為武訓雖然不好，但是陶行知在國民黨統治下提倡武訓精神，“有着積極的作用”。但這種為陶行知打圓場的作法很快遭到否決。半個月後出版的《文藝報》第四卷第二期發表的《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作者楊耳），批駁了賈霽的觀點。楊耳說：“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而且楊耳還認為，陶行知在蔣介石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危害可能更大些。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楊耳的文章，這就拉開了批判陶行知的帷幕。

此後，在全國批判武訓的運動中，陶行知和他的教育思想也成了批判對象。所不同的是，武訓的帽子是封建主義，陶行知的帽子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清除武訓一類的錯誤思想》（作者李一氓），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列入“武訓

一類”，並認為清除陶行知的錯誤教育思想，是這一次思想鬥爭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內容”。

七月一日，《人民教育》雜誌發表了陶行知的朋友馬叙倫的文章《我過去表揚過武訓的自我檢討》（署名方直）。他說，批判《武訓傳》只是澄清教育思想上混亂的“一個起點”。今後教育界的一個重大任務，是“研究與批判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

在此以前，為配合這場鬥爭，教育部的機關刊物《人民教育》已經於五月改組，編輯委員會原來的正副主任委員成仿吾和葉聖陶被免職，由教育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擔任主任委員。改組後的《人民教育》在一九五一年六月號上發表社論，要求教育界每個人都要“照照自己”。七月一日發表的教育部長馬叙倫那個《自我檢討》，就是這樣出來的。此後的一兩年內，《人民教育》成為批判陶行知的主要陣地，差不多每期都有批陶文章或陶行知弟子的自我批判。

在批陶運動中，他創辦的重慶育才學校也由地方黨政部門派“工作組”進駐，以“武訓精神給育才師生思想上的嚴重毒害”為主題，開展猛烈批判。校長孫銘勛是陶行知的弟子，在批判後被撤換。他被說成“當前中國教育改革中右翼的代表，代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在爭取人民教育事業的領導。”^②

批判《武訓傳》雖然沒有對人進行“組織處理”，但是批判陶行知卻把他的一些弟子從教育部門的領導崗位上撤換下來了。除了育才校長之外，上海市教育局長戴伯韜是最著名的一個。

對毛澤東批陶之一解

同一個陶行知，一九四六年逝世時已經由中共中央蓋棺論定了。為甚麼在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對他的評價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呢？

在“過河拆橋”或“兔死狗烹”這類解釋之外，一九九七年八月

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有一篇文章，對這件事從另外的角度進行了研究。文章題目是《中共開國後第一文化罪案考》，作者是在日本作博士後研究的何平華。他認為，批陶的“首要動因，顯然是毛澤東急欲樹立在中共教育界的權威指導地位。”其次是反美親蘇的政治需要。除了這些政治背景，何平華還從毛澤東個人思想深處一種“偉人情結”上作了探究。他認為，“批陶是爲了抹消《實踐論》接受實驗主義的軌迹。”他指出，青年毛澤東原是胡適的崇拜者，不但旁聽胡適的哲學課，還特地聽過杜威來華時的演講。陶行知是杜威的弟子，用“知行”說來闡發杜威的實驗主義。毛澤東一九三八年還在陝甘寧邊區夏訓班對學員盛贊陶行知的“知行”說。事實上毛澤東的《實踐論》的副題就是“知和行的關係”。何平華認為“毛、胡、陶在使用這一中國民族哲學詞語時，都是一致的；至于“實踐”、“實驗”、“試驗”，只是用語的不同。實驗主義認為“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實踐論》認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陶行知認為“經驗”是“真知識的根”，“行動”是“思想的母親”。《實踐論》認為認識產生于實踐。凡此種種，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接受陶行知“知行”說的思想軌迹。因此，何平華說：“綜上而言，毛澤東爲何要在中國建國初期發動批陶的另一深層情結便不言而喻了。”^④

五 思想改造運動

從自願學習到被迫改造 〇

必須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這是中共在延安整風中已經確定了的政策。建國初期的學習運動可以說是改造之前的“熱身運動”。批判《武訓傳》以及順帶的批判陶行知，自然都屬於思想改造，但那畢竟限于特定題目，而且批判對象極其有限。對於改造全國知識分子的任務來說，這種批判只是小試牛刀。真正在全國範

圍內對知識分子普遍進行一次有組織的思想改造運動，是一九五一年下半年開始的。

有趣的是，帶頭發動這場運動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黨外的民主人士北京大學新任校長馬寅初。當然，馬寅初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能量，而是他的倡議恰巧碰到了點子上。不過這件事確實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一片真情。

馬寅初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大義凜然，不但公開斥責國民黨，而且嚴厲批評蔣介石，雖遭監禁，也不動搖。他和很多著名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擁護中國共產黨。到北京大學不久，他就聯合十二位教授，在北大教職員中發起政治學習運動，要求清除舊思想，樹立新思想。他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寫信，報告北大政治學習的情況，並請毛澤東等領導人為教師，來北大作報告。這封信正好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完全合拍，因為中共正要對他們進行改造。所以馬寅初的信立刻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肯定。於是教育部決定先在北京天津組織高等學校教師參加學習，然後再推廣到全國。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②這是一個動員令。全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迅速開展起來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教育部要求所有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的教師都要參加思想改造運動。

同月，文藝界也發起了整風學習運動。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在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上作了報告。他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指出文藝界的出路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改造思想，走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道路。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國科學院也舉行了思想改造學習動員大會。包括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內的知識分子便都

捲入了這場運動。

接着，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全國政協作出《關於開展各界人士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決定》。於是全國各界所有的知識分子全部被組織到思想改造運動中來了。

為動員知識分子努力進行思想改造，周恩來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作了一個有名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大報告。他現身說法，用自己“犯過很多錯誤，栽過筋斗，碰過釘子”作為例證，鼓勵大家不斷學習，決心改造自己，逐步把立場轉變到工人階級方面來。他還強調，轉變要靠自己覺悟。有人還要觀察，還要考慮，這應該允許，“我們決不勉強”。

由於周恩來講的比較坦率和誠懇，而且態度平易近人，所以聽眾大為感動。這對推動知識分子投入運動，起了積極作用。^②

不過運動開展之後，就不是那樣輕鬆了。胡喬木特別強調必須開展批評：“不批評舊的就不能建立新的。不能設想馬克思主義好像維他命丸一樣，每天吃幾個，然後就發生作用了。”^③

錢俊瑞作報告時說：“在我們不少的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着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特別是崇拜美國資產階級的思想。”他的下述批判，代表了當時以及此後大約三十年間在中國大陸起支配作用的看法。按照這種看法，中國的知識分子“固執地崇拜着英美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所謂‘美國生活方式’，羨慕着美國的‘富裕’（他們看不見美國勞動人民的貧困）和‘文明’（他們向往着英美資產階級的墮落，忽視英美廣大勞動人民陷於無文化的悲慘地位）。他們佩服英美的科學和技術到了迷信的程度”。他還尖銳地批評有些教授使用“洋教本”，並且驚呼：“甚至還用英語講課，要學生用英文做筆記、做習題，這真怎麼得了！”錢俊瑞對個人主義的批判也代表了當時及以後通行在中國大陸的對知識分子的評估：“僅僅是他們的個人利益和個人前途在指引和支配着他們的工作和他全部生命。”^④

學習的變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絕大部分(包括從海外大量歸來的)知識分子的心情都是興奮和樂觀的。但是隨着運動的進展，事情就變化了。人們發現，這已經不是解放初期那種較為自由和輕鬆的學習了。如今學習已經成爲一種正式的制度。領導學習的“學習委員會”，具有行政權力，甚至超過一個單位的行政領導。因爲行政領導人也必須參加一個學習小組，要受“學委會”領導。這種“學習”，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必須發言，必須“聯系實際”，檢查自己的“舊思想”，必須貶低自己，必須敢于“亮醜”。把自己貶得越低，就表示覺悟提得越高，這是當時流行的價值取向。因此，“脫褲子，割尾巴”成爲一時的口頭禪。把人比作野獸，以“脫褲子”爲榮，鼓勵人們敢在衆人面前“亮丑”，是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特色。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操守之一的自尊心，在運動中變得一文不值了。

周恩來原來說，思想的轉變要靠自己覺悟，絕不能勉強。不過運動起來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每個人都要接受大家的“幫助”，特別是學校裏的教師還要接受學生的“幫助”。本來一個人的思想是否轉變，是自己的事，但是在這次運動中，一個人的思想是否改造好了，必須大家通過才能過關。在這種群眾運動的“幫助”下，思想改造運動果然進展迅速，差不多到一九五二年暑假，就告一段落了。據統計：“這次運動中，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的教師，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師，經過反復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④

忠誠老實運動——清查知識分子的歷史

不過思想改造只是這場運動的一半。另一半是審查每個人的政治歷史，公開的名稱叫作“忠誠老實運動”。這也是延安整風模

第一章 建國初期的思想運動

式的再現(先整頓思想,後整頓組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的《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中,已經對整個運動作出布置,並且清楚地說明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政治目的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迹,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因此,必須“在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培養幹部和積極分子,並在這些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專科學校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動分子。”^④

事實上在學習和檢查思想的階段,對知識分子政治歷史的審查就在內部開始了,經過半年的內查外調,已經在每個人的檔案裏準備了相當多的材料。等到“忠誠老實運動”一開始,就着手群眾的審查了。這就是:個人在會上交代自己的歷史和政治問題,然後群眾審問,最後由領導上作出審查結論。

到一九五二年底,整個運動就結束了。這是延安整風運動模式在全國範圍內的第一次運用,也為以後的思想鬥爭運動開了先河。

這場運動,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使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情遭到一次不小的挫折。說“沉重”,是相對於解放初期那種愉快的心情說的。其實比起後來的運動,這次思想改造不過是小菜一碟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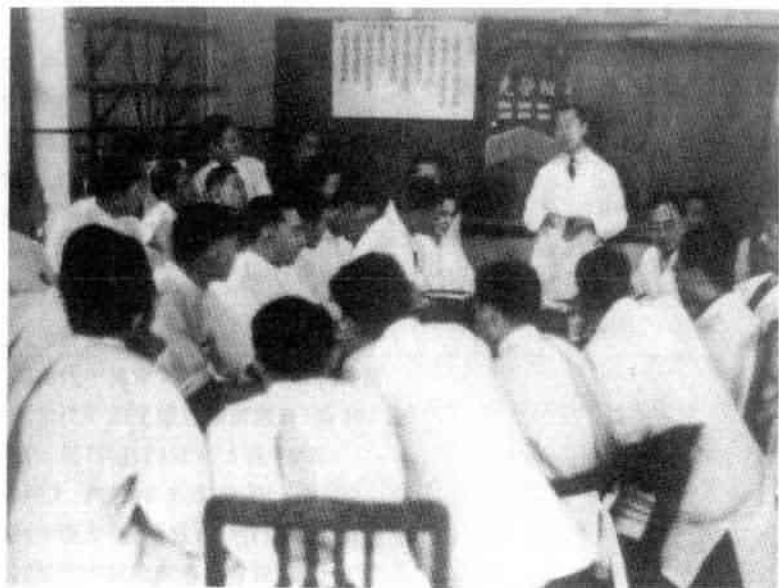
※ ※ ※

第一章 引文出處

- ①《新華月報》第1卷,第4期,第1003頁
- ②同上,第1006頁
- ③《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8-549頁
- ④同上,第549頁
- ⑤《毛澤東選集》第1489-1490頁
- ⑥同上,第1515頁
- ⑦同上,第1491頁
- ⑧《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3頁
- ⑨《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第516頁
- ⑩《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第104頁
- ⑪《人民日報》1951年5月16日
- ⑫同上,1951年5月20日
- ⑬《中國青年》總第67期(1951年6月16日)
- ⑭《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第519頁
- ⑮《文壇公案》第74頁
- ⑯《武訓歷史調查記》第76頁
- ⑰《人民日報》1951年6月7日
- ⑱《人民日報》1951年8月4日
- ⑲《文壇公案》第19頁
- ⑳《中國“左”禍》第155-156頁
- ㉑《文壇公案》第60-61頁
- 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1-1956)第111頁
- ㉓延安《解放日報》1946年8月12日
- 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1-1956)第111頁
- ㉕香港《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號,第97頁
- ㉖同上,第98-101頁
- ㉗《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50

第一章 建國初期的思想運動

- ⑧《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200 - 202 頁
- 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第 92 頁
- ⑩同上，第 93 - 94 頁
- ⑪《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200 頁
- ⑫《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第 89 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由於政治上反美親蘇的需要，特別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開展反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鬥爭，圖為一九五〇年協和醫學院吳英愷教授在學習會上發言。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方面要他們學習理論，一方面要他們參加階級鬥爭的實踐。這是一九五〇年清華大學教授參加土地改革回校後，集會討論毛澤東新發表的《實踐論》的情形。

圖中左起：吳景超，潘光旦，馮友蘭，雷海宗，孫毓棠，費孝通。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1953 - 1955)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歷了多次疾風暴雨式的政治鬥爭之後站穩腳根了。被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所破壞的國民經濟，已經恢復了。一九五三年正式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這一年是當代中國很少有的相對平靜之年。

不過平靜只是表面的暫時的。

中途變卦——提前實行社會主義

這一年，在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同時，一場新的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提前開始了。

本來在建國前後，毛澤東多次批評過想提前實行社會主義的左傾觀點。他非常明確地肯定：社會主義革命“還在很遠的將來。”^①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他就變了。這一年六月，中共中央統戰部起草一個文件，按照中共一貫的政策，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中間階級。毛澤東批示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②這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是革命動力，而是革命對象了。不過他暫時還沒有提出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到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忽然在講話中提出一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即“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換句話說，就是馬上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不但要消滅資產階級，而且要消滅

一切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新民主主義共同綱領比起來，這是一個新的政治綱領。從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轉變。但是既沒有經過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討論，也沒有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按：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權。在憲法產生之前，共同綱領就起憲法的作用。）這麼重大的事情，由黨的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一講，就定下來了。過了兩個月，到了八月，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一個講話稿時，加上了這條“總路綫”並且把“過渡時期”定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③也就是說，原來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社會被取消了。從民主革命勝利的那一天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就轉入社會主義革命了。

當代中國政治一大特色

這正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不講信用，說變就變。而且完全是個人獨裁，一個人在別人的講話稿上批了幾個字，一個黨的總路綫就制定出來了，一個國家的命運就決定了。

這一年在中共黨內有一場風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也有一場風波。

黨內風波發端于財政問題。主持財經工作的薄一波，因為在稅制上主張“公私一律平等”而受到批評。毛澤東認為薄一波違反了總路綫，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高崗乘機攻擊劉少奇，想取而代之。于是誘發了一場更大的鬥爭，結果是高崗失敗自殺。幸好這場鬥爭只在黨內進行，沒有波及社會。

另一場風波發端于政協委員梁漱溟的一次發言。結果毛澤東親自上陣單槍匹馬和他辯論。一時空氣緊張，形勢嚴重，不過當時也沒有波及社會。只是到了1955年，才對梁漱溟公開批判。

一 毛澤東和梁漱溟的鬥爭

一代學者的鴻儒風範

一代學者梁漱溟，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他不贊成西方民主，也不贊成蘇聯共產黨的道路，而是把目光投向農村，從事“鄉村建設”，希望找到一條改造中國的道路。他在一九四一年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民盟），反對國民黨獨裁。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暗殺李公僕，聞一多。據說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都在特務準備暗殺的黑名單上。但梁漱溟毫無畏懼，著文痛斥特務暴行：以民主同盟秘書長身份發表書面談話：“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騙國人。”他並且挺身而出面對國民黨的槍口：“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了，我不能躲避這顆子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邀他參加政府工作。他謝絕了，只當一名政協委員。他以前曾兩度訪問延安，建國後也常與毛澤東深談。他不是見風使舵的人，但經實地考察和思考，對自己過去的觀點有所轉變，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表示贊服。一九五一年他在《兩年來我有了那些轉變》中寫道：“共產黨可佩服之處甚多，而我最佩服的則是其群眾運動。我常嘆息，自古以來有群眾，自古以來亦有領導，但卻沒有領導與群眾結合像這樣好的。”^⑤

針砭良言觸怒毛澤東

然而過了兩年，他和共產黨的關係卻因為一次發言而惡化了。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全國政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在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會上作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報告。梁漱溟在小組討論時深表贊同。周恩來建議他在大會發言時也講一講。

九月十一日梁漱溟果然在大會講了。他除了擁護總路綫之外，還提了些建議，其中一條是農民問題。他說：

“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于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此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們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⑥

這真是一言中的。後來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用剝奪農民的辦法來發展工業，以致國民經濟嚴重失調。梁的意見，不論在理論上還是政治上，都極有見地。

毛澤東沒有參加那次政協會，但他顯然知道了梁的發言。梁的發言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之處，無非是希望注意農民而已。不料毛澤東卻認為他反對總路綫，于是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作出反應，不過他沒有點名：

“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綫，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他好像特別對梁漱溟提到黨與農民的關係感到憤怒：“有人竟然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

的！”^⑦

維護尊嚴，猶作困獸之鬥

梁漱溟當時列席這個會議，知道毛澤東在批評自己。但他覺得毛誤解了他的意思，因為他並不反對總路綫。所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又和毛澤東面談，要求毛澤東收回那個批評。但是兩個人沒有談攏，不歡而散，於是梁漱溟決定訴諸大會。九月十六日，梁漱溟在大會上發了言，重申擁護總路綫。這一天的大會上沒有人批評梁漱溟，好像事情過去了。其實事情不但沒有過去，而且更加嚴重了。

九月十七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專講梁漱溟的歷史，說他一貫反動，在國共兩黨兩次和平談判的緊急關頭，梁漱溟的立場完全是幫助蔣介石的。^⑧周恩來講話時，毛澤東在旁邊插話：“蔣介石是用槍杆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⑨

梁漱溟對周恩來的發言感到意外，對毛澤東的插話感到震驚。他要求再次發言，第二天他上臺剛剛開始發言，便被人打斷。他堅持要有答辯的權利，對毛澤東說：“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甚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以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當場回答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漱溟說：“主席你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

兩人就這樣在臺上爭論，臺下的紛紛呼喊：

“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

“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

“梁漱溟滾下臺來！”

毛澤東的雅量，不敵民主人士的革命氣概

毛澤東還是主張讓梁漱溟講下去，只是勸他講短點。但梁漱溟堅持要講長些，還要從歷史上講，因為周恩來說他歷史上一貫反動，他必須辯白。但會場上多數人不答應。

最後，梁漱溟還是被轟下來了。^⑩

有趣的是民主人士的態度。據姜威在《老肖像，新打量》中寫道，此問題最後提付表決。毛和中央人民政府中的黨員委員贊成梁講下去。但是包括民主人士在內的多數反對，結果梁沒有講成。

就已經公諸于世的材料看來，在毛澤東就任中共主席以後，能夠唇槍舌劍和他如此爭辯的，大概只有梁漱溟一人。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確實有“雅量”，雖然話說的很重，但是並沒有把他看成政治問題。會後，梁漱溟的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拿。不過他以後經常“請假”在家，不去開會了。政協方面，有會議時照樣通知，參加與否，隨他自便。

後來，一九五五年，中宣部在《關於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情況和今後工作的報告》中提出擴大批判範圍：“要對近幾十年來其他資產階級思想代表人物在今天還有影響的（如梁漱溟）進行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於是報刊上對梁漱溟的思想展開了大規模的公開批判。梁的學生和朋友馮友蘭首先發難，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發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打響了批梁的第一槍。其實，馮本人也是這場運動批判的對象。

對梁漱溟的批判，除了哲理方面以外，重點是政治批判，即批判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批判者認為他要麻醉農民，以對抗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反對共產主義。劉大年在一九五五年第五期《歷史研究》上寫道：“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用反革命國家機器來維護封建土地制度，反對土地制度的民

主改革。在同一個時期，梁漱溟則適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需要，用歷史唯心主義理論來維護封建土地制度，反對土地制度的民主改革。兩者的作法和作用不同，自有界限。從性質上看，它們又沒有甚麼特異。”^①

梁漱溟對這場批判運動，只在一次座談會上表示“擁護”，此外一概不作任何表示，既不檢討，也不反駁。到了一九五五年底，批判也就收兵了。

二 批判“《紅樓夢》研究”

舊“紅學”和新“紅學”

一九五四年，思想界那種表面上的平靜被打破了。

事情是從《紅樓夢》的研究開始的。曹雪芹大概不會想到，他的《紅樓夢》自從問世之後就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並且產生了一門“紅學”。他尤其不會想到，在他身後一百九十年的時候，竟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

《紅樓夢》問世之後，深受讀者喜愛，並為學術界重視，到清朝末年，便有“紅學”出現。不過清代的紅學家，或從消閑的角度出發，品味其中男女情愛的趣味（這種“紅學”被稱為“消閑派”）；或將《紅樓夢》中的人和事，與歷史上的真人真事聯在一起，推斷書中某人是影射歷史上某人，書中某事暗指歷史上某事（這種“紅學”被稱為“索隱派”）。

五四運動以後，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崛起，他們用實證的方法研究《紅樓夢》，而舍棄了舊紅學的低級趣味和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斷。俞平伯在胡適的啓發下，致力於《紅樓夢》研究。他論證了《紅樓夢》後四十回為高鹗所續，不是曹雪芹原著，並在其他方面推動了對這部古典文學巨著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俞平伯把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紅樓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夢》辯》修訂後改名《〈紅樓夢〉研究》于一九五二年出版，又寫了一篇《〈紅樓夢〉簡論》在《新建設》一九五四年三月號上發表。

《紅樓夢》研究所引發的思想批判運動，是由兩個青年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李希凡和藍翎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評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寄給權威的文藝評論刊物《文藝報》，根本沒有回音。於是他們把文章投給母校山東大學的《文史哲》月刊。這家雜誌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號上發表了。

九月中旬，在中宣部文藝處工作的江青要求《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結果被拒絕，因為報社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後來《文藝報》同意轉載，在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十八期上發表了。江青出面要求《人民日報》轉載，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這篇文章已經被賦予政治意義了。不過當時不論《人民日報》還是《文藝報》的人們，誰都不曾認識到這一點。《文藝報》在轉載此文時加按語說：“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确的。”編者說，他們轉載此文，是“希望引起大家討論”。這個“討論”當然是指學術討論。但是實際上一場新的鬥爭開始了。

毛澤東的一封信

十月十六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拉開了鬥爭的序幕。

他寫道：“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毛澤東特別批評“大人物”，說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

錢，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¹²（注一）

過了兩天，即十月十八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的信，並作初步的檢查。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鐘洛的文章《應當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文章說，這是“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思想路線上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

十月二十八日，袁水拍在《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他們壓制新生力量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這篇文章從標題到文中一些重要之處，都是毛澤東改定的。

從十月三十一日到十二月八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陸續召開八次聯席會議，討論《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並且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定》，決定改組《文藝報》領導機構，另組編委會以“加強領導”。

從九月到十二月，中國思想界整個捲入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中去了。報刊上報道過的討論會或批判會有一百次左右，發表的批判文章在一百萬字以上。因為毛澤東批判“大人物”“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所以《文藝報》主編馮雪峰，文聯和作協領導人郭沫若和茅盾，都公開檢討自己“作了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俘虜”。茅盾除了以作家協會主席身分檢討自己對《文藝報》疏於領導的責任以外，還檢討了一九三五年他給開明書店編“潔本”《紅樓夢》時，在《導言》中“完全抄引了胡適的謬論”。¹³

階級分析法的運用

由於《武訓傳》的批判中已經樹立了階級分析的榜樣，所以《紅

樓夢》研究的批判很容易就走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軌道。

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認為，曹雪芹雖然生在乾隆盛世，但已預感到封建官僚地主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他將這種預感和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作者用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的圖畫埋葬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命運。”^⑭其他批判文章大體上也是這個路子，都肯定《紅樓夢》有鮮明的反封建主義傾向，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批判者認為，俞平伯說《紅樓夢》有自傳性質，這就否定了它的社會意義。（注二）

這場批判，對《紅樓夢》這部作品本身的分析，還只是停留在古代的封建社會。至於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就變成現實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了。“這個鬥爭不是偶然的，是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中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藝術領域裏的反映。”^⑮有的文章把俞平伯稱作：“沒落的資產階級辯護人。”還有人說，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是胡適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配合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抗拒社會主義改造。”^⑯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的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是這場思想批判運動的高峰。文聯主席郭沫若，作協主席茅盾，中共黨內文藝工作領導人周揚，都作了重要發言。

他們除了談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問題並作了自我批評之外，還提到開展學術上自由討論的重要性。不過現實生活和他們的講法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一場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一開始就是猛烈的政治批判，沒有一點“自由討論”的氣味。這一點，郭沫若已經意識到了，他解釋說，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是一項迫切的對敵戰鬥，要迅速“肅清”它，“不能允許它有存在的自由。”這就是說，只要宣布誰的觀點是資產階級思想，他就只能接受批判，等候“肅清”，而沒有自由討論的權利了。

由於這場批判的火力很猛烈，特別是政治性的批判威力更大，

所以有人心裏很害怕。據《文藝報》的一篇胡家林的文章披露：一個文藝界的“知名人士”說：“不但平伯的半生心血盡付東流，就連我們這些過去弄過些研究工作的，都覺得人人自危起來。”^⑭

這場批判運動，到一九五四年底就基本結束了。由于毛澤東在給政治局的信中已經定下界限：“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所以除了改組一下《文藝報》編委會之外，對俞平伯並沒有有採取懲罰手段。不過經過這樣一場劫難，俞平伯已經抬不起頭來了。雖然他自己寫檢討文章時，硬着頭皮說：“我的心情是興奮的”，但是實際上是另一回事。人們都像害怕傳染病似的不敢和他來往。“交游寥落似晨星”，是他此刻的自我寫照。只有一個老友王伯祥不避嫌疑，登門看望，並邀他小酌于什剎海畔。他于淒涼中贈以詩云：

“門巷蕭蕭落葉深，
愛然客至快披襟。
凡情何似秋雲暖，
珍重寒天日暮心。”^⑮

(注一)毛澤東這封信裏提到的《清宮秘史》，是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拍攝的電影。一九五〇年三月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影片反映的是清朝末年“戊戌變法”中光緒帝和珍妃支持維新派，與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的鬥爭。這場鬥爭以維新派失敗告終。結果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海外。在清宮內部，光緒被囚禁，珍妃被害。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此片“被人稱為愛國主義”的“人”，指劉少奇。^⑯

看樣子毛澤東早就想批判《清宮秘史》，而且信中口氣也對劉少奇表示不滿。不過大家都批俞平伯去了。毛關於《清宮秘史》的指示未能貫徹。這筆帳，十二年後在文化大革命

中，才由戚本禹出面予以清算。

(注二)也有少數人不同意李希凡和藍翎的觀點(這些人也不贊同俞平伯的觀點)。比如，李希凡藍翎認為“乾隆盛世”是“資本主義萌芽孕育的時代”，賈寶玉“是當時將要轉換着的社會中即將出現的新人的萌芽”。吳大琨就不同意，他認為“乾隆盛世”並不是那樣的時代。”^②劉大杰也認為，不能把賈寶玉和林黛玉看成“資本主義新人”。^③劉衍文認為，賈寶玉可以說是封建大家庭中的清醒者，但談不上是“反封建的英雄”。^④

三 批判胡適

胡適是中共思想上的主要對手

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說的很明白：“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⑤批俞平伯，還只是“前哨戰”，頂多是一個局部戰役。批胡適，才是這次思想鬥爭運動的主戰場。

胡適是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是對現代中國有重要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和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被學術界視為一代宗師。他一生主要是治學，也從過政。他鼓吹西方民主，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中共。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內戰期間，他站在國民黨一邊。蔣介石對他十分重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已被中共軍隊包圍。蔣特派專機把他接走。因此被中共列為“戰犯”。

胡適桃李滿天下，現代中國許多著名學者都出于他的門下。以“戰犯”身分而又對思想界有如此重大影響，他自然要在中共發

動的思想運動中成爲必須搬開的巨石了。

對俞平伯的批判開始不久，中宣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就根據毛澤東那封信的精神提出：批判不應限于俞平伯一個人，也不應限于古典文學，而應該發展到其他部門去，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徹底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毛澤東批示“照辦”。^⑤于是在批判俞平伯的同時，另一個更大規模的批判胡適的運動已經開始了。

根據毛澤東所批准的中宣部這個報告，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舉行擴大聯席會議。這個會議實際上是一個批判胡適的動員大會。

文聯主席郭沫若在會上說：“對於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是刻不容緩的嚴重的思想鬥爭。”“中國近三十年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這是一般所公認的。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爲‘聖人’，稱爲‘當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國主義的扶植，成爲了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依然有不容忽視的潛在勢力”。

周揚在會上說，只有全面徹底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才能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學術界樹立真正領導的地位。”^⑥因此這一次規模空前的思想批判運動，被看作一場戰略決戰，目的是使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思想園地樹立“真正領導”的地位。這場戰鬥被看作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綫在思想方面的戰略任務。因此從領導的重視，準備工作之充分，組織工作的周密以及投入力量之宏大，都遠遠超過對《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圍殲胡適思想的周密部署

早在十二月二日，中國科學院院務會議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就開了個聯席會議，決定聯合召開批判胡適的討論會，並分爲九個方面進行批判：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1. 胡適哲學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
2. 胡適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廬)
3. 胡適歷史觀點批判(召集人范文瀾)
4. 胡適文學思想批判(召集人黃藥眠)
5. 胡適哲學史觀點批判(召集人馮友蘭)
6. 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召集人何其芳)
7. 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達)

8.《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性成就(召集人張天翼)

9. 對歷來《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召集人聶紺弩)

整個討論會由郭沫若、茅盾、周揚、潘梓年、鄧拓、胡繩、老舍、邵荃麟、尹達九人組成的委員會來領導。郭沫若是主任。

十二月二十九日討論會正式開始。這一天同時舉行了“胡適的哲學思想批判”第一次討論會和“《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第一次討論會。以後陸續舉行其他方面的討論會，前後共二十一次。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宣布對俞平伯的批判已經告一段落，同時宣布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已經開始。緊接着，中共中央三月又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把這個思想批判提到戰略高度，擴展到整個意識形態。

這個《指示》說：“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階級鬥爭更爲複雜和尖銳起來了。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已被消滅將被消滅的階級中的堅決反動分子，力圖破壞社會主義事業。他們破壞我們事業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用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反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們用這個方法抗拒改造，阻礙社會進步，阻礙科學和文化的

進步，阻礙建設事業的發展，並且腐蝕勞動人民，直到腐蝕我們黨。”^④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領域發動一連串思想運動的理論根據。這個理論是斯大林創立的，他認為，社會主義愈進展，階級鬥爭便愈尖銳。中國共產黨正是沿着這條道路，發動一次比一次更大和更猛的思想鬥爭運動的。這也就是在思想和文化領域開展階級鬥爭。《指示》還明白無誤地規定要分清敵友：“對於在思想上堅持資產階級錯誤觀點的代表人物，應當視為思想上的敵人”。對付敵人的辦法是“展開鬥爭”。“對於雖有錯誤，但是傾向於唯物主義的知識分子，應當視為朋友，幫助他們進步。”^⑤

在這些指示下，批判運動的風暴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地刮起來了。從北京到各大中城市都成立了批判討論工作委員會，全國各高等院校普遍組織了討論會和批判會。差不多大陸有關學科所有知名的學者專家都投身到批判運動中來了。其中不但有共產黨員，而且有黨外人士，還包括深受胡適思想影響的學者。

遭到重點批判的胡適一些觀點

胡適遭到批判最多的思想觀點是這些：

實用主義——這是胡適學自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哲學思想。此字來自英文 Pragmatism，胡適自己譯作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是“經驗”。這種哲學認為，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應付物質的客觀環境。在不斷地應付環境的過程中，人的知識就進步了。實用主義認為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唯物和唯心的對立。“實在”(客觀世界)都是經人改造過的實在，是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因此批判者認為這是主觀唯心主義。

進化論——胡適認為人的知識、經驗和生活，與生物進化一樣，都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社會是“大我”，由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組成的。歷史是一點加一滴逐漸進化來的。批判者認為

這是庸俗進化論，在政治上是用改良來反對革命。

個人主義——胡適主張個人自由。他推崇“真的個人主義”反對不管社會改造、只顧自己利益的“爲我主義”或“獨善的個人主義”。他認爲“真的個人主義”具有獨立思想，只追求真理，不計個人利害的品格。這種“真實的我”是最有益的人。批判者說，這是叫青年只爭個人自由，而置國家的興亡于不顧。這是反動的個人主義思想。

治學方法——胡適說，實驗主義“只是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它的方法是：細心搜求事實，大膽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④這種方法從具體事實入手，認爲一切學說與理論，都是有待證實的假設，而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就是胡適對這種方法的概括。批判者說，這種方法從表面上看，好像很科學，但只要同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內容聯繫起來，就知道是騙人的東西。

問題與主義——胡適早年就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來又說：“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批判者說這是胡適反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引導青年閉門讀書，鑽到故紙堆裏，以便脫離人民革命鬥爭。

這場批判運動，規模是空前的。各種批判文章，光是三聯書店編爲《胡適思想批判》文集的，就有八集，約二百萬字。

因爲胡適一貫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共所領導的革命，所以對他的政治批判較爲簡單，只要戴上一些政治帽子，簡單地予以痛斥就可以了。（注一）

至于學術思想就不簡單了。胡適學貫中西，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有着廣泛的影響，不是簡單幾頂帽子就能批倒的。翦伯贊在批判胡適達到高潮時，就批評了那種認爲“胡適知識很淺薄”的觀點。他自己很坦率地說：“我對於胡適才開始研究，對於他的一套，

還不甚明白”。^③

但是很多批判者不是這樣。許多文章用語尖銳，結論武斷，但講不出甚麼道理。比如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就遭到猛烈的批判。王力說：“我們並不反對假設，但是我們堅決反對‘大膽’。”理由是：“所謂‘大膽的假設’，實際上只是主觀的猜測。”^④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身分就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發表談話時，也批判了這個方法。不過他的批判也沒有使人明白這個方法為甚麼是錯的。他說：“胡適的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說穿了就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論。按照胡適的理論，人們就可以任意地來‘大膽假設’一些胡說，去挖空心思‘求證’；故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不過是用來證實他主觀地假設出來的東西而已。”^⑤

“共產黨最怕自由和懷疑”

中國大陸鋪天蓋地的批判，在美國的胡適在作冷眼旁觀。據說批判文章他都看過。他認為這些批判者都是奉命上陣。一次，他的學生唐德剛指着大陸出版的八本《胡適思想批判》問道：

“這幾百萬字的巨著裏，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

胡適的回答是：“沒有學術自由，哪裏談得到學問？”^⑥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臺灣的“自由中國之聲”電臺曾播出曾虛白與胡適的問答。曾虛白問胡適，對於大陸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有甚麼感想。（當時雖未形成運動，但已經陸續有批判文章）。胡適回答說：“我曾經說過，在共產黨統治下，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大陸上有些文人學者發表文字清算胡適的思想，這都是大陸上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的鐵證。我一百個同情這些可憐人……我不但不怪他們，我還要感謝他們——感謝他們在鐵幕裏替我宣傳我的思想。”

胡適又很驕傲地回答了下面的問題。

問：“究竟共產黨爲甚麼要清算胡適思想？”

答：“這是因爲共產黨的確承認‘胡適思想’是共產黨的敵人。”

問：“胡適思想有哪幾點是共產黨的敵人？”

答：“我只能指出共產黨最害怕兩點：第一，我提倡自由，我一生主張：在一個文明的國家裏，人民必須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發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論的自由）。這都是共產黨統治之下絕對不容許的……第二，我提倡懷疑……凡是禁不起懷疑的東西，都是靠不住的。共產黨要人人做‘馬列主義’的奴隸，只許信仰，只許迷信，不許懷疑，所以我的懷疑主義是共產黨的一個大敵人。”^③（注二）

胡適之子對乃父的批判

和胡適這種怡然自得的心情構成強烈對比的，是他的小兒子胡思杜對他的批判所引起的強烈震動。這是發生在一九五〇年的事情。

胡思杜原隨胡適同住北平。胡適逃往南京時，胡思杜不願同行，留下來了。他原在北平圖書館工作。中共接管北平後，他進入華北革命大學（人民大學前身）學習。當時華北革命大學是中共的幹部學校，專門吸收新區知識分子，經過短期培訓後分配工作。這種學校學生畢業前都要做“個人思想總結”，反省自己的歷史和總結學習的收穫，然後通過小組鑒定。胡思杜在總結中寫出對胡適的認識並宣布和他劃清界限，以表示進步。這種“劃清界限”的舉動，對於所謂反動階級出身的人來說，是想加入革命隊伍必須做的一件事。不過這種“總結”（或“交代”，或“檢查”）材料，都只裝入個人檔案，不會隨便公開發表的。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卻公開發表了。這究竟是他自己要發表的，還是有關組織要求他發表的，已不可考。因爲胡思杜已經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自殺身亡了。（注三）

胡思杜在這篇批判文章(實際是個人的“思想匯報”)中說,起初聽到有人批判胡適,“自己就有反感”。“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不過胡思杜最後表示:“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認識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確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④

當年這篇文章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香港,臺灣和美國的新聞媒體曾廣泛報導,使胡適很難堪。

對胡適的批判持續時間很長,不過高潮也就是一九五四年最後兩三個月和一九五五年開頭幾個月。在一九五五年,胡適還沒有批完,胡風又代替了他的位置,成為思想鬥爭運動新的中心了。

(注一)其實政治上對胡適簡單的痛斥也不符合實際。胡適早年倡導民主自由人權,三十年代以後在政治上雖然支持國民黨,但他畢竟贊成西方的民主政治,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一九九七年臺灣《聯合報》首次披露胡適和蔣介石的兩封來往信件,可以看出胡適自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不是如一些無恥文人專門賣身投靠權勢的。胡適的信寫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其中把“一黨專政”作為國民黨的“大錯”。他批評蔣介石“黨政軍,集大權于一人”,並要求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實行多黨政治。蔣介石當然不會放棄一黨專政,不會放棄手中的大權,但又不便於生硬拒絕,于是就採用迂回手法,回信說:這些事“非面談不能盡道其詳”,也就是婉言拒絕了。^⑤不過蔣介石並沒有因此整治胡適,以後對他一直是優禮有加。

(注二)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二月在中南海宴請出席政協的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知識分子代表時，透露說：中共曾托人帶信給胡適，勸他回來，但為胡適拒絕。此事臺灣《中央日報》也有披露：中共曾派人向胡適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所反對的不過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適聽了大笑說：“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④

（注三）胡思杜一九五〇年九月剛一畢業，就申請加入中共，並把母親留給他的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上交國家，以表示進步的決心。^⑤不過胡思杜畢業後被趕出北京，到唐山鐵道學院工作。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時，他向學校領導提出教學改革的建議，結果在反右派運動中受到批判。他感到絕望，便於當年九月自殺。^⑥

四 胡風事件

三十年代結怨，五十年代清算

在批判胡適的風暴橫掃中國大陸的時候，另一個更有破壞力的風暴形成了，這就是胡風事件。

胡風三十年代在上海參加中共領導的文藝團體“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共事，是個有影響的文藝理論家，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當時左翼作家之間有些分歧，胡風和周揚不睦。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以後，胡風並沒有根據《講話》的精神改變自己的觀點，也沒有接受黨的“幫助”。不過他在政治上是一直跟共產黨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胡風發表熱情歌頌的長詩《時間開始了》。他贊揚毛澤東是“中國第一個光榮的布爾什維克”，“挑起了這一部歷史”。

但是胡風的文藝觀點被認為不符合毛澤東的《講話》，再加上他和中共文藝工作領導人的宿怨一直未消，所以矛盾逐漸加深。一九五二年全國文藝界整風時，胡風的好友作家舒蕪寫了一篇《從

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檢討自己過去所堅持的胡風觀點,同時也批評了他和胡風的好友路翎。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刊載舒蕪這篇文章時加了編者按語。按語第一次提出“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並斷定他們的思想“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文藝思想。”七月,胡風寫信給周恩來,要求討論他的文藝思想。從這一年九月到十二月,共開了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胡風在個別問題上有自我批評,但在根本問題上認為自己並沒有錯誤。

一九五三年初,《文藝報》第二期和第三期發表了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已經給胡風思想作了結論。

胡風上書自辯

但是胡風根本不服,他不光對自己的遭遇不服,而且對中國文藝現狀感到焦慮,於是決定給中央上書,總題目是《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的情況的報告》,共四個部分。第一部分陳述文藝界領導人周揚等對他的排斥,第二部分專門反駁林默涵和何其芳對他的批判。他把兩人批判文章中的每一論點都摘錄下來,然後幾乎是逐句地進行辯論。第三部分是關於“小集團”及其中幾個人的問題。第四部分是關於文藝工作的建議。這份材料後來被叫作《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書》。全文二十七萬字,後來被叫作“三十萬言”。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風親自向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勛呈上這個《意見書》,請他轉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

他還附了一封信,寫道:

“我熱誠地希望得到中央的審查;

“我熱誠地希望得到中央的批評和指示;

“我要遵守指示隨時做補充的檢查；

“我要擔負我應該擔負的任何嚴重的責任。”^③

《意見書》如石沉大海，幾個月過去了，都沒有回音。這一年十月，《紅樓夢研究》的問題提出來了。《文藝報》受到批評。文聯和作協連續召開批判會。胡風誤以為他那個《意見書》受到中央重視，起了作用，文藝政策將有調整，于是在會上積極發言，批評《文藝報》壓制“小人物”，批評文藝界的領導有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簡單粗暴等等。

陷入重圍，抽身已晚

一九五五年一月，胡風的《意見書》受到重視了，不過並不是胡風所盼望的那種重視。一月二十日，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打了報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適的同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公開的批判。這份報告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④這份報告認為必須徹底批判胡風的《意見書》，以便“肅清他的影響”。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批准了這個報告，而且批語更為嚴厲：“胡風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着反黨反人民的活動，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⑤原來還是“文藝思想”，這時已經升級為“反黨反人民的活動”了。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協主席團決定對胡風展開批判，於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開展起來的對胡適的批判，讓位給對胡風的批判了。

一直堅持自己觀點的胡風，到一九五四年底才發現自己的估計完全錯了。形勢嚴峻，他決定檢查。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他

寫出《我的自我批評》。一月十六日，又寫出《對〈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的檢查》。他幾乎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觀點和言行，並且承認“攻擊了黨的文藝領導幹部”，“對黨的領導表現了頑強的反對態度。”

檢討送上去，毫無消息。他不知道，此時此刻，多么“深刻”的檢討都無濟于事了。

從一九五五年一月到五月十二日，全國省級以上七十種報刊共發表批判胡風思想的文章四百多篇，其火力大大超過了對胡適的批判。

五月十三日，事情突然變了。

五 從“小集團”到“反革命集團”

舒蕪倒戈，交出胡風信件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突然發表舒蕪提供的“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按政治需要摘錄出來，加上按語予以公布。

舒蕪先自我介紹說：“我在解放以前，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解放後，在共產黨的教育之下，在參加實際鬥爭當中，我才初步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鑒于胡風對抗批評，所以舒蕪“要提供一些材料，以幫助大家更好地認識胡風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動的實質。”

舒蕪把胡風給他的信件分成四類，並加上標題，大體是說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以及反對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以及胡風又怎樣進行了一系列宗派活動等等。

胡風在這些私人信件中，常常使用一些調侃的或帶有挖苦性的語言。比如對何其芳和劉白羽以“馬掛”稱之（按，清朝大官穿黃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馬掛，故“馬掛”為官員的代號），或稱何其芳為“何爺”，稱中共為“官方”，把批評胡風的人稱為“公子們”甚至“市儈們”，等等。這些信的內容，主要是一些文藝創作和理論上的是非曲直。胡風對中共一些文藝幹部心懷不滿，所以在和舒蕪的信中不時發泄出來。當然，他絕對不會想到，這些私人信件有一天會被收信人公開發表。

舒蕪原是胡風的好友，兩人的思想相投。舒蕪因文藝觀點受到批評時，胡風一直堅定地為他辯護。建國以後，舒蕪態度有變化，開始檢討自己，批評胡風。不過那也只限于思想觀點，這種變化並不出人意外。現在突然把往年的私人信件斷章取義加以摘錄，在報紙上公布出來，這件事不但對胡風是晴天霹靂，而且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聲驚雷。它告訴人們：第一，私人通信已經不受法律保護了。第二，思想觀點可以被當作政治問題。第三，還是古人說得好：“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必須提防每一個人，哪怕是至交。

這個“胡風反黨集團”的定性，當然不會出自舒蕪，但胡風的信總是他交出去的。他是怎樣做出這一舉動的呢？據說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之後，林默涵多次找舒蕪談話，鼓勵他公布胡風給他的信件。於是舒蕪找出一百多封胡風的私人書信交給了林默涵。^④

羅織罪狀，造出一個“反革命集團”

《人民日報》在舒蕪交出的材料前面加了按語。按語把以前稱呼的“小集團”改成“胡風領導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團”，並要求這個集團的人以及和胡風混在一起的人都像舒蕪那樣交出“密信”。而且用威脅的口氣說：“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

《人民日報》同時公布了胡風的《自我批判》，以便證明胡風的檢討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這句著名語錄就出

自《人民日報》五月十三日的按語。

這個按語果然有效。《人民日報》在五月二十四日和六月十日又連續發表了“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這說明得到胡風“密信”的人已經紛紛交出來了。不過《人民日報》在這兩批材料的按語中並沒有說明這些“密信”是“交出來”的還是搜出來的，只是在六月十日的按語中說：“人民政府已經獲得大批材料。”

“第二批材料”和“第一批”一樣，披露的主要是胡風對中共文藝工作領導的不滿和他們受壓抑的心情。這些私房話，都被編者按語用“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加以解釋和發揮。例如胡風信中曾指責“輿論一律”，“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裏空氣是強迫人的。”《人民日報》的按語對此作了這樣的解釋：“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面的人。”

“第三批材料”主要追溯胡風等人的歷史問題。這批材料的按語說：“胡風和胡風集團中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着反革命勾當。”這種做法，很像延安整風時對待王實味一樣，從思想批判入手，最後從政治歷史上把他打倒。

從五月十三日公布“第一批材料”那一天起，胡風問題就不再是思想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其實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早就成立了一個“胡風反黨集團案”專案組，派人四處調查和搜集材料了。^④

憲法保護不了人民代表的人身自由

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除一般的公民權利之外，還應享有人民代表特有的權利（非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不受逮捕）。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未能保護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這位“人大

第二章 從思想批判到思想治罪

代表”的人身自由。五月十六日下午，作協領導劉白羽來到胡風家，和他單獨談話。接着來了一個陌生婦女和胡風妻子梅志單獨談話。然後又來了一群人，出示“搜查證”後對全家進行搜查。搜查完畢，把胡風帶走了。從那天以後十一年間，梅志不知道胡風的去向。^④

胡風入獄之後兩天，《憲法》才發生效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五月十八日“批准”逮捕胡風。

又過了一個星期，五月二十五日，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擴大聯席會議，出席七百多人。郭沫若主持大會，作了“請依法處理胡風”的講話。他建議把胡風“作為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理”。他特別強調：“今天，對於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

于是大會通過決議：開除胡風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其作協理事、文聯委員和《人民文學》編委職務。大會還向全國人大常委建議：依據《憲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撤銷胡風的人大代表資格。

其實這個請求已經晚了。因為一星期之前胡風就已經從“人大代表”變成囚犯了。

大會通過決議時，有一個人不曾舉手，他是呂焚。

呂焚曾要求大會發言，得到允許後到主席臺上坐在郭沫若和周揚中間。他說：“胡風不是政治問題，是認識問題，不能說他是反……”他没能說下去，會場大嘩，他立刻從主席臺上被推下去了。

于是呂焚也成了“胡風分子”，失去自由。

胡風文字獄是毛澤東親手所造

《人民日報》在六月十日公布了“第三批材料”之後，僅用五天時間就把整個三批材料編在一起，取名《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正式出版了。事後人們才知道，原來這位《人民日報》“編者”就是毛澤東。他親自抓這件事，足見他多么重視這場鬥爭。《按語》

和《序言》都是他寫的。令人吃驚的是：他能從平平常常的字裏行間發現許多“反革命”言行，並且根據這種“發現”去決定這批人的政治生命。事實上這場鬥爭已經不限于“胡風反革命集團”。毛澤東在給這本《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寫序言時已經指出：“只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了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⑤

形勢一天比一天嚴重，運動迅速升級。報紙上不斷發表消息、材料和聲討文章，使全國籠罩在空前緊張的鬥爭氣氛中。（注一）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次文字獄。由於“廣大的革命人民”已經被毛澤東所編的那本《材料》“激發了革命熱情”，“辨別能力”迅速提高，所以“胡風案”不斷擴大，共株連二千一百多人，許多人被逮捕，被“隔離審查”或“停職反省”。其中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和作家。（注二）雖然文聯作協的大會請求“依法”處理胡風，但胡風作為一名“反革命案被告人”，並未享受法律給予被告人的權利。他被逮捕之後並沒有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被起訴，而是一直被關在那裏。

兩年後，中共開始整風，要求黨外人士提出意見，幫助黨改正缺點錯誤。這時遼寧省瀋陽師範學院有兩個人（張百生，黃振旅）站出來為胡風說了話：

“胡風及‘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分子嗎？根據前些時候公諸于世的材料看來，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從胡風給黨中央寫的‘萬言書’中，絲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識形態範圍內的文學藝術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議罷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議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對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條主義的批評，這是公民的起碼權利”。這兩個人說：“胡風問題已過去了兩年，為甚麼還不公開審判？我們要求黨中央，如果打對了就立即公開審判，如果搞錯了就馬上開釋，並恢復其名

譽。”^④

這是繼呂莢之後第二次有人為胡風鳴不平。他們的意見當然不會有任何作用，胡風照樣被關押着。不過這兩個人的意見對他們自己倒起了作用：他們都被打成“右派”，變成人民的“敵人”。

當局肆意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

胡風一直在秦城監獄中被關押了十年之後才開庭審判。這時已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被判處有期徒刑 14 年，扣除十年監禁，還剩四年刑期，監外執行。他可以回家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譴送到四川一個茶場監督勞動，一九六七年又被收監。

一九六九年刑期已滿，但他繼續被監禁。於是一九七〇年他上書請求釋放，結果卻被四川省公安廳“改判”無期徒刑。原因是他在自己保存的毛澤東像的四周和背面寫有詩詞。（公安機關可以給人判刑，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新鮮事情。）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由公安部命令四川省公安廳把胡風釋放。二十四年鐵窗生涯已經徹底摧毀了他的健康。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在政治上為胡風平反，但還留了些尾巴。一九八八年中共中央又發出一個文件徹底給他平反。不過胡風已經聽不到了，因為他在一九八五年就去世了。

（注一）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國開展了“肅反運動”。這次“肅反”也運用了延安“審幹”的經驗，採用群眾運動的方法。毛澤東編寫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中的《序言》和《按語》所表現那種超常的政治嗅覺，成為這次“肅反運動”中群眾分析“敵情”的有力武器。據《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說：“由於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有些問題政策界限不

清，這次內部肅反運動曾在一個較短時間內，發生過鬥爭面過寬和‘逼、供、信’的偏向。”(後來，又進行了復查和甄別。)④

(注二)胡風一案，到一九五六年底，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共七十八人(內有共產黨員三十二名，全部開除黨籍)。其中判刑的是胡風、阿壘、賈植芳。勞動教養、撤職、下放勞動的六十一人。其中有人因長期關押而致病，如胡風、路翎、王元化、蘆甸等；有的含冤而死，如阿壘、呂焚等；有的自殺身亡，如方然、鄭思等。⑤

※ ※ ※

第二章 引文出處

- ①《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27 頁
- ②同上,第 65 頁
- ③同上,第 81,89 頁
- ④《梁漱溟評傳》第 311 頁
- ⑤《光明日報》1951 年 10 月 5 日
-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3-1956)第 131-132 頁
- ⑦《中國“左”禍》181-182 頁
- ⑧《梁漱溟評傳》第 390 頁
- ⑨《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07-108 頁
- ⑩《中國“左”禍》第 182-184 頁
- ⑪《梁漱溟評傳》第 409-410 頁
- ⑫《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34-135 頁
- ⑬《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9 日
- ⑭《新華月報》1954 年第 11 號,第 227 頁
- ⑮《中國青年報》1954 年 11 月 2 日
- ⑯《中國“左”禍》第 159 頁
- ⑰《文藝報》1954 年第 23、24 期合刊——胡家林:《是新事物還是“怪現象”?》
- ⑱《文壇公案》第 120 頁
- ⑲《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35 頁原注
- ⑳《人民日報》1954 年 11 月 29 日
- ㉑《解放日報》1954 年 12 月 12 日
- ㉒《光明日報》1954 年 11 月 28 日
- ㉓《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134 頁
- ㉔《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第 142 頁
- ㉕《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9 日
- ㉖《國史通鑒》第 1 卷,第 765 頁
- ㉗同上,第 767 頁
- ㉘《紅樓夢研究資料集刊》第 2 集,第 384 頁

- ⑳《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 ㉑《中國語文》1954年12月號
- ㉒《新華月報》1954年第12號,第209頁
- ㉓《無地自由·胡適傳》第361頁
- ㉔《胡適言論集(1952年11月至1953年1月)》第232-233頁
- ㉕《新華月報》1954年第9期第 頁
- ㉖臺灣《聯合報》1997年2月27日
- ㉗《無地自由·胡適傳》第364-365頁
- ㉘同上,第351-354頁
- ㉙同上,第363-364頁
- ㉚《中國“左”禍》第164-165頁
- ㉛《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213頁
- ㉜《中國“左”禍》第165頁
- ㉝《胡風傳》第208頁
- ㉞《中國“左”禍》第167頁
- ㉟同上,第167-168頁
- 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62頁
- ㊲《瀋陽日報》1957年6月10日
- ㊳《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215頁
- ㊴《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第555頁

第二章附圖



圖為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一九五四年在校園留影。俞為中國有數的研究《紅樓夢》的專家。一九五四年，毛澤東藉兩個青年人對俞平伯的批評，親自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其實這只是一個由頭，毛的真正意圖，是由此展開一場規模更大的“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思想鬥爭運動，主要敵人是對現代中國思想界有巨大影響的胡適。



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首倡白話文。他又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為學術界一代宗師，對中國文化思想影響巨大。他崇尚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故被中共視為思想上的主要敵人，曾組織全國學術界的力量予以批判。

陶行知生前和中共關係甚好，曾被稱為“人民教育家”。但因他尊崇武訓，故在批判《武訓傳》時，一並遭到批判。

圖為一九一七年胡適(左二)和陶行知(右一)等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影。



圖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一九五四年在中國科學院大會上作報告。

身兼作家、學者和政治活動家的郭沫若，早年在文藝和歷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貢獻。他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變幻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從批判《武訓傳》、批判胡適和胡風，一直到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都積極參與，站在批判的前列。四人幫被抓起來以後，他也積極參與批判四人幫。



胡風，當代中國文字獄的第一位受害者。只因文藝思想與中共不同而於一九五五年下獄，直至一九七九年方才重見天日。二十四年的監禁已經徹底摧毀了他的健康。這是他出獄後，一九八二年在家中所攝照片。

毛澤東親手鑄造了這場文字獄。他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所寫的序言和按語，已經成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典範。從此以後，左派打手們進行批判鬥爭的時候，無不從中得到陷人於罪的法寶。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

(1956 - 1957)

一九五五年過去了。那是一個“鬥爭年”。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全面開花。胡適思想，胡風思想，梁漱溟思想，都是重點對象。而且還批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把一些人送進監獄。

到了下半年，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在全國鋪開了。它要求在所有的機關、團體、軍隊、學校、企業中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共黨內還有一場鬥爭，發生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批評主張合作化搞慢一點的人是“小腳女人”，並在全黨開展“反右傾”鬥爭。於是這一年下半年便出現了一個“農業社會主義高潮”。到年底，全國農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組織到合作社裏來了。

中國提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在“農業社會主義高潮”的推動下，全國的個體手工業和私營企業也都迅速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尤其快得出奇。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北京首先宣布全部實現公私合營。一月十五日，首都各界二十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向中央領導人報喜：“北京第一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其他城市也不甘落後，緊跟着北京一下子都“進入社會主義”了。原來一九五三年制定“過度時期總路綫”時，預定要用十五年實現，結果只用了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就提前實現了。

進入一九五六年以後，除了“肅反”還在繼續（但群眾性的鬥爭已經過去，運動轉入由組織部門對少數重點對象的審查，其他的鬥

爭高潮已告一段落),在思想領域,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出現了。

一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當代中國僅有的一個“自由化”年份

和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階級鬥爭比起來,一九五六年是風和日麗的一年。代替那種嚴峻肅殺的景象,是比較溫和寬鬆的氣氛。如果前者叫作“僵化”或“強硬”,那麼後者常被叫作“自由化”。在這個意義上,一九五六年是個“自由化”的年份。

顯然,中共高層領導已經準備把工作重心從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包括思想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從一九五六年起,用毛澤東的話說,可以“向地球開戰”了。

這一年開門頭一件事,是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因為搞經濟建設就要發展生產,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要掌握科學知識和現代技術。這就需要知識分子,需要“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于是在前幾年的批判和鬥爭之後,應該調整一下知識分子政策,至少調整一下政策的重點,該強調“團結”了。(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團結,教育,改造”。)為此,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專門成立一個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十人小組”為會議做準備,由周恩來負責,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安子文、徐冰、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

知識分子第一次摘掉“資產階級”帽子

會議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南海開幕。這是中共有史以來專門為知識分子問題而開的一次規模空前的盛會。從毛澤東起,中共中央和各地黨政領導機關以及文化教育科學藝術單位的領導人共一千二百多人與會。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宣布,經過建國以來的六年,絕大部分知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

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信任他們，要正確安排他們的工作以便發揮所長，要提供適當的工作和改善待遇。他談到知識分子改造思想的途徑時，除了學習馬列主義和社會生活的觀察與實踐這兩條道路之外，又提出一條新路：“他們自己業務的實踐”。這是全新的提法，表明中共對專門知識和技能開始重視了。^①

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講了話。他說：“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單靠老粗是不行的。”^②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經歷的是一次比一次嚴厲的批判和鬥爭。尤其是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雖然最後被定為“胡風分子”的只有幾十個人，但這次以思想治罪的文字獄，特別是席卷全國的鬥爭風暴，已經使知識分子普遍膽戰心寒了。如今這個盛大的知識分子會議，第一次宣布“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實在使他們受寵若驚。因為自從延安整風以來，知識分子就被看成工農的異己力量。他們頭上戴着帽子，最輕的也是遭到輕蔑或嘲笑的“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時候這頂帽子還不容易爭取到手，扣到他們頭上的帽子往往都是“資產階級”。如果再重一點就是“封建文人”、“買辦文人”或“帝國主義奴才”了。這種下賤的階級屬性，自然就成了知識分子總是處於挨鬥地位的根源。如今由中共中央出面宣布，這個往昔被看成異己階級的知識分子，一下子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種挨批挨鬥的歲月大概總算過去了。而且這個會議之後，為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又采取了一些具體措施，還破格吸收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於是中共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好像一下子變得緩和了。

蘇共“二十大”沖擊波

一九五六年二月，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對中國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這就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批判。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向大會作了一個秘密報告，主旨是反對個人崇拜，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

斯大林不但是蘇聯和蘇共的領袖，而且一直被奉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統帥，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現在經赫魯曉夫一揭開蓋子，原來他是這樣一個可怕的獨裁者。他犯下的不單單是錯誤，而且是大規模殘害無辜的暴行。因此赫魯曉夫的報告立刻在全世界引起強烈震動，對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一次空前猛烈的衝擊。不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內，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在野黨內，一向居于統治地位的斯大林主義強硬路綫都遭到嚴重的挑戰。

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前，斯大林的路綫在國內已經不得人心，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路綫已經在蘇共黨內占了上風。他們在國內外都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特別是平反了斯大林時期的一些冤獄，釋放了大批無辜者，並使許多屈死者得到昭雪。這些被稱為“解凍”或“自由化”的措施是得人心的。因此，一個自由化的潮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迅速擴展開來。這個趨勢在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明顯。

毛澤東對蘇共批判斯大林，懷有複雜的心情。斯大林的暴行，是客觀事實，誰也無法給他辯護。但是毛澤東從斯大林死後的遭遇想到自己，擔心中國也有“赫魯曉夫”，在他死後也如法炮制一個秘密報告。這件事，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魘，並且埋下了日後反對“修正主義”的種子。不過赫魯曉夫揭開斯大林蓋子這一勇敢的行動，的確使中國共產黨從蘇聯和東歐的覆轍中看到了改弦易轍的必要性：經濟上的僵化和政治以及思想上的高壓，必然使矛盾激化，這對統治者是十分危險的。所以緊接着蘇共“二十大”，中共有兩個重要動作：一是調整“十大關係”，二是提出“雙百方針”。再加上前面說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些動作構成了中國的“自由化”

進程。

中國的“自由化”進程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十個問題，要求調整十個方面的關係，包括經濟結構，管理體制，民族關係，黨群關係，國際關係，是非關係等等。總的傾向是背離僵化的斯大林主義，轉向較為靈活和寬松的政策。比如：強調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而不是一味注意重工業；要多搞經濟，少搞軍備；要兼顧國家和個人，不要抹殺個人利益，不要把農民搞得很苦；要團結民主人士，讓他們發表意見，罵共產黨的，也要讓他們罵；要向外國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③

從這時起“一邊倒”已經不是唯一的方針了。中國已經不願意老把自己捆在蘇聯的大腿上，與世隔絕了。

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又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爲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④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央向知識界作報告，詳細地講述了這個方針。陸定一說，這個方針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和科學研究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意見、堅持自己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⑤

從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到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中國大陸的思想文化園地開始有了一點春意。後來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曾講到當時知識分子的欣喜心情：

“幾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分子原本已起了變化。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着

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他特別談到在運動中受到批判或被鬥爭所震驚的人，心情開始復蘇：“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⑥

中共“八大”不再強調階級鬥爭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宣布：“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基本上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了。”^⑦於是國內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後來有人把它說成“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矛盾。

中國這種理論和實踐並不符合中共所信奉的馬克思的觀點，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只有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舊有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容納的時候，才能發生社會革命，而不是先建立起“先進的”生產關係，然後再去發展生產力。換句話說，這種作法是超前的，這種“先進的”制度是沒有物質基礎的。不過中國的實踐完全符合列寧的思想，因為列寧主張在落後國家可以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然後加速發展生產力，“跑步”追上先進國家。

但是不管怎麼樣，既然“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那就不必老是揪住資產階級去鬥爭了；既然生產力太落後，那就集中力量去搞經濟建設好了。這樣一來，就不必天天鬥來鬥去，人們將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可以休養生息了。中共“八大”的這個決策，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從理論上和政策上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向經濟建設，所以人們都是歡迎的。

新的時期好像真的開始了。

二 人民內部矛盾

新時期的矛盾

一九五六年因爲上邊沒有發動過新的思想批判運動，所以就全國範圍來說，局勢是平靜的。但是下邊卻不那么規矩。這一年和第二年春天，有不少地方出現了“群眾鬧事”；僅全國總工會收到報告和直接處理的事件，就有罷工二十九起，請願五十七起。學生罷課和請願事件有三十起，參加者一萬多人。^③

這些事件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本來也無足輕重，不過它卻暴露了匆忙改組社會經濟關係以及照搬蘇聯計劃模式所產生的問題。城市的糧食、肉類和副食品短缺，升學、就業方面的困難，農民鬧退社，這些問題當然各有具體的原因。但是蘇聯模式那種片面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過高的積累率，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特別是僵化的計劃體制，都嚴重妨礙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比例失調，影響人民生活。當五年計劃剛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明顯。隨着時間的過去，問題就越積越多，越來越重了。再加上社會關係大改組所造成的工作上、生活上和思想上的不適應，於是矛盾就在各個方面陸續暴露出來了。

而且一九五六年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那兩個國家的問題，說到底無非是蘇聯強加給他們那種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當然還得加上一個民族壓迫的因素。蘇聯“老大哥”的控制和剝奪，是任何“小兄弟”都不堪忍受的。原來常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中國人，現在看到波蘭和匈牙利的事態，便不能不想到：“東歐的今天，會不會是我們的明天呢？”

其實，不論中國的問題還是波蘭和匈牙利的問題，經濟因素只是它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政治。這些國家都是一黨專政，沒有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壟斷產生腐敗，這是鐵的規律。在

這種制度下，人民對掌權者無法監督，社會問題沒有正常的渠道和民主的程序來疏導和解決，而是靠高壓來維持“穩定”。等到矛盾積累到壓不住的時候，便爆發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里面，“黨的領導”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是自認為最先進的政治制度，決不容有任何動搖或冒犯。因此，出了問題也不可能用改變這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而只能用“加強黨的領導”來對付。其實這種“黨的領導”就是一個黨獨掌政權。這種“領導”愈“加強”，壟斷便愈嚴重，問題便愈多。

“兩類矛盾”的理論

面對這一大堆新問題，黨內有不同的反應。從戰爭和革命年代過來的領導幹部，習慣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但毛澤東不是這樣，他提出一種“兩類矛盾”的理論，用來觀察新時期的問題。從一九五六年底到一九五七年初，毛澤東在中央和好幾個省市反復講述他的觀點：要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也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

毛澤東特別提醒黨內領導人注意東歐的教訓。匈牙利共產黨原來的領導人拉科西老是用高壓手段壓制群眾，結果被推翻了。所以毛澤東說：

“要學會這麼一種領導藝術，不要甚麼事情總是捂着。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願，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甚麼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⑥

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把它和“敵我矛盾”加以區分，被認為是毛澤東的創見，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是解決新時期國

家政治生活的正確方針。不過這個理論並沒有觸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問題，而只是在一個黨獨掌政權的框架之內，對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加以改進而已。它的根本前提是“以我為主”；誰是人民？誰是敵人？矛盾的性質由誰來“正確區分”和“正確處理”？都是由“我”即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而且在這個黨的內部，由于延安整風以後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使得全黨上行下效，都是“第一把手”說了算，所以“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各級黨委書記的個人專斷。

毛澤東的“民主”概念

當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詞匯裡也有“民主”。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裡也談到“民主”，可是他的“民主”有多重含義，唯獨不是國家的政治制度。他所說的一般是指領導者的個人作風，是領導“方法”或“手段”，也就是領導者能讓人講話，而不是封住對方嘴巴，這就是“民主”；領導者對下屬或人民群眾進行批評或說服教育，而沒有一棍子打死，這也是“民主”。毛澤東還把“民主”和“集中”聯在一起，他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即由領導來指揮你去“民主”。毛澤東還有一個“大民主”的概念，指的就是群眾“鬧事”，包括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游行示威等等。後來又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叫作“大民主”。所有這些“民主”，沒有一種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

正因為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實行民主制度，所以他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思想便只有努力說服各級黨委領導人，指望他們理解和接受，並且自覺改變方法和作風了。不改變制度，不建立民主機制，而是靠改變領導作風解決權力壟斷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這正是中共掌權後必須不斷整風的原因。

“收”和“放”

在不改變政治體制的前提下，毛澤東在這個期間的確表現了一個最高掌權者的眼光和氣度，他總是強調“放”，反對“收”。當然他的“放”不是聽之任之，而是認為，即使是壞東西，也只有放出來才能解決；只有放，才能揭露矛盾，解決矛盾。“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比如壞戲，他就說：“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⑩

對於鬧事，他的方針是：“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⑪

他還寬宏大度地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⑫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把他對於“兩類矛盾”的思考作了一次長篇講話，這就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三月十二日，他又在全國宣傳會議上發表講話，也是同一個主題。宣傳會議雖然是黨內會議，卻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種開會方法都表現了開放的特色。這兩個講話迅速在全國廣泛傳達，引起熱烈反響，知識分子尤其感到溫暖。

給知識分子重新戴上帽子

不過知識分子可能沒有注意到：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初的這兩個講話，又把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會議時周恩來給他們戴的桂冠——“工人階級一部分”——收回去了。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我們

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所以他的結論是：“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④這就是說，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給知識分子摘掉的“資產階級”帽子，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又被這個黨的主席重新給他們戴上了。

更令人不安的是毛澤東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間，劃出一些“抱敵對情緒”的人。“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他還算出了一個數目：“這種人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⑤毛澤東很喜歡從自己的頭腦里取出一些數字來進行各種政治估量。這一次他取出的是百分之一、二、三，也就是五萬、十萬、十五萬。這樣，按照“兩類矛盾”的學說，這些人就已經成為“敵人”，面臨着被專政的命運了。

三 整風和“鳴放”

舍本逐末的整風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共掌權以後最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開始了。這次整風和延安整風不同。延安整風要解決的是黨內矛盾（毛澤東和王明誰來領導），這次整風要解決的是黨和群眾的矛盾（鞏固一黨專政）。很明顯，它的背景是：東歐斯大林極權體制瓦解；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已經暴露了嚴重問題；而黨的各級領導幹部依然沿襲革命戰爭年代的方法處理和平建設時期的問題，並且在權力的腐蝕下，與群眾的關係日益緊張。這個黨既然從來不曾考慮過改革政治體制，便只有從思想作風的整頓上試求解決了。

整風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反對的是官僚主義、

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如果不改革政治體制，只求救于思想作風，那麼，這三點是抓到了要害的。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使黨和政府的領導脫離群眾，而主觀主義正是這兩者的思想根源。權力在手而又主觀主義，那後果就可想而知了。即使僅僅從執政黨本身的利益來考慮，認真整頓一次作風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指示》特別重新強調一下毛澤東經常引用的封建皇帝廣開言路的名言：“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⑮

《整風指示》五月一日見報。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要在全國採取擴大民主生活、擴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使領導者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變得容易解決，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感覺到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這裏的“擴大民主生活”當然不是建立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機制，而只是“讓人講話”，“擴大”者，即可以多講話，可以批評共產黨。當然，人民講了話，執政黨聽取與否，是另一回事。按照毛澤東的原則，只能聽取“正確”的意見，如果聽者覺得“不正確”，那自然就不聽了。所以人民講了話是否就有了“主人翁的感覺”，仍然取決于執政黨的態度，但是能夠讓人把話講出來，已經比不讓人講話好多了。特別是在一連串的思想批判和思想治罪的狂風暴雨之後，能夠如此廣開言路，的確使人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了。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已經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請他們對各方面的問題進行批評，意見可在報紙上發表，以便引起社會注意，這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中共中央和地方以及各部門的黨組織普遍都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座談會，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很快，一個“鳴放”高潮到來了。

在北京有兩個主要鳴放園地。一個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從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共開會十三次。另一個是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的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

工商界座談會，從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共開會二十五次。另外《光明日報》編輯部還在上海等九個城市組織座談會，邀請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參加“鳴放”。這些座談會的發言都在報紙上發表，對全國起着推動作用。

這是建國以來共產黨第一次如此坦誠公開征求意见，而且有幾個月的思想蘊釀和輿論準備，這種準備又是毛澤東親自出馬，四出奔走，耐心說服，所以大家都十分踴躍地提出各種意見。因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八個字很得人心，所以大家又把整風中提出各種意見叫作“鳴放”，或“大鳴大放”，以表示它的群眾性和規模。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治空氣最活躍的時期。

“鳴放”的主要意見

當時比較有名的是這樣一些意見：

“政治設計院”——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④

“平反委員會”——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說，為了使人給共產黨提意見而不受打擊，要由人大和政協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甚麼委屈都來申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使他們減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⑤

“黨天下”——《光明日報》（當時是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總編輯儲安平說，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他說，全國不論大小單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凡事都要黨員點頭才算數，

“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⑧

“輪流執政”——天津第三女中教員黃心平提出：“為甚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的辦法呢？一黨執政有害處，像共產黨已經整過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通過這一次整風是不是能夠徹底消滅這些缺點，還很使人懷疑。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過競爭來輪流執政，由各黨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地選擇，這就好得多。因為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選票，為人民服務。”^⑨

“定息不是剝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章乃器說：“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該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按：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資本家已交出生產資料，失去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只是從一九五六年起每年收取股金的5%作為定息，連收七年，後又延長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取消。）他還認為，雖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有本質區別，“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區別”。^⑩

“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竑就黨政關係提意見說，有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就有可能使人以為黨的領導方法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不利于團結全國人民。”（按：“五人小組”是中共領導肅反運動的組織。）^⑪

“‘成績是主要的’已成公式”——黃紹竑還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這意味着掩蓋錯誤。個別錯誤即使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掩護它。就司法方面來說，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就經濟建設來講，百分之二

三的錯誤不知要造成多少億元的損失。”^②

“取消馬列主義指導”——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說，“以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產生教條主義；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個學者一個學說都不能把一切好的東西都包括進去。”他認為，共產主義的概念將來可能會有變化。社會在發展中，要指導，要限制，就是教條主義。因此他建議“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③

“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地方”——南開大學教授雷海宗說：馬克思恩格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可是以後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現在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一八九五年的地方。“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會另做結論。”^④

除了這些著名人物和著名言論以外，還有許多意見，也都是和黨的領導有關的。比如“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新華社“一花獨放”問題，報紙“報喜不報憂”問題，新聞工作者只能按領導意圖辦事而不能以獨立精神忠于客觀事實的問題等等。民盟曾組織了兩個小組，研究科學體制和高等學校領導制度。參加這兩個小組的，有曾昭掄，千家駒、黃藥眠、費孝通、吳景超等教授。他們在關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中，對黨的領導方法和黨員素質及作風提出一些意見，不過並未主張“黨委退出學校”和“教授治校”。他們認為，高等學校黨組織應抓：政治思想教育，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黨的建設，動員黨員起帶頭保證作用。至於教學、科研、人事，應由校務委員會來管，這是學校最高領導機關。這些意見，後來被認為是要“黨委退出學校”。（注一）

（注一）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談過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黨委書記包攬一切，校長有職無權的狀況。他在上海

參加一次整風座談會，一個大學校長的發言給他印象最深。這位校長說，他毫無實權。這個大學的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赴京，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務由校長代理”云云。^⑤

四 反右派鬥爭

事情正在起變化

那些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中共感召下正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時候，誰也不曾想到：大禍已經臨頭了。

在“鳴放”高潮中，毛澤東在五月十五日寫了一篇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題目叫做《事情正在起變化》。

事情是在起變化，整風運動要變成反右派運動了。

還沒有材料證明毛澤東或中共中央在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之初就預謀“引蛇出洞”，然後來一個反右派運動。事實上除了最卑鄙的政客以外，任何政治家也不會出此下策，對被領導者玩弄陰謀。

現在研究者所肯定的事實是：中共確實要整風，準備虛心聽取意見，並沒有計劃“反右派”。連當時主持黨外高級人士座談會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都說，毛澤東開頭並沒有說要反右。他去主持座談會，也不是要“引蛇出洞”。不過他每次開會後都及時向毛匯報。據李維漢回憶，到了五月中旬，當他匯報到有人提出“輪流坐莊”和“海德公園”（在英國倫敦，假日供人發表各種不同政見）的時候，毛澤東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毛當時決定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當李維漢匯報說，有人把黨外人士批評共產黨比作“姑嫂吵架”時，毛澤東說：“不是姑嫂，是敵我。”只是聽到毛澤東這些話之後，李維漢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

備。^②

據李維漢說，毛澤東聽到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在五月十五日寫出那篇《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②

毛澤東寫道：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彩烈。黨內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他像往常一樣，對人的劃分有個數量上的估計，“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還首次提出“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③

他知道，從“整風”到“反右”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一定會招來怨言和責難，因為誰也沒有思想準備，不但黨外那些天真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沒有料到，就連黨內的領導人物如李維漢者都不曾料到。於是毛澤東預先準備了答案。他自問自答地說：

“‘你們這一篇話為甚麼不早講？’為甚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了一切毒草必須除掉嗎？”^④

這樣一來，“反右派鬥爭”就是事先安排好的，現在不過是按原定計劃照章辦事罷了。反正我有言在先，誰叫你們不聽呢？

然而用“毒草必須除掉”這類語言為整風突然轉向來打圍場，畢竟太牽強了。還得找點別的論據把這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說得人們無法反駁。可是遍查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共的“八大”決議以及《整風指示》，都找不出反右派的理論根據和政策規定。於是只好求助于別的辦法了。

更改原來的講話——陰謀變陽謀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了。人們吃驚地發現，六月十九日的文本和二月二十七日的文本已經大不相同了。除語句上按照“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寫以外，最要命的是新增加了兩處“反右派”的武器。一處是講階級鬥爭的：

“在我國，雖然……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③

另一處是劃分“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即劃分敵我的標準，也就是劃“右派”的標準：

“（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些團結。”^④

增加了這兩處之後，“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據了。你們不是埋怨我沒有早說嗎？我在二月二十七日就說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有時還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給我提的意見？分明是在進攻！是資產階級在向無產階級進攻。你說你不是進攻嗎？那么用六條標準衡量一下吧：你的話“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你是想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就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敵人，就是右派。這是我二

月二十七日“已經說過”的。

總之，毛澤東的講話經過這番修改之後，反右派鬥爭就成爲“有話在先”了。也就是說，不是我“不教而誅”，而是你“明知故犯”。活該！

毛澤東後來給“反右派”辯護的時候說，他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不過毛澤東五月十五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時候，顯然還不打算把這個“陽謀”拿出來見見陽光。他只讓黨內領導幹部先知道，而對那些“鳴放”的人保密，也就是讓更多的大魚浮上來，以例聚而殲之，多打一批“右派”。

直到六月八日，也就是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二十四天之後，在“大魚”“小魚”紛紛浮上水面之後，這個“陽謀”終於露面了。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爲甚麼？》的社論，正式打響了“反右派鬥爭”的信號槍。社論說：“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共產黨‘下臺’。……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誘出更多右派，以便聚而殲之

但是毛澤東還是覺得意猶未盡，所以在同一天又爲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在這個黨內指示中，毛澤東還要讓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的“右派”盡量暴露。“高等學校組織教授座談，向黨提意見，盡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來，登在報紙上。……最後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②

在這個“指示”里，毛澤東好像回到戰爭年代，以一個統帥兼參謀長的身分向各路大軍發布作戰命令，安排殲敵計劃。他說：“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就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險。現在的整風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

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③

果然，在這個“指示”的安排下，各地又用“引蛇出洞”的辦法誘出更多“右派”。

毛澤東發明“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

七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書記會議，討論反右派鬥爭問題。毛澤東在這個會上印發了他的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在這篇文章里，他確定“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④並且第一次提出：單有經濟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他認為“反右派運動”就是這種革命，不過這種鬥爭以後還要有。“從現在起，可能還要延長十年至十五年之久。”^⑤這就奠定了後來不斷地進行“政治思想戰綫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

在毛澤東的指揮下，一場圍剿“右派”的戰略決戰在全國展開了。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到處都在進行。不過這種“大辯論”不同一般，被辯論的一方是沒有發言權的。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外到黨內，所有被認為“放”過右派言論的大小人物，都陷入人民戰爭的包圍圈內。在“大辯論”的火力下，他們紛紛檢討、認罪、投降。比如，《向人民低頭認罪》(章伯鈞)，《我的初步交代》(羅隆基)，《向人民投降》(儲安平)，就是一些著名右派的公開表態。有人在檢討自己的同時還揭發批判別的右派。

比如，《北京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就刊登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陶大鏞的檢討：《揭穿章伯鈞、羅隆基的陰險活動，堅決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綫》。他說：“我的思想已經被章伯鈞和羅隆基的‘糖衣炮彈’打中了……我腦子里裝進的一點無產階級思想，一

下子就被資產階級思想所占領了。”“我今天愈想愈可怕，我險些兒落進他的政治圈套了。”所以他表示“堅決與一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堅決跟黨走”。不過，他最後還是被劃為右派。

猛烈擴大戰果，無辜紛紛落網

狂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在中共中央指揮下戰果迅速擴大。六月二十九日中央估計需要點名批判的“極右分子”有四千人。剛過十天，中央又通報說：準確的名單擴大了一倍，“全國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約有八千人。”八月初，中央又提出反右派運動要向地、縣、市、區和大廠礦發展，後來又要求向中小學教職員工發展，並且要求“深入挖掘”右派。於是右派數量迅速上升。^⑧

當時戰果擴大之快，常常使人應接不暇。北京文藝界開會，作家鄧友梅正在臺上義正辭嚴地批判“右派”作家劉紹棠和叢維熙，不料就在這時，他本人也被當場宣布為“右派”，于是他自己又變成批判的對象。

很多“右派”，並不是滿腹意見有話要說，而是一個偶然機會，偶然一句話就陷入羅網的。上海《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整風時剛剛訪問蘇聯回來，忙于寫訪蘇見聞，根本不想參加“鳴放”，後來硬被拉去開會。會上大家談到黨群關係有隔閡。徐鑄成說，《文匯報》黨員和黨外人士就合作得很好，可見領導的黨員至少要懂一點本行的業務。“如果完全是外行，那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了。”就是這個發言，被指為“大毒草”，是“推廣反黨經驗”，于是被劃成“右派”了。^⑨

其實，領導上如果能把誰劃成右派，就是不“鳴放”也逃不過去。著名老作家聶紺弩，因為胡風案受株連而被“隔離審查”一年。剛審查完就趕上“鳴放”。他婉言拒絕了領導上要他“鳴放”的盛情，甚麼也沒有說。但是他的夫人周穎卻說話了。她批評了“肅反”，並且提出一個驚人的問題：“胡風算是甚麼樣的反革命？”這一

下惹了大禍，不但成了“特大右派”，而且殃及聶紺弩。他被指控為周穎發言的“幕後策劃者”。他找出周穎發言的稿紙，證明上面沒有他寫的一個字。但是這也不行，反正非把他打成“右派”不可。于是他在批判會上說：“我現在想通了。別人成右派，都有一個偶然性，他可以想：如果我不寫那張大字報，不發那次言，就沒問題了。而我聶紺弩成右派是有必然性的，即使不鳴不放，從根子上也是右派。”^⑧

五 新的“反動階級”

知識分子的厄運

反右派運動前後差不多經過一年，到一九五八年夏季結束。當時也不清楚到底打了多少右派。據後來平反復查時統計，共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⑨，除了少量政壇人物外，幾乎全是知識分子，約占全國知識分子的百分之十。其中許多是著名的學者、作家、科學家、詩人、藝術家、記者。這些人經過反復的鬥爭之後，都要經過“組織處理”。是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員的，開除黨團籍，是領工資的，要降級，嚴重的還要開除公職。然後，一律下去勞動。有的是“勞動改造”，有的是“勞動教養”，有的是“下放勞動”。最輕的是在本單位掃地、倒痰盂、刷廁所，不過一般都被送到邊遠的農場或鄉村，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甚麼時候可以“摘帽”，甚麼時候可以回來，那就看甚麼時候被認為“改造好”而定了，大抵從一年到二十年不等。

“帽子”，是現代中國特有的政治術語。國民黨時期只有一頂“帽子”，叫作“紅帽子”，是用來稱呼共產黨員和左傾青年的。那時的“左傾”是指進步人士和革命者的。誰要是被戴上“紅帽子”，就成為特務注意的對象，快倒霉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紅帽子”沒有了，另外有四頂新帽子：

“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簡稱“地富反壞”或“四類分子”。“紅帽子”只是約定俗成，並非正式術語。被戴上“紅帽子”的人，如果不被抓起來，便仍有公民權，可以自由行動，只是被特務暗中注意罷了。“地富反壞”是正式的政治帽子。誰被戴上某一頂帽子，他就正式具有該種“分子”的身份，政治權利就被剝奪了。“反右派運動”以後，中國大陸又多了一頂政治帽子：“右派分子”。雖然毛澤東說“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④，但他們都是和“地富反壞”排在一起的。“地富反壞右”，這是專政對象的通稱。在官方和民間已經用了多年的“四類分子”這個名詞，就被“五類分子”代替了。

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盼望的是摘帽子。不過摘了帽子也還是直不起腰來，因為他們被叫作“摘帽右派”。這就是說，帽子盡管摘了，人還是“右派”。這是新的“階級敵人”。（注一）

新標準——按照人的思想劃階級

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一，階級是經濟條件決定的；第二，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即使一時消滅不完，也總應該越來越少。中共“八大”就是這樣看的。

但是反右派運動以後，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階級倒是越來越多了。這是反右派運動的成果。

一九五八年五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會議作報告時說：中國還存在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

這不是根據經濟地位，而是根據政治思想去劃階級。而且一個人的政治思想究竟怎樣，又只有領導者是最有權威的裁判。反右派運動後，第一，中國平空增加了一個新的“右派階級”。五十多萬“右派分子”加上他們的家屬，以百萬計的人們就這樣被決定了

命運；第二，知識分子又從“工人階級一部分”變成資產階級的一部分。

“八大”二次會議否定“八大”一次會議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正式否定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通過了一個新的提法：

“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④這樣就給以後連年不斷“階級鬥爭”鋪好道路了。

反右派運動對整個中國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

首先是阻斷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下面解放出來轉向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一九五六年開始的“自由化”或“解凍”進程，經中共“八大”的確認，完全有可能使中國擺脫連年不斷的政治思想鬥爭，從此轉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軌道。但是“反右派”鬥爭使這一切成為泡影。整個中國又重新被拉回到無休止的大規模階級鬥爭中來。使中國社會的發展滯後了幾十年。

其次是摧殘了一大批有眼光有膽識正直敢言的優秀分子，把他們投入社會最低層，使他們完全喪失了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淪為被污辱與損害的“五類分子”，在屈辱中度過一生中最富有創造力的青春年華。還有些人，或在鬥爭中自殺，或在以後的苦役折磨中了此殘生。在這場運動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有多少家庭被粉碎，已經無法統計了。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這樣多的精英人才集中起來當作“毒草”通通鋤掉。它使中國的民族元氣遭到極大的鑿喪。

中共最大的政治失敗——失信于民

這個運動不單傷害了被鬥的“右派”，實際上也傷害了中國共

產黨本身。

經過一九五五年以前的連年鬥爭，曾為廣大群眾衷心擁護的中共，威信已經受到損害。但那些損害總的來說無非是人們覺得這個黨行事太左，或小題大作，或過分重視意識形態，或對西方文化有偏見，即使是胡風文字獄，也不過是讓人覺得這個黨太厲害而已。到了一九五六年一“解凍”，人們以為政策將調整得寬松，於是又懷有希望了。

然而“反右派運動”卻使這個黨失信于人了。一個堂堂的執政黨，那麼“誠懇”地請人來幫助整風，而且信誓旦旦地許了願：“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結果人們提了意見之後，卻發起突然襲擊，把自己請來的人打成“右派”。這不是騙人嗎？這不是故意陷害人嗎？而且那被騙和被陷害的是自己的臣民，這些臣民是忠心耿耿來進忠言的。難道還有比這更不可原諒的行為嗎？毛澤東深知這一層道理，所以他反復說明自己沒有玩弄陰謀，而是在耍“陽謀”，反右派是有言在先，早就定好了的。但是這並沒有使他擺脫困境，因為這是一個兩難的命題：如果真是早就定好了整風當中要反右派，為甚麼不明說？為甚麼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只字不提？這不是誘人上鉤嗎？一個領袖人物，一個執政黨，對自己的人民設陷阱，還有資格當領導嗎？還有資格執政嗎？如果不是這樣，就是說，原來沒有打算反右派，而是半路上被一些批評意見所激怒，因而改變主意要來一個“反擊”，那就是說，這個黨說了不算，言而無信。這樣一來，執政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也就垮了。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失去信用，就失去起碼的立身依據，這個傷害是極其沉重的。

徐鑄成在他寫的《陽謀——一九五七》中談到當時宋雲彬的一句刻骨銘心的話，極其發人深思。反右派運動中，人大開會。徐鑄成曾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在北京共酌。宋雲彬嘆氣說：“我在杭州已被批過了幾次，恐怕這次在劫難逃了。”徐鑄成竟慰他說：

“你是人所共知的黨的老朋友，如果我們也被打為右派，豈不令人寒心？”宋雲彬慘然一笑說：“天下已定，以為不會有甚麼萬一了。”葉聖陶和鄭振鐸也說：“時局真是有些看不透，究竟要發展到甚麼地步。”^④這幾位高級民主人士在革命戰爭年代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患難之交。然而到了“共安樂”的時候，徐鑄成和宋雲彬卻被打成“右派”了。也就是宋所說的：“天下已定”，過了河該拆橋了。共患難的朋友發出這種哀嘆，這對於已經坐了天下的共產黨，意味着甚麼呢？

(注一)當代中國最傑出的評劇藝術家新鳳霞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周恩來的過問下，她的帽子被摘掉了。但摘了帽子也還是“摘帽右派”，根本就沒有一個人的起碼尊嚴，更不要說作為一個藝術家應有的榮譽了。每次演出結束，觀眾為她鼓掌歡呼時，她都沒有資格謝幕，而是被迫到後臺去倒痰盂、刷廁所。甚至到外地演出時，後臺都貼上大標語：“大右派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

六 壓不彎的腰

屈打成招，摧殘士氣

反右派鬥爭是一次摧殘人的良和和氣節的運動。“打斷他們的脊梁骨，使他們跪倒塵埃”，這種殺氣騰騰的“指示”，正是發動群眾用暴力強迫“右派”屈服的形像寫照。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違心地承認自己所沒有的“罪行”，乖乖地聽候黨的處置，是每個“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如果說建國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是自願貶抑自己並且誠心要改造自己的話，那麼，到了“反右派運動”中，便只剩下屈打成招免受更多折磨的苟且偷生之念了。在這種運動中，真正實現了斯文掃地。中國傳統的“士可殺

不可辱”的氣節，已經被摧毀了。

不過畢竟還有例外。

貧賤不能移——傅雷

著名翻譯家傅雷，在整風中被打成右派，不但精神上受到極大壓力，連生活都陷入困境。因為他是不領工薪的知識分子，專靠稿費為生。但是當了“右派”以後，出版社不能再出版他的書了。後來出版社想了一個變通辦法，要他改用筆名，以便出版他的譯著。但是傅雷拒絕了：“不！要末還是署名傅雷，要末不印我的譯本。”

一九六一年，上邊想給傅雷摘掉“右派”帽子，但要傅雷認個錯，“雙方好下臺階”。然而傅雷絲毫不為所動，寧肯戴着“右派”帽子，也不去“認錯”。後來報紙上登出消息：傅雷的“帽子”已經摘掉。面對這則“喜訊”，傅雷不僅沒有甚麼“感激”之情，而且說：“當初給戴帽，本來就是錯的。”^③

錚錚鐵骨——章乃器

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乃器，抗日戰爭前和瀋鈞儒鄒韜奮等共同組成“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要求民主，要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結果被國民黨逮捕下獄，時稱“七君子”。他一直是中共的好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糧食部長。章秉性耿直，從不轉彎抹角。整風時，勇于提出批評意見，不但批評黨員自視特殊、以黨代政和宗派主義，而且批評了毛澤東的一些名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過“革命不是綉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過“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章乃器說：不能用革命領袖的這些話來指導今天的工作。現在生產建設有些工作“尤甚於綉花”；在革命勝利後對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不是採取殘酷手段，而是采用革命人道主義的。”他還說：“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

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⁴⁹

六月五日，即開始“反右派”的前三天，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陳叔通和黃炎培兩位老民主人士夜談。毛說：“章乃器是和我們走兩條路的。”這樣，章乃器的命運就注定了。

此後章乃器經歷了多次批鬥，但他從不低頭，反而據理力爭，堅持自己從不反黨，從不反對社會主義。

六月二十五日國務院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周恩來將向人大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談到反右派運動時，有一段批判章乃器的文字。章乃器當即站起來說：“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你是總理，我是協助你工作的國務院幹部，過去工作中遇到問題，總是大家分擔困難。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幹部，只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不是值得考慮？”

當時四座大驚，周恩來竟無言以對。於是大家群起圍攻章乃器，但章乃器毫不退縮，力持己見。周恩來只好說：“你不悔改，將自絕于人民。”於是國務院會議不歡而散。據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說，周和章係二十多年老友，這是他們兩人唯一的一次傷了感情的爭論。⁵⁰

“反右派運動”期間，他每天準時到糧食部上班，照常工作。因為他在糧食部威信高，“威風打不下來”，便把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合會的人找到糧食部，連開三天“聯合鬥爭會”。章乃器安坐聆聽。第三天有一個人上臺聲討，章乃器往昔有恩誼于他。當他聲討完畢，章乃器突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大聲說：“你没良心！”會場立刻大嘩，會也沒法再開了，於是責令他寫書面檢查。

章乃器寫了檢查，但不承認強加的罪名。他寫道：“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良心來對待自己。”

所以，他自始至終都拒絕在“右派”的結論上簽字。

當然他不簽字也改變不了命運，最後被定為“極右分子”。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

他於一九七七年去世，有生之年冤案未能平反。但他信念堅定，曾自作一副對聯：“實踐檢查真理，時間解決問題。”^④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發了個六十號文件，為最後二十二個知名“右派”平反，其中有章乃器。果然是“時間解決問題”。至少在有名的高級人士當中，在“反右派”的高壓之下始終挺然屹立的，迄今已知者只有章乃器一人。

反右派運動在極廣大的範圍內破壞了人與人的正常關係。誰只要被劃成右派，周圍的人便要和他“劃清界限”，親友同事，轉眼成為陌生路人，而且都要參加批判和鬥爭。即使一個家庭內部，只要有人出了問題，不論父母妻子或是兄弟姐妹，也都必須和他一刀兩斷。這些人即使心中極不情願，也必須參加到這“牆倒眾人推”的大流里來，否則便是“立場不堅定”，甚至自身難保。因此，這種運動不但對被鬥者的意志予以摧毀，而且對眾多奉命鬥人者的意志，也是一種銷蝕劑。這對整個民族的心理素質，是極其嚴重的傷害。

貞烈不讓王寶釧——新鳳霞

不過也有人並不隨風倒。一個十分感人的例子是新鳳霞。

藝冠群芳的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出身寒苦，秉性善良，與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伉儷情深。她知道吳心直口快，仗義敢言，深恐他在鳴放中誤蹈虎尾，生出是非，所以堅決阻止吳去開會。但吳終於在周揚和陽翰笙的盛情邀請下，不但去開了會，而且發了言，當然也就因此成為“右派”，而且是“反革命右派”。

文化部一位副部長把新鳳霞召到文化部，要她看當天的《人民日報》。報上有一則報道：某男被劃為“右派”，他妻子斷然和他離婚，緊跟着就入了黨，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了。副部長對新鳳霞說：“你應當向她學習。”

不料，這位一向“見官就怕”的柔弱女子，竟拒絕了副部長的指

示。

她說：“黨要改造知識分子，他(指吳祖光)會改好的。”

“他能改好?”

“能改好。”

“我們要把他送到很遠的地方。”

“我可以等他回來。”

“噢！你能等多久?”

“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注一)

副部長勃然大怒：“你給我出去！”^①

同一個“反右派運動”把許多人壓彎了腰。然又正是這個運動，把一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磨煉得敢于橫眉冷對以勢壓人的權貴。

當然新鳳霞也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她也被劃為右派。

這就是我們這個東方民族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有那樣多的精英被摧殘了，有那樣多的人們被壓彎了腰。然而疾風知勁草，中國還是有人在暴風中挺直了腰。盡管在“輿論一律”的控制下這種事例為人所知者很少，但它表明這個民族的氣節還沒有喪盡。也就是說，這個民族還有希望。

(注一)傳統戲《武家坡》中，薛平貴因家貧投軍，一去無音信。其妻王寶釧在寒窯中茹苦含辛，苦守十八年，終於等到丈夫歸來。

※ ※ ※

第三章 引文出處

①《共和國歷程》上卷，第509頁

②《國史通鑒》第1卷，第47-48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85面

第三章 從“百花齊放”到反右派運動

- ④《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220 頁
- ⑤《國史通鑒》第 1 卷，第 238 頁
- ⑥《人民日報》1957 年 3 月 24 日
- ⑦《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8 頁
- 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1958)第 3 頁
- ⑨《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54 頁
- ⑩同上，第 349 頁
- ⑪同上，第 353 頁
- ⑫同上，第 354-355 頁
- ⑬同上，第 409 頁
- ⑭同上，第 404-405 頁
- ⑮《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1 日
- ⑯同上，1957 年 5 月 22 日
- ⑰同上，1957 年 5 月 23 日
- ⑱同上，1957 年 6 月 2 日
- ⑲《天津日報》1957 年 5 月 27 日
- ⑳《人民日報》1957 年 6 月 2 日
- ㉑《人民日報》1957 年 5 月 17 日
- ㉒同上
- ㉓同上，5 月 25 日
- ㉔同上，4 月 22 日
- ㉕《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86 頁
- ㉖《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75 頁
- ㉗同上
- ㉘《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24-425 頁
- ㉙同上，第 429 頁
- ㉚同上，第 389 頁
- ㉛同上，第 393 頁
- ㉜同上，第 432 頁
- ㉝同上，第 432-433 頁
- ㉞同上，第 456 頁

- ⑮同上,第 461 頁
- 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 - 1958)第 16 - 17 頁
- ⑰《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86 頁
- ⑱《共和國洗冤錄》第 3 - 4 頁
- ⑲《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38 頁
- ⑳《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456 頁
- ㉑《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 - 1958)第 31 頁
- ㉒《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86 頁
- ㉓香港《二十一世紀》1997 年 8 月號,第 76 頁
- ㉔同上,1997 年 4 月號,第 46 頁
- ㉕同上,第 52 頁
- ㉖同上,第 54,57 頁
- ㉗《共和國洗冤錄》第 86 頁



毛澤東改變了“社會主義還在很遠的將來”的承諾，一九五三年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在一九五六年提前完成。於是中國就變成一個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上圖為河北省邯鄲郊區農民在報名入社。

但是不少農民並不喜歡這種社會主義，而是更喜歡單幹，即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一九五七年要在農村開展“兩條道路大辯論”。下圖為河北省大興縣用今昔對比證明合作社比單幹優越。



一九五二年的“五反”，不但摧毀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也使它一蹶不振。有了這個前提，一九五六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費吹灰之力就實現了。

上圖為一九五二年上海“不法資本案”排隊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以求從寬處理。

下圖為一九五六年中國最老的製帽廠天津盛錫福帽莊實行公私合營時，身穿幹部服的經理，正面帶苦笑，接受職工祝賀。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開過一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這一年是中共歷史上僅有的和知識分子關係最好的一年。

為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老作家巴金(右一)和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等人。



為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編製科學技術發展綱要的科學家。

第三章附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它剛剛提出來的時候，確實使人心情一振，並使思想界有過曇花一現式的活躍。

上圖為一九五七年春節前夕，中央實驗歌劇院在北京公演西洋古典名劇《茶花女》。

下圖為中國民主同盟為貫徹“百家爭鳴”而創辦《爭鳴》月刊。



一九五七年中共決定整風，並請黨外人士幫助，但很快就轉為“反右派鬥爭”。

上圖為中國科學院邀請一百多位科學家座談人民內部矛盾，院長郭沫若正在發言。

下圖為一九五七年國慶遊行時的大標語：“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

第三章附圖



一九五七年七月，反右派鬥爭已在全國展開。幾十萬右派都陷入毛澤東的“陽謀”，被鬥得焦頭爛額。上圖為民主同盟副主席、交通部長章伯鈞正在挨鬥。下圖為毛澤東在青島開會佈署反右派鬥爭之餘，到海邊游泳後，在沙灘上悠然自得的神態，與章伯鈞的愁眉苦臉恰成鮮明對比。



當代評劇皇后新鳳霞與著名劇作家吳祖光伉儷情深。吳祖光被打成右派後，文化部一副部長命新鳳霞與之離婚。新鳳霞抗命不從，因此也被劃為右派。圖為吳祖光(右一)被發配農村勞動，新鳳霞執鞭相送。甘苦與共，生死同心。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1958 - 1959)

一九五八年是以“大躍進”的年份載入當代中國史冊的。這一年開了一個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這一年全國農村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合稱“三面紅旗”，於是一九五八年又以“三面紅旗”作為特徵。

一 一天等於二十年

“大躍進”的由來

“大躍進”的想法，應該說由來已久。中國人窮怕了，一百多年來由於貧弱而受人欺負，那日子是不好過的。因此更快一點富強起來，應該說是全民族的共同願望。“大躍進”的發動者毛澤東，雖然有強烈的主觀主義和浪漫色彩，但他確實也表達了那種民族願望。這也正是“大躍進”能夠迅速席捲中國大陸的一個原因。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批評農村工作的“小腳女人”時，就已經明顯地求快。一九五七年他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赫魯曉夫宣布蘇聯將用十五年趕上並超過美國。毛澤東就宣布中國要用十五年趕上並超過英國。他說，到那個時候，社會主義陣營“就無敵于天下了”。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乘風破浪》宣布了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社會主義總路綫”，“快”是它的核心，“大躍

進”正式成爲政治路綫了。

大躍進高潮起來以後，“十五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已經落後了。於是這個時間一再縮短，先縮爲七年，最後縮爲兩年。而且毛澤東還說：“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①

促成“大躍進”高潮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反右派鬥爭”的餘威。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思想上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把社會主義革命分成“經濟戰綫”和“政治思想戰綫”兩個方面。一九五六年的“社會主義高潮”，是經濟戰綫的革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思想路綫”的革命。那種人海戰術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可以說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大躍進”中，這些方法又發揮了同樣的威力。它要解決的，除了“兩條道路”的矛盾以外，還有“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費”的矛盾，這是“兩條路綫”的矛盾，即“總路綫”和“右傾路綫”的矛盾。即使不被打成“右派”，那“右傾”帽子也很厲害。因爲“右傾”和“右派”只是一字之差。“反右派”鬥爭的威力是人人都知道的，難免心有餘悸。事實也是這樣告訴人們的。不論誰，只要敢對“三面紅旗”說出半個不字，便立刻會在大批判的海洋中遭到滅頂之災。因此在“三面紅旗”下面不管多么離奇的事情差不多都能通行無阻。

勞民傷財的大煉鋼鐵

作爲“大躍進”的標誌，主要是“大煉鋼鐵”和“大放糧食衛星”。當時以爲，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主要看鋼的產量，農業的發展水平主要是看糧食產量，尤其中國有這樣多人口，吃飯是頭等大事。有了鋼和糧，便是世界強國了。因此，“以鋼爲綱”和“以糧爲綱”就是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兩個杠杆了。

一九五七年鋼的實際產量是五百三十五萬噸。一九五八年的計劃產量原來是六百二十萬噸，後來要“大躍進”，一下子改爲一千零七十萬噸，即一九五七年的兩倍。這是原有設備和人力物力絕

對辦不到的，于是就發動“全民煉鋼”。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幹部到農民，都來大煉鋼鐵。全國到處是土法修起的小高爐，連城里的機關院內都是小小的煉鋼作坊。沒有原料就搜集廢鐵，廢鐵用完了就砸掉農村的鐵制水車和農民的鐵鍋（反正農民都去公共食堂吃飯，家里的鍋也沒多大用處了）。沒有焦炭就砍樹燒炭，用木炭煉鋼。這一年，全國共動員了九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很多地方農作物熟了沒有人去收割，浪費嚴重。尤其是森林，遭到一次史無前例的大破壞，許許多多山林被砍得精光，幾十年都恢復不起來。由于水土流失和氣候反常所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計算。另外，為了多出煤鐵，就實行掠奪性的開采，使很多礦山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這種損失，也是無法計算的。

這樣蠻幹的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扣除虛報的產量之外，煉出的是幾百萬噸廢鐵。

吹牛大賽——競放糧食衛星

在糧食生產的“大躍進”方面，則是各地競放“高產衛星”。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廣東汕頭報出晚稻畝產三千斤的消息，不過沒有引起連鎖反應。到了夏收時節，“高產”熱潮一下子掀起來了。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有“高產衛星”送上天空的消息。起先是北方的小麥，畝產從兩千多斤上升到七千三百二十斤。但這個記錄很快就被南方的早稻打破了。下面是幾個突出的例子：

八月一日，湖北孝感畝產早稻一萬五千斤。

八月十三日，湖北麻城超過它一倍多，畝產三萬六千九百斤。

九月十八日的消息最驚人，四川郫縣的早稻畝產是八十二萬多斤。^②

這種天文數字已經超出常人的想象，但也確實有人相信，並且有報紙和電臺發往全國，因而對各地形成強大的壓力。于是互相攀比，產量節節上升。實際上這些天文數字都是吹出來的。

河南遂平縣渣峪山公社韓樓大隊有塊二畝九分的試驗田，共產小麥一萬零二百一十斤，折合畝產三千五百多斤。打麥時，現場有公社的人和記者監視，於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則新聞。後來又經“復打”（把打過的麥粒進行二次脫粒），每畝產量又增加了三百斤，變成三千八百多斤。《人民日報》為此專門出了“號外”，向全國報道這一喜訊。結果轟動全國，前來參觀的跟踵而至，最多時一天達到三萬人，把村里的井水都喝乾了。這個“高產衛星”是怎樣放上去的？原來他們的試驗田是二十畝。把二十畝小麥的產量說成二畝九分的產量，這就是畝產三千多斤的秘密。這個秘密村里人都知道，只瞞外人。^③

把這些奇迹加以概括，提到哲學高度，就是《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通欄大標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到山東作調查的人寫出來的。他寫道：“從現有條件看，一畝穀子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穀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畝產三萬斤就是這樣在紙上算出來的。因為人已經說了：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於是“地有多大產”就可以實現了。

本來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一個後果就是國民經濟結構失調。再加上中國自己發明的“大躍進”，使已經失調的國民經濟遭到更嚴重的破壞。不過這個後果還只限于生產力方面。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還有一個更新鮮的事情發生在生產關係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化”。

二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人民公社好”——五個字引發共產風

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就主張合作社大一些更好。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演講，傳達了毛澤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東對新社會組織的構想：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作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事實上這種公社已經在河南出現了。這一年四五月間，遂平縣就建立起一個“嵒山人民公社”。這個公社受到中共中央重視，七月底，陳伯達親自前來調查研究，並指導他們制定出公社試行簡章草案，成為全國人民公社的藍本。

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報道毛澤東的談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於是“人民公社好”五個字傳遍全國。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十七——三十日在北戴河舉行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在“決議”的推動下，全國立刻“人民公社化”了，七十四萬多個合作社，一下子合併成兩萬六千多個公社。

通往天堂之路

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這是真正的“共產”，把各合作社的生產資料和農民的一些生活資料都“共”到公社里來了。又因為公社里面工農商學兵甚麼都有，從生產到生活甚麼都管，所以被看成“共產主義萌芽”。那時中國好像馬上就要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了，所以人們唱道：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

據《中州評論》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報道，河南魯山縣有個紅旗公社，一下子實現了“生活集體化”。這個公社有八千多戶，三萬八千多人。他們除像其他公社一樣，實現了“吃飯集體化”以外，還實現了“住宿集體化”。公社內的工廠、學校、專業生產隊和一些機關團體，都設置了“男宿舍”和“女宿舍”。接着農業生產隊也在田間修建了八百多個“戰棚”（“大躍進”年代，把生產叫作“作戰”）。社員在這里住宿，吃飯，休息。為了搭“戰棚”，社員把家里的被子拆掉，把單子拿來，有人還拿出布票（當時棉布是定量供應，每人每年有若干尺布票）去買新布來縫“戰棚”。社員們把各種生活用品都搬到“戰棚”里來，於是這里就成了他們的集體宿舍。據說這“戰

棚”有八大方便：勞動方便，休息方便，學習方便，住宿方便，避雨方便，開會方便，吃飯方便，宣傳方便。

像這種“生活集體化”的情況，一九五八年到處都有。有的地方還把農民原有房子拆掉，重新選擇地點集中修建一些宿舍，把農民搬過去集中居住，實際上完全破壞了農民的生活基礎。一拆一建，不知損毀了多少建築材料和生活設施，而且這種“集體化”的居住給大家造成極大的不便。不過當時卻以為這就是“共產主義萌芽”。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充滿信心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甚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④

如此共產主義社會

在這種樂觀的決議推動下，全國興起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高潮。

九月，河北省徐水縣就在劉少奇的指示下開始辦共產主義“試點”。（注一）他們計劃用五年時間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為此把全縣組成一個公社，包括城市居民在內的所有人口都成了公社社員。取消工資，一律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洗澡、理髮、看電影、醫療、喪葬，共十五項，全由公社包起來，叫作“十五包”。不僅吃飯不要錢，還可以放開肚皮吃。為了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迅速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這個縣還創辦了十一所“大學”。不過在進入共產主義以前，為了準備“十五包”，必須先用錢去買。然而徐水縣全年財政收入還不到兩千萬元，那“十五包”所需的大量東西實在買不起。像全縣人洗澡，根本就沒有那麼多浴室。毛巾原來要每人發兩條，後來勉強發了一條。錢花光了，又把全縣的商業流動資金五百萬元挪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用過來，結果弄得商業無法周轉。而且這幾百萬元用在全縣的“供給制”上，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所以這個“試點”勉強撐了幾個月就垮臺了。

爲了消滅城鄉差別，徐水還拆了三萬多間土房和破舊磚房，以便蓋新房子，實現“鄉村城市化”。結果因爲資金和建材不足，只有一個村莊建了三百間質量極差的“居民樓”。爲了破除私有觀念，向共產主義過渡，農民的家畜家禽和樹木全部歸公。飯鍋都砸了煉鐵，人們都去公共食堂吃飯。有的地方連箱子櫃子都收歸公有。群眾說：“除了一雙筷子和一只碗是個人的，其它都歸公了。”^⑤

這種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不止徐水一處。山東有個范縣，比徐水跑的更快。十月二十八日，縣委第一書記宣布：范縣兩年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他描繪這個新社會說：

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

鷄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十一月六日，毛澤東看到這個范縣的材料，指示說：“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倉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⑥

歷史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兩年以後，范縣也好，徐水也好，並沒有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是進入了自己制造的荒年。也不光那兩個縣，全國都是這樣。

至今爲止，共產主義社會還只是共產黨人的一種美好的理想。如果真有這樣一個社會，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只能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物質基礎之上。而從貧窮落後的起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恰恰是南轅北轍，跑的越快，離美好的理想就越遠。

（注一）劉少奇當時也是積極支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

運動的。他覺得社會主義建設也能像打仗一樣，可以苦戰三五年，打幾個大的戰役，一鼓作氣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因此在各地視察時，也倡導快一點向共產主義過渡。徐水縣的“共產主義試點”就是根據他的指示搞起來的。^⑦

三 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張春橋的投機理論

在“大躍進”的年代，還有一個插曲，這就是張春橋的文章《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他當時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此文發表在上海市委主辦的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一九五八年第六期上。

他用游擊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批判和平建設時期的工資制，用已經成為歷史的軍事共產主義批判當時的社會主義。他說工資制是“鈔票掛帥”，物質利益原則不過是“錢能通神”而已。他認為這都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在作怪。

其實當時中國的經濟生活，並沒有真正擺脫戰爭時期供給制的影響，平均主義相當嚴重，整個分配制度，都是僅能維持低水準的生活而已。至於物質利益，幾乎還處於非法狀態，人們都羞於談論。然而張春橋認為這還不夠，還應該完全回到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去，才顯得“革命化”。

按：“資產階級法權”一詞出自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談到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能夠領取和自己付出的勞動等量的報酬。因為各人勞動能力不一樣，家庭負擔也不一樣，所以各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不平等的。按所付勞動領取等量報酬，是等價交換。這是商品經濟的通行準則。資本主義經濟是最發達的商品經濟，所以馬克思把這個準則叫作“資產階級權利”。因為舊譯文一直把“權利”譯作“法權”，所以那時都把它稱為“資產

階級法權”。

事實上中國的分配制度離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很遠。當時中國的工資雖然有些等級，可是遠遠不能反映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差別，“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這種話雖然有點誇張，但它確實反映了中國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按照馬克思的意思，人們取得的報酬應當和他付出的勞動相當，才是合理的。

身為宣傳部長的張春橋，並沒有看懂馬克思那句話的意思，特別沒有弄清“資產階級法權”到底是甚麼，便在它後面加上“思想”兩個字，然後大加批判。他說：“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然後就演繹開來：“一切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都是保護嚴格的等級制度的。他們不惜捏造各種神話，說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間的主人。……在舊時代，整個社會上，從配不配姓趙，到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煙的姿勢，哪一條不要講究身份、等級？哪一項沒有‘禮’？合乎禮、不合乎禮，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到處都有資產階級的法權。”最後他呼吁：把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徹底恢復和發揚起來”，“徹底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④

毛澤東的平均主義

其實這篇文章的思想並不是張春橋的。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就不止一次提到“資產階級法權”，並把分配制度以外的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都歸之于“資產階級法權”。比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老爺態度，靠資格吃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貓鼠關係（毛澤東用來形容上下級之間不平等關係的用語），還有軍銜制等等，都被毛澤東說成“資產階級法權”^⑤。可見，不光是張春橋，連毛澤東也沒有弄明白“資產階級法權”是甚麼意思，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一些毫不相干的東西通通塞到這個概念里面來了。

對於分配制度，毛澤東這時也是明確地反對馬克思所設想的

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他在一個會議上集中講了這個問題。他認為，按勞分配，工資制度，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收入差別，都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殘餘，應當破除。要考慮廢除工資制，恢復供給制。^⑩

不過，不管毛澤東怎樣理解“資產階級法權”，他本人對平均主義情有獨鐘。他是把供給制當作“共產主義因素”來看待的。這一點，又和中共所領導的革命以及它的社會基礎有密切關係。

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中共長期立足于農村。中共的骨幹主要也是農民。農民的“共產主義”有很多自然經濟和平均主義的特點，它對中共影響至深，包括毛澤東在內。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使人頭腦發熱，以為共產主義就要到來的時候，毛澤東自然要對他所理解的“資產階級法權”大加批判了。

慣于聞風而動的張春橋正好投中了這個機。他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恰巧投其所好，所以引起毛澤東的重視，並寫了一則按語，交給《人民日報》轉載。按語說：“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然而毛澤東又事先定了調子：“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⑪

這則“按語”的來頭當然不可能絕對保密。所以很快就掀起一個“一邊倒”的討論熱潮。這次“討論”實際上對當時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場討伐。不單是按勞分配，而且現實社會生活中所有的分工和差別，都遭到尖銳的批判和嘲笑。特別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和差別，更被看成剝削階級強加給勞動群眾的極酷，甚至是人類歷史的迷誤。

當時正是“人民公社化”高潮，全國農村正在“共產”，即隨意剝奪農民的財產，無償使用農民的勞動，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張春橋這篇文章正好給這種“共產風”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自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居然能把張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春橋這種以賣弄無知爲能事的文章登在自己的中央機關報上，毛澤東竟認爲它“基本上正確的”。只是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當時這個黨的理論水平究竟如何了。非常重視理論作用的中國共產黨，依靠這種“理論”來指導實踐，在那個年代發生的種種怪事也就容易理解了。張春橋文章中所表達的思想，雖然和“大躍進”中的“共產主義”一起失敗了，但是毛澤東並沒有放棄。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再一次向“資產階級法權”發動進攻，結果給中國社會造成一次更嚴重的破壞。

四 拔白旗，插紅旗

精神生活大躍進

和物質生產“大躍進”相適應，一九五八年同時是個精神生活“大躍進”的年份。

一九五七年的整風，本來是中共要整整自己，結果是“整風”變成“反右”，整自己變成整別人。整完別人之後，倒是安排了一個“整改”階段，但這不過是要大家出主意改進工作，已不是當初整風的本意。當初反對官僚主義是爲了解決領導與群眾的矛盾，反對宗派主義要解決的是黨和群眾的矛盾，而在“鳴放”中凡批評“黨”或“領導”的人，差不多都給打成“右派”了，所以這兩個主義也就沒有人再去反對了。

這樣，便需要有新的問題作爲繼續進行整風運動的對象。於是“反保守、反浪費”的“雙反運動”，便在反右派鬥爭之後提上日程了。它完全採用“反右派”時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法，用群眾運動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右傾保守思想”。

在知識分子集中的高等學校，這種運動發展成“紅專大辯論”，既批判知識分子的學術思想，也批判他們的個人主義。簡單地說，就是批判“白專道路”。“白專”是和當時提倡的“紅專”相對立的東

西。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寫了一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雖然叫作“草案”，實際上一直被當作“經典著作”，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着重大作用。其中第二十二條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他提倡“又紅又專”，不過又把“紅”放到更高的地位，並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②

毛澤東這個命題，在“反右派運動”以後，成爲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强大武器。它的目的是把知識分子在科學技術和業務上的“威風”打下來，讓他們服服貼貼接受黨的領導，不然就會走上“邪路”，即資本主義道路。那後果，凡經歷過“反右派運動”的知識分子，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學校里面這場“紅專大辯論”實際上是對沒有劃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的一次補課，只不過沒有去劃“右派”，但是要“拔白旗”。因此，這一次思想批判運動的內容叫作“拔白旗，插紅旗”，或“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簡稱“興無滅資”)。對於被批判者來說，應當在這個運動中“向黨交心，自覺革命”，就是讓他們主動交代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主動接受批判。

圍殲“資產階級思想”的人民戰爭

因爲這場運動直接從反右派鬥爭承繼下來，所以聲勢之大，火力之猛，遠遠超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比如，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正式開始，開過動員大會之後，全校一萬名師生員工在三個小時之內共貼出大字報八萬份。三天後上升到十七萬份，又過了三天上升到二十八萬份。全校人人都貼大字報。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大學在這個運動里，“人們在大字報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上燒自己，燒別人，從黨內到黨外，上下左右一起燒。人們翻箱倒櫃，深思苦想，查筆記，查講義，從教學業務中看立場，找思想”。找的結果，原來教授的資產階級思想是萬惡之源。“許多學生義正辭嚴地提出：學校出現大量不合規格的學生和右派學生，教授們不能辭其咎。”

原來學校里那么多“右派”，不是共產黨打出來的，而是教授們教出來的。

在學術批判當中，大概除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外，都免不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的帽子，都在批判之列。不但社會科學如此，就是自然科學也不例外。即使科學規律本身找不出階級性，也總有個“方向”和“道路”問題。所以在一切學術領域都要展開兩條道路的鬥爭。

心理學原來是研究“人”的心理過程的。在學術批判中，據報道說，資產階級的心理學被攻破了。比如，《心理學》教科書說：“過度疲勞，睡眠不足等，都能使心境不好。”批判者說：“這是資產階級好逸惡勞的反映。”^⑬北京師範大學在批判“資產階級心理學”時指出：沒有抽象的一般人，也沒有人類的共同心理。資產階級心理學是“虛偽的，反動的”。它研究的是資產階級的心理規律。“這些心理規律，對廣大勞動群眾說來，是不適應的。”批判者主張建立一種“無產階級心理學”，它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廣大工農群眾及其年輕一代共產主義意識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

他們認為：不同階級的人對事物有不同的反映，比如對紅光的反映，就會因階級地位不同而不同。批判者還談到“政治掛帥”對心理的作用：“只要政治掛帥，人就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記住很多東西，創造出記憶的奇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許多模範事迹就說明着這一點。”^⑭

知識分子重新跌入谷底

這場鬥爭和反右派鬥爭的區別只是沒有把剩下的知識分子打成“右派”而已。但是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領導者眼中的形象，已經狼狽不堪，遠不是一九五六年那樣風光了。他們不但從“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復原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有人還是“反動派的隨從”。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的很坦率：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的在內，大都生長於地主資本家的家庭，受了資產階級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進入社會，以‘知識’為本錢為資產階級服務。他們之中的少數人一直和反動政客為伍，全心全意為反動統治服務……他們的全部‘學術思想’都浸透了反動統治階級的觀點。僅僅因為黨和政府解放以來不斷進行的政治運動教育了他們，他們才幸免于成為資產階級右派。”中共中央機關報這篇社論警告老教授們說：“老一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死抱着謬誤不放，青年一代只有走上前來把白旗拔掉，把紅旗高高地插到學術界的每一塊領域上去！”

這種強硬方針果然有效。教授們感到“形勢逼人，不改不行”，於是趕緊“自我革命”。北京大學生物系一位教授，一個月內寫了一百三十份大字報，開會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每會必到，爭取發言”。

新華社在關於北京大學思想批判運動的消息結尾，報道了它的效果：在群眾的揭發批判和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下，“立即向左轉”已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共同口號。”^⑭

不過他們的“向左轉”並不影響“拔白旗，插紅旗”照樣進行。大學生們一面批判，一面著書立說。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集體編出一部七十八萬字的《中國文學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四年級學生不甘示弱，也編出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一百萬字，另外還編了一部《民間文學史》，六十萬字。這就超過了北大三年級。北大中文系一二年級學生的也不讓高年級同學專美于前，他們聯合一些青年教師共同寫出四本《文學研究與批判專輯》。被他們批判的有王瑤、游國恩、林庚、王力、高名凱、朱德熙、鄭振鐸、劉大杰、朱光潛等著名學者和專家。另外馬寅初、馮友蘭、賀麟等也都受到青年師生的批判（並有批判專輯）。^⑩

五 批判馬寅初

沒有奴顏媚骨的馬寅初

在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運動中，馬寅初是最著名的一面“白旗”。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決定對校長馬寅初進行批判。

如果說魯迅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話，那麼馬寅初同樣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他們都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氣節的人。

馬寅初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擔任經濟系教授。抗日戰爭期間到戰時首都重慶，在重慶大學擔任經濟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他對國民黨高官的貪污腐敗，利用權力大發國難財十分憤怒，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八個字：“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他經常公開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不但提議征收戰時財產稅，而且要求把他們撤職，拿出他們的不義之財充作抗日經費。蔣介石曾請他去美國考察，以免老在重慶說些逆耳之言，但他不去。國民黨當局後來又請他做財政部長或中央銀行總裁，也被拒絕。於是當局出動特務給馬寅初寄“警告信”並附上手槍子彈一顆。

馬寅初絲毫不為所動，就在接到這封信不久，他應黃炎培之邀，作了一次公開演講。他不但繼續攻擊豪門權貴發國難財，而且

猛烈抨擊蔣介石：

“有人說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可以說是我國的民族英雄，但我馬寅初認為他根本不夠資格；要說英雄，蔣介石也是一個英雄，不過他只是一個‘家族’英雄，因為他包庇他的親戚家族，危害國家民族！”

講到最後，馬寅初當眾揭露了特務的“警告信”，並且解開長衫鈕扣，指着自己胸口說：“會場上的警察憲兵們，你們要逮捕我馬寅初嗎？要開槍殺人嗎？可以朝這兒打。”^⑩

這一次，馬寅初是抱着必死的決心去演講的，所以把兒女都帶去了。不過國民黨當局當時沒有敢下手。過了一個多月，終於把他逮捕了。

一九四四年，國民黨當局在國內外壓力下恢復了馬寅初的人身自由，不過不准他演講和發表文章。但馬寅初“偏偏要講”，而且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繼續抨擊官僚資本。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在重慶打傷包括馬寅初在內的許多民主人士。馬寅初對記者說：“對這個政府，我原來主張改革，現在我主張推翻。”^⑪

馬寅初的新人口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馬寅初被任命為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一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九五三年起，他就着重研究中國人口問題。一九五五年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他根據兩年的調查研究提出控制人口的問題，結果在小組內就遭到圍攻，只好把提案撤回了。但他鄭重聲明，他並不改變觀點，只是要繼續調查研究，使之完善，下次會議再提。他說：

“我為甚麼這麼講呢？這完全是因為人口的問題，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太重要了。我既然發現和認識了這一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就一定要堅持到底，直到最後勝利！否則，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和人民代表，我就沒有盡到自己對祖國和人民應盡的責任！”^⑫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過了兩年，馬寅初完成了《新人口論》的寫作。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開幕，他把它作為一項提案交給大會。七月五日，《人民日報》全文刊出。

《新人口論》的主要思想是：中國人口增長太快，從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方面說，非控制人口不可。不僅控制數量，而且要提高質量。為了防止批判者把他和馬爾薩斯混在一起，他特別把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加以區別。

這時正是反右派運動的高潮。《新人口論》一發表，就受到不指名的批判。有些同意新人口論的人已經被打成右派。馬寅初本人好像受到上面的保護，暫時沒有受到直接攻擊。

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北京大學黨委決定對馬寅初展開批判。大字報，辯論會，紛紛向馬寅初開火。但是馬寅初全然不為所動，堅定地捍衛自己的信念。

一九五八年五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批判了新人口論，雖然沒有點名，但是政治壓力很大。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了。這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文章，他重新強調了一下一九四九年評論美國“白皮書”時的觀點：人多是好事情。他寫道：“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顯然，馬寅初的理論不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下半年，指名批判馬寅初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光明日報》特地為此辟了專欄。

批判者說，馬寅初只看見人有口，沒看見人還有手。他把人口多看成國家的負擔是“對六億人民沒有感情。”批判者駁斥馬寅初“人多不好安排”的觀點時說：“社會主義永遠不會產生失業現象，永遠不會感到勞動力過剩。”批判者還說，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因為“在黨的領導下，喝令高山低頭，河水讓路，能使土地交出更多的糧食來。”批判者認為馬寅初和馬爾薩斯沒有甚麼兩樣。他的提高人口質量的理論更為反動，是為帝國主義的種族優

越論作辯護,等等。

誓以生命捍衛真理

馬寅初決心捍衛自己的觀點,戰鬥到底。他的堅定態度使好友爲他擔心,都勸他“認一個錯了事”。不然的話,會影響他的政治地位。馬寅初拒絕了這些勸告。使他最爲難的,是周恩來的勸告。周恩來在馬寅初遭國民黨逮捕時曾營救過他,兩人私交深厚。如今周恩來專門勸馬寅初檢討,說明事情的嚴重性,顯然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將決定馬寅初的命運了。

但馬寅初最後還是把個人的政治命運置于不顧,而選擇了堅持真理的道路。他在《新建設》雜誌發表《重申我的請求》,表示真理重于個人私利甚至生命,願意爲此“擔當一切後果”。“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爲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而不以理說服那種批判者投降。”同時他也不指名地公開向周恩來表示歉意,因爲他沒有接受周的勸告。“最後,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謝,並道歉意。”“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心中萬分不愉快,因爲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切回旋餘地都沒有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生召見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宣布了如下決定:“馬寅初最近很猖狂,……借學術爲名搞右派進攻。”“一定要從政治上把馬寅初批臭。馬寅初已不能再做北京大學的校長,把他徹底批臭之後,將他調離北大!”^④

一切按指示進行。一夜之間,幾千張大字報鋪天蓋地,有些都貼到馬寅初的房子里去了。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初,除了小會以外,還開了三次全校性的大會對他進行批判。按照上邊的指示,這時馬寅初的罪名已經都是政治性的了。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一九六〇年一月，馬寅初只好辭去北大校長職務，從此消聲匿迹二十年。

馬寅初被“徹底批臭”之後，只有一個身居高位的老朋友去看他，並且支持他的“新人口論”，給馬寅初以很大的安慰。這個人就是陳毅。陳毅說：“即使再過一萬年，你馬寅初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正確。”^②

六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肥皂泡破滅以後

“三面紅旗”對國民經濟的巨大破壞作用很快就顯露出來了。一九五九年中國大陸已經面臨饑荒。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一九五九年一月到河南省去看望下放到該省的黨校幹部，了解他們生活和工作的情況。他們向楊獻珍反映了當地的嚴重問題。他們所看到的，和報紙上所宣傳的，完全是兩回事。在一個縣的城關公社，已經沒有糧食吃了。下放幹部只好叫老百姓把紅薯藤曬乾，磨成面，聊以充饑。當時河南省號稱“千斤省”（宣稱全省平均畝產千斤）。楊獻珍感慨地說：“這就是大躍進年代號稱全國第一的千斤省的人民的真實情況。”^③

後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承認：河南共產風刮得厲害，虛報浮夸也最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④

其實哪里都一樣，影響也是互相都有。浮夸風和共產風的後果很快就從糧食問題上暴露出來。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五九年初，許多放過“高產衛星”的地方都因缺糧而告急了。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毛澤東已經感到一些問題，並且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就不斷設法糾正。

十一月初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駁了陳伯達等人要

求“廢止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主張。^④

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開幕。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不應無根據地“立即進入共產主義”。^⑤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舉行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承認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以致同農民關係緊張。他強調價值規律必須遵守，要實行等價交換。^⑥

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給基層幹部寫了一封有名的《黨內通信》，切實推動降溫。信中最受人稱道的是“講真話”。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講假話。”下面曾被人廣為傳誦的兩句名言，就出自這封信的結尾：

“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⑦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降低了當年各項經濟指標。其中鋼產量由一千八百萬噸降到一千三百萬噸。其實這個指標也是過高的，根本不可能實現。

在一連串糾左運動之後，中共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召開廬山會議。

廬山會議前期，是要總結經驗，繼續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提出十九個問題要大家議論。他自己對一九五八年的估計是這樣的：“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只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⑧這就是說，他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來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的。這種揚湯止沸的方法當然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據會議參加者李銳說：“就是對這十九個問題的看法，當時也還存在有分歧，並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廬山這場風波，從發生大爭論來說，是必然的；但是後來出現如此‘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可怕局面，則有一定的偶然性。”^⑨

會議的後期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起因于彭德懷的

一封信。

廬山會議上唯一敢講真話的人

彭德懷幼年家境極苦，以後終生儉樸，並且從不忘懷群眾饑寒。上山開會以前，他已視察過好些地方，發現不少問題。在乘火車去廬山開會途中，隨行保健人員發現他吃飯極少，便問他：“爲甚麼吃這麼少，是不是在車上睡眠不好？”他指着車窗外面說：“看看外邊，這叫人怎麼吃得下去。”原來火車站外面站着許多饑民，衣衫爛襖，蓬頭垢面，手把欄杆，呆望着車廂。

他上山後，在小組會上多次發言，七月十二日曾想找毛澤東細談一次，結果毛正在睡覺，沒有談成。他又聽說會快結束了，恐怕失去機會，所以趕緊寫了一封信，十四日送給毛澤東。

這封信分兩部分，前一部分首先是肯定成績：工農業的增長速度很快。缺點是基建項目過急過多了一些，原因是“缺乏經驗”。人民公社化當中的問題，“基本已得到糾正”。大煉鋼鐵雖然浪費一些人力物力，也是“有失有得”。

信的後一部分是如何總結經驗教訓。他說：去年的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在客觀上是難以避免的。主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一是浮誇風。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沒有把工作安排放在穩定可靠的基礎上，有些經濟法則被輕易否定，以爲政治掛帥可以代替一切，這都是一種左的傾向。他認爲，“經過去年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④

這封信的全部內容，都是從愛護黨的事業出發，善意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且他是希望毛澤東採納這些意見之後，由毛自己講出去。這是爲了維護毛的威信，而不是損害他的威信。下面就是

彭當時的想法：

“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由毛澤東提出來，“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④

誰知彭德懷給毛澤東個人的信，竟被毛澤東加上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給會議討論。彭德懷當即要求收回，但是毛澤東不答應。

在討論中，各種看法都有。據彭德懷自己在筆記中的估計，多數人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見，只是其中有些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少數人對信的後一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重。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只有個別人。參加會議的李銳認為這個估計大體符合實際情況。^⑤

講假話的圍攻講真話的

但是到了七月二十三日，情況突然變了。毛澤東沉默九天之後在全體會議上發言。他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麼一批人。”^⑥他對彭德懷信中的“有失有得”特別加以分析：“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過了的。”^⑦

據說彭的原稿是“有得有失”，交隨員抄寫時，誤抄為“有失有得”。不料這個偶然疏忽，竟成為“仔細斟酌”。^⑧

從這一天起，會議急轉直下，對彭德懷展開猛烈的圍攻。完全從善意出發寫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被說成“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反黨活動。而且由於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國防部副部長）。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曾經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或接觸多一些，就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毛澤東又給它起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了個名字，叫“軍事俱樂部”。

廬山會議上批判鬥爭的火力之猛，是中共黨史上罕見的。彭德懷被說成“陰謀家”，“野心家”，“僞君子”。

八月十六日，大會一致通過兩個文件：〈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綫，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決議把彭德懷的“錯誤”定性為“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錯誤”。決議斷定彭德懷“反黨集團”進行的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⑤

這樣，以糾正左傾錯誤為目的的廬山會議便以反右傾告終了。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的當天寫了一篇文章〈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把彭德懷一封信所引起的黨內鬥爭又升了一級：“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⑥

在廬山上被鬥爭了二十多天的彭德懷，下山後到北京還要繼續挨鬥。在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參加者一定要追逼出“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其實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俱樂部”，它完全是毛澤東平空想象出來的。彭德懷說，對強加給他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罪名，為了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威信”，可以違心地檢討，但是對這個並不存在的“俱樂部”，他決不承認。因為要承認它就得亂咬別人，那樣不但要株連許多無辜者，而且將給軍隊造成巨大的損害。在軍委會議上被追逼得無可奈何的時候，這位身經百戰的名將氣得喊道：“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⑦

老實人的悲慘命運

廬山會議以後，在全國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

是專門在黨內開展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思想批判運動，當然也伴隨着組織上的處理。據統計，在這場鬥爭中被批判的重點對象，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共有三百六十五萬人。^④

從彭德懷起，被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是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所鼓勵的“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據毛澤東說，老實人是不會吃虧的。可是事實恰恰相反，越老實越吃大虧。

彭德懷在廬山挨鬥時曾經做了三條保證：一，不做反革命；二，不會自殺；三，勞動生產，自食其力。^⑤可惜他晚年想自由勞動都不可得。1966年他被囚禁起來，由紅衛兵肆無忌憚地橫加蹂躪，每次鬥爭大會都被打得遍體鱗傷，有一次肋骨都被打斷了，痛得連痰都不能吐，但是還繼續被拉出去批鬥。據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監禁記錄”記載：彭德懷被拉去游街回來後，兩個人從車上把他架到屋里，進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二十一時三十分左右，起來喝一碗稀飯，走動時東倒西歪。二十二時自言自語地說：“這麼還得了啊，今天打的太重了。”^⑥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懷整整被囚禁八年。最後一年因為病重關在醫院里，但門窗完全被黑紙蒙住，不見一絲陽光。他為中國人民能在陽光下自由生活，出生入死苦戰了幾十年，但最後自己卻既失去自由又失去陽光！下面是《最後的年月》這本書對他臨終前的忠實記錄：

“臨死，可能是常說的那種‘回光返照’吧，他特別地清醒了，指着被黑紙糊成一片黑乎乎的窗戶，揮動他乾柴似的手臂，喊叫：‘撕了，撕了！’專案人員沒有理會他的這一最後的要求。他狂怒地喊起來：‘呵——！呵——’他掙扎不起，因為他的全身都癱瘓了。他只得用他的牙齒咬着被角，用他僅能活動的右手撕扯着被面和棉絮，一直把它扯得粉碎，一直扯得他自己牙床流血，嘴唇撕裂，一直扯得他力盡淚枯！”^⑦

他就這樣痛苦地死了。時間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五十三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這位叱吒風雲，身經百戰

的將軍，在戰場上曾使敵人聞風喪膽，和平時期卻被毛澤東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親手參加建立的共和國的天空下，臨終前想看一眼陽光都不可得！

七 另一場反“右傾”鬥爭

又一個敢講真話的人——董謙

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有一場鬥爭關係重大，這就是關於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問題。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國農村普遍辦起了公共食堂。在物質條件極端落後的中國農村，不要說公共食堂的飯菜質量，就是“食堂”這個名字都不能兌現，因為農村不可能有一座堪稱“食堂”的建築物。所以農民端着飯碗或盆子從大廚房里打來飯菜，只能在露天吃，或小心翼翼地踏着鄉村小路端回家去吃。刮風下雨時，到這種公共食堂打飯吃飯，簡直是一場災難。但是不去食堂又不成，因為農民個人的口糧已經完全歸于食堂，自己顆粒全無了。這還不說，即使誰能弄到糧食，也不能自己煮飯，因為各家的鐵鍋都被砸掉拿去“大煉鋼鐵”了。

因此，公共食堂一開始就有爭議。但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高潮的沖擊下，微弱的反對聲音根本成不了氣候。公共食堂作為人民公社的重大支柱和社會主義的重要障地，很快沒有人敢說二話了。

然而，這畢竟是關係幾億農民切身利益同時也是關係中國農業生產力前景的一件大事。中國農業幾乎完全靠農民的手工勞動來維持，他們的肚子能不能吃飽，直接決定着農業生產力的高低。即使不管農民生活是否方便，僅從生產力的角度，也值得經濟學家加以研究了。因此，經濟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派董謙率領一個調查組到河北省昌黎縣調查農村公共食堂。調查組沒有去贊美

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出現的這個“新生事物”，反而列舉了種種理由證明公共食堂不如農民家庭的小竈好。除了公共食堂不如家里做飯方便合口之外，這個調查組還用事實推翻了新聞媒介大肆宣傳的兩條優越性：節約糧食和節約勞力。《調查報告》說，農民在家里做飯，可以因時制宜，精打細算，糧菜搭配，因而節省了糧食。家里做飯，婦女小孩就可以勝任，而公共食堂卻要專門抽出壯勞力去當炊事員，結果恰恰浪費了勞動力。

被歷史拋棄的究竟是誰？

這個報告激怒了毛澤東，他說：“提倡辦食堂的人都應該斷子絕孫！”（注一）並在廬山會議上批判說：經濟所有個右派“跳出來，反對大辦食堂”。

毛澤東的震怒已經決定了董謙的命運。經濟研究所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猛烈地批判了董謙，把他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為了批駁董謙的《調查報告》以及受到它的影響而對公共食堂有所懷疑的人們，《人民日報》專門發了一篇社論，叫作《公共食堂前途無量》。社論引用列寧的話，把公共食堂叫作“共產主義幼芽”，說它“受到幾億農民的熱烈贊揚”。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學着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社論引用很多“實際材料”來證明食堂有許許多多“優越性”，最後得出結論說：“我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定會越辦越好。”“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④

歷史事實是：這篇社論發表之後兩年，人民就拋棄了那種公共食堂。二十年之後，人民又拋棄了人民公社。

蒼天無眼——可怕的懲罰都落在無辜百姓的身上

還有一個更殘酷的歷史事實，是《人民日報》社論作者萬萬沒有想到的，這就是餓死人的問題。這篇充滿自豪感的社論有一段用新舊社會對比來贊美人民公社的食堂。社論說：“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據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六年極不完全的統計，十六年間死于災荒的人口達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人。”附帶說一下，社論作者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那時是封建割據，軍閥混戰。不過這不要緊，總之，是共產黨掌權以前的舊社會即中華民國就是了。按照社論所採用的數字，那十六年當中，平均每年死于災荒的是一百一十四萬多人。然而在共產黨掌權之後的一九六〇年，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這一年全國淨減人口一千萬。農村的非正常死亡尤為嚴重。這一年農村人口減少一千七百萬。^④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作的報告（注二），僅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正陽縣就死人八萬多，新蔡縣死人近十萬。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舉國聞名的遂平縣嵎山人民公社，一個社就死亡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生產隊竟高達百分之三十。^⑤

《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的作者本想用國民黨時期餓死人的數目來反襯共產黨時期人民公社辦食堂的優越性。他沒想到，人民公社帶來的人為災難遠遠超過舊社會的自然災荒。而在這場人為的災荒中，公共食堂恰恰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當時雖然糧食非常少，但如果讓農民自己掌握，還可以千方百計勉強度日，即所謂“糠菜半年糧”。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免不了也要死人，但總死不了那樣多。可是公共食堂完全剝奪了農民吃飯的自由。飯勺子完全由別人掌握，自己沒有絲毫權力，這就使農民只能束手待斃了。所以大躍進失敗後中國能餓死那樣多人，公共食堂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董謙的《公共食堂調查報告》當時能被當權者接受的話，

不知能挽救多少生命！

這是歷史對“三面紅旗”最嚴厲的懲罰。可惜這懲罰都落到老百姓頭上。而“大躍進”的發動者卻在中南海裡享受着“特種供應”，不會知道挨餓的滋味的。當然，誰要是膽敢說出真話，像彭德懷和董謙那樣，是必須受到懲罰的。

因為當時對董謙只是內部批判處理，沒有示眾，所以此事鮮為人知。

(注一)這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當時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室的人轉述的。它表明毛澤東對董謙的《公共食堂調查》極為震怒。

(注二)信陽地委把他們這個地區大量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于“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的破壞”，因而解決的辦法是“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也就是用加強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餓死人的問題。中共中央肯定了信陽地委這個報告。^④

※ ※ ※

第四章 引文出處

①《中國“左”禍》第308頁

②同上，第301頁

③同上，第297-298頁

④《國史通鑒》第2卷，第365頁

⑤《中國“左”禍》第272頁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1958)第98頁

⑦《國史通鑒》第2卷，第11頁

⑧《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注九十

第四章 從“大躍進”到“反右傾”

- ⑩《國史通鑒》第2卷,第651頁
- ⑪《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 ⑫《國史通鑒》第2卷,第352頁
- ⑬《光明日報》1958年8月15日
- ⑭同上,1958年8月25日
- ⑮《新華社每日新聞》1958年4月16日
- ⑯《新建設》1959年第1期
- ⑰《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1958)第218-219頁
- ⑱同上,第220頁
- ⑲同上,第226頁
- ⑳同上,第231-233頁
- ㉑《國史通鑒》第2卷,第41頁
- ㉒《我的哲學罪案》第121-122頁
- ㉓《廬山會議實錄》第37頁
- ㉔《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236-237頁
- ㉕同上,第237頁
- ㉖同上,第238頁
- ㉗同上,第239頁;《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第404頁
- ㉘《廬山會議實錄》第31頁
- ㉙同上,第33頁
- ㉚《彭德懷自述》第281-287頁
- ㉛同上,第275-276頁
- ㉜《廬山會議實錄》第133-134頁
- 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注六十六
- ㉞《廬山會議實錄》第171頁
- ㉟《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0)第198頁
- ㊱《國史通鑒》第2卷,第412頁
- ㊲同上,第2卷,第412頁
- ㊳《彭德懷自述》第279頁
- ㊴《中國“左”禍》第355頁
- ㊵《彭德懷自述》第288頁
- ㊶《解放軍報》1980年12月7日

- ⑫《最後的年月》第 51 頁
- ⑬《人民日報》1959 年 9 月 22 日
- ⑭《中國共產黨大典》第 733 頁
- ⑮《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757 頁
- ⑯《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248 頁



一九五八年各地競放“高產衛星”。這是一個小姑娘坐在“豐產田”裏密植的水稻穗上所拍的照片。

這種“豐產田”是把其他稻田剛剛成熟的水稻連根拔出，然後密集栽在一塊田裏，專門供人參觀，拍照和報道。



一九五八年發動了九千萬人(主要是農民)大煉鋼鐵。上圖為山西省故縣的土法煉鐵高爐(所謂“小、土、群”，即土法上馬，小高爐，群眾運動)。

為了大煉鋼鐵，把城鄉居民家裏的鐵器都搬去用作原料。下圖為北京市居民把家中鐵器送去煉鋼。



這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運動中北京大學“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展覽會”上的漫畫。不知有意無意，漫畫上的“社會主義關”是一個狹小的洞口，只能容許“又紅又專”的空車皮通過。而滿載書籍和儀器、象徵文化和科學的車廂，則通不過這個關口。



馬寅初節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新人口論》，是足以影響中國國運的真知灼見。但因觸犯了毛澤東“人多是好事”的理論，而遭到猛烈批判。馬寅初匹馬單槍，誓以生命捍衛真理，給高壓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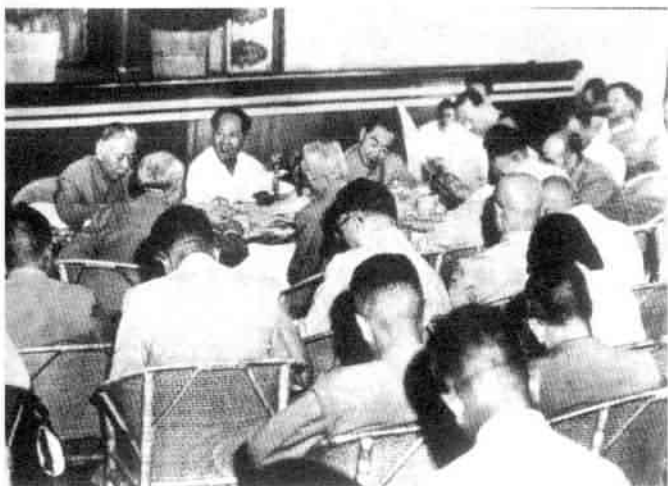
圖為一九五四年的馬寅初正和北京大學學生在一起。

第四章附圖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如果接受了彭德懷的意見，中國該不會餓死幾千萬人。起初多數與會者是同意彭德懷的。但是在毛澤東的號令下，全體一致反對彭德懷的“右傾”。這個時候，沒有一個人敢於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這是中共中央委員會最不光彩的記錄之一。



上圖為彭德懷一九五八年在湖南湘潭農村作調查。下圖為廬山會議會場。





由於廬山會議不反左傾而是反右傾，一九六〇年全國都陷入饑荒。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口糧又完全由公社食堂控制，農民家中顆粒皆無，以致饑荒更加嚴重，所以群眾強烈要求解散食堂，自己做飯度荒。但是中共仍然堅持“公社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這是一九六〇年一個公社慶祝“五一”晚會上的一個節目：“公社食堂好處多”。背景的標語是：“食堂就是一枝花，鮮花盛開香萬家。”

第五章 階級鬥爭為綱

(1960 - 1965)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遭到圍攻時在自己的筆記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國內在經濟建設中，出現許多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在左傾急躁冒進的基礎上，再加以猛烈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它提到兩條路綫鬥爭的高度。它將要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引起……生產和人民生活嚴重下降的後果！”^①他的預見完全正確，事情正是這樣。

一 短暫的喘息時期

大躍進造成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

一九五九年已經是捉襟見肘了，一九六〇年還要“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結果使已經失調的國民經濟更加失調，嚴重的經濟危機再也無法掩蓋了。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三年平均積累率高達 39.1%，積累總額 1438 億元，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積累總額還高 44%。由於重工業畸形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連年減產，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〇年，工農業產值的比例由五·七比四·三變為八比二。輕工業和重工業比例由三比二下降到一比三。^②

最致命的是農業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一九六〇年糧食產量（2870 億斤）比一九五七年（3900 億斤）下降了 26.4%。同期油料作物下降了 54%。同期農村人口平均占有糧食由 409 斤減至 264 斤，下降了 35.3%。^③

據估計，“大躍進”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一千二百億元。

直到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才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就是說，“大躍進”的結果是倒退八年。^④

饑荒中餓死多少人已無法統計。本來按前幾年中國的人口增長率，一九六一年應比一九五九年淨增二千七百萬。但一九六一年反而比一九五九年淨減一千三百萬。這就是說，全國人口比正常年景要少四千萬左右。這里面當然包括因饑荒而少生的數目，並不完全是餓死的。但這數字已夠怵目驚心了。^⑤

事實上，中共中央自己所說的反右傾以來的“大好形勢”，到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就已經像肥皂泡似的吹破了。這一年五月份已有多處告急，幾個大城市的糧食已經發生恐慌。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五月二十八日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這個《指示》已經失去年初那種“繼續躍進”的神氣，而是坦露了窘困的實情：“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除此之外，還普遍減少城鄉居民的棉布和口糧及食油的供應定量。^⑥

放鬆控制，調整各方面的關係

正因為局面實在撐不下去了，這才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這是一九六〇年七八月間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時決定的。八個字，主要是“調整”。說是調整經濟，實際上包括政治；不但降低計劃指標，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同時也調整黨和農民的緊張關係，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調整中共黨內的關係。

執行調整的方針，首先是使奄奄一息的農業能夠復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故簡稱“十二條”。主要是穩定生產關係，糾正“共產風”，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等。^①但是對於公共食堂，還是當作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予以堅持。只是到了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開會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時，才下決心取消公共食堂。^②這些措施，對農村的危機多少有所緩和。

只治標不治本的七千人大會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縣委書記以上的負責幹部七千多人參加，所以又叫“七千人大會”。這次大會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做了回顧。以前把“大躍進”對國民經濟的破壞都歸罪于“自然災害”。這次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在報告中第一次承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也是造成經濟困難的一條原因。後來劉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說，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還說：“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③

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作了一點自我批評。他號召發揚民主，並以霸王項羽為例，因為聽不得不同意見，終歸失敗。他批評那種“第一書記說了就算數”的現象，說這種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他表示要對中央犯的錯誤負責。不過他沒有說自己是不是霸王，也不提廬山會議的是非。^④

這次大會是在完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糾正一些枝節錯誤。在發揚民主的問題上也只是強調“讓人講話”。這次會議揭發出來的問題，證明彭德懷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會議不但不給彭德懷平反，反而說鬥爭彭德懷是“完全必要的”。因此，這次會議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但是不管怎樣，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搞錯了，這是任何人心里都明白的。因此，除了大量的“甄別平反”之外，思想園地經歷了一段平靜的日子。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或毛澤東暫時沒有發動大規模的思想鬥爭。促進相對平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的精力有限。當時的

燃眉之急是首先挽救瀕于絕境的農村。救農村也就是救城市，因為城里人要吃飯。同時城市本身還承擔了過多的人口和過多的職工的壓力，必須狠下決心進行精簡壓縮，減少吃商品糧的人數和財政負擔。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全神貫注，因為它牽涉到政局穩定。所以這個時期從上面來說，至少是沒有精力再去發動一場新的鬥爭。

調整文教政策，緩解黨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

對於知識分子和他們耕耘的文化教育科學藝術園地來說，這時好像又一次出現了令人興奮的轉機。

在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的主持下，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春，中共中央陸續制定了《科學十四條》（一九六一年七月）、《高教六十條》（一九六一年九月）和《文藝八條》（一九六二年四月）。這些政策都是為了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概括了前幾年的左傾手法：“別人的話說出來，就會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①這一套整人的做法被稱為“五子登科”。周恩來說，一來就“五子登科”，這種做法不好。他要求從領導做起，改變作風。

聶榮臻在起草《科學十四條》時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建議不要用“白專”帽子去壓人，學術上要自由辯論，要承認個人的創造作用。他把“使大家心情舒暢”作為黨組織領導研究機構的條件之一。

為防止黨員對科研工作的瞎指揮，《科學十四條》規定：基層黨組織只對科研工作起保證作用，黨員個人見解不代表黨。不過它規定在研究所這一級實行黨委領導。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批轉聶榮臻的報告時指出：“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不抓辯子。”“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于講真話，暢所欲言。”^⑫後來廣為流傳的“三不主義”，就是這樣正式由中共中央肯定並下達的。它受到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不過卻從來沒有兌現過。

《高教六十條》把反右派運動和“大躍進”以來對高等教育的破壞做了些糾正，大體上對維護正常的教學體制做了一些規定。比如，規定學校“必須教學為主”，在教學中“必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科研工作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等。關於領導體制，是這樣規定的：“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⑬學校本來就是教學的機構，教師本來就是要教學生的。只有這樣，學校才能成爲一個學校。然而這種任人皆知的常識，居然必須由中共中央鄭重其事加以規定，可見前幾年的鬥爭已經把事情弄到甚麼程度了。

知識分子第二次摘帽子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來在廣州發表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說：“你們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

陳毅三月六日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說，應該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之帽，加勞動人民之冕。^⑭

中共中央四月批准的《文藝八條》是根據周恩來三月在廣州講話的精神制定的。主要是強調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及“批判地繼承民族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以及“保證創作時間，注意勞逸結合”等等。^⑮

由于中國共產黨調整了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把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的框框也打破一些，所以這兩年思想界有了一點活躍的氣氛。戲劇、電影、小說，都有些新的作品。針砭時弊的雜文又出現了。《人民日報》的《長短錄》專欄，《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都有很大影響，深受讀者歡迎。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也有些問題在報

刊上展開討論。好像真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可惜這個時期太短暫了。事實上中共中央內部對思想界和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並不一致。周恩來和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中共中央內部就有人不同意。於是周恩來要求毛澤東表態，以便澄清。但是毛澤東卻一直拒不表態。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¹⁶

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況果然變了。

二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八屆十中全會——以階級鬥爭為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十中全會。在此以前，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後期回到北京）舉行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所有的重要問題都在北戴河會議上解決了，全會是通過正式決議。所以這兩個會議實際上是一個會議，兩個會議的名稱有時也互相通用。

這個會議不但把半年前七千人大會的方向完全扭轉，把意識形態短暫的平靜徹底打破，而且把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左傾發展為一套完整的理論和路綫。

據《國史通鑒》記載：“由于五月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已經通過了進一步調整的決議，並對工業和基建戰綫的調整作了具體安排，所以北戴河會議的原定議題是進一步解決遺留下的農業和商業等方面的具體政策問題。”但是會議的第一天（八月六日）毛澤東就發表了一個與會議主題截然不同的講話。¹⁷

毛澤東向會議提出三個問題要大家討論：階級，形勢，矛盾。接着他就亮出自己的底牌：第一，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階級。第二，不能把形勢說成一片黑暗。第三，如果承認有階級，就得承認兩條道路的矛盾長期存在。¹⁸

這樣，會議的主題就轉為“以階級鬥爭為綱”了。會議批判了

“黑暗風”(指對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單幹風”(指農村的包產到戶)，和“翻案風”(指給受批判和處分的幹部甄別平反)。正好，在此以前章乃器 and 彭德懷先後提出申訴。章乃器是頭號大“右派”，如果給他平反，“反右派運動”就整個泡湯了。彭德懷寫了八萬字的申訴信，為強加給他的“裡通外國”和“軍事俱樂部”的罪名申冤。如果他的申訴能夠成立，廬山會議“反右傾”的成果也就喪失了。這就更加重了北戴河會議“反翻案風”的法碼。顯然，毛澤東必須寸步不退，才能保住“反右派”和“反右傾”的戰果。

九月二十四日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一開幕，毛澤東就作了重要講話。他回答了在北戴河會議提出的問題：“現在可以肯定，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所以他號召全黨：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⑩

中共社會主義時期基本路綫正式形成

全會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想通過了大講階級鬥爭的決議：“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⑪這是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具有理論意義的最新提法，也是以後中共一切政策措施的根本出發點。以前的“過渡時期”，都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次變成了過渡到共產主義。於是過渡時期就成為一個長期存在的獨立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充滿了尖銳的階級鬥爭。這就比斯大林主義走的遠得多了。後來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人們就常常用這八個字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一種通俗說法。

《劉志丹》冤案——最大的黨內文字獄

爲了證明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八屆十中全會在三天時間里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

事情是從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說《劉志丹》開始的。

這部小說通過十年內戰時期陝北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之一劉志丹的傳記，描寫了這個根據地的歷史。其中當然會涉及和劉志丹共事的高崗以及陝北地區其他人物。作者李建彤是劉志丹之弟劉景範的夫人。她寫好之後，先印出樣書徵求意見。包括習仲勛（原西北局書記，當時已任國務院副總理）在內的許多老幹部都贊成出這本書。有人將此事報告康生。康生並未看過此書，就斷言“完全是爲高崗翻案的！”在北戴河會議期間，他寫信給楊尚昆，要求中央書記處處理這個問題，同時要工人出版社把《劉志丹》第三稿印三百本，第五稿印六百本送中央審查。

在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批判翻案風時，康生遞給他一個條子：“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唸了這個條子，並且說了一段經常被引用的名言：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④

於是這部小說立刻變成政治問題。康生說它“爲高崗翻案”，“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英明，還先知”，“爲習仲勛篡國篡黨製造政治資本”等。

更嚴重的是十中全會平空斷定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是個“反黨集團”，並且專門成立以康生爲首的“專案組”進行審查。這就造成一個株連很廣的文字獄。

這個會也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一樣，一邊倒，毛澤東的意志不折不扣地爲全體與會者所接受。不過不包括中央委員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習仲勛和賈拓夫。因爲中央政治局決定他們

五個人“不參加全會”。^②(按：黨章並無此項規定：政治局可以剝奪中央委員的權利。因為政治局係中央委員會選出的，應向中央委員會負責。如果政治局可以剝奪五個中央委員的權利，當然也可以剝奪更多的中央委員的權利。)

劉少奇和毛澤東配合默契

全會結束時，劉少奇按照毛澤東的思想作了重要講話。他講話時，毛澤東有插話。他們的對話把階級鬥爭的氣氛推向一個新高潮。下面是其中片段：

劉：“《劉志丹》八十萬言書也是綱領……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兩條道路的問題未最後解決……”

毛：“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又出了赫魯曉夫……”

劉：“斯大林在集體化以後講‘誰戰勝誰’的問題國內解決了，國際未解決。在這裡還是主席講得對。”

毛：“我是根據列寧的說法，列寧有預見……”

劉：“斯大林不對，麻痹了自己。”

毛：“後頭又出了反革命……”

劉：“我們要接受教訓……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

毛：“我們要準備五代到十代，我們算第一代，共一百年到二百年！”^③

全會以後，西北地區許多黨政軍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進行審查，有好些人被說成“反黨集團”成員。習仲勛從此被撤職，一直“審查”了十六年。賈拓夫也一直被“審查”，到文化大革命時，被折磨死了。這是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樁黨內文字獄，全案株連約一萬人，包括為作者李建彤帶過路的老百姓都不能幸免。^④

由於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非常嚴重，好像階級敵人隨時都會實行“資本主義復辟”，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後，思想

園地到處都在戰鬥，不單在國內鬥，而且在國際上鬥。

三 文藝界的狂風

文藝園地歷來是思想鬥爭的重災區

當代中國大陸上的思想鬥爭，文藝園地歷來是主要戰場。只要政治上一有風雨，這塊園地一定成爲災區。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鬥爭還沒有完，又打出了一個“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他們是《文藝報》的正副主編）。其實並沒有這樣一個“反黨集團”。一九五七年中宣部已經派人去平反。不料反右派運動開始了。結果，不但丁玲陳企霞沒有平反，連派去平反的人都被打成右派了。在反右派運動中，許多作家和藝術家被打成右派，他們的作品被定爲“毒草”。像青年作家王蒙和他的作品《组织部新來的年輕人》，就是反右派鬥爭的犧牲品。著名記者劉賓雁和他的作品《在橋梁工地上》，也遭到同樣的命運。

毛澤東對文藝的特殊眷顧

現在八屆十中全會既然大抓階級鬥爭，文藝界短暫的平靜便過去了。全會以後，毛澤東對文藝特別注意。他在巡視到華東時，對戲劇發表意見說：“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占優勢。”^⑤“東風”和“西風”是毛澤東從《紅樓夢》中引用的語言，用來代表互爲消長的兩種力量。不過毛澤東給“東風”賦以褒義，給“西風”賦以貶義。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這個《報告》特別點了孟超新編的劇本《李慧娘》，說它的要害是影射“大躍進”的問題。

李慧娘是南宋宰相賈似道的歌女，因游西湖時看了一個青年男子一眼，便被賈似道殘酷處死。劇本《李慧娘》寫了她的冤魂復

仇的情節。當時這出戲受到許多觀眾的喜愛。

文化部的報告被批准之後，對《李慧娘》的批判就開始了。康生曾經贊揚過這個戲並且宴請過這個戲的編劇和演員。此時他立刻改口說，《李慧娘》“是用死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④

鬼戲雖然禁演了，毛澤東還是對文藝工作不滿意，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說：“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⑤

過了一個多月，毛澤東把他對文藝問題的看法和心情加以概括，在一個文件上用批示的形式寫下來：“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他指責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⑥

文藝界連續兩次整風

這個憤怒的批示使黨內領導人感到非同小可。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劉少奇親自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人士開會，由周揚傳達了毛的批示。過了一個多月是春節。二月三日，劇協組織了一個“迎春晚會”。不料被人告發，說這個晚會“吃喝玩樂”，部分節目“庸俗低級，趣味惡劣”。於是中宣部在三月下旬召集文聯各協會領導人連續討論三天，得出結論說：“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當前階級鬥爭在文藝隊伍中的反映，是劇協領導資產階級思想的暴露。”同時決定文聯和各協會進行七到十天的整風。

五月八日，中宣部寫出《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本來草稿是不能往外拿，更不能往上送的，不料卻被江青得到，直接送到毛澤東手里。六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這個草稿

上寫了下面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②

裴多菲俱樂部是匈牙利知識分子在一九五五年組織的。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時,這個俱樂部起了一定的作用。蘇軍鎮壓了匈牙利事件之後,這個俱樂部被定為反革命組織。因此毛澤東這個批示分量很重。中宣部立即召集剛剛整風的文藝界,決定再來一次整風。這一次時間長得多,從一九六四年七月一直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因為毛澤東說過,“整個文化部系統不在我們手里”,所以整風結束時,中共中央調整了文化部領導,免去了夏衍、齊燕銘的文化部副部長職務。^③

整風使百花凋零

在文藝界第二次整風期間,許多電影、戲劇、小說都被扣上“毒草”的帽子遭到公開批判。這是建國以來在文藝園地刮起的最大一場風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這個園地已經是百花凋零了。

首先罹難的是電影。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宣部向中央書記處寫了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毛澤東批示道:“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甚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止這兩部影片,還有別的,都需要批判。”^④

於是“毒草”的名單迅速擴大。《舞臺姐妹》、《紅日》、《兵臨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鋪子》、《聶耳》、《怒潮》、《不夜城》、《兩家人》、《球迷》、《逆風千里》、《抓壯丁》等影片,都受到公開批判。

除了電影以外,戲劇、音樂、美術也都遭到同樣的命運。

小說方面，除了構成文字獄的《劉志丹》以外，描寫彭德懷事迹的《保衛延安》和青年知識分子獻身革命的《青春之歌》等受到讀者喜愛的作品，都被戴上“反黨、反毛主席、為反革命修正主義頭目樹碑立傳”的帽子。《紅旗譜》、《我的一家》等作品被說成“歌頌錯誤路線，攻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三家巷》、《苦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們播種愛情》、《苦菜花》等等，被扣上“宣揚階級鬥爭調和論”或“人性論”的帽子。《上海的早晨》、《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反映建國以來生活的作品被說成是“歪曲和攻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反映解放戰爭的《紅日》和反映土地改革的《暴風驟雨》，被說成“丑化工農兵形象”或“美化階級敵人”。久負盛名的《三里灣》和《李雙雙小傳》等，被指控為“大寫所謂‘中間人物’，反對塑造工農兵形象”。

總之，作家怎麼都不對。你寫了，說你“歪曲”，“醜化”；沒有寫，說你“反對”。寫現代和當代的人物和事件，當然很容易扣上政治帽子；寫古代人物和事件，照樣可以扣上政治帽子。深受觀眾喜愛的京劇《謝瑤環》（田漢編劇）寫的是唐朝的事。武則天派謝瑤環到江南巡視民間饑苦，懲辦豪強，結果反被權奸豪強所害。這樣一齣戲，竟被說成影射現實，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劇中武則天有一句唱詞“載舟之水也覆舟”，本是中國一句極有名的政治格言改寫的：“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而且由武則天口中唱出來，完全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但是批判者卻指責這是“號召人民起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②

邵荃麟的厄運

這場劫難既然使文藝園地許多香花被打成毒草，它的園丁們當然也逃不脫厄運。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遭到批判，在文藝界擔任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也不例外。夏衍、陳荒煤、邵荃麟、袁文殊等都受到整肅。特別是邵荃麟，因為文藝理論問題受到嚴厲批判。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座談會。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在講話中談到文藝作品簡單化的缺點。他主張作家要更深刻地去反映人民內部矛盾鬥爭的長期性、艱苦性、複雜性。這種主張後來被稱作“現實主義深化論”。同時他在談到克服人物創作單一化的缺點時，強調也要寫“中間人物”。他說：“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應當寫出他們的各種豐富複雜的心理狀態。”

提出這種觀點本來文藝創作方法問題，當時很多人贊成，也有不同意見，都是正常的。但是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下來之後，“寫中間人物論”被認為反對寫英雄人物，竟成爲一個政治問題，遭到長時間的批判。作協和《文藝報》多次開會進行深入檢查。邵荃麟本人被當作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文藝領導機關中的“代言人”。姚文元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解放日報》發表《使社會主義文藝蛻化變質的理論——提倡“寫中間人物”的反動實質》，說邵荃麟“違背了毛澤東的文藝方向，離開了無產階級文藝的根本路綫，走上了一條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綫。”這場批判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而且日益升級。一九六二年的大連座談會竟被批判成“牛鬼蛇神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反革命黑會”，參加會議的作家橫遭迫害。邵荃麟于一九七一年屈死獄中，遺體始終沒有下落。^③

四 哲學戰場

楊獻珍與主流思想的分歧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楊獻珍成爲哲學戰場的 centre 人物。他是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央黨校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訓練中共高級幹部的。在歷次思想鬥爭中，它是以重武器向資產階級思想開火的主力兵團，其中楊獻珍的火力更是特別猛烈。但是一

九六四年，楊獻珍自己卻陷入批判火力的重圍了。

原來在“大躍進”的年代，楊獻珍就看不慣，經常講要尊重唯物主義，要從實際出發。一九五九年七月他說過這樣的話：“現實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又有多少？依我看來，在某些怪事中，現實主義占百分之一，浪漫主義占百分之九十九。”中央黨校附近有個生產隊的高產田，畝產指標是一百二十萬斤，打死七十多條狗，熬湯當肥料，結果顆粒無收。楊獻珍批評說：“定指標能按浪漫主義辦事么？怎能以寫詩的構思來定指標呢？”^④

這時正是彭德懷在廬山受到圍剿的時候。所以廬山會議結束後，楊獻珍就在他當校長的黨校內受到長達十個月的批判。康生說：“楊獻珍配合彭德懷，一文一武，一個在山上，一個在山下，瘋狂反對三面紅旗，反對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在強大的壓力下，楊獻珍遞交了《向黨低頭認罪》的檢討書，並被降為副校長。

彭德懷罷官後被安置在北京郊區掛甲屯的吳家花園閉門幽居。此地離中央黨校很近。楊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在彭領導下工作，是老朋友，因此常去看望這位淒涼孤寂的老將軍。

一九五九年對楊獻珍的批判還是內部進行的。一九六四年的批判就搬到社會上公開進行了。

楊獻珍在黨校講課時，從中國古代哲學中借用了一個“合二而一”的概念，把它和毛澤東常用的“一分為二”放在一起，用來解釋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黨校兩位教員按照這個觀點寫了一篇文章《“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發表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發表之前，康生已經得到清樣。他指示《光明日報》盡快發表，同時就組織人寫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在六月五日的《光明日報》上刊出，並且把這篇文章通過江青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作出裁決：“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義。”^⑤

如臨大敵的黨內理論鬥爭

圍剿楊獻珍的戰役開始了。黨校爲此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撥出一棟小樓作爲辦公室，下設材料組，調查組，批判組。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就“合二而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

本來在報刊上和某人“商榷”一個甚麼學術問題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中國大陸，在報上“點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尤其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上點一個中央委員的名字，更有不尋常的意義。康生說：“這本身就是對楊獻珍的政治批判。”^④

從八月份起，中央黨校開始對楊獻珍展開批判。整個批判工作如臨大敵，組織嚴密，計劃周全。各個支部，各處，各教研室，都分有專題，組織專人，搜集材料準備發言。發言稿都要送校部審查，批准後還要在小範圍內試講，像演戲之前的彩排一樣。排練好了之後，再上大會發言。

中央黨校有一個和楊共事多年關係密切的教研室主任，在學校內外專門做批楊報告。他說，他早就看透了楊獻珍，已經等了多少年，“現在這一天總算到了！”他的意思是表明自己政治嗅覺是多麼敏銳，眼光是多麼高明，所以早就“看透了”楊獻珍。但他也無意中泄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這支“革命隊伍”里，人和人除了“親密的同志關係”以外，還存在着如此陰險的敵對關係：已經看到這個“同志”有問題了，卻不去提醒他，而是暗中“等待”他。等到某一天，時機來了，便突然撲上去。

爲了把這場批判推向全國，康生在九月召集各省市宣傳部長、學校校長和報刊負責人作了安排。於是全國都動起來了。到一九六四年底，已經發表批判文章約五百篇。各地還紛紛舉行座談會，痛斥“野心家、反黨分子楊獻珍”。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中央黨校校務委員會向中央寫了《關於

楊獻珍問題的報告》，結論是：“他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是彭德懷一伙，是個小赫魯曉夫。”

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把黨校這個報告作為中央文件批發全黨，撤銷了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關進監獄住了七年。中央黨校受到株連的有一百五十多人。歷來在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鬥爭中非常賣力並以火力凶猛著稱的孫定國（學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遭到比他的火力更凶猛的批鬥之後自殺身死。

康生原先布置過，要“引蛇出洞”，雙方觀點都發表，看看全國都有誰同意“合二而一”。後來，凡同意“合二而一”的，都受到迫害。^②

五 經濟學戰場

經濟學和國民經濟息息相關。理論上的是非，直接影響着現實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幾位經濟學家曾經率先指出現實經濟生活的重大弊端，並且提出切合實際的良策。可惜他們的真知灼見都被當作異端。不但這些觀點遭到顛倒黑白的批判，而且他們本人也都遭到沉重的政治打擊。作為這種橫暴批鬥的後果，是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整個國家為它付出了無法估量的代價。

人們已知的馬寅初和他的人口理論，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錯批一人，誤增兩億。”就是這場批判的歷史結論。

另一個例子是董謙和他的《公共食堂調查》。

（以上兩例已見本書第四章）

孫冶方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分道揚鑣

還有一個例子是孫冶方和他的利潤理論。

孫冶方是一九二四年加入共產黨的老黨員，一九二五年曾被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遭受過王明的打擊。一九三〇年回國後在上海等地秘密從事黨的理論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在蘇北和華中敵後根據地的黨校作理論教育工作。建國後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一九五七年到經濟研究所任所長。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孫冶方之所以成爲經濟界的“修正主義旗幟”遭到大軍圍攻，也不是偶然的。他早就和當權的正統理論分道揚鑣了。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認爲生產資料一旦公有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將退出經濟生活。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用行政手段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領導，而對市場經濟及其相關的價值、價格、利潤等範疇，採取排斥態度。孫冶方早就發覺這個問題，並在一九五六年就寫出《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注一)，在《經濟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上發表，呼呀重視價值規律。這種清醒的聲音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引起當政者的重視。

一九五八年他看到遍地星羅棋布的土高爐煉出大量廢鐵，就問道：“你們不怕虧老本嗎？”人們豪邁地回答說：“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需要的是使用價值本身。”孫冶方說：“社會主義也必須講價值。”他給他們算了一筆簡單的帳：“假如你們花了一百元，煉出來的鋼鐵只值三十元或十元，甚至一分錢也不值，那麼你們能維持多久呢？”^⑧當然孫冶方的觀點說不服狂熱的人們，因爲這種狂熱來自上邊。

一九六〇年以後，孫冶方着重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利潤問題。多年來“利潤”是個禁區。按照傳統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經濟中是不能有利潤位置的。價值，利潤，獎金，都被認爲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只能是革命者批判的對象。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現實卻是企業本身沒有活力，只能靠政府用行政命令和黨的思想工作來推動，不推就不動，推一推才動一動，或者推也推不動。因

此，無論“社會主義祖國”蘇聯也好，還是“一邊倒”的中國也好，都面臨同樣的問題。蘇聯在自由化的過程中，有個經濟學家利別爾曼已經提出用利潤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杠杆。當然，在整個僵化的傳統體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光靠利潤也不可能給它注入活力。不過這畢竟是從理論上突破僵化體制的創見。如果這種創見當時能引起重視，並且能在沒有戒律的條件下進行自由討論和研究，未嘗不能使中國經濟早一點擺脫蘇聯模式，走上改革的道路。可惜這個轉機完全錯過了。結果是中國這列火車撞倒了扳道叉的人，繼續沿着老路走了下去。

“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

孫冶方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五日送出一份《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的研究報告給國務院，同時給中共中央主管理論工作的陳伯達和康生也送去抄件。幾天後，他被告知：康生看了他的報告，只是說：“老孫這個報告提出了一個問題。”但沒有表態。

其實康生背地里到毛澤東那里去告了狀：“孫冶方一個小小的經濟所長，竟敢公然擁護蘇修利別爾曼的獎金掛帥和利潤掛帥！”^③

從此孫冶方就被稱為“中國的利別爾曼”，他的主張被稱為“利潤掛帥”。康生和陳伯達說他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這種主張既然和當時的“社會主義”背道而馳，也就危害了當時的“立國之本”，當然和黨的原則絕不相容。所以孫冶方是必須拔除的釘子。

“要為真理活下去”

由康生和陳伯達直接指揮的大規模圍剿，在一九六四年開始了。這一年初，他們指使《紅旗》雜誌組織了一個近百人參加的座

談會。孫冶方被指定必須參加。這個會的主旨是批判支持孫冶方觀點的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強調價值和利潤，遭到與會者眾口一詞的討伐。

孫冶方忽然站起來說道：“不要再批判他們了。他們的文章說明的是我的觀點，幹脆沖着我來吧！”接着他即席發表演說，理直氣壯地指出必須按價值規律辦事。“按價值規律辦事，第一條就是抓利潤。”他指出：如果價格能正確反映價值，“利潤的多少是反映企業技術水平和經營管理好壞的最綜合的指標。”同時他還要求擴大企業自主權，“應當把簡單再生產範圍內的一切事，放手讓基層企業自己處理。”他大聲疾呼：“我要為企業請命！”^⑧

不論開多少次批判會，孫冶方從來也不屈服：“我還要堅持自己的意見，今後也不準備作檢討！”在圍攻最凶惡的時候，孫冶方已經作了最壞的準備。他鎮定地說：“死不足惜，名聲毀了也不要緊。但我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形成的經濟觀點決不能丟。我要為真理活下去。”^⑨

雖然用嘴批不倒孫冶方，但是權力可以把他打倒。康生派了個“工作隊”進駐經濟研究所，制造了一個“孫冶方張聞天反黨聯盟”（張聞天在廬山會議遭打擊後到經濟所當一名研究員），把孫冶方打成這個“反黨聯盟”的頭目，予以撤職。1965年又把他弄到農村去監督勞動。等到“文化大革命”，又把他從農村揪回來批鬥，游街。一九六八年四月，他被逮捕入獄，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才被釋放。

他回到經濟研究所。“四人幫”的重要成員遲群要他寫一份“正確解決三對待”的材料。即“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這個“三對待”是強迫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的人不能心懷不滿，不但打掉門牙必須往肚子里咽，而且還要為“文化大革命”叫好，要為“革命群眾”的野蠻行徑叫好，另外還要貶低自己，痛罵自己。這就叫“三個正確對待”。孫冶方沒

有這樣“正確對待”，而是寫了這樣三句話：“個人恩怨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④

（注一）孫冶方很坦率，不奪人之美，他說自己是受了顧准的啓發而提出價值規律問題的。他在這篇文章的〈後記〉中寫道：“還在今年初夏，顧准同志就提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

顧准是被當代中國永不停息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摧折了的杰出的理論家。事實上他是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不了商品貨幣關係，也取消不了價值規律的人。然而他一生坎坷，兩次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無從施展他的驚人才華。直到他孤零零地棄世之後，人們才從他遺留下的斷簡殘篇中發現他的真知灼見，遠遠超出同時代的人們。可惜他的稿子大部散失，僅存的有限遺作和日記，已由陳敏之編集出版（《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

六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中共和蘇共的分歧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之後，除了在國內全面開展思想鬥爭以外，又在國際上開闢了一個新戰場，這就是以蘇共為對象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

中共和蘇共的矛盾從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就開始了。起先爭論限于兩黨內部，不曾公開宣戰。中共主要是不滿蘇共揭斯大林的蓋子，事先不打招呼；再就是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而沒有對他的功過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在理論和策略上是不同意蘇共的“和平過渡”（即認為資本主義可以不經過

暴力革命而過渡到社會主義)。至于反對個人崇拜以及在國際上和平共處,當時中共中央在表面上都是贊成的,並且表現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的文件中。

至關重要的反修背景

其實有幾個沒說出來的因素在中蘇兩黨關係惡化和中共決定大舉“反修”的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是馬恩列斯之後誰來高舉紅旗。二是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三是蘇共對中國的控制和干涉。

毛澤東並不喜歡斯大林,但他顯然欣賞斯大林在蘇共黨內和蘇聯國內以及“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最高領袖地位。毛澤東在中國的地位,當然和斯大林在蘇聯一樣,也是至高無上的。至于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地位,斯大林在世時自然輪不到毛澤東,如今斯大林已經去世,應該是誰呢?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他主動提出“以蘇聯為首”,那只是因為蘇聯國力遠比中國強大。至于馬克思主義水平以及政治鬥爭的策略等方面,他並沒有把赫魯曉夫放在眼里。而且中國共產黨自己早就是“馬恩列斯毛”,把他排在第五位了。使毛澤東最不高興也最擔心的是反對個人崇拜。赫魯曉夫當斯大林在世時,狂熱地吹捧他,而在他去世之後,又那樣揭露和批判他。這使毛澤東的心里蒙上一層陰影,總覺得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身邊也有中國的赫魯曉夫,準備在他去世之後向中共代表大會作一個“反對個人崇拜”的報告,把他一棍子打死。所以他對“反個人崇拜”越來越反感,尤其對赫魯曉夫更加仇恨。

蘇共雖然同西方搞緩和,但在處理同中共的關係以及中蘇國家關係上,實行大國霸權主義,總想壓服中國。在這方面,赫魯曉夫完全繼承了斯大林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接受的。因

為中共堅持獨立自主，不聽命于莫斯科，于是蘇共就搞突然襲擊，于一九六〇年突然單方面撕毀中蘇兩國簽定的全部合同，撤退援助中國的全部專家，拿走援建項目的全部圖紙和技術資料，停止供應所有的關鍵設備和材料，並且追索朝鮮戰爭的全部債款。（朝鮮戰爭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武器。但這些武器要由中國出錢！）當時正是中國“大躍進”失敗後最困難的年月，蘇共撕毀合同已經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失，還要讓中國人在挨餓的時候擠出大量食品和日用消費品運給蘇聯抵還債款。這是任何民族都難以咽下的苦果。

以上就是中共決定進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一些深刻的背景。

中蘇兩黨鬥爭的發展

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發表三篇文章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一篇是《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列寧主義萬歲》，一篇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還有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都是“指鷄罵狗”，表面上以“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為靶子，實際上是批判蘇聯共產黨。文章主要就時代問題，帝國主義本性問題，戰爭與和平等問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觀點。

一九六〇年六月，世界各國共產黨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會。蘇共在會上突然送給中共代表團一份《蘇共致中共通知書》，批判中國紀念列寧誕辰的三篇文章，說中共重復列寧的觀點是“教條主義”，說中共“希望戰爭”，是“左傾冒險主義”。中共代表團當即發表聲明，指責蘇共搞突然襲擊，以老子黨的姿態用壓力迫使兄弟黨屈服，這是完全違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準則的行為，中國黨決不接受。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各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會，中蘇兩黨關係

有所緩和。但是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中蘇關係又緊張起來。蘇聯報刊上不斷發表批判中共的文章。中共內部，對蘇共已不抱甚麼幻想。一九六二年初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蘇聯的壞人壞事，蘇聯的修正主義者，我們應當看作反面教員，從他們那里吸取教訓。”^②

因為蘇共“二十二大”以後世界上有四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發表決議、聲明和文章反對中共，所以中共從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陸續發表七篇文章回答各國共產黨的批評，但還沒有直接指名批評蘇共，為的是留有餘地。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系統地就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和策略說明了他們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與中共針鋒相對的原則問題，已經沒有任何調和餘地，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同蘇共就這些原則問題進行一場公開的大論戰。首先在四月十四日把蘇共的信件全文發表，然後在六月十四日給蘇共發出了回信，這就是系統闡明中共觀點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因為這個建議共有二十五條，故簡稱《二十五條》。

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全面反駁的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條》。

為了進行論戰，中共中央早在一九六〇年就成立了由康生領導的反修寫作組。除了過去已經發表的文章之外，由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共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

中共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理論和策略

《二十五條》和《九評》涉及馬列主義一些基本理論和共產黨的基本策略，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這些理論和政策，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的路綫。由于是在世

界面前和最強大的對手作戰，並且那“反修”寫作組也集中了一批被認為是黨內最精幹的國際問題專家和馬列主義理論家，所以這些反修文章在論證上更加周全。下面是其中一些重要論點：

現在還是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本性並沒有改變，它的矛盾也沒有改變；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必然引起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決這些矛盾。

資產階級不會自願讓出政權，歷史上沒有過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先例，故必須準備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屬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整個過渡時期都存在着階級鬥爭。在這個時期，不但舊有的剝削階級不甘心滅亡，而且會從小生產者、工人和幹部中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同時，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平演變政策，又是社會主義國家階級鬥爭繼續存在的外部條件。不但國際間的階級鬥爭必然反映到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來，而且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也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因此，《九評》說：

“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在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停息的。這個鬥爭是長期的、反復的、曲折的、複雜的。這個鬥爭像波浪的起伏一樣，高一陣、低一陣，有時候比較緩和，有時候十分尖銳。”這種鬥爭將“決定社會主義社會是走向共產主義，還是復辟為資本主義。”^⑨

《九評》除了宣布上述馬列主義“普遍真理”之外，最尖銳的部分是對蘇聯的具體分析。分析的結果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已經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這個集團是蘇聯新生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他們正在成為官僚資產階級，正

在把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所有制，正在把蘇聯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九評》中還有一篇文章專談斯大林問題。文章認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並且特別強調“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也正是毛澤東最念念不忘的一個老掉牙的公式。表面上說的是斯大林，實際上是在給自己定調子。

據說，中國本來打算共寫十篇文章，但寫到九篇之後，蘇共領導內部發生權力更替，赫魯曉夫下臺了，勃列日涅夫上臺了，所以第十篇就沒有寫。勃列日涅夫上臺後，蘇聯的霸權主義比赫魯曉夫時代更厲害了，所以中蘇關係繼續惡化。

反修鬥爭的回顧

中共這場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最大的成功之處是掃掉了蘇共一貫的“老子黨”威風，發揚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這場鬥爭又一個收穫，是使所謂“社會主義陣營”陷于瓦解，因為這個“陣營”或“大家庭”實際上是蘇聯控制和剝削鄰國以便爭霸世界的工具。

但是這場鬥爭如果就理論觀點和策略原則來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赫魯曉夫揭開斯大林的蓋子，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對傳統的經濟體制試圖改革，在國際關係上用緩和代替冷戰，研究新時代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特點，因而采用新的策略，這都是一種進步，應該說也正是一貫反對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但是在這場反修鬥爭中，這些進步卻都被扣上“現代修正主義”的帽子，通通被否定了。（注一）

其實赫魯曉夫所作的，在國內無非是試圖改革已經走入困境的斯大林模式，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國際上是想稍稍減輕一下沉重不堪的軍備競賽的負擔。他調整政策的企圖及其成

敗，本不應由別的國家過問。事實上中共的批判也不可能對蘇聯發生甚麼作用，可是對中國自己卻發生了作用，而且是非常巨大的作用。《二十五條》和《九評》的觀點和路綫，正是中共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的根本原則。沿着這個左傾軌道繼續朝前走，終於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了。

(注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鄧小平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談到六十年代的那場中蘇論戰。他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這是很含蓄的自我批評。其實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很多都是當年中共所批判的“修正主義”，而且比那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走的還遠。

※ ※ ※

第五章 引文出處

-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6-1958)第200頁
- ②《國史通鑒》第2卷，第160頁
- ③《中國“左”禍》第322-323頁
- ④同上，第324頁
- ⑤同上，第325頁
- ⑥《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244頁
- ⑦同上，第246頁
- ⑧同上，第250頁
- ⑨《國史通鑒》第2卷，第86頁
- ⑩同上，第2卷，第86頁
- ⑪《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5頁

- ⑩《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 207 頁
- ⑪《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252 頁
- 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5)第 54-55 頁
- ⑬《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217 頁
- ⑭《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 208 頁
- ⑮《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20 頁
- 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5)第 97 頁
- ⑰《中國“左”禍》第 362-363 頁
- ⑱《人民日報》1962 年 9 月 29 日
- ⑲《中國“左”禍》第 364-365 頁
- ⑳《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91 頁
- ㉑《中國“左”禍》第 367 頁
- 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5)第 99 頁;《中國“左”禍》第 366 頁
- 頁
- ㉓《中國“左”禍》第 369 頁
- ㉔《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120 頁;《中國“左”禍》第 370 頁
- ㉕《中國“左”禍》第 371 頁
- ㉖《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550 頁
- ㉗同上,第 552 頁
- ㉘《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5)第 87 頁;《中國“左”禍》第 374 頁
- 頁
- ㉙《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1965)第 91 頁
- ㉚《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121 頁
- ㉛《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第 300-305 頁
- ㉜《我的哲學罪案》第 142 頁
- ㉝《中國“左”禍》第 381 頁
- ㉞《中國“左”禍》第 385-387 頁
- ㉟《風起雨落幾鴻儒》第 115 頁
- ㊱同上,第 116-117 頁
- ㊲同上,第 119-120 頁
- ㊳《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123 頁

第五章 階級鬥爭為綱

- ①《風起雨落幾鴻儒》第 128 頁
- ②《國史通鑒》第 2 卷,第 19 頁
- ③《人民日報》1964 年 7 月 14 日



大躍進失敗後，中共暫時放鬆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因而這個園地有了短時間的平靜，文藝界獲得一點喘息的時間。

這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來和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的參加者在一起。周恩來和文藝界的關係一向比較好，他在會上批評了文藝工作中的左的錯誤。



《關漢卿》為田漢以元代戲劇家關漢卿生平為素材所寫劇本，描寫關漢卿與風塵知己朱簾秀，因演出《賣娥冤》而遭到權臣迫害。粵劇大師馬師曾和紅線女在北京演出此劇，曾轟動京城。但因此劇揭露元代暴政對藝術家的迫害，遂招康生之忌。田漢也因此劇及他所寫的另一劇本《謝瑤環》等而遭到批判，並終於身死牢獄，遺骨都無尋處。他的命運，比他深有寄託的關漢卿的命運，還要悲慘得多。（劇中的關漢卿和朱簾秀雖被下獄，終於獲救，只是被逐出京城，得免一死。）



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是繼馬寅初之後第二個誓以生命捍衛真理的學者。他因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被稱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遭受嚴厲批判並被投入監獄七年之久。出獄後表示：“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長期監禁嚴重損傷了他的健康，圖為晚年在病榻上聽人讀報。



本來按照《土地改革法》，土改後三年，地主富農可以改變成分。但一九六二年大抓階級鬥爭以後，這種規定完全作廢。（不但地主富農改不了成分，而且他們的子女也都要繼承父輩的成分，叫作“地富子女”。）再加上“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總稱“四類分子”。後來又加上“右派分子”，總稱“五類分子”。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家屬，便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賤民階層，可以任人欺凌。

上圖為四類分子在民兵的押解下參加一個大會。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1966 - 1971)

毛澤東爲甚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促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去探尋。一方面是政治因素：第一，把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認爲到處都是階級敵人，中國已處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夜。第二，認爲黨內已經出現許許多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第三，最危險的是劉少奇已經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他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尤其使毛澤東寢食難安的是這個黨好像正在脫離他的控制，而劉少奇已經要奪權了。

除了這種政治上的考慮以外，從毛澤東的實踐和思想，特別是在文化革命前後的言行來看，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有一個深層的考慮，或者說有這樣一種“潛臺詞”：那就是按照他的“理想”來重新鑄造一個“中國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以便重溫“大躍進”中失敗了的“公社夢”。

當時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難題是：劉少奇早已確立爲他的“接班人”，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內領導格局已經固定，按照正常途徑很難改變。要想擺脫這種格局，只有打碎原有系統，才能甩掉劉少奇和他的司令部，換上自己滿意的“接班人”。另外，他是主張“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和這種政治革命同時，可以對整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改造，建立起一種“工農兵學”合一的自給自足的“共產主義公社”，這就消滅了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另外，對文化教育和知識分子給以毀滅性的打擊或革命性的改造，也就消滅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這樣，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在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中獨領風騷了。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中國歷史的腳步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的。

一 “反修防修”的背後

黨史上第一次——發動黨外群眾，鬥爭黨內幹部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說：“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如果不聞不問，甚至敵我不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①

根據這種估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普遍開展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以防止“黨變修，國變色”。運動的正式名稱叫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是一場猛烈的階級鬥爭。那方法和土改差不多。先派工作隊進駐，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組織階級隊伍，然後向階級敵人發起進攻。“地富反壞”當然是敵人，不過重點是所謂“四不清”幹部。

原來這場運動在農村叫“四清”，在城市叫“五反”。所謂“四清”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五反”是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後來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又把城鄉的“五反”和“四清”統稱“四清”，其內容一律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並且確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樣，自從中共成為執政黨以來，第一次把自己的黨員放在階級敵人的位置上，並且發動群眾展開鬥爭。

“走資派”當然上下都有。毛澤東雖然覺得全國問題都很嚴

重,但他更關心的是中央。早在一九六三年他就不斷向來華訪問的外國共產黨領袖講中國黨內高層有修正主義者,他們對外主張“三和一少”,對內主張“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要和氣一點;對亞非拉的革命,援助要少一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

發動外國共產黨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

一九六四年二月金日成到中國來,毛澤東對他說:“彭德懷是赫魯曉夫的人,……將來可能危害我們,也可能危害你們。譬如,彭德懷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麼,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崗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這些人總是想復辟的。所以要提高警惕。”

毛澤東還叮囑金日成:“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麼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②

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恩怨

隨着時間的推移,毛澤東的目標逐步集中到劉少奇身上。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時,毛澤東忽然向大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央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③當時誰都不知道毛澤東心中已經有了對象,都以為他是一般地提醒大家注意防止修正主義而已。其實他指的就是他的“接班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第二把手劉少奇。

劉少奇本來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毛澤東思想”雖然不是劉少奇首先發明,但當年卻是他舉得最高,並且在中共“七大”作了充分論證因而使全黨接受作為指導思想的。一直到“大躍進”和反彭德懷,兩人都配合得非常好。一九五八年鼓吹向共產主義過渡,劉少奇比毛澤東並不落後。徐水縣的“共產主義試點”,就是根據

劉少奇的指示辦起來的。不過到了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可能感到有點滋味不對了。這個大會在“三面紅旗”遭到慘重失敗之後召開。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在意識到犯了錯誤的情況下開的大會。在此之前，毛澤東至少有三次檢討自己有錯誤（注一），不過都不是太直接。這一次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作了一次檢討，這一次是直接這樣多人面前公開承認：“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④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大會的主角是劉少奇。他代表中央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並且有個長篇講話。而毛澤東只在開會中間作了一個講話。劉少奇承認中央犯了錯誤，在分析犯錯誤的原因時，除了“經驗不夠”之外，着重指出“我們不少領導同志”“驕傲自滿”，“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綫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⑤劉本人是中央第二號領導人，但他沒有作自我批評。於是這裏的“領導同志”指的是誰，就十分清楚了。

林彪的升起

顯然，這次大會，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以後第一次在黨內處於失勢地位的大會。在這次會上只有一個人，即林彪，旗幟鮮明地保了毛澤東的駕。他有一個講話，他說，犯錯誤都是因為沒有照着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⑥這就是說，毛永遠是正確的，錯誤都是別人的。毛澤東以後搞掉劉少奇而代之以林彪作為“接班人”，或許在這次大會上已經開始種下種子了。

但是劉少奇好像沒有覺察到甚麼問題。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搞“四清”和“五反”時，毛劉對形勢和矛盾的看法以及鬥爭的主要對象等，有些分歧。工作上的分歧和爭論本是正常的，劉一直自我感覺良好。但是毛已經日益不耐煩了。一九六四年十一月

底，毛澤東在聽匯報時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⑦顯然，毛已經明顯地不滿了。

後來，一九七〇年美國記者斯諾訪華時間過毛，甚麼時候決心把劉搞掉。毛回答說是一九六五年一月。^⑧

(注一)見于公開記載的：毛澤東在下述三個場合承認自己有錯誤：

一次見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澤東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中承認“幾年來自己也犯了許多錯誤，例如幾次會議上同意鋼鐵高指標和第二次鄭州會議時主張“一平二調”的帳可以不算，等等。”^⑨(按，“一平二調”指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無償剝奪農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另一次見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轉發甘肅省委一個報告時的《批示》。這個《批示》是毛澤東寫的，但在文字上用的是中共中央的口氣，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對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⑩

毛澤東第三次檢討自己是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會議(北京)上。毛澤東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請大家傳達到各地去。結果許多地方都沒有傳達。當時毛是怎樣講的，現在還沒有公開。不過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到此事，所以

人們知道毛曾作過第三次自我批評。^①

二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文字獄——掀起政治運動的捷徑

把“黨內走資派”作為城鄉“四清”的鬥爭重點，是毛澤東在“反修防修”道路上的一個重大步驟。但是“四清運動”鬥來鬥去，總是出不了基層的圈子。揪出來的“走資派”主要是些生產隊和公社的隊長書記之類的基層幹部。而毛澤東最不放心的中央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認為這才是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然而，要靠“四清運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把鬥爭的火焰燒到北京，燒進中南海。顯然，必須另闢蹊徑。

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所開始的意識形態風暴，應該說是最便捷的通道。因為文字獄是最容易製造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只要望文生義加以引伸，然後揪出“後臺”或“黑手”就行了。——簡直易如反掌。

事情正是這樣發展的。

在前面說的文藝戰場、哲學戰場和經濟學戰場硝烟正濃的時候，歷史學的戰場又打響了。起初是關於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的爭論，以後是關於清官問題和讓步政策的爭論，最後則集中為對歷史學家吳晗和翦伯贊的政治批判。

翦伯贊和吳晗最早被選為祭旗的犧牲品

吳晗和翦伯贊是毛澤東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最早用來祭旗的犧牲品。向這兩位歷史學家執行開刀任務的，是上海市委的姚文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戚本禹。

戚本禹寫了一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發表在《紅旗》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上。此文批判了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翦伯贊，

但是沒有點名。毛澤東認為寫的很好，但責備他沒有點名。於是戚本禹又寫了一篇《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應當批判》，發表在一九六六年第四期《紅旗》雜誌上。他一下子給翦伯贊扣了六頂帽子：反對階級鬥爭觀點，污蔑農民革命，歌頌帝王將相，宣揚讓步政策，反對“以論帶史”，反對“古為今用”。從此翦伯贊就陷入無休無止的批鬥當中，直到一九六八年夫妻雙雙自殺，才最後解脫惡運。

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點名批判吳晗的。

在中國思想運動史上，吳晗和他的《海瑞罷官》的遭遇，可以說是最奇特的也最冤枉了。如果一個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思寫作而觸怒當局，還可以說是“咎自由取”；即使被批錯了，也可以理解。然而吳晗寫海瑞，卻是不折不扣的“遵命文學”，他是奉最高領導之命寫的。而後來發起對他的批判，也是最高領導布置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看到《生死牌》這齣戲中出現了海瑞，便找《明史——海瑞傳》來看，並給大家講海瑞的故事。海瑞剛正不阿，敢罵皇帝，給嘉靖皇帝上疏說：“嘉靖者，家家皆淨也”。他雖然因觸怒皇帝而入獄，仍然忠心耿耿。當時毛澤東很欣賞海瑞精神，要求大家學習海瑞，講真話。還叫人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海瑞。（也就在這個月底，毛澤東寫了那封有名的《黨內通訊》，號召全黨講真話。）

會後，胡喬木把毛澤東的意思轉達給明史專家吳晗，建議他寫些有關海瑞的文章。

吳晗原是民主人士，後加入中共，早就當了北京市副市長。經胡喬木一說，他欣然命筆寫成《海瑞罵皇帝》一文投給《人民日報》，於六月十六日發表。接着又寫出《論海瑞》。此時已是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已被批鬥。胡喬木在看《論海瑞》的稿子時，根據“反右傾”的精神提出了些建議，特別向他透露了毛澤東在廬山上說的：“要真海瑞，不要假海瑞；要左派海瑞，不要右派海瑞”。於是吳晗

趕緊根據這種最新的精神對文章做了修改，增加了這樣一層意思：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假冒海瑞，歪曲海瑞。這樣一來，吳晗所寫的海瑞就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劃清界限了。

後來北京京劇團團長馬連良請吳晗編海瑞的戲。吳晗很認真地七易其稿，最後於一九六〇年底編成劇本《海瑞罷官》，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北京文藝》上發表，同時上演。此劇上演後，毛澤東很高興，並且在家中接見了飾演海瑞的馬連良。

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在到處抓階級鬥爭的氣氛中，江青曾找到中宣部和文化部，要求批判《海瑞罷官》被拒絕，後來在北京又找人寫批判文章也被拒絕。於是一九六五年初她專門去上海找柯慶施和張春橋。他們找姚文元來承擔這個任務。

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一共有七八個月，是在極其嚴格的保密條件下進行的。北京除了毛澤東之外，連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上海方面只有柯慶施和張春橋兩個人知道。不久柯慶施病故，只有張春橋一個人知道了。文章草稿是按“絕密”文件排印的，外人誰也不許知道。在反復修改過程中，張春橋幾次秘密帶着校樣到北京請江青和毛澤東審閱修改。

毛澤東親自發動對《海瑞罷官》的批判

後來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澤東曾經談過，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他親自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志回去發表。”^⑩

姚文元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的《文匯報》。

《海瑞罷官》寫了海瑞翦除惡霸豪強，平反冤獄，給農民退還被霸占的農田等情節。這些情節都有歷史材料作依據，正可以刻劃

海瑞生平。但是姚文元卻說這些情節都是攻擊現實生活的。他說：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平冤獄”，就是代表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所以姚文元的結論是：“退田”和“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

因為姚文元的文章蠻不講理，政治帽子大的嚇人，所以中央和北京市的報紙不予理睬。（只有《解放軍報》轉載了，並且加了政治性的按語。這是江青找了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結果。）鑒于北京一直按兵不動，所以毛澤東叫上海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但是北京市的新華書店卻不訂購。這就更增加了毛澤東的憤怒。

一直僵持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京方面終於讓步了。這兩天《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分別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並且都加了學術討論性質的按語。《北京日報》的按語是根據彭真的指示寫的。強調“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人民日報》的按語是周恩來審定的，強調百家爭鳴：“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服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

毛澤東對北京方面的讓步當然不滿意，因為他要發動一場政治鬥爭而不是自由討論。姚文元的文章雖然已經從政治上開刀，但是毛澤東覺得沒有刺中要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對陳伯達、艾思奇和關鋒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①

三 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

彭真的《二月提綱》

中共中央早在一九六四年七月曾經成立過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彭真任組長，陸定一任副組長，另有三個組員是康生、周揚、吳冷西。^⑭按照常規，意識形態領域這些批判當然要由這個“五人小組”來領導。所以一九六五年底毛澤東在杭州談話之後，中國上空陰雲密布的時候，彭真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召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想對運動加以引導。次日寫出一份《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提綱按照八屆十中全會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已經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和其他學術批判提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說成是“興無滅資的鬥爭”，“是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它主張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以勢壓人”。^⑮

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批准了《二月提綱》並決定向不在北京的毛澤東匯報。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沒有表示不同意。所以二月十二日《二月提綱》便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

林彪和江青的《文藝座談紀要》

與此同時，江青和林彪共同做了一個重要動作。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專程去蘇州會見林彪。林彪指示總政治部派四個人到上海和江青開座談會。座談會從二月二日開到二月二十日。開會中間江青又把張春橋請來參加並起草文件，最後就產生了一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她又請陳伯達對《紀要》加以修改。

《紀要》寫好，又經毛澤東修改和同意之後，江青才把它送給林彪。林彪又把它送給軍委。^⑥

三月三十日，中央軍委批准了《紀要》並報給中共中央。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發了這個《紀要》。

《紀要》的內容主要是否定所有的文藝，不單是建國以來，就是三十年代中共領導的左翼文藝也都徹底否定。它認為，建國以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基本上沒有執行；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綫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紀要》提出的行動口號是：“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綫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綫。”

江青這次活動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建立了林彪和毛澤東在文化革命中的親密合作關係。同時，《紀要》也奠定了江青的“文藝旗手”地位。因為它記載了林彪對江青的評價：“江青同志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是內行。”後來《紀要》寫好後，林彪又在三月二十二日寫信給軍委說：這個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⑦

江青把《紀要》弄好之後，毛澤東在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連續三次找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批評《二月提綱》，嚴厲指責北京市和中宣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還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三家村札記》（吳晗、鄧拓、廖沫沙共同寫作）和《燕山夜話》（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⑧

這樣，準備用來給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犧牲品，除了吳晗和翦伯贊之外，又加上鄧拓和廖沫沙了。

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北京市委覺察到了。于是在四月十六日的《北京日報》上，主動對鄧拓等人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

記)展開批判。

然而已經晚了。他們這些動作後來都被指控為“假批判，真包庇”。

《五一六通知》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了彭真，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和“五人小組”，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草案)，決定提交政治局會議通過，以完成正式手續。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一直在外地，這個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于五月十六日正式通過，故被稱為《五一六通知》。

《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綱》，指出文化革命是政治鬥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毛澤東在這一部分特別加了一段話。他寫道：“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難道能夠允許有甚麼平等嗎？”他又寫道：新老社會民主黨和現代修正主義“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甚麼平等。”他說，必須壓迫他們，對他們實行獨裁。《通知》特別強調“破”。因此它尖銳地批判了《二月提綱》的“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通知》指控這種說法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按照《通知》的觀點，“破”是最重要的。只要不顧一切去“大破”就行了，因為“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這些觀點，對以後的“大批判”和砸爛一切的“革命行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通知》對形勢的估計是：已經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界”。他們是一

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通知》特別指示：“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⑩

這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文件，因此這個《通知》一經發出，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就以不可阻擋之勢刮起來了。

為了領導這場文化大革命，五月二十八日專門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它事實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為毛澤東直接領導的“中共中央”了。小組成員是：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陶鑄曾兼任過幾個月的顧問，後被打倒。王任重、劉志堅、謝鏜忠、尹達、穆欣，也很快就被淘汰。）

四 造神運動和“第三個里程碑”

林彪的“政變經”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五月十八日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他一是講“政變經”，二是宣揚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林彪搜羅了古今中外許多政變的例子，來渲染中國當時面臨着“反革命政變”的危險。他平空捏造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但他拿不出任何證據，只是誣蔑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個人“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杆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⑪

成功地制造現代迷信

林彪這次講話最重要的部分是掀起一個造神運動，樹立現代迷信。這是對整個中國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影響極其惡劣的一篇講話。

毛澤東在建國以後諄諄告誡全黨所要防止的驕傲自滿，很快就在他自己身上滋長起來了。他不但在中國共產黨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成爲當然領袖，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後儼然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自居。所以他對於反對個人崇拜十分反感。對於被他懷疑爲動搖他個人專斷地位的任何人和任何事，都絕對不能容忍。林彪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全力鼓吹對毛的個人迷信，因此取得毛的信任並且擠倒劉少奇而成爲接班人的。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是林彪在軍隊中鼓吹個人迷信的名言。毛澤東也正是欣賞這一點，才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

但是這種作法畢竟水平不高，充其量不過是使軍隊成爲毛澤東的個人工具而已。五月十八日的林彪講話，在個人迷信方面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從“天下第五”升爲“天下第一”

這是林彪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定位，已經定到最高的位置了。但他覺得還不行，因爲這不過是把以前的老公式“馬恩列斯

毛”拿出來確認一下而已。既然馬恩列斯都已過世，那麼原來的“老子天下第五”，現在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了。

必須有所突破，才能顯出林彪的高明。果然，他接着就把毛澤東從第五位取出來放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之上了(斯大林早已不在話下)：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毛主席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④

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反對關起門來自吹自擂，稱王稱霸。然而到了晚年卻喜歡起這一套了。所以他親自把林彪的講話批發給全黨。

在林彪的倡導下，文化大革命同時又成爲一個造神運動。一時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滿天飛。“早請示”，“晚匯報”，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成爲泛濫中國大陸的新景觀。不但對毛澤東的態度是區別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綫，而且所有與毛澤東沾邊的事物，都獲得了神聖的意義。比如，誰要是不小心沾污或撕壞了報紙上的毛澤東像，便會以“反革命”論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知有多少人在“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或“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下遭到噩運。據一九八七年第六期《黨史通訊》披露：“據不完全統計，‘文革’十年中，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有一〇四〇二人。”^⑤

不過，這位“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能光靠狂熱的造神運動來樹立權威。既然他已經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總得有點新理論才能和這頂桂冠相適應。

毛的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新理論”早就有了，從一九五七年起，毛澤東就不斷提出一些獨到的論點，並且及時予以實踐。這些論點越來越厲害，也越來越完備，終於引發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確實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是毛澤東多年形成的“新理論”的必然結果。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一九六七年的時候，這個“新理論”就以完備的形式正式出臺了，它的名字叫作“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有六：

1. 必須用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2. 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還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着兩條道路的鬥爭。爲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3.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4. 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走資派就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5.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開展文化大革命。

6.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這是姚文元起草，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發表在十一月六日的“兩報一刊”上。那時，凡是用“兩報一刊”名義發表的文章，都表明其等級是最高的。

文章說：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②(按：中共當時認爲，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里程碑是馬克思恩格斯樹立的，第二個

里程碑是列寧樹立的。)

這樣，毛澤東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最高地位，便由中國人自己樹立起來了。

五 文化浩劫

焚書坑儒以來中國文化的最大災難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只是這場鬥爭所要通過的外圍。毛澤東的着重點是政治，目標是“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當然還有他所認定的劉少奇的黨內同伙和社會基礎——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和新的老的階級敵人。這個目標，《五一六通知》已經點破，過了三個月，到八月間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時，便達到了。毛澤東在八月五日貼出了《我的一張大字報》，把劉少奇套入羅網，以後就是慢慢收緊繩索，把他置于“永世不得翻身”的地位罷了。

但是，“文化”儘管是外圍，卻遭到了最野蠻的摧殘，這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中國文化界最大的一次浩劫。

還在《五一六通知》之前，“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和她的部將關鋒已經打響開火的信號槍了。

五月八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軍報》發表進軍令似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綫開火》。文章號召“必須在政治戰綫、經濟戰綫、思想和文化戰綫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並且點出鄧拓、吳晗、廖沫沙的名字，說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懷着刻骨仇恨。”並說：“不僅鄧拓滑不過去，他的同伙也滑不過去；不僅《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要鏟除掉，《海瑞罷官》、《李慧娘》、《謝瑤環》以及《長短錄》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東西，都要一一鏟除，毫不例外。”

同一天的《光明日報》發表了關鋒化名何明寫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中心是說北京日報四月十六日《關於“三家村”和

《燕山夜話》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

江青和關鋒這兩篇文章不在《人民日報》發表，而在《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發表。這本身就傳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人民日報》現在已經不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它被甩在一邊了。黨報從來就是“黨的喉舌”，所以五月八日這一天，人們不但知道北京市出了大問題，而且中央內部也出了大問題。此後一個短時期裏，《解放軍報》成爲國內外探測中國政治氣候的主要窗口。

最初殉難者的悲哀

江青和關鋒的文章一發表，本來已經驚恐萬狀的北京市委，此時就完全亂了套。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聲討和批鬥，使鄧拓和吳晗這些被用來祭旗的羔羊經歷着不可忍受的壓力。《燕山夜話》的作者，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成爲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位殉難者。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晚自殺了。

或許他不知道是誰把自己推入絕路的，或許他已經知道，但是爲了免遭鞭尸，並使家屬少受株連，所以在遺書中痛苦地喊道：

“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着敬愛的黨，向着敬愛的毛主席。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④

曾經寫出“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鄧拓，應該不是軟弱之輩。再從他在《燕山夜話》中表現的清醒頭腦和深刻見解看，他也決不會愚忠到這個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遺書中他竟充滿激情地高呼“萬歲”，實在使人感到悲哀。

另一位用來祭旗的犧牲品吳晗，當時並沒有死，他還想活下去，因此在鬥爭中受盡凌辱和毒打。一九六八年三月，已經被蹂躪得不成樣子的這位學者又被投入監獄。在監獄中他繼續遭受野蠻的折磨。最後他已經不能自己照顧自己，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慘死獄中。

北京主演《海瑞罷官》的京劇藝術家馬連良，上海主演《海瑞上疏》的京劇藝術家周信芳，都因為海瑞問題含冤死去。據說明朝的海瑞當年上疏批評皇帝時是帶着棺材上朝的。他自認必死無疑，結果卻沒有死，後來還受到重用。他絕不會想到，四百多年後，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已經是人民共和國了，僅僅因為有人寫了他的事，演了他的戲，就把命都送進去了。

五月八日以後惶惶不可終日的《人民日報》，終於在六月一日又恢復了“黨的喉舌”的權威地位。

一九六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派陳伯達率工作組接管《人民日報》。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徹底破除幾千年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這是放手發動群眾肆無忌憚地破壞一切文化和凶暴地摧殘知識分子的動員令。執行這個動員令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湧現的“新生力量”——“紅衛兵”。

文化大革命主力軍——紅衛兵的誕生

紅衛兵五月下旬產生于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六七月間各校爭相仿效，這個運動迅速蔓延全國。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有三張著名的大字報，即一論、再論和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他們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有了這個根據，他們喊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大造反”，“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起投過去，來一場大搏鬥、大廝殺”。“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⑤

清華附中紅衛兵把大字報寄給毛澤東。毛澤東回信，對他們

以及和他們取同樣態度的人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從北京到全國，身穿草綠軍裝，帶着紅色臂章的紅衛兵果然按照最高統帥的命令行動起來了。當時最受他們喜愛的毛澤東語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革命是暴動”。^④江青唯恐這些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太雅致，在七月二十八日一次講話中特地教導他們要動手打人：“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甚麼了不起嘛！”“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⑤在這種教唆下，紅衛兵們果然大打出手。首先遭殃的是中學教師，他們遭到自己的學生百般蹂躪。爲了保護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中共中央在八月二十二日批發了公安部的報告《嚴禁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的任務本來是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制止違法犯罪行動。但是警察的正當任務竟被禁止，而違法犯罪行爲卻成爲合法的。

對知識分子史無前例的摧殘

就在這個中央文件下達的第二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文化界遭到一次浩劫。在“破四舊”的革命行動中，著名作家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中國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被紅衛兵揪到國子監。文化局在這裏存放的戲裝和道具，被堆在院子裏放火焚燒。這些作家被勒令跪在四周，頭髮被剃成“陰陽頭”。紅衛兵們向他們吐唾沫，辱罵和毆打他們。用手打還不解恨，就用皮鞋和皮帶抽打，這還不過癮，又用演戲的道具木刀砍他們。老舍本來因病住院，前一天剛出院，身體十分衰弱。但因為他是北京市文聯主席，所以被打得最厲害，頭被木刀砍破了，一直折磨到深夜，已經是遍體鱗傷，才被家人接回。夫人想給他換衣服，但他的襯衣都被血沾到傷口上，脫不下來了。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按“造反派”的通知，他必須自己拿着“現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聯去報到挨鬥。這一天，他獨自離家

出去了。他走時，拉着三歲的孫女的小手說：“和爺爺說再見。”這是他和親人說的最後一句話，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原來他一個人走到北京西北角的太平湖。有人看見他在湖邊坐了一整天。那湖對面是老舍母親生前的住處，他一直注視着那個地方。當夜，這位現代中國語言大師，被稱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縱身投入湖中，和人世告別了。

稍後，八月三十日在上海，著名翻譯家傅雷被紅衛兵抄家。這抄家行動持續了三天三夜，夫妻二人被迫站在板凳上挨鬥。他們受盡凌辱之後，在九月二日夜裏雙雙自殺了。

在此之前，八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哲學家李達在武漢去世了。他倒沒有自殺，但卻是被折磨死的。《人民日報》六月一日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發表，他就成了武漢大學第一個犧牲品。大字報把他家的屋裏屋外整個貼滿了，還專門裝了高音喇叭對着他家晝夜不停地吼叫。造反派先後組織了許多的人圍繞他的住房游行示威。他還要隨時被揪出去批鬥。鬥了七十多天，八月十三日他的胃大量出血，但紅衛兵不准他去醫院診治。九天後他昏倒了，才被送去醫院。他妻子抓住救護車門，要求跟去護理，被紅衛兵一拳把她打下去了。八月二十四日夜間，病痛使他滾到床下，就這樣死去了。屋裏沒有一個人在場，他妻子不在，醫護人員也不在。

在這場史無前例以野蠻和殘暴著稱的“文化”大革命中，直接打死和摧殘致死以及自殺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恐怕永遠也查不清了。但是可以說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受過程度不等的迫害。批判，鬥爭，挨打，挨罵，人身污辱，勞動改造，關進“牛棚”，都是家常便飯。打擊面之大，可以從反面看出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澤東明令保護的知識分子，只有郭沫若（注一）和章士釗等幾個人。這就是說，除了這幾個人之外，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可以打擊的。

文化遺產的浩劫

對人的摧殘和對物的摧殘是交織在一起的。北京市六千八百多處古迹，有四千九百多處遭到破壞。至於“破四舊”中被燒毀的書籍和字畫，就無法計算了。當時盛行抄家，僅八九兩個月，北京就有三萬多戶被抄。凡是古代圖書文物都是“四舊”，一律沒收，有的當場燒毀，有的被送到集中點去處理，或焚燒，或造紙，或回爐。在這些待處理的東西中僅被挑揀出來的就有字畫十八萬五千件，古舊圖書二百多萬冊，各類文物五百多萬件，其餘那些被毀掉的就數不清了。北京如此，上海好像更厲害：從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八日，半個月內被抄家者就達八萬多戶！^⑧至於中等城市以及成千上萬的縣城和市鎮，就不知道了。

這場浩劫中的文物古籍也不是都毀掉了。有一部分被抄家者“抄”到自己家裏去，變成他們的收藏品了。其中收獲最多的是康生。他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間共去北京市文物局三十多次，“取”走抄來的圖書一萬多冊，其中許多是宋版和明版珍本古籍。另外還“取”走抄來的文物一千多件。江青也常去“取”東西。據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記載，她共“取”走文物字畫一千多件，圖書四千多冊。她沒有白拿，而是付了錢的，當然，都是物美價廉。例如一支象牙杆的毛筆，付款人民幣一分。以上她所取走的東西總共付款二十一元六角四分，按當時的外匯牌價，約合十美元。^⑨

(注一)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時，因為早在內部看到了文件，所以及早充當了一個自殘自賤的標兵。他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發言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番話經毛澤東批示，特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表。這就給全國樹立了一個標杆。^⑩郭沫若是中國有數

的學者、作家和詩人。他的作品都應該全部燒掉，中國文化界還有幾個人可以不予打倒，還有幾本書可以不必燒掉呢？或許正是郭沫若這個發言，使他爭得主動，蒙受特別保護。可嘆的是在他這個標杆以下的文化人和他們的作品，便都被肆無忌憚地摧殘了。

六 教育“革命”

毛澤東又一發明——五七道路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來被叫作《五七指示》。這封信表達了他理想中的新社會模式，簡單地說，就是取消社會分工。軍隊、工廠、學校、商業、服務業、黨政機關，都要以本行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甚麼都幹。中共中央五月十五日轉發了這封信，並把它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對於學校教育，《五七指示》是這樣寫的：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⑥

多年來教師對學生的辛勤教育，原來是“資產階級統治”。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不但課程全部停止，而且教師都成了階級敵人。此後就是學生造反，串連，抄家，打人，沖擊黨政機關，揪鬥走資派；老師則是挨鬥，挨打，勞動改造，關進牛棚。全國的學校教育完全停止了。

一九六七年，紅衛兵已經把全國攪得一塌糊塗，原來的黨政系統已經完全癱瘓，毛澤東“天下大亂”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是說，紅衛兵的使命已經完成。於是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號召學生們“復課鬧革命”。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聯合發出正式通知，要求大中小學立即開學。但是，中央通知也好，最高

指示也好，都不靈了。正像《水滸》裏的“洪太尉誤走妖魔”一樣，他放出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之後，就再也收不回來了。這一年學校不但復不了課，而且成了兩派紅衛兵武鬥的戰場。

工農兵占領學校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把工農兵請進學校。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實現教育革命，必須由工人、戰士和革命師生實行三結合。“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永遠領導學校”。姚文元的文章說的更直率：“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於是從工廠裏抽出工人組成的“工宣隊”紛紛開進各級學校。

這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大改革”。城市的大中小學由工人階級領導，農村的學校由貧下中農領導。橫行了兩年多的紅衛兵已經不能為所欲為，學校的武鬥逐漸平息下來。不過教學卻恢復不了，因為工人和士兵雖然能領導“教育革命”，卻不能教課。而能教課的教師又都是資產階級，是“教育革命”的對象。因此，這個時期學校根本開不了課。

而且還有一個社會問題：一九六八年，已經有一千多萬中學畢業生（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這三年的應屆畢業生，即所謂“老三屆”）浮在社會上游來游去，既無學可上，又無業可就。紅衛兵的誕生是為了造反，可是這時該推翻的該打倒的也都差不多了。（一九六八年九月，“全面奪權”已經完成，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毛澤東“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已經達到。這時，怎樣把這些橫沖直撞的無業青年引到一個去處，使他們不再造反也不再武鬥，便成為令人頭痛的問題了。

把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再教育”

辦法終於有了。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披露了毛澤東又一個“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樣就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高潮。曾經當過革命的“無產階級左派”的紅衛兵,這時又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據統計,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共一千六百萬。^②

教師的命運

既然“無產階級左派”紅衛兵都要接受“再教育”,那些被當作教育革命對象的教師就更不用說了。他們都要去走“五七道路”,即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起訴書的統計,僅教育部所屬單位和十七個省市教育界受迫害的教師和幹部就有十四萬多人。衛生部所屬十四所高等醫學院校六百多名教授和副教授,受迫害的有五百多人。全國高等學校一九六五年有正副教授七千八百人,到一九七七年僅剩五千八百人。除自然死亡外,都是被摧殘而死的。中國著名的體育理論家袁敦禮教授,解放前任北師大校長時,曾在國民黨大搜捕中勇敢地保護師大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他名望很高,國民黨特務也不敢惹他。後來他去西北師範學院教書。文化革命中,他在垂暮之年被造反派把腰打斷了。他站不起來,也沒有人管他,只好在地上爬。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有數的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和吳晗一起被毛澤東點名批判,接着就遭到“革命群眾”的肆意折磨和污辱,更嚴重的是躲不開“專案”人員惡毒的政治迫害,以致夫妻兩人雙雙含恨自殺了。

“教育革命”造成中國人才斷層

這場“教育革命”據說要“破舊立新”。如果說一九六八年以前主要是“破舊”的話，那麼一九六九年以後就要“立新”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開“九大”。林彪在政治報告中說，“要把文化教育障地牢固地占領下來。”於是全國各級學校都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實行“開門辦學”。“革命大批判”和勞動都是主課。對原有的文化課和專業課，或精簡，或取消。比如《人民日報》曾作為“農村教育革命方向”的吉林省梨樹縣規定；小學課程是：政治、語文、算術、革命文藝、軍事體育、勞動。中學課程是：毛澤東思想教育、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勞動。

至於大學，一九七二年以前沒有招生，在校的一些高年級學生主要也是在搞“大批判”，因為這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基本任務”。理工科大學，按照清華大學“工宣隊”的做法，也是以“大批判”為主課。至於專業課，要“大破買辦洋奴哲學”，要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後來，和資產階級相對立的這種理工科“新教材”是否編出來了，外人並不知道。不過從“開門辦學”、“校辦工廠”、“廠校掛鉤”和“廠帶專業”等實踐活動可以看出，這個時期學校或是沒有上課，或是用勞動生產作為教學活動，因此，有沒有教材，有沒有教師，都不重要了。

這場教育革命一個重要內容是改變招生制度：廢除考試，實行“推薦制度”。即：“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大學的招生對象主要是“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農兵。這些“工農兵學員”來到大學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也就是說，這種“教育革命”，是由初中文化水平的工農兵來“管理”和“改造”高等學校。

這個期間，中學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招生也廢止了考試，實行和大學相同的招生辦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國務院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張春橋和姚文元寫了一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並轉發全國。這個《紀要》把文化大革命對教育的破壞加以肯定，作為經驗予以推廣。

一九七二年全國大學恢復招生，開始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的特點是：有初中程度就可以上大學，而且這初中程度也不要經過考試就被認可，只要有官員推薦就行。而有推薦權的官員的文化程度並不比被推薦者高明。事實上他也不管那些工農兵的文化水平是否能學大學課程，考慮的只是這個人在政治上是不是“紅”。而誰“紅”誰不“紅”，當然完全取決於推薦者是否喜歡他。

這種“教育革命”既然貶低甚至否定了文化，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教育。毛澤東早就討厭讀書人。他欣賞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因為他們一個讀書不多，一個沒讀過書。“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⑧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發出的名言。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思想又被“革命左派”發展到極端。“知識越多越反動”，“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知識的精神貴族”，都成為新的準則。特別是遼寧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之後，“讀書無用論”就更加風行了。

這場“教育革命”的總結果，是中國民族智力發展的中斷。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七年（這一年恢復招生考試）雖然只有十二年，但在人才上造成的斷層卻影響到幾代。

七 文藝沙漠化

文藝界被一網打盡

文藝園地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就已經被“革”得差不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當中，文藝界反倒相當沉寂，因為這塊園地已經沒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有甚麼花草樹木，基本上沙漠化了。

當然文藝界的人是要批鬥的。周揚是這支隊伍裏最早的“黑幫”。本來周揚自三十年代起就是中共在上海領導白區文藝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到延安，以堅決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著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更是一直領導文藝工作。在歷次思想批判運動中都是忠實地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從批判胡風到反右派鬥爭中批判丁玲、陳企霞、馮雪峰和吳祖光等，後來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文藝整風中批判田漢、夏衍、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周揚都是很努力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揚從三十年代起所做的一切，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了。他對那些人的批判也被說成“包庇”。而且他本人也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起就被投入監獄，從此音信全無，直到九年之後才被釋放。

在文藝界一直批判別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領導幹部尚且如此，其他早就被指控為“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就更逃不脫惡運了。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出不朽作品《家》的巴金，抗日戰爭時期風靡全國的《游擊隊之歌》的作者賀綠汀，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在上海遭到極其野蠻的批鬥。巴金被長期關在“牛棚”，除了挨鬥之外，被迫從事清洗廁所等最具屈辱性的體力勞動。賀綠汀則和造反派進行了針鋒相對寸步不讓的鬥爭，結果不但遭到更凶惡的毒打，而且被投入監牢，成為“現行反革命”。

這個期間，文聯系統的所有協會，從作家協會到曲藝家協會都關門了。作家和藝術家不是挨鬥就是被關起來，以後又都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去了。同樣，幾乎所有的出版社和雜誌編輯部也都關門了，編輯們和作家一樣，也都“下放”了。

全國只出版一本雜誌和一個人的書

當然，《紅旗》雜誌一直出版，這是百花當中唯一盛開的鮮花。此時，它的領導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位連級幹部。

出版社雖然關門了，印刷廠卻非常忙，要印《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報道說，這一年前五個月已經出版《毛選》二千九百萬部，比一九六六年全年還多六百萬部。這就是說一九六六年出了二千三百萬部。按這個速度，一九六七年全國大約可出六千萬部。以後當然還要繼續出版。在世界出版史上，恐怕沒有甚麼書能印這樣多。或許《聖經》能和它相比。

這個時期的書店，書架上擺滿了毛澤東著作。其他的文學、歷史、哲學、社會科學書籍基本上不見了，因為一九六六年以前的那些書差不多都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毒草”，有害於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是燒了，就是送到造紙廠去做紙漿，剩下的也都封存起來了。

八億人看八齣戲

戲劇倒是繁榮興旺。革命現代戲是“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不過劇目太少，只有八個：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其他所有古今中外各個劇種的劇目，一概都是“封、資、修”，所以完全禁演。這八個戲原來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各地創作的。後來江青很有興趣，便給以關心和指導。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些戲便成為江青的專利，被定名為“樣板戲”，和“經典著作”一樣，成為神聖的東西了。所以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舞臺上翻來覆去就是這八個“樣板戲”。

但是中國人很多，而且多半不懂京劇。為了對其餘的幾億人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進行革命教育，也爲了占領地方舞臺，就讓地方各劇種“移植”樣板戲。於是全國舞臺上便都有戲可看了。只是這八個戲實在太少了。後來又模仿樣板戲編出《龍江頌》和《杜鵑山》。可惜還是太少，人們便都膩了。“八億人看八齣戲”，就是當時的怪話。

電影很不景氣。舊片子差不多都批判了，新片子既沒有人編劇，也沒有人導演，當然更沒有演員。於是銀幕上便都是新聞紀錄片，而且主要是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接見各界的紀錄片。被接見的面目多有不同，接見者卻老是一個人，觀衆也就不愛看了。後來又把樣板戲拍成舞臺紀錄片。使銀幕的功能增加了一些，起了普及樣板戲的作用。不過普及之後也就不再有人看了。

這個時期的歌壇盛行“語錄歌”，即把毛澤東的語錄譜成歌曲。這種歌曲擁有不少群眾，不過全是紅衛兵。他們在武鬥時常常高叫“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用以鼓舞士氣，視死如歸。

舞蹈，除了兩個芭蕾舞“樣板”以外，在群眾中廣泛流行的是“忠”字舞。胸佩毛澤東像章、手拿《毛主席語錄》的人們，做出各種“忠于偉大領袖”的動作，並伴有歌頌毛澤東的音樂，這就表了忠心。

美術，“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只產生了一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它被譽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燦爛的藝術之花”。據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的《人民日報》報道，這是紅衛兵小將和年輕人的集體創作。據說“一小撮階級敵人”曾經指責過他們，潑冷水。但他們“手捧紅彤彤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認真進行學習”，于是有了方向。從構思到創作完成，共用了兩個多月，就創作出這樣一幅“無產階級的藝術珍品”。“它說明，只要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革命人民就可以創造出任何人間奇迹！”

因爲這時左派的腦子裏階級鬥爭的弦绷得太緊，所以他們發現：差不多甚麼事情都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文藝活動當然也不例

外，連演戲都是在和階級敵人作鬥爭中進行的。《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十期有篇文章《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就講到“階級敵人”的種種破壞活動。其中一種破壞活動是“男人扮演李鐵梅、沙奶奶”。演員的性別和角色的性別不同，都屬於“階級敵人破壞”，那階級鬥爭當然是無所不在了。

一九七三年，湖南拍了一部湘劇電影《園丁之歌》歌頌一個教師，結果被打成毒草，罪名是“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原因是劇裏有一句臺詞：“沒有文化怎能擔起革命重擔。”重視文化當然是反對文化大革命。所以這個電影在全國範圍內受到猛烈批判。江青說：“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該是共產黨，怎麼是教員？”^④

正因為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專政的手段對待文化，所以在那個年代，即使有少許幼芽出土，也很快就被以鬥爭為職業的左派迅速鏟掉了。

八 毛林體制的破裂

禍起蕭牆——獨裁制度的隱患

中國古代，皇帝的交班和接班歷來是最敏感的政治問題，弄不好就出事。因為專制政體的權力在老皇帝一個人手裏，他想給誰就給誰，所以爭奪也就十分激烈。老皇帝在世時預先立太子，就是避免爭奪的一種方法。但是這種辦法有時又會在皇帝和太子之間產生矛盾。老皇帝老也不死，太子等不及了，就會搶班奪權。漢武帝和太子間就為此發生一次武裝衝突，結果太子戰敗失蹤。

民主國家的權力屬於人民，它的轉移有法定程序。國家和政府的首腦，誰也不能把這權力放在自己口袋裏隨便傳來傳去。

不幸的是，當代中國還沒有擺脫古代的政治傳統。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之一，就是毛澤東要改換接班人。他決心搞掉劉少奇，換上林彪，方法是拋開憲法和黨章，直接發動群眾，打碎原有的黨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組織和國家政權，然後建立起新的權力體系，確立新的接班人。

這個程序經過一九六八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已經完成了。前一個全會“永遠開除”了劉少奇，後一個大會確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林彪這個接班人的地位還寫入了中共黨章。好像一切都很如意。但是又不盡然。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被打倒之後，“無產階級司令部”裏邊的矛盾就上升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雖然已經確定，但在毛澤東沒有交班以前他就不能接班，只能當一個“副統帥”，在送給他批閱的文件上簽名時，只能寫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而且中國的政局，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下，又是夜長夢多，最高權力沒有到手以前總有被別人搶去的可能，劉少奇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何況江青和張春橋一伙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這對林彪不能不是嚴重的威脅。然而儘管林彪急于接班，毛澤東卻不急于交班。

矛盾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爆發了。原來的接班人劉少奇是國家主席。他不但被打下去，而且被折磨死了。這個位置自然該輪到林彪了。但是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提出要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林彪當然不願意，就在四月十一日給毛寫信，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過他沒有說自己要當這個主席，而是建議毛“兼任”。毛澤東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就指示說：“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其實彼此都知道，國家主席的位置是為林彪設的，但雙方都不說破，表面上都在為毛當不當國家主席而爭論。

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和林彪的交鋒

林彪決定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再做一次努力，方法當然還是把黃袍往毛澤東身上披。為了立于不敗之地，他又增加了一個法碼，重新提出“天才”問題。陳伯達和他合作，事先編

了一個馬恩列斯毛《論天才》的語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會議開始後，林彪和陳伯達就宣稱毛澤東是天才，其實這是林彪已經宣傳了好幾年的舊觀點。不過他們在會上造成一種印象，即有人要貶低毛澤東，否認毛是天才，反對毛當國家主席。

林彪過去鼓吹毛澤東是天才，並且說，這種天才全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從來都沒有提過異議，而是很愉快地接受了。然而這次在廬山上他卻變卦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專門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發給會議。這個《意見》除了批評“天才”以外，還宣告了他和陳伯達的決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他舉的一個例子是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他說陳伯達“跑到彭德懷那裏去了”。^⑤這使人很吃驚。因為大家都知道陳伯達在延安時代就深受毛澤東器重，以後一直是毛在理論上的左右手。他總是緊跟毛澤東，能從理論上很出色地配合毛的政治意圖。一九五九年反彭德懷時，他也是很積極的。只有一九七〇年這次廬山會議是唯一的例外，配合錯了。可是這時當毛要拔掉他的時候，卻把他多年辛勤配合的功勞一筆抹殺，說是“從來沒有配合過。”毛澤東一言九鼎，陳伯達徹底完了。

毛澤東這一次沒有動林彪，但把他在軍內的幾員大將抓住了，要他們作檢討，從而剪除了林彪的羽翼。全會決定對陳伯達進行“隔離審查”，在全黨進行“批陳整風”。批陳實際上就是批林。林彪此時處于打了敗仗，但被對手寬容的狼狽境地。他從紅極一時的頂峰上滑下來了。

廬山會議是毛澤東和林彪的第一仗。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號召大家：“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並且說：這事並未完結，還要“繼續研究”。^⑥他講的是要研究“認識論”，實際上他和林彪都清楚，這個“認識論”指的是甚麼。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

下山之後。林彪和毛澤東果然各自作了“繼續研究”。他們“研究”的詳情，局外人自然難以窺見。根據官方的事後說法，林彪沒有及時回頭，而是破釜沉舟，策劃搶班奪權。毛澤東則是針鋒相對，到各省對很多黨政軍領導人作了工作。這樣，雙方從一九七〇年“繼續研究”到一九七一年，形勢對林彪越來越不利。據後來的中共中央文件說，林彪決定孤注一擲，立即發動武裝政變，派飛機在路上襲擊毛澤東。不料毛澤東已在九月十二日提前秘密回到北京。圖窮匕見，林彪最後一着棋也輸了，只好在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結果摔死在蒙古。這就是“九一三事件”。

這個事件還有很多謎有待解開。據說有人至今還持有異議。事實真象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是不管真象有多大出入，毛和林的破裂都是不可更改的實情。

“九一三”事件不僅是摔死一個林彪，而且給毛澤東的形象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傷。兩個“最親密的戰友”突然反目成仇，而且這個法定接班人還是“洞察一切”的偉大導師親手培養和選拔的。這件事對全黨和全國所造成的震撼，是極其巨大的。從批判《海瑞罷官》到《五一六通知》，從《我的一張大字報》到開除劉少奇黨籍，都是在為林彪上臺鋪設道路，都是為了建立毛林合作體制而辛勤耕耘。為了使毛林體制擁有絕對不可侵犯的權威，當時有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公安六條》。它明確規定：反對毛澤東和林彪就是反革命。全國只有這兩個人受專政機關保護，這在法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然而這一切，都在“九一三事件”的爆炸聲中震得粉碎。

這就是說，“九一三事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被精心編織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失去它的力量了。

※ ※ ※

第六章 引文出處

- ①《國史通鑿》第2卷,第23頁
-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 - 1965)第141頁
- ③同上,第112頁
- ④《共和國歷程》第2卷,第837頁
- ⑤《中國共產黨大典》第749頁
- ⑥《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上冊,第491頁
-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 - 1965)第144頁
- 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 - 1965)第145頁
- ⑨《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上冊,第454頁
- ⑩同上,第457 - 458頁
- ⑪《中國共產黨大典》第874頁
- 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 - 1965)第197頁
- ⑬《國史通鑿》第2卷,第129頁
- ⑭《中國共產黨大典》第760頁
- ⑮同上,第760頁
- ⑯《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235頁
- ⑰《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295 - 296頁
- ⑱《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344頁
- ⑲《中國共產黨大典》第999 - 1001頁
- ⑳《國史通鑿》第3卷,第449頁
- ㉑《國史通鑿》第3卷,第451 - 452頁
- ㉒《大時代文摘》1998年1月8日
- ㉓《中國共產黨大典》第939頁
- ㉔《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1958 - 1965)第204 - 205頁
- ㉕《國史通鑿》第3卷,第401頁
- ㉖《毛澤東選集》第18頁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 ⑳《中國“左”禍》第 415 頁
- ㉑同上，第 414 頁
- ㉒《“左派”理論家浮沉錄》第 174—175 頁；《人民日報》1977 年 5 月 28 日
- ㉓《田漢傳》第 856 頁
- ㉔《人民日報》1966 年 8 月 1 日
- ㉕《國史通鑿》第 3 卷，第 332 頁
- ㉖《毛澤東論教育革命》第 14 頁
- ㉗《國史通鑿》第 3 卷，第 204 頁
- ㉘《國史通鑿》第 3 卷，第 821 頁
- ㉙同上，第 921 頁



在毛澤東支持下，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

圖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戴着“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林彪正在講話，號召紅衛兵“大破四舊”。

第六章附圖



：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上圖：鬥爭王光美。下圖：鬥爭和尚。



協和醫院是協和醫學院的附屬醫院。協和醫學院是美國和英國的基督教會於一九〇六年在北京創建，一九一五年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接辦。一九四九年後由中國政府接辦。

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都屬於中國最早一批新式醫學院校和醫院，在開創中國新式醫藥事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以後，爲了配合反美的政治需要，協和醫院被說成是美國的文化侵略，並被指控犯下了殘害中國人民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中，爲了和它的創辦者劃清界限，紅衛兵把這所醫院改名爲“反帝醫院”。

第六章附圖



文化大革命作為造神運動，在中國大陸造成一種如痴如狂的迷信氣氛。左上圖為一群少年紅衛兵經長途跋涉來到哈爾濱連夜購買毛像和毛選。右下圖為一名士兵全身掛滿毛澤東像章以表忠心。



像《水滸》裏的“洪太尉誤走妖魔”一樣，毛澤東煽動紅衛兵到處造反，弄得他自己都無法收拾局面，最後想出一個辦法，叫他們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果然有效。橫行了兩年的紅衛兵運動終於結束了。

圖為知識青年下鄉的場面。文革期間下鄉的知識青年約一千六百多萬人。這個下鄉運動，給這些青年和他們的家庭造成極大經濟困難和精神負擔，特別是使他們荒廢了學業，造成中國文化教育的斷層。

(《水滸》裏的洪太尉打開一個盒子，結果放出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再也收不回來了。這些妖魔化作一百零八位江湖好漢，鬧得天下大亂。)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知識分子遭受到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最嚴重的摧殘。上圖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罹難的吳晗(左)和老舍(右)。

明史專家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他本一直緊跟共產黨，寫《海瑞罷官》也是秉承毛的旨意，然而竟成為毛的政治需要的犧牲品，死於獄中。

著名作家老舍也是努力以自己的創作適應黨的需要，然而仍不免紅衛兵的凌辱和摧殘，並面臨親人與之“劃清界限”的痛苦。他感到已經完全絕望，於是在整天凝望老母生前往處之後，自沉於北京太平湖。



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先驅張志新，(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幹部)，因為質疑造神運動，竟被殘酷處死。行刑前，劊子手害怕她喊出真理的聲音，竟預先割斷她的喉管，從而寫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慘無人道的一頁。張志新的壯烈犧牲，給後人留下永遠不能忘記的沉痛回憶。



用“毛澤東——林彪”體制代替“毛澤東——劉少奇”體制，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精髓所在。不料“毛林體制”的壽命還不及“毛劉體制”持久。隨着林彪座機的墜毀，“毛林體制”也被摔碎了。至此，毛澤東苦心編織的文化大革命，從理論到實踐，便完全破產了。在毛澤東的一生中，這是對他的致命一擊。以後，不管他怎樣掙扎，政治上再也不能恢復元氣了。

圖為林彪座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的現場。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1972 - 1976)

一個遲暮老人掌握着中國的命運

“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林體制的破產。毛澤東苦心營建的政治格局，一下子被炸得粉碎。他原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至此已經完全失敗。所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已經結束了。

這次打擊對毛澤東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以至在“九一三”以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裏，他不光健康上受到損害，而且在政治上也沒有多大作為。當然，他是不會甘心失敗的，而且也不打算從極左路綫上轉回來。可是他的威信已經受到嚴重損傷，政治影響力大大減低了。林彪死後所留下的“接班人”席位也使他感到困擾。事實上毛澤東這時不論從生理上還是從政治上，都已完全進入暮年。然而他卻仍然掌握着最高權力，一個人決定着中國的命運。不論他清醒還是糊塗，誰都不能改變這種局面。這正是中國民族的悲劇。

從“九一三”以後，周恩來和鄧小平曾先後試圖把中國從極左的危險道路上拉回來，但都遭到毛澤東的打擊。這就造成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間中國局勢的左右搖擺和動蕩不安，並使毛徹底毀壞了自己的形象。

一 左和右

毛澤東擺脫困境的努力

林彪摔死之後，全國正在進行的“批陳整風”一律改成“批林整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風”。這個運動除了清查林彪黨羽以外，主要是通過批判林彪，把陷入混亂的黨內思想重新統一起來。在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中，林彪事件被稱為第十次路綫鬥爭。（其他九次的錯誤路綫代表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

在“批林整風”中，印發了林彪父子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據說“五七一”是“武起義”的諧音，即武裝政變計劃。同時還印發了一個重要材料：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一封信。毛在這封信中對林彪五月十八日的講話表示不安：“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當時印發這封信，為的是表示毛澤東早就對林彪不滿。這將有助於恢復他“洞察一切”的形象。不過這樣一來又陷入新的困境：林彪五月十八日的講話是毛澤東同意並且作為中央文件批發下去的。所以周恩來在“批林整風”時解釋說：一九六六年當時把林的講話送請毛澤東批示時，“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這就是說，毛澤東是為了解顧群眾情緒，勉強把林彪這個講話批准發出去的。^①

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綫

毛澤東在“批林整風”時拿出這封信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堅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綫。這封信上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多次掃除。”^②這就是說，林彪事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而是證明了它的正確。因為文化大革命本來就需要不斷地搞，搞掉一個“機會主義頭子”又有一個“機會主義頭子”，反正七八年就從來一次。

周恩來顯然不想這樣一次又一次搞文化大革命。他利用“批林整風”的勢頭，着手糾左。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整版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指出林彪一伙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罪魁禍首。他們發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論，進行招搖撞騙，樹立自己的權威，利用竊取的權力實行“以我劃綫”，對廣大幹部和群眾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統治。

這些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和姚文元立刻指控這是“修正主義右傾回潮”，並在《人民日報》社內對編出這一版文章的胡績偉和王若水進行圍攻。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信，支持周恩來批左的主張，並反映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左。不料毛澤東不但不支持王若水，反而加以批駁。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和張春橋、姚文元談話。他批評王若水的信說：“那封信我看不對。”他完全支持張、姚，斷定林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還指示說：“極左思潮還是少批一點吧。”^②毛的這次表態不但使《人民日報》社大反右傾，並且撤了胡績偉和王若水的職務，而且從此不許反左，使周恩來陷于困境。

《人民日報》這個事件表明，毛澤東在躊躇一年之後，還是站在江青、張春橋們一邊。因為他知道，如果允許反左，那就必須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樣，他精心編織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綫就完全泡湯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提前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按黨章應在一九七四年開會）。這大概是為了彌補接班人位子上出現的真空。

毛在人事問題上的游移

這次大會升起的唯一新星是王洪文。他是“政治報告”和新黨章的起草人之一，又是修改黨章的報告人。張春橋和姚文元也是起草人，卻不是報告人。周恩來是“政治報告”的報告人，卻不是起草人，他只是到會上宣讀報告而已。

在新選出的中央領導核心中，毛澤東當然還是主席。副主席中周恩來排名第一，王洪文排名第二。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顯然，毛澤東決不會讓周恩來當接班人。但他需要周的忠心、治國的能力和足以穩定人心的威望。“十大”新領導的名單傳達的信息是：王洪文是接班人，但是太嫩，經驗、能力、威望都不行。周恩來正好可以彌補這些薄弱之處。

“十大”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點是完全肯定“九大”的路綫。這表示毛澤東在林彪倒臺後並不改弦更張，決心沿着文化大革命的路綫一直走下去。而要沿着這條極左路綫走下去，就只有依靠左派。

事實上毛澤東在“十大”之前就明確表態了。七月十四日，他同王洪文和張春橋談話時，批評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是：“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④和王洪文們在一起吐露對周恩來的不滿，這件事意味着甚麼，是很清楚的。所以，“十大”雖然把周恩來安排為第二號人物，並不表示一種接班體制，而只是一種過渡的格局。

到了一九七三年底，事情進一步明朗化。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開會，毛澤東突然對周發出嚴厲的指責：“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更嚴重的是他又發出新的“反修”信號：“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⑤當時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是周恩來，軍委日常工作雖然由葉劍英主持，實際上也由周恩來管。所以毛的這個指責對準誰是很清楚的。不過他並沒有立即把王洪文提上來，而是把眼光從周恩來轉到鄧小平身上。毛在這次會上，提議鄧小平當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同時當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一九七四年周恩來積勞成疾，住進醫院。毛澤東讓鄧小平越過張春橋當第一副總理。中國政治天秤的指針好像從左邊移開了一點。這次擺動雖然引起江青的不滿，但是毛澤東比較堅定，一九七五年一月，又通過十屆二中全會把鄧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且兼任軍委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顯然，左派沒有得分。但他們從來就沒有善罷甘休。

二 古今“儒法鬥爭”

毛澤東發動尊法批儒

一九七二年底毛澤東制止了周恩來糾左的努力之後，一九七三年他開始考慮批判孔子的問題。他認為歷來儒家都是保守的，法家是主張改革的。所以保守派都尊孔。“批林批孔”的口與就是他提出來的。他主張把批判林彪和批判孔子結合起來。這一年七月四日他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說林彪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正是這次談話，他同時批評了周恩來。事實上“批林整風”已經進行了兩年，林彪本人不但已經倒臺；而且摔死了。他的餘黨也都清查出來，關起來了。所以他已經不再是現實的威脅。至於思想影響，林彪本來是極左而又不准批極左，因此沒有甚麼新鮮東西好批了。在這種情況下，“批林批孔”四個字也就剩下“批孔”了。

八月五日，毛澤東專門把江青召去，詳細談了批孔問題。他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毛澤東還特別推崇秦始皇，對人們批判秦始皇焚書坑儒，不以爲然。

八月七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這是毛澤東批發的。從此，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就指揮他們組織的寫作組（大批判組）用梁效、洪廣思、羅思鼎、唐效文等筆名，在報刊上陸續發表歌頌法家批判儒家的大塊文章。

經過多年意識形態鬥爭的熏陶，中國人經常需要“辨風向”。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變幻不定的風雲使人們不得不從很平常的事物中去尋找不尋常的意思。明朝的海瑞可以被說成彭德懷，春秋時期的孔子又是誰呢？

一九七四年，這個謎底明朗了。

周恩來陷入重圍

這一年在當代中國是以“批林批孔”或“評法批儒”載入史冊的。在這場思想運動中，江青走到她事業的巔峰。一月十八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把江青主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作為一九七四年一號文件發給全黨。一月二十四日，江青召開首都各界萬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周恩來是被通知參加大會的。這個大會連開兩天，江青們在會上呼風喚雨，指桑罵槐，不指名地把會場上的周恩來置于四面楚歌的窘困境地。這個“精神”很快傳遍全國。接着各地的“大批判組”就紛紛發表文章。這次“批孔”的文章差不多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針對周恩來的。

因為周恩來一直努力糾左，所以這些“批孔”文章都用“復辟”、“反攻倒算”來影射他。江青曾兩次接見梁效等寫作組，指示說：“現在的文章有點缺點，就是不講現代的大儒。”她明確地說：“蔣介石是大儒，黨內也有大儒。劉少奇、林彪是大儒，黨內還有大儒。不然，為甚麼搞這麼大的運動？”^⑥其實江青說的是實話。批海瑞是有所指的，批孔子當然也是有所指的。為了使矛頭指向更加明確，有些文章特意找些古代的宰相，來影射當今的總理。比如秦朝的呂不韋，漢朝的霍光，就是這樣被當作儒家批判的。在宰相當中，“周公”遭到更多的批判，因為他的稱謂前面有個“周”字，可以使人從古代的“周”聯想到今天的“周”。

呂后成了法家

批判儒家和歌頌法家是同時進行的。商鞅、韓非、李斯自然是法家，秦始皇更不用說。引起人們興趣的是漢高祖劉邦之妻呂后

也成了法家。

《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發表一篇《法家代表人物介紹》。按照江青的指示，這篇介紹裏專門為呂后立了一個條目：《呂后》。歷來為人所不齒的這個凶悍的潑婦，在《北京大學學報》裏竟變成“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了。編者說：劉邦死後，“呂后為防止發生動亂，決定親自掌權。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她積極推行劉邦制定的路線”。這種露骨的無耻比附，使人們對這場運動的意圖看得更清楚了。

在這場“批林批孔”運動中，只有北京和各地的“大批判組”參加。學者們都在一旁冷眼觀看，只有個別例外。

楊榮國教授早就對孔子持批判態度。一九四三年他在《孔墨的思想》一書中就認為孔子代表沒落奴隸主貴族，思想保守。這本是一個學者的學術觀點，作為一家之言，並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一九七三年他新寫的批孔文章得到毛澤東的稱贊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後，他立刻身價百倍，各省爭相請他去作報告。以前當他還是一位單純的學者時，對兩漢以後是否還有儒法鬥爭，是否還有法家，都很難斷定。但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覺得應該適應政治需要，用儒法鬥爭作為基本綫索，把整個中國歷史都串起來，就改變了態度。他出過一本《簡明中國思想史》，是按照自己原有的觀點寫的。這時為了配合全國學習儒法鬥爭史的需要，就全部按照“新觀點”重新改寫了。

“修辭立其偏”——馮友蘭

另一位學者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教授。他本來有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並且以此著名。五十年代以後他的思想不斷受到批判，自己也就不斷地進行自我批判。“批林批孔”運動一來，他覺得自己大概又要成為批判對象了，于是就趕緊改變對孔子的看法。在《三松堂自序》裏，他寫道：

“一九七三年，批林運動轉向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爲‘衆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寫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在會場上念了兩遍，果然大受歡迎。”^⑦

這兩篇批孔文章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後，受到毛澤東的重視，還給改了幾個字，就由《光明日報》發表了。接着，馮友蘭就被吸收參加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成爲這種寫作班子裏唯一的老專家。

他說，他當時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嘩衆取寵。後來他認識到《周易》有一句話：“修辭立其誠”。說話寫文章都應講真話；講錯了，也還是“立其誠”。如果不講真話，而是附合流行的意見，“這就是僞，這就叫嘩衆取寵。”他坦率地承認：他當年批孔，“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僞。”^⑧

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另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梁漱溟也捲了進去。不過他沒有批孔，而是做了他一生中最後一件也是爲中國知識分子爭了一口氣的事情。

一九七三年十月，“批林批孔”開始以後，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的學習組也參加了。大家紛紛表態擁護，並且努力批判林彪和孔子。梁漱溟被公認爲“尊孔派”。他每會必到，但是從不發言。人們要求他表態，並舉出馮友蘭發表批孔文章爲例，希望梁向馮學習。梁漱溟說，他看過馮的文章，他懷疑馮的文章是不是講真話。其實梁漱溟見到馮友蘭的文章後就去信批評了馮。馮後來在女兒的陪同下專門到梁家作了解釋。梁覺得“人各有志，律己可以，何必強求于人呢。”所以他對馮友蘭也就不去深究了。^⑨

但是梁漱溟在學習組內受的壓力一天比一天大，每次開會都逼他發言，他只好答應作準備。後來他聽到江青一月二十四日在首都“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錄音，其中也批到梁漱溟，並且怒斥“梁漱溟何許人也”。這就更增強了梁漱溟發言的決心。

一九七四年二月，梁漱溟在政協直屬學習組分兩次共講了八個小時。他說，中國古代沒有任何人能和孔子相比。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五千年歷史中，孔子正好生活在二千五百年前，是承先啓後的。他主張對孔子要分析，不能片面地批判。

對於林彪，梁漱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說林彪有政治路綫，因為林彪是玩弄陰謀，沒有人格。他認為一個政治家爲了國家前途公開提出主張，才是路綫，如劉少奇、彭德懷就是。

這是“批林批孔”運動中唯一獨立的聲音。因此梁漱溟的發言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遭到猛烈批判。從三月到九月，大會小會共批判一百多次，給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梁漱溟也是每會必到，又恢復了以前的態度，絕不發言，用他自己的話就是“洗耳恭聽”。最後，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會上，主持會議的人問梁漱溟：對大會批判有何感想？梁漱溟本來還是不想回答。但主持人再三追問，他只好回答，於是講出下面一句話，這句話使全場爲之震驚：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⑩

在那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能夠在如此強大的圍攻中做到“匹夫不可奪志”的，只有梁漱溟一個人。

三 毛澤東的理論遺囑

毛澤東把列車放在兩根不平行的鐵軌上

一九七五年在中國是個矛盾的年頭。一方面，毛澤東沒有造就江青的攬權欲望，並且批評和警告他們不要結成幫派。另一方面，迅速而果斷地把黨政軍的大權交給鄧小平，讓他代理因病住院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的周恩來主持全面工作。

鄧小平比周恩來果斷，他一上來就迅速整頓各條戰綫。政治、經濟、文教、科學、內政、外交和軍隊，無不立竿見影。遭到破壞的國民經濟開始恢復，社會秩序逐漸穩定，各方面都重新萌發生機。

但是毛澤東在這一年的開頭同時又作了一項重要決策：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說：“列寧爲甚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方法。這叫“虛與實”。他要鄧小平做的那些事，是“務實”。學習理論這件事，是“務虛”。毛澤東認爲：虛與實的關係，是以虛帶實。因爲他一向認爲意識形態更重要：“政治是統帥”，“思想是靈魂”。所以學習理論這件事，他交給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他發布學習理論的指示時，就指定叫張、姚給他找列寧的有關語錄，並叫他們寫文章。“要使全國知道”，就是又要搞一個全國規模的思想運動。這樣，中國這輛車子又被放在不平行的兩根鐵軌上運行了。鄧小平正在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也是毛的指示）。張春橋和姚文元，當然還有江青和王洪文，卻要掀起一場“學習理論”的運動。這“理論”是幹甚麼的，不用學就知道。從一九五七年以來，特別是一九六二年以來，人們已經領教過多次，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來，更是談虎色變了。

一個要團結起來搞建設，一個要專門找“階級敵人”搞鬥爭；一個“務實”，一個“務虛”。中國要在這樣兩根不平行的軌道上行駛，能不翻車嗎？這就是一九七五年中國所面臨的矛盾。

重申“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毛澤東這次強調的理論，並不新鮮，還是他一九五八年強調的那個“資產階級法權”。他的說法也還是張春橋一九五八年發揮的那個觀點：資產階級法權的核心是等級制度。他說：“現在還實行

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怎樣對付這個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說:“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姚文元寫了一篇《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發表在《紅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上。張春橋寫了一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發表在《紅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上。這兩篇文章立即被印成小冊子發往全國,成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主要教科書。

其實他們的文章不過把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重復一下而已,無非說階級鬥爭連綿不斷,除了老階級,還不斷產生新階級。姚文元特別賣弄他的無知,一面重復“思想產生階級”的理論,一面又發明出一個“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這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這樣一來,中國便到處都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了。所以結論是必須實行專政。張春橋的新創造是在專政前面加個“全面”,以示其無所不在之意。姚文元文章的新內容是利用毛澤東一九五九年的一句話,提出“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是影射周恩來的。因為延安整風批判王明教條主義的時候,周恩來是作為經驗主義當了教條主義的俘虜而受到批判的。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開始以後,所謂“資產階級法權”成了一頂法力無邊的帽子,被到處套用。本來當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就已經是平均主義的同義語了,“文化大革命”又使已經低得可憐的勞動報酬更加平均。但是這種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用“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一分析,仍然是產生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於是又得進一步加以限制。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指示,可以說是毛澤東的理論遺囑。這不是人到晚年的糊塗話,而是他那種平均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的一部分,是“人民公社化”、“五七指示”

的繼續。

在這種平均主義指導下，最著名的“大寨工分”（沒有差別的農業勞動報酬）就是一個“樣板”，這是全國都要學習的。上海港的響亮口號“要做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裝卸工不計件，愛幹多少幹多少。）更是風靡一時。

批判“經驗主義”旨在打倒周恩來

不過江青們的實際興趣是在如何打倒周恩來。張春橋和江青都反復告訴人們，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幫凶，是當前的天敵”。所以各個報刊發了很多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上海《解放日報》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發表的《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說得非常露骨：“他們……醉心于無原則的實際主義……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凡多少知道一點中共歷史或延安整風的人，都知道這是指周恩來。但毛澤東顯然不想搞掉周恩來。他需要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務實派”來管好國家穩定局勢，正像他需要張春橋們那種“務虛派”來貫徹他的鬥爭哲學以便堅持文化大革命一樣。所以當他看到姚文元送來一個材料把經驗主義當作主要危險的時候，做了如下批示：

“提法似應提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他特別敲打了一下這些理論權威：“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①這話的分量不輕，使江青們受到一次較大的挫折。

從四月下旬到六月初。政治局連續開了多次會議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毛澤東在五月三日的會上說：“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澤東又重申過去的警告：“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甚麼照樣搞呀？為甚麼不和二百多中央

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⑫

宋江也成了修正主義。

江青等人不得不做些檢討。但是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還是忠實地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解決他們的問題，沒有借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東風，把他們整下去，更沒有弄到社會上去，發動一場批判運動。但是對方卻沒有這麼寬厚。和鄧小平的做法截然相反，江青們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打倒政治對手。五六月間剛剛碰了一次釘子，八月間他們忽然發現：機會又來了。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蘆荻談到《水滸》時，發表了一些看法：“《水滸》這本書，好就好在投降。”“《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擯屍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⑬

這個談話記錄被姚文元看到，他立即給毛寫信說：毛對《水滸》的評論，對於中共和革命群眾“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因此他建議印發毛的談話並附上他這封信，在全國發動一個“評《水滸》”的運動。

姚文元這封肉麻的信立即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于是一個新的思想運動又興起了。

連宋江都成了修正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浪潮就把古人也捲進去了。在此以前，已經流傳着這樣一個政治笑話：

一個生產大隊的支部書記在向社員作“批林批孔”的動員報告：“社員們！中央又揪出一個走資派，他的名字叫孔老二。孔老二不是中國人。他是魯國人。他的主要罪行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當時老百姓實在弄不清為甚麼一會要批孔子，一會要批《水滸》。至于江青們要打倒周恩來和鄧小平，局外人確實很難領會。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所以江青特別提醒人們：“《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要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⑩這樣，人們也就明白這次新的思想運動的意義了。

四 批判鄧小平

生活不能自理，卻治理整個國家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澤東的健康狀況惡化，不能出來活動。他的侄子毛遠新被任命為“聯絡員”。於是毛遠新就成了毛澤東了解外界信息的唯一通道，也是向外界發布毛澤東指示的唯一權威人士。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已經不能自理的時候，卻要治理整個國家；而整個國家除了聽任這個人的擺布之外居然無能為力。這實在是中國民族的悲劇。然而有甚麼辦法呢？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形勢，並且凝結為固定的體制。這種形勢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造成的。雖然不能說人人有份，至少是很多人都出了力。犧牲在這種制度下的劉少奇就是制造這種形勢的第一提琴手。

從九月起，中央政治局就見不到毛澤東而只能聽命于毛遠新了。事後查明，毛遠新向毛澤東報告的情況，是促使毛澤東又一次打倒鄧小平的一個因素。當然，根本原因是毛和鄧在政治上的原則分歧。毛澤東曾經給了一個框框，要政治局討論一下文化大革命；按照“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作出一個決議。這樣，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大革命”就在黨內取得共識，定下案來，以後就不會被否定了。但是主持政治局的鄧小平拒絕了。他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按，此語出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桃花源中人是秦朝末期躲避戰亂進入深山的。連漢朝都不知道，更不會知道有魏晉兩朝了。）鄧借用此語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與世隔離，甚麼

都不知道。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決定再次打倒鄧小平

毛澤東想打倒誰當然很容易。恰巧這個時候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反映黨委書記遲群和另一個副書記謝靜宜的問題。信是請鄧小平轉交的，這就成了導火綫。毛澤東批示道：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準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爲甚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¹⁶

十一月三日，毛澤東這個批示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向清華大學傳達。從此拉開了“批鄧”的序幕。

十一月下旬，政治局召集黨政軍負責幹部一百三十多人開了一個“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宣讀了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宣告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正式開始。接着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紛紛出籠。“打招呼會”逐漸擴大，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擴大到黨外群眾，全國都被捲入這場運動中去了。

指導這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最高指示，是毛遠新整理出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這是他繼“學習理論”的指示之後又一次遺言。雖然有些話好像已經神志不清，比如“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但總的看來，還是重復他的鬥爭哲學：“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

這次“批鄧”的聲勢和規模，從報紙、刊物和廣播上看，比當年批判劉少奇時厲害得多。不過從內容看，已經沒有甚麼新鮮招數了。除了一般地重復文化大革命中早已震耳欲聾的老調以外，較爲特殊的有這樣兩點：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一是“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理論，目標是老幹部。意思是過去搞民主革命的老幹部，到社會主義時期，思想如果跟不上，就會變成走資派，即“黨內資產階級”，成為革命對象。按照這個理論，由“新生力量”即造反起家的“無產階級左派”來奪權就是理所當然了。

二是制造出“唯生產力論”作為批判對象。凡注重發展生產的言行，都是應予批判的“唯生產力論”。按照這個標準，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如果“衛星上天”，就要“紅旗落地”。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當然是“唯生產力論”，必須予以批判。張春橋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才符合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批鄧”剛剛開始，周恩來就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了。他一生為革命辛勤奔走，建國後日理萬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他苦苦撐持着被毛澤東搞得一塌糊塗的局面。所有這些使他贏得很多人的愛戴。不管他有過甚麼瑕疵，也不管後人對他有甚麼責難，在當時的中國，他是最得人心的領袖人物。因此，他的逝世，使全中國都浸入深沉的悲痛當中。

鄧小平復出之後，以他一九七五年的政績，迅速得到舉國擁戴。人們都覺得，他正好可以接替周恩來。然而正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卻忽然發動“批鄧”。因此這種倒行逆施不但沒有人響應，而且只能激起普遍的反感。雖然新聞媒介每天大吹大擂，鑼鼓喧天，實際上也只是“四人幫”和他們幾個跑龍套的在政治舞臺上中風狂走大喊大叫而已。這倒是當時的中國特色。在高度集中的上層建築中有一套高度集中的傳播體系，中央的總控制室可以操縱全國的傳播媒介。所以盡管群眾普遍反感，“批鄧”的噪音還是覆蓋了中國大地。

鎮壓“四五”運動使毛澤東最後毀掉自己

1976年4月5日是中國傳統的掃墓日子清明節。五四運動以來就成爲民主聖地的天安門廣場，成了人們悼念周恩來和抗議“批鄧”的中心。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到廣場上獻花圈，貼詩文，表達自己的心意。

這是中共執政以來的第一次，人民的忍耐終於突破了極限。很明顯，群眾的不滿是對着毛澤東的。毛澤東自己也非常清楚。雖然他一貫教導全黨要有“群眾觀點”，但是當群眾冒犯他的權威時，他就要動用專政的武器了。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已經取代鄧小平的華國鋒和江青們一起野蠻地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和平群眾。出面打人和抓人的是“工人人民兵”和警察。

天安門事件之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撤消了鄧小平一切職務，提升華國鋒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本來總理要由全國人大任命，雖然那只是走一下過場，但畢竟在憲法程序上說得過去。這一次則把憲法拋在一邊，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任命。）

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一直在中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這權威的起源是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可惜他不斷浪費這種資源。如果毛在起用鄧小平之後能夠支持他一直幹下去，事情會好得多。但他終於和鄧小平決裂，從而鑄成他一生中最後一個大錯。對天安廣場的暴力鎮壓，毀掉了他在人們心目中剩下的最後一點政治影響力。

天安門事件之後，儘管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盛大的游行來“擁護華國鋒”和“打倒鄧小平”，畢竟都無濟于事。那些游行都是強制的。爲了扭轉“批鄧”的冷清局面，後來又加上“深入”兩個字，變成“深入批鄧”。但是不論怎樣“深入”，“批鄧”還是沒有人理睬。人

第七章 從批林批孔到批鄧

民對於這個政權已經不再信任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十月六日“四人幫”倒臺。那個時代終於結束了。

※ ※ ※

第七章 引文出處

- ①《國史通鑒》第3卷，第1403頁
- ②同上，第3卷，第1403頁
- ③同上，第3卷，第1170頁
- ④《國史通鑒》第3卷，第1479頁
- ⑤《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429頁
- ⑥《國史通鑒》第3卷，第220頁
- ⑦《三松堂自序》第187頁
- ⑧同上，第188-189頁
- ⑨《風起雨落幾鴻儒》第314,324頁
- ⑩同上，第323頁
- ⑪《國史通鑒》第3卷，第241頁
- ⑫《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444頁-445頁
- ⑬《國史通鑒》第3卷，第246頁
- ⑭同上，第246頁
- ⑮《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第450頁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出席他生前最後一次中共黨代表大會（“十大”）。按慣例，大會閉幕時，毛應最先退場，然後才輪到其他人按身份依次退場，以示尊卑有序。但毛體力已衰，一時竟站不起來，場面難堪。周恩來急中生智，宣佈說：“請代表們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場。”算是化解了毛的窘境。

此時毛無論身體上還是政治上，都已進入暮年。一年垂暮老人，連自己的身體都已不能支配，卻要支配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周恩來在十年內戰期間位在毛澤東之上並且整治過毛澤東。遵義會議後，特別是延安整風以後，周恩來極其小心地並且忠誠地把自己的位置放在毛澤東之下，而且只當第三把手，因而免遭滅頂之災。林彪敗亡之後，周曾打算糾左，這就觸犯了毛的逆鱗，所以毛發動“批孔”運動，意在打擊周恩來。但他還需要周來輔佐他治理這個國家，所以沒有把周打倒，而是予以做誠。這是批孔運動中在曲阜孔廟舉行的批孔大會。



批林批孔運動，有聲望的學者均作壁上觀，只有馮友蘭和楊榮國（楊早年就持反孔態度）廁身其中，參加批判。梁漱溟與馮友蘭早年有師生之誼，對馮此舉不以為然，曾去信責備。

上圖為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文科哲學門第二屆畢業生與老師合影。

前排左起：第五人蔡元培，第六人陳獨秀，第七人梁漱溟。

二排左起，第四人馮友蘭。



在批林批孔運動橫掃中國大陸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挺身而出成爲中流砥柱，這就是梁漱溟。

一代學者梁漱溟忠於理念，秉持至誠。不論國民黨特務的子彈還是毛澤東的無比權威，他全然不爲所動。批林批孔運動中，面對其勢洶洶的批判狂潮，他的回答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士氣已被摧殘殆盡的時候，梁漱溟爲人們樹立了一個最爲難能可貴的楷模。



毛在周恩來病重時起用鄧小平。鄧立即收拾殘局，使全國局勢呈現轉機。但毛又突然發動“批鄧”，從而犯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致命的錯誤。

這是一九七六年在“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中，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正在趕排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



“批鄧”激怒了人民。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四月五日），百萬人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不光是反對四人幫，而且也宣洩了對毛的不滿。上為北京越劇團導演李鐵華在發表演說，右為貼在廣場的一首詩，表明人民已經決心走上反抗的道路。

毛澤東下令鎮壓了這場運動，結果使他徹底毀壞了自己的形象。

欲悲洵鬼叫，
我笑豺狼笑，
洒油祭雄杰，
揚眉劍出鞘。

第八章 思想解放運動

(1977 - 1979)

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倒臺，標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是新時代並未開始，因為毛澤東的影子繼續籠罩着中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綫，仍然支配一切。

新時代的開始是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它是當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當代中國唯一的一次反左鬥爭

為了實現這次轉折，中國又經歷了一次思想鬥爭。不過這次鬥爭和以前鬥爭根本不同。以前的鬥爭都是用現代文字獄來禁錮中國人的思想，這一次鬥爭卻是打破這種禁錮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前的鬥爭都以“反右”為特征，唯獨這次鬥爭以反左為特色。以前的鬥爭都要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唯獨這次鬥爭沒有對誰實行政治上的打擊。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為了結束三十年來連綿不斷的思想鬥爭而進行的最後一次鬥爭。

可惜的是，它並沒有真正成為“最後的鬥爭”。不久人們就發現，這唯一的一次反左鬥爭，不過是當代中國始終如一的“反右”鬥爭中的一段間歇。

一 “兩個凡是”

華國鋒失去歷史給他的機會

“一舉粉碎四人幫”是一次成功的不流血政變。政變是在法律程序之外用突然襲擊的方法奪取政權，它屬於非常規的政權更替。

第八章 思想解放運動

本來在法制健全的國家，可以通過憲法程序實現權力轉移，可是中國雖有憲法和黨章，卻形同虛設。首先執政者自己就不遵守，所以要改換領導便只有在法制之外尋找途徑了。

華國鋒和葉劍英發動的這次政變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因為四人幫早就被人們唾棄了。許多人把粉碎四人幫這件事叫作“第二次解放”可見人心的向背已經到了甚麼程度。

然而人們不久就失望了。

毛澤東在最後的日子裏親自挑選的接班人華國鋒，雖然由于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而欠下了一筆債，但在關鍵時刻他能和四人幫決裂，因而得到了群眾的諒解。但是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親手給大家潑了一盆涼水，把人們對他的好感一下子澆涼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底，華國鋒有三條指示傳達下來：

1. 四人幫不是極左，是極右；
2. 凡是毛澤東點過頭的，做過批示的，都要堅持；
3. 批四人幫，不能給鄧小平翻案。（注一）

這就是說，華國鋒決心繼續執行毛澤東那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極左路綫。四人幫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華國鋒卻認為他們是極右。按照這種說法，只有比四人幫更左才行。當時人們最關心的兩件事是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問題。華國鋒堅持不給平反，理由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反革命事件”）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是毛澤東定的，所以一個也不許動。不過，以華國鋒個人的威望，這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他請出毛澤東。

經過二十多年的個人崇拜，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造神運動，毛澤東已經被塑成一座神像。他的話被稱為“最高指示”。誰要是被指控“反對毛主席”，便是犯了滔天大罪。文化大革命當中，北京的遇羅克，遼寧的張志新，就是因為這種罪名被判處死刑的。四人幫倒臺之後，在華國鋒當政的時候，吉林的史雲峰，上海的王申酉，也是同樣的罪名下被處死的。所以儘管毛澤東已經不在

人世，他的巨大身影仍然支配着中國的生活。

提出“兩個凡是”，堅持毛的一切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華國鋒通過“兩報一刊”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正式提出他的最高準則——“兩個凡是”：

“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持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緊密的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布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揮”。

事情很明顯，按照這篇社論所樹立的準則，不但毛澤東的一切“指示”，不管它謬誤到甚麼程度，都必須“始終不渝地遵循”，而且“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不管把中國領到哪裏去，人們都必須聽從它的指揮。

這不是毛澤東或華國鋒個別領袖人物的事情，也不是一個黨或一個軍隊的事情，而是關乎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大事。二十多年來，由于總是不斷地鬥，中國已經吃了大虧。許多國家和地區，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平時期，都實現了經濟起飛。而中國卻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思想上批判，政治上打擊，組織上清洗，自己鬥自己都應接不暇，還有甚麼精力去搞建設呢？到了七十年代，中國不但已經落後于先進民族，而且自己的生存都成了問題。現在好不容易才結束了那個年代，難道還要沿着極左路綫繼續走下去么？

（注一）華國鋒這三條指示，當時沒有正式文件，只是口頭傳達。這是筆者當時的原始記錄。後來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238頁）是這樣記的：

“十月二十六日 華國鋒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人說：

當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綫是極右路綫；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二 真理標準大討論

鄧小平用“完整準確”對抗“兩個凡是”

當時確實是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改弦易轍已經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然而“兩個凡是”卻牢牢地束縛住人們的手腳，誰也不許越出毛澤東的框框。因此，沖破“兩個凡是”，使人們的思想從這具枷鎖下解放出來，便成了一切工作的先決條件。

首先向兩個“凡是”挑戰的是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初，許多老幹部都提出要給鄧小平平反，華國鋒也表示要考慮。這一年五月間，中共中央辦公廳兩個負責人去看鄧小平，要求他擁護“兩個凡是”，以便恢復他的工作，鄧小平拒絕了。他對這兩個人說：“‘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爲我平反的問題。”^①

鄧小平正式向黨提出這個問題，是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取代“兩個凡是”。他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給中共中央寫信，同年七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談到毛澤東思想時，都強調了“完整”和“準確”，反對歪曲和割裂。所謂“完整”和“準確”，是一種委婉的說法。言外之意是毛也有錯誤的東西，應該丟掉。

這樣，對毛澤東思想便有兩種“高舉”的方法。一種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一種是鄧小平的“完整準確”。

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內便有兩條思想路綫。“兩個凡是”是官方的觀點，但實在不得人心，也沒有甚麼道理拿得出手，所以很不景氣。相反，“完整準確”這一方卻有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他們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間，向極左思潮和“兩個凡是”展開了深入的批判。

批判在各個領域進行。除了各種具體是非以外，所有的批判實際上都是在破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當然，還不是直接批判毛澤東本人，而是批判林彪和四人幫，並且在批判時盡可能找出毛澤東的話作為根據，以證明林彪和四人幫違背了毛澤東的觀點。其實他們所鼓吹和實行的極左思想和路線，從根本上說都是毛澤東的。不過這一點大家都不點破。這也是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慣性運動之後，從那個巨人的陰影下面解放出來時很難避免的現象。

這兩年是中國人三十年來經歷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許多長期禁錮思想的枷鎖被打破，不少禁區都被闖進去了。例如，下面這些重要是非就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解決的：

領袖是人不是神，也要犯錯誤。不應對他盲從，要破除現代迷信，即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生產力是社會的物質基礎，不應當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或“黑貓白貓論”，應該致力於經濟建設，實現現代化。

不能到處都以階級鬥爭為綱，也不能把中共黨史歸結為路線鬥爭史。

在精神和物質的關係上，不能夸大精神作用，在分配上要強調物質利益原則。

尊重科學，尊重文化知識，反對以愚昧、落後和野蠻為光榮。

反對平均主義，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都要承認差別。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些常識，是由于中國的思想生活長期不正常，所以很多是非都弄顛倒了，而且成為禁區，誰也不能過問。

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不過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光停留在“完整準確”上面還不夠，因為“完整準確”仍然停留在毛澤東思想本身的框框裏。究竟這種思想對不對，符不符合客觀實際，還必須有個客觀標準，才能判斷是非。

這個標準就是實踐——爲了徹底駁倒“兩個凡是”就必須請出實踐作爲判斷誰是誰非的唯一標準。胡耀邦意識到這一點，於是布置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起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起草的過程中，《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從來稿中找出一篇論述實踐標準的稿子，送給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從中吸取了一部分內容，最後由孫長江執筆寫成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

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和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汪東興，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毛澤東著作辦公室（中共中央的寫作班子）的負責人，都主張“兩個凡是”。因此發表實踐標準的文章肯定要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於是胡耀邦讓《光明日報》先發表，《人民日報》來轉載，而且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表示不代表報社。這樣文章就可以避免送審，以免遭到扣壓，而且發表後報社可以少受點壓力。

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用“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人民日報》立即轉載。與此同時，新華社社長曾濤決定，作爲新聞通稿向全國全文播發這篇文章。

果然，文章發表之後立刻受到官方的嚴厲指責，說是“砍旗”，即砍倒毛澤東思想紅旗。這是十分嚴重的政治罪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和新華社社長曾濤，都受到這種指責。然而和官方的指責相反，這篇文章在全國引起非常熱烈的響應。各個報刊，各個地方，紛紛參加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一邊倒，沒有任何文章支持“兩個凡是”。而主張“兩個凡是”的也拿不出一篇文章來爲自己辯護。

但是，“兩個凡是”雖然沒有道理，卻有權力。他們曾經施加強大的壓力來阻止真理標準的討論。五月十七日汪東興在一個小組

會上說，那篇真理標準的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幹，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然後他指示“要查一查”並且說：“《人民日報》要有黨性，中宣部要把好關”。

五月十八日，即汪東興講話的第二天，中宣部長張平化就對各省市文教書記和宣傳部長專門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他說：“不要認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了，就成了定論……不要隨風轉。”^②

在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的壓力下，社會上紛紛傳言“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問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主持這篇文章的胡耀邦受到的壓力更大。

兩個司令部

鄧小平堅決支持了這篇文章，六月二日他在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有人天天講毛澤東思想，但卻反對實事求是，“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③

此後，雖然從中央到地方仍然有壓力，但是討論的規模越來越大。不單是理論界和知識界，而且黨政軍各界都紛紛表態或發表文章，贊成實踐標準。於是這場討論又變成一場政治運動，不過這不是以往那種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整人運動，而是一種自發的自下而上的“公民投票”；全國各界都反對“兩個凡是”。

只有一個重要的輿論障地——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按兵不動。在真理標準討論當中，它拒不表態。有人在《紅旗》雜誌社附近貼大字報質問它為甚麼不表態，社內也有此要求。但雜誌的總編輯熊復按照汪東興的指示，“《紅旗》要一花獨放”，“就是不表態”。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分成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毛澤東和林彪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個是以劉少奇和鄧小

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事實證明這純粹是唐·吉訶德和風車戰鬥。但是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確實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華國鋒和汪東興為首的“兩個凡是”司令部，一個是鄧小平和胡耀邦為首的“實踐派”司令部。前一個司令部是正統的“當朝派”，因為華國鋒是黨的主席，是“英明領袖”；汪東興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副主席，中宣部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後一個司令部可以說是“在野派”：鄧小平是剛剛從冷宮裏被釋放出來的中央副主席，胡耀邦只是中央黨校的副校長。

兩支理論隊伍

和兩個司令部相適應，當時在首都有兩支理論隊伍。“當朝派”的主力部隊是“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是汪東興，副主任是原來康生的秘書李鑫，這是華國鋒親自抓的“秀才班子”。提出“兩個凡是”的那篇著名社論，就是這裏的出品。這個司令部的輿論陣地是《紅旗》雜誌，總編輯是熊復。那裏也集中了一批人才。不過他們這支隊伍裏的秀才，真正贊成“兩個凡是”的，也實在有限。所以這支隊伍很不景氣。在整個真理問題的討論中，連一篇文章也拿不出來。

在野的司令部則擁有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其實它並不是誰特意組建的，而是由於“同聲相應”自然形成的。這支隊伍的組成大致如下：

胡耀邦直接領導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吳江，阮銘，孫長江。他們主編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是胡耀邦創辦的領導思想解放運動的旗幟。

國務院研究室——胡喬木，鄧力群，林澗青，林子力，馮蘭瑞等。在批判左傾理論和路線中，這裏寫出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在撥亂反正當中起了重大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光遠，孫冶方，黎澍，丁偉志，嚴家其，

邢賁思,吳敬璉,董輔弼等。這裏擁有很多學者,還出版多種學術刊物,其中《歷史研究》在批判左傾理論和路綫方面尤為出色。于光遠組織的經濟學座談會,成為經濟領域思想解放的自由論壇,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起了推動作用。

《人民日報》社——胡績偉,秦川,王若水,何匡,汪子嵩,蘇紹智,范榮康,余煥春,李玉田等。這裏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陣地。幾乎所有的重要文章,都用“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立即由張香山主管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同時由曾濤主持的新華社發出通稿。這使得思想解放的信息總是迅速覆蓋中國大陸並傳遍世界。

除了上面幾個理論隊伍比較集中的主力單位以外,還有一些較為分散的力量,也都是在胡耀邦的直接指揮或影響下參加這場思想解放鬥爭的:

中共中央組織部——曹志

《光明日報》社——楊西光,馬沛文。

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童大林,吳明瑜,鮑彤。

北京大學——郭羅基,張顯揚,王貴秀。

公安部——于浩成。

當時全國的報刊,除了《紅旗》雜誌和個別省委的機關報以外,可以說都是思想解放的園地。除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之外,擁有眾多青年讀者的《中國青年》雜誌(主編關志豪)和《中國青年報》(主編鐘沛璋)也辦得很出色。

真理戰勝權力——當代中國僅有的一次例外

在這樣兩個司令部的較量當中,從權力上看,當然“當朝派”厲害。但從實力上看,它比起“在野派”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是後者的對手。所以較量的結果是“當朝派”大敗虧輸,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第八章 思想解放運動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次思想運動都是領導上發動和組織的。每次運動要批判甚麼思想，整甚麼人，運動的目的和方法，深度和廣度，步驟和安排，都是領導上確定的，確切的說都是中共中央決定的。唯獨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主客易位，這次討論是違反中央意志並且是冲破中央強大的壓力發展起來的。這是不折不扣的“爭鳴”。以往的思想鬥爭都是領導上先把對方的手捆住，把對方的嘴堵上，然後大張撻伐。換句話說，以前的思想鬥爭都是權力壓倒真理，而這一次思想鬥爭卻是真理戰勝權力。有權力的官方觀點居然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在野”的觀點竟能支配全局大獲全勝，這在建國三十年的歷史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這次思想鬥爭之所以出現這種形勢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民間輿論的向背。

三 西單民主牆

“民主牆”的由來

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那支強大的理論隊伍之外，還有一支社會上的隊伍。他們生氣勃勃，敢想敢說，敢于衝鋒陷陣。這支隊伍完全由年輕人所構成的。他們發表言論的園地就是被叫作“民主牆”的地方。這地方在北京西長安街，也就是西單北大街的南口東邊。因為緊靠西單，所以又叫“西單牆”或“西單民主牆”。它是群眾自由發表政見的園地。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它起了重大作用。

其實作為自由發表政見的園地，“民主牆”起源于天安門廣場。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即“四五”運動時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詩文，就表達了人民群眾反抗極左路綫的政見。粉碎“四人幫”以後，群眾繼續在天安門廣場用詩文紀念清明節。在一九七八年的四月六日，紀念碑前有一張署名霍華、尹明的大字報，實際上是“民主

牆”的倡議書。

他們提議，應該不限于清明節，“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在這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裏，每一個都是社會的主人！”

這個倡議當時沒有實現，因為天安門廣場和人民英雄紀念碑自有它的莊嚴風貌，不可能用作經常張貼的處所。

不過這種客觀需要並沒有消失。幾個月後，他們的倡議在“西單牆”實現了。這一次，它是通過一個偶發事件實現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國青年》復刊了。這一期刊物上發表了“本刊特約評論員”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作者李洪林，經胡耀邦修改定稿），文章第一次提出破除“現代迷信”即對毛澤東的迷信。《中國青年》復刊號還發表了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時的天安門詩抄。誰知這期刊物剛剛出版就被汪東興查禁，理由是：“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事件”。他還指責這期刊物沒有發表毛澤東的詩詞，也沒有華國鋒題詞。

查禁《中國青年》一事引起人們的憤慨。有人把這期《中國青年》逐頁貼到西單路口旁邊的牆上，立即引起全北京市的注意。大家蜂擁而至，於是這裏張貼的大字報小字報逐漸多起來，形成一個民間自由表達意見的中心。這就是“西單牆”的由來。

“西單牆”的活躍分子全是年輕人，有的還自由結成社團，不但出牆報，而且自辦油印刊物。像《北京之春》（王軍濤），《探索》（魏京生），《四五論壇》（徐文立、劉青等）就是當時比較著名的民辦刊物。

這些刊物雖然都出自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之手，有些確實辦得嚴肅認真，而且很有理論水平和政治眼光。比如《四五論壇》的發

刊詞說：

“《四五論壇》的宗旨，就是為在我國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盡一點微薄的力量。安定團結不是一潭死水，不是不讓人民講話，尤其不是不讓人民講真話。人人有話敢講，任何污穢就沒有藏身之地。人民的意志必然決定社會的命運。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一言以蔽之，《四五論壇》就是要行使憲法賦予人民監督和管理國家的權利，使憲法由一紙條文，變為我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那些習慣于一種調子統一天下的同志，也應該慢慢地習慣于在多元化的鬥爭、比較中，抉擇出一條最科學的，通向進步和光明的捷徑，盡早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才符合世界進步的潮流。”

對黨內改革派的有力支持

當時“西單牆”所反映的，很多都是有待解決的舉國關心的政治問題。有些大字報直率地批評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人。這對真理標準的討論，對平反冤案，對活躍國家的民主生活，都是很大的推動力量，特別對中共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對以鄧小平和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是強有力的支持。

總的說來，“西單牆”所表現的民間輿論的中心，是對民主的呼喚。魏京生在《探索》上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要求，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事實上“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只限于生產力和軍事技術。這都屬於物質條件。如果政治不實現民主化，這些物質條件不可能順利發展，或將畸形發展，就像二次大戰前的德國、日本和蘇聯一樣，並非國家之福。當時理論界是意識到這一點的並且早就對民主提出強烈的要求。不過魏京生把民主作為“第五個現代化”，雖然在邏輯上未必恰當（因為民主是四化的政治條件，不宜並列），但是這個提法新穎，給人的印象比較深刻。

呼喚並實踐言論自由

圍繞着民主這個中心，“西單牆”提出了一些突破正式報刊言論界限，常人所不敢涉及或當時還沒有涉及的重大問題。

出版自由問題——一張署名“百全”的大字報《論民主辦報——學習新憲法的一點體會》，要求兌現憲法所規定的出版自由：

“人民早已吃盡了沒有輿論工具的苦頭！在林彪、四人幫橫行之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報上卻仍然煞有其事地呼喊是‘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蒙騙群眾的報道舉不勝舉……這樣的報紙在人民大眾的心目中成了假話的代名詞，可這又是所謂‘黨報’，具有至上的尊嚴——‘反黨’的大帽子又不容許你提出非議。青年人不說真話，是爲了出路；中年人不說真話，是爲了妻室兒女；老年人不說真話，是爲了維持‘幸福’的晚年。人們的思路被報紙上的八股文，引上八股思想的絕路。”

“四人幫控制的輿論長期愚弄人民……人民不該揭露這伙小丑的嘴臉嗎？不是！因爲人民沒有‘嘴’！難道‘四五’無數英雄被投入大獄，人民不該爲他們昭雪嗎？人們不該將‘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公布于衆嗎？不是！因爲人民沒有‘嘴’！”

“今天，人民勝利了，這種局面應該徹底改變了！……‘民主辦報’，‘非官方辦報’，只能是一利于民主，二利于對政府各級領導機構的促進，三利于批評與自我批評。”

要求取消“惡毒攻擊”罪——《四五論壇》有一篇文章《反革命與言論自由》寫道：

“歷來被鎮壓的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大部分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是‘反革命言論’。這樣‘反革命言論’便被納入了‘反革命活動’範疇，而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這一公民權利，便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空話。因爲甚麼是‘反革命言論’是很難確定的，只能憑各級長官和司法大員的認識來定，而各

級長官和司法大員的識別能力，實在令人難以信服，更何況各級長官和司法大員本人是否就是‘反革命’呢？也是無法證明的。”

文章接着提出所謂“惡毒攻擊”問題（按，實際上都是指對黨國要人的批評）：

“甚麼樣的對象被罵了才屬於‘惡毒攻擊’呢？是幾個主要領導人那樣的大大官嗎？還是所有的小民被謾罵了也屬於被‘惡毒攻擊’呢？如果僅只是幾個主要領導人，那麼中國的法律就將人分成等級了；一類是法律保護不許罵；一類挨罵不挨罵法律不管。倘若是黨和社會主義不許罵，我也看不到可以成立這樣法律的理由。黨和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具體的人在領導的具體的團體、社會結構，是必然會有錯誤的，有時甚至是站到了人民利益的對立面。林彪、四人幫時期就是如此，難道不可以罵嗎？如果中國人民沒有在天安門廣場大罵一頓，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大概今天的中國人只能喝西北風了。”

“中國共產黨是在擁有八百萬軍隊的蔣介石政權的‘惡毒攻擊’和肆意造謠聲中獲得政權的，周總理在四人幫的‘惡毒攻擊’中反而更加高大，可見‘惡毒攻擊’不能讓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政黨、政權滅亡，甚至不能讓個人的威信降低，只會增大他的崇高形象，只會讓‘惡毒攻擊’者本人加速滅亡。現在，有甚麼理由害怕‘惡毒攻擊’呢？有甚麼理由抬出‘惡毒攻擊’這個帽子，使言論自由變成受氣的小老婆呢？難道是害怕人民說話，為了便于統治嗎？”

質疑“黨的領導”

對“黨的領導”提出異議——《人民日報》七九年一月十五日曾有一篇文章說：“所謂黨的領導，主要是說，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裏，一切方面的工作都要受共產黨的領導，都要執行黨的路綫、方針、政策，都要沿着黨指引的方向前進。這也就是說，在我們國家，既不容許有另外的政黨行使領導權，也不容許有不接受黨的領導

的獨立王國存在。”《四五論壇》對《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問道：“黨的路綫、方針、政策發生錯誤的時候，也‘都要執行’嗎？”

批毛和擁毛

直接批評毛澤東——當時公開報刊上都是批判四人幫，即使涉及毛澤東也是用轉彎抹角的方法。但是“西單牆”卻有大字報直接指出毛澤東晚年“思想上的形而上學”，“支持四人幫打倒了鄧小平同志，鎮壓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大字報的署名是“王府井大街五十七號，汽修字〇五三八證件持有者。”）

有一張小字報《致鄧副主席的公開信》（署名麗萍）批評了中共中央粉飾毛澤東錯誤的做法：

“中央所作的毛主席的錯誤是微不足道的結論，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毛主席的後十年裏，毛主席所推行的路綫，跟四人幫的路綫，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綫嗎？”“在這十年裏，從毛主席的政治路綫看，中心內容：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這條路綫把主要矛頭對準了不同政見者，把他們投入監獄。而更觸目驚心的是導致了空前的各種類型的民族自相殘殺。”“從毛主席的組織路綫看，沒有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幫能把劉鄧陶打倒嗎？大多數老幹部能這樣土崩瓦解嗎？沒有毛主席的個人獨裁，社會能有個大倒退嗎？”

“西單牆”所呈現的也不光是一種傾向。除了批評毛澤東的言論以外，也有維護毛澤東的言論。這本是民主生活的正常現象。然而有一張大字報把批評毛澤東說成是“階級敵人的破壞”。它說，批毛“使海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反華反共分子聞後禁不住歡喜若狂。”“某些人……純粹是要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本人，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乃至民主革命的歷史，制造混亂。”“把眼睛擦亮吧，‘非毛化’運動是不得人心的！”最後這張大字報作者要求動用專政武器實行鎮壓：“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打擊階級敵人的破

壞。”

還有人寫道：“警告一小撮‘塔斯社別動隊’，竟敢影射攻擊紅太陽！”

不過總的來說，“西單牆”的言論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對當局雖有批評，也是與人為善的，並沒有誰去煽動動亂，所提意見也並無違法之處。大家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其實正是憲法條文已經保證了的。

除了北京地區的人們以外，還有些外省的年輕人也到北京來表達自己的政見。像從貴州來的“啓蒙社”就在天安門廣場東側中國歷史博物館附近張貼大字報，提出響亮的口號：“必須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須對毛澤東三七開。”這都是當時人們還不敢涉足的最大禁區，他們都勇敢地闖進去了。應該說，當代中國這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以青年為主力軍的民間輿論，是其中最勇敢最活躍的組成部分。

群眾思想的活躍，民主氣氛的高漲，嚇壞了在一黨專政制度下慣于壟斷一切權力的官員們。他們驚恐萬狀，強烈要求取締。

鄧小平和葉劍英支持“民主牆”

當時鄧小平堅定地支持了群眾的創舉。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對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的談話。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

“西單牆”式的言論自由圍地在別的城市也有。它使群眾意見迅速表達出來。有人對此有些擔心。鄧小平隨後在三中全會的預備會上說：“群眾提了些意見應該允許，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甚麼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特別警告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④

另據三中全會文件起草人之一阮銘回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高度評價“西單牆”。他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不過這句話後來在作為中央文件下達時，被胡喬木改掉了。^⑤(注一)

(注一)胡喬木當時是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他被賦予一項重要權力：對黨的文件“在文字上把關”。中共中央的文件差不多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超過法律的效力。所謂“在文字上把關”，也就是有權對文件進行修改或增刪。不言而喻，“把關者”完全有可能上下其手，使文件符合某種需要。中共中央把這樣重要的權力給予胡喬木個人，它對於這個黨的影響究竟如何，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當然那只能是將來檔案解密之後的事情。

四 三中全會——歷史轉折點

建國以來中共第一次黨內民主會議

在思想解放運動高潮當中，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到十二月十三日，開的是中央工作會議，這是三中全會的預備會。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正式舉行三中全會。習慣上都把這兩個會統稱三中全會。

全會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本是從一九五三年以來早就應該作的。但是幾次想集中力量搞建設，都被無休止的階級鬥爭所打斷。文化大革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高階段，一切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這就教育了整個民族，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從思想上為改弦更張掃清了障礙，這就為三中全會的召

開準備了條件。

會議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的。他原來打算，三中全會只討論經濟問題，不討論政治路綫和思想路綫問題。因為在他的頭腦裏，那兩個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這就是“抓綱治國”和“兩個凡是”。“綱”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好在兩年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已經使民主氣氛相當濃厚，因而也使黨內思想活躍起來，再者華國鋒又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獨斷專行的權威，所以三中全會一反傳統慣例，沒有被一個人牽着走，而是議論紛紛，真的開成一個“會議”，也就是有“會”有“議”了。

確定現代化的政治路綫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

在自由議論當中，會議決定首先要解決政治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現代化建設放在一條牢靠的路綫上，從而真正成為一切工作的中心。

但是光解決政治路綫還不夠。如果思想路綫不解決，便還會面臨“兩個凡是”一類的思想框框的束縛。所以三中全會除了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政治路綫以外，還確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全會否定了“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就為中國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前提。因為改革必然和傳統的理論和制度發生矛盾，如果不確定一個實踐標準，勢必處處都被指責為“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背離毛澤東思想和毛的“革命路綫”。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背離”是大逆不道的。

確定改革的總方針

三中全會確定了現代化的總目標，雖然沒有制定出具體規劃，但是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改革不適合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改革不適合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這就從原則上打開了改革的大

門。它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後來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是在貫徹這個決定。

三中全會還批評了過去的個人專制，特別強調民主，認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條件。

會議除了為彭德懷等老革命家平反以外，還作了一個重要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件事公布以後極大地振奮了人心。在人們心頭壓了幾年的大石頭，終於搬開了。

鄧小平的主題講話——解放思想，民主法制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致閉幕詞，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它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講話，並被接受為三中全會的方針，會後成為指導全黨各項工作的準則。

鄧小平着重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尖銳地批評了設禁區、下禁令、打棍子的做法，批評了“一切統一口徑”和“一切照抄照辦照轉”的現象。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他批評了過去“長期缺乏民主”。他說“一聽到群眾有一點議論，就要追查所謂‘政治背景’、所謂‘政治謠言’，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惡劣作風必須堅決制止。”

他還講到法制問題：“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黨委委員的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④

全會決定永遠廢除暗無天日的“專案組”

全會還作了一個看起來似乎不大，但卻是關乎黨員和公民權利的至關重要的決定：永遠廢止“專案組”。

所謂“專案組”，是中國政治生活裏最暗無天日的工具之一。它是在黨章和國法之外，由當權者任意指定一些人組成的對某人

進行審查的小組。這個“專案組”的權力極大，卻沒有任何機構對它進行監督。它有權拘捕人，有權關押人，有權審訊人，也就是對人實行所謂“隔離審查”。被“隔離”的人，連正式犯人的權利都享受不到。（注一）他們處於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態，一任專案組隨意擺布。“專案組”的任務是按照領導意圖，千方百計到處搜集材料，對本人則是指供，逼供，誘供，目的是證明事先作好的“結論”。（注二）一個人只要落入“專案組”，就很難有翻身餘地。除了事後政治氣候有變化而獲得平反，很難再有清白之身了。有時即使“專案組”不能證明某個審查對象有問題，它也會把各種“揭發”、“檢舉”材料塞到這個人的檔案裏，使他終身背着各種各樣的“暗挂”的罪名。這種“暗挂”的材料和罪名根本不告知本人，使他完全蒙在鼓裏，自然也就沒有申辯的機會。正因為“專案組”是如此踐踏人身權利，所以三中全會把它永遠廢止了。

因為三中全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做出許多扭轉毛澤東時代左傾錯誤的主要決定，使中國這般大船開始調轉船頭駛向現代化的方向，所以這次會議成為當代中國的歷史轉折點。

（注一）《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者，當代戲劇大師田漢，一九三六年曾被國民黨逮捕，關入監獄。那時他的母親可以前去探監。然而一九六七年田漢被“專案組”關押時，他的老母日夜思念都不得見面。田漢也非常思念母親和妻子。他在關押中已經重病在身，有時低聲沉吟：“放我回家見見我媽媽吧！”但是“專案組”的人員根本不具備人性（因為“人性論”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無產階級是沒有這個玩意的），他們所能作的就是審問。直到田漢生命垂危之時，他們還在審問，後來發現田漢已經昏迷過去，才悻悻離去。

田漢就這樣在監禁中死了，至死母子都不能見上一面，家屬不但不知他已死去，連骨灰都不知去向。

(注二)最著名的例子是“劉少奇專案組”給劉少奇製造的誣陷材料。這位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竟被“專案組”玩弄于股掌之上，不但喪失了一切自由，被折磨致死，而且還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

五 理論工作務虛會

胡耀邦的傑作

三中全會本來要討論一下理論工作，由于時間關係，決定全會之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三中全會還調整了一下人事，決定由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長。于是理論工作務虛會就由新任中宣部長胡耀邦主持，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開幕。這個會可以說是胡耀邦在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項傑作。

“務虛”和“務實”是毛澤東創立的一對概念。“實”指實際工作，“虛”指思想或理論。理論工作本來就是“務虛”，所以這個會議的名字有點同義反復。于是人們把它簡稱“務虛會”。

會議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邀集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者一百多人分小組開會，深入討論一些問題。第二階段召集各省來人，會議擴大到四五百人。在第一階段，各省也同時召開本省的“務虛會”。

胡耀邦在會議開幕時有個“引言”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第一次披露了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對彭德懷談的三句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這就是說，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之後已經意識到自己錯了。他還透露，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已經對文化大革命有了懷疑，認為它可能是個歷史上的小插曲。那是在中共全會上。這次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按黨章規定，本來“開除”就是對黨員的最高處分。

“開除”而要加上“永遠”，已經表明這個全會對自己的“決議”缺乏信心了。胡耀邦說：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的全會上，“主席講了幾句話後問我們：‘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鴉雀無聲，沒有答復。毛主席接着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胡耀邦說：“這兩段話我聽了很感動，有很多想法。”^⑦他雖然沒有講出自己都有甚麼想法，但是這兩個例子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連被奉為偶像的毛澤東本人都承認自己錯了，還有甚麼框框不能打破呢？

胡耀邦在講話中對兩年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給以充分的肯定，並且贊揚了推動這場運動的理論工作者。他說：這兩年“湧現了一大批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善于思考問題，敢于發表創見的闖將。應當看到，這兩年的思想理論戰綫並不平靜，有過那麼幾次風浪。這些同志在鬥爭中衝鋒在前，不愧為思想理論戰綫的前衛戰士。他們敢于實事求是，破除迷信，頂住種種非難和指責，不怕飛來的帽子和棍子。他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說敢幹敢闖。這樣無所畏懼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他號召大家解放思想，“沖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充分發揚理論民主。”^⑧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由中央領導人出面給理論工作者這樣高的評價，並鼓勵他們勇敢地“沖破一切禁區”，在過去從來不曾有過。因此，他的“引言”極大地鼓舞了與會者的情緒。

會議開始不久，又傳達了鄧小平的話：“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這本是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申明的觀點，現在直接作為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指示，就更加使與會者心情舒暢了。自從建國以來，理論界能夠暢所欲言，領導上也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因此，務虛會在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都有深入的探討和新的突破。

“務虛會”起初對“兩個凡是”進行了集中的批評。這是三十年來第一次，在這樣一場原則是非的辯論中對犯錯誤的人採取和風細雨、與人為善的態度進行批評。所有的批評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真正的和風細雨，既沒有疾言厲色的鬥爭，更沒有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或清洗。而且胡耀邦還特地把“凡是派”的兩位大員吸收到會議的領導小組，參與領導工作。

接着，會議的討論很快就在許多領域展開。涉及的問題很多，最突出的有這樣一些：

評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首先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論。會議不光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且好幾個人都提出，一九五七年起，毛澤東就犯了左傾路綫錯誤。在此以前，直到三中全會為止，一般都認為建國以來的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路綫是正確的。只是一九六六年以後才是錯誤的。“務虛會”第一次提出：“一九五七年以後二十多年來，我們執行了一條錯誤路綫”，“這條路綫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

王若水提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毛澤東思想中有錯誤的東西，這些錯誤的東西不是片言只字，而是他反復強調的思想。不能都推給四人幫或康生。這個發言引起一些維護毛澤東形象的人的很大震動。因為他們雖然可以承認毛澤東有錯誤，但認為這些錯誤只是“片言只字”，“微不足道”的，特別是不能歸入毛澤東思想，因為只有正確的東西，才算是毛澤東思想。

和毛澤東問題相關聯的是個人迷信。當時黨內有人借口“維護旗幟”，反對批判“現代迷信”，而且又大樹特樹對華國鋒的迷信，明顯地要步毛澤東的後塵。針對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務虛會”更尖銳地批判了“現代迷信”，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以外，也直接批評了對華國鋒的個人迷信。

王若水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他詳細地分析了毛澤東怎樣從一九五七年以後背離自己原來的觀點，在錯誤的路上越走越遠，而且大搞個人迷信，“把個人威望看得重于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觸犯他的絕對權威。”正是沿着這條路才走到文化大革命的。

澄清領袖與黨和人民的關係

李洪林專門做了一個《領袖和人民》的長篇發言，針對被“現代迷信”顛倒了的是非，提出：不是人民應該忠于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于人民。不是領袖締造了黨，而是黨產生了領袖。領袖是可以批評的，批評領袖不是“反黨”。他還特別提出：應該永遠廢止領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只有封建皇帝才要預先立太子。而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裏，領袖本人都是由黨和國家的權力機關決定的，因此他本人無權指定“接班人”。

廢止終身制問題

嚴家其專門論述了廢止領袖終身制的問題。他提出：對黨和政府首腦的任期必須加以限制。他說：“如果只是政府首腦有一定任期，而黨的主席在事實上仍是終身任職的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共和政體就不可能牢固地建立起來。在這方面，有很多歷史教訓。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從強調‘集體領導’開始，以破壞集體領導、大搞個人專權告終。如果黨的主席事實上仍是終身制，總有一天，還會產生新的林彪、新的四人幫，他們還會煽起新的‘造神運動’……到時候，就很難阻止以新形式出現的‘現代迷信’的瘟疫的流行了。”

批判文化大革命和毛的理論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共原來想不急于評論。但“務虛會”沒有

回避這個問題。大家在發言中幾乎異口同聲予以譴責和否定。王若水說：“文化大革命是用錯誤的方法對錯誤的對象進行的一場錯誤的革命。”

對於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務虛會”遭到衆口一詞地批判。特別是這個《通知》蠻橫地對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專政”，更激起與會者的憤慨。大家強烈地要求實行“理論民主”，廢止文化專制主義。林英說：“在學術理論工作中，要排除‘長官意志’、‘上級見解’、‘主席觀點’這一類的東西。”在理論問題上，中央領導人的見解“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並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權威性，是可以批評，可以反對的。”

“務虛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進行了認真的討論。這種討論不但對毛澤東和華國鋒的權威具有挑戰性質，而且對於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權威都是一種挑戰，因為一九七七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華國鋒為它專門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目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發表在五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還把這個理論寫入黨的文件，使它在黨內具有法定權威。“務虛會”在討論中，很多人都認為這個理論是林彪和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思想工具，應予拋棄，並進行深入批判。不過也有人認為清除掉四人幫所塞進去的内容之後，“繼續革命”仍可使用。

在“務虛會”上，蘇紹智和馮蘭瑞就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作了一個聯合發言。他們批評了毛澤東把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整個歷史時期籠統地叫作社會主義社會，而且從頭到尾都充滿階級鬥爭。按照毛澤東這種觀點，一是把階級鬥爭無限制地擴大，永遠鬥起來沒有完結，二是在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把將來才能做的事情勉強拿到現在來做。

他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整個歷史時期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包括“過渡時期”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二是發達的社會主義；三是共產主義社會。他們認為，我國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呼喚民主和法制

“務虛會”還深入討論了民主和法制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實行的是封建法西斯專政，同時也批評了毛澤東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觀點，也批評了毛澤東只把民主當作“手段”或作風（所謂“讓人講話”）的觀點。與會者都強調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大家都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就缺乏民主，民主沒有形成制度。人民代表不是真正民選，而是協商產生，實際上就是指定。代表和選民不見面，代表不對選民負責，選民無權監督和撤換代表。所以人民沒有真正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力。即使人民代表大會真正是民選的，也是形同虛設，因為一切權力由黨的會議、幹部會議取而代之。

“務虛會”有一些人特別強調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起制度，民主才有保證。

有人在會上特別強烈地提出“黨委要守法，黨內鬥爭要守法”。他們說“法律大，還是黨委大？當然，法律大！任何一級黨委，包括黨中央、政治局，都應一體遵行。”

如果把視野擴大一些，看看世界，再看看中國，那麼理論工作務虛會對上述那些問題的“突破”，只是在中國大陸的範圍內有它重要的意義。所有這些問題，放在現代民主國家或現代文明社會，其實都是些人所共知的常識或常規。問題是中國大陸多年來已經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人們的思想已經被禁錮到這種程度：除了官方設定的口徑之外，不敢越雷池一步。誰如果敢于在官方口徑之外說出哪怕是一句常識，也要驚世駭俗，使許多人大驚失色。

因此，“務虛會”上所提出的“新觀點”，在理論上實在談不上有甚麼創見，只是在大家沒有公開說出來之前，有人敢于把它說出來而已。胡耀邦之所以把這兩年打破禁區的理論工作者叫作“闖將”，原因正在這裏。與其說他們有水平，不如說他們有勇氣，倒是更合乎實際。

但是不管怎樣，理論工作務虛會在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畢竟寫下了空前的一章。它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最高潮，是建國三十年來思想最活躍的一次理論討論會。

會議期間，會議簡報及時發到各省市，這又進一步促進了全國範圍內的思想解放。

不過可惜的是，高潮也就到此為止。誰也沒有想到，“務虛會”竟成爲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後一幕。

(注一)文化大革命中遼寧省被殺害的思想解放先驅張志新，就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影響下得到昭雪的。刊載李洪林《領袖和人民》發言的務虛會簡報傳到遼寧，主張給張志新平反的人拿這一期簡報作根據：“張志新的言論比李洪林的差多了。如果張志新有罪，李洪林就更加有罪；如果李洪林的發言是正確的，張志新就應該平反。”這樣，粉碎四人幫以後拖了好幾年的這樁冤案，終于一九七九年春平反了。

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歷史轉折時期的矛盾和問題

歷史的轉折不能像汽車在馬路上轉彎一樣，到一個路口，把方向盤一轉，車子就駛入新的道路了。歷史是由千千萬萬的人們用有意識的行動構成的。恩格斯把它比喻成許多“分力”構成的“合力”，是很確切的。中國人民久已苦于毛澤東那條“普遍貧窮”“永

遠鬥爭”的左傾路線。中共三中全會正好順應了這種民意，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合力”，也就是“應天順人”，及時做出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向現代化的決定。中共是中國的執政黨，有效地控制着中國大陸，決定着中國歷史的走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中全會成為當代中國的歷史轉折點。但是要使將近十億人口的大國在實際上轉上新的軌道，不能不經歷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裏，各種社會力量，各種觀點和傾向，都會有所表現。矛盾和衝突，阻力和困難，都是難以避免的。

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國，就處在這樣一個轉折時期。

可以說，當時擺在案頭亟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首先是歷年被趕到農村的知識青年要求回家。至於文化大革命中各派文鬥武鬥以及其他遺留問題，就不可勝數了。所有這些矛盾都威脅着社會的穩定。事實上各地已經不斷發生事件，上訪，請願，游行，衝擊黨政機關，甚至卧軌的都有。

在“西單牆”上，除了批判四人幫和“兩個凡是”的大字報以外，也有一些別的。比如，一九七九年元旦，署名“一個中國青年工人”給美國總統卡特寫了一紙公開信，要求他幫助自己去美國看看。一月六日，任曉町等七人貼出《中國人權宣言》，宣布成立“中國人權同盟”，並要求世界各國人權組織及公眾給予支持。

魏京生向鄧小平開戰

最尖端的大字報是三月二十五日魏京生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個命題從理論上當然無可挑剔，但在政治上，批判的矛頭是直接對準鄧小平的。這張大字報果然引起很多人注意，產生了一種轟動效應。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民主生活正常的國度，本不足為奇，一個公民批評政府領導人是很普通的事情。問題是中國經過多年專制之後，民主剛剛前來敲門。三中全會只是要求

加強民主，而怎樣建立民主機制，根本還沒有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正在鄧小平領導下為擺脫毛澤東的路綫而奮鬥。以他為首呼喚改革的中共領導人，剛剛在和“兩個凡是”的較量中贏得一個回合，在這個時候，不是支持他反左，而是反過來批判他，這實際上是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注一）

據“西單牆”領袖人物之一劉青說，當時“民主牆有激烈派，溫和派，保守派，魏京生是激烈派的代表”。魏曾提議對鄧小平開戰，譴責鄧要走獨裁之路，劉青和“西單牆”多數人反對魏的提議，但魏堅持自己的意見。（見劉青為《魏京生獄中書信集》所寫“前言”。）這或許能說明魏的大字報的背景。

所有這些，大體上都是三中全會到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發生的。而且就在“務虛會”期間，上海和重慶等地都向中央告急，由於示威的群眾的衝擊，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都受到妨礙了。

反對三中全會的力量蓄勢待發

本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之後，在幹部中就有抵觸情緒，有人說“三中全會右了”，有的地委負責人公然反對三中全會，甚至說這是“逆風千里”。等到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以後，一方面極大地鼓舞了各地的思想解放，一方面也引起一些幹部的嚴重不滿，說“這些秀才們把思想搞亂了”。一時從各地到北京都紛紛流傳着這類順口溜：

“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思想混亂。”

“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社會秩序混亂。”

“落實政策過了頭，引起階級關係混亂。”

“重點轉移過了頭，丟了綱和綫。”

落實政策指平反冤案和給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子。綱和綫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天天講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綫”。那些以批鬥別人為職業的人當然十分珍惜這個綱

和錢，因為那是他們的生命錢。理論工作務虛會在他們的眼裏自然更加不能容忍。所以這個會沒有開完，指責的聲音就出來了。

“務虛會”第一階段從一月十八日開到二月十六日。春節期間休會。第二階段是各省市和軍隊都派人參加，從三月廿八日開到四月三日結束。

第二階段實際上沒有討論甚麼理論問題，而是來聽鄧小平的報告，然後稍微議論一下就散會了。

從放到收的轉折

中國的政治氣候總是有“放”有“收”。如果說“務虛會”第一階段是“放”，那麼第二階段就是“收”了。

會議一月十八日開幕時，曾經宣布：閉幕時黨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要講話。但是到閉幕時，華國鋒不講話了，只是鄧小平講話。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領導方面對此沒有任何解釋。

只有三種可能：一是華國鋒在此期間已經失勢；二是他正好生病或有更重要的公務而外出；三是表示他對會議不滿，故意予以冷落。但華國鋒此時並未失勢，也沒有生病，所以他不講話顯然是第三種情況。這樣一來，就把鄧小平一個人晾在臺上了。那沒有念出來的潛臺詞是：“你不是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區嗎？看！都弄成甚麼樣子了？”這種潛臺詞未必是華國鋒的，但它肯定是“凡是派”和深受左傾思想薰陶的黨政軍幹部心裏想的。

只有這種政治背景能夠說明鄧小平為甚麼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閉幕時作了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

- 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 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 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 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正像鄧小平自己說的，這四項原則並不是新東西，它都是共產黨早就堅持的原則。但是現在專門在他所指示的“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來講，那意義是十分明顯的：第一，回答黨內的指摘。這種指摘不光來自“凡是派”，而且來自相當一部分老幹部，特別是身處第一綫的黨政負責人。第二，在沖擊“兩個凡是”的時候，需要闖將；打敗“兩個凡是”之後，就需要控制局面了。

鄧小平的政治態度是中共內部力量對比的集中表現

鄧小平自從一九七七年重新工作以後，已經成為眾望所歸。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他已是事實上的中共中央核心人物。他的膽略和領導才能，特別是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華國鋒遲遲不肯解放他的真正原因。鄧小平既然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便不能不考慮黨內各方面的觀點和願望。毛澤東掌權的幾十年間，已經按照自己的需要造就一大批領導骨幹。儘管這些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都被打倒，但他們只是暫時離開當權的位置，思想方法並沒有改變。傳統的左的傾向在一些黨員和幹部身上深深地扎下根子，不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就能改變過來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大批老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雖然痛恨林彪和四人幫，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沒有好感，但是對於建國後的十七年，卻十分留戀。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一些人對三中全會已經有抵觸情緒，更不要說“務虛會”的“離經叛道”了。應該說，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原則”首先是在回答這部分人的責難，也就是表白自己沒有離開黨的原則。

鄧小平已經注意到把自己的“四項原則”和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注二)以及四人幫那種極左的原則劃清界限。他說：

“我們批判了‘四人幫’那種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

“我們粉碎了‘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恢復和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

“我們恢復了遭到破壞的黨的三大作風(注三)……從而大大提高了黨的威信，加強了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

“我們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幫’所制造的精神枷鎖，堅持領袖是人不是神；堅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⑨

“四項原則”重在反右

不過鄧小平在整個講話中着重批判的是“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

他批判了“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他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他談到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不過沒有批判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這是很少見的。而且他還講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他談到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必要時，只說這種鬥爭是“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

他特別着重批判了“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的傾向，並且告誡人們，不能像四人幫一樣“踢開黨委鬧民主”。

他還批評了“有些同志說，我們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他說，錯誤的東西“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⑩

鄧小平的講話是他個人授意，經胡喬木領導的起草小組寫出，並由他本人定稿的。據現有材料，這個講話沒有經中共中央研究或通過，只是鄧小平個人向理論工作務虛會所作的講話。

打倒“兩個凡是”，樹立“四個凡是”

但是這個講話在中國政治生活裏的地位和作用，至少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相當，甚至比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和決議都重要。

“四項原則”從思想方法上說，和“兩個凡是”一樣，都是確立幾個先驗的原則，既不受實踐檢驗，也不容許絲毫懷疑，因此實際上是“四個凡是”。這是從三中全會立場的一次大倒退。

他的講話是三月三十日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的。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領導幹部都出席了。這種規格顯然不止是“務虛會”的事情，而是事關全黨全國的重要報告。此時，文化大革命雖然結束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時形成的“政治敏感”並沒有同時結束。這個講話剛剛發表，人們立刻聞風而動。許多省市來開會的代表立刻把消息傳回本地。有的省連夜召開電話會議向下傳達。不管鄧小平在報告裏怎樣強調要在“批左”的同時，注意從右面反對四項原則的現象，這些“聞風而動”的官員們都認為鄧的講話是“反右”的動員令，是在“糾正三中全會的右傾”。于是一場相當大的“反右”之風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來了。

其實糾左的三中全會剛剛開過，中共中央怎么能忽然又換了一個“反右”的方針呢？況且中共也沒有正式開過中央全會或政治局的會議，也根本不會制定一個“反右”的新方針。但是“四項原則”和“三中全會方針”是互相矛盾的兩種傾向，已經成為無法掩飾的客觀現實了。

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閉幕時有個簡短的講話。他意味深長地提到“現在有各種風”，果然應驗了。

當代中國迄今為止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隨着理論工作務虛會的閉幕，也就到達終點了。

第八章 思想解放運動

(注一)魏京生爲自己的大字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將他逮捕。同年十月十六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是：胡耀邦反對逮捕魏京生。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時，胡耀邦在小組會很激動地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着中央搞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爲我那樣做是從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對於前兩個月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能抓來關。大凡敢于提出這樣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到現在不寫檢討，還要絕食抗議。你們別以爲他怕死，相反，他想快點死，他一死就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①

魏京生一九七九年十月被判刑十五年以後，有一次胡耀邦找李洪林和阮銘到他家去研究他的一個講話稿。阮和李向他談起審判魏京生的事情，認爲不應該這樣做。他完全有同感。阮和李問他爲甚麼沒有制止這種做法。他表示無可奈何，並告訴阮和李，這次重判，是彭真說服了鄧小平的結果，已經無法改變了。

(注二)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四項“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階級鬥爭”，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注三)中共的三大作風指：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

※ ※ ※

第八章 引文出處

- ①《走出現代迷信》第 18 頁
- ②同上，第 53 頁
- ③《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第 109 頁
- ④同上，第 134 頁
- ⑤《鄧小平帝國》第 50, 52 頁
- ⑥《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 131-136 頁
- ⑦《國史通鑿》第 4 卷，第 636 頁
- ⑧同上，第 4 卷，第 636-638 頁
- ⑨《共和國歷程》中卷，第 1704-1705 頁
- ⑩同上，第 1705-1707 頁
- ⑪《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第 350 頁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白熱化。十月，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並得到主管中央警衛團的汪東興的支持，實行宮廷政變，一舉擒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立刻奪取了電台、通訊社和報紙，迅速控制了全國局勢。此舉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人們形容它是“第二次解放”。



左上圖為毛逝世後的華國鋒和葉劍英。右下圖為人們把痛恨已久的四人幫做成玩偶掛在北京街頭，以洩胸中之憤。



一九七八年，北京人民自發地在西單附近的西長安街北側一片圍牆上，張貼大字報和小字報，發表政見，形成一個民間輿論陣地，因而被稱為“民主牆”或“西單牆”。它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和葉劍英曾經堅決支持它，並批評了害怕“民主牆”的保守派官僚。

但是隨着民主呼聲的高漲，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畢竟不能容許不同政見的存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當局正式禁止在此貼大小字報，“民主牆”遂告消失。



爲了打破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從而掀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唯一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路線轉變掃除了思想障礙。

胡耀邦又出色地領導了理論工作務虛會，使思想解放運動達到高潮。

圖爲三中全會上的胡耀邦。



鄧小平曾鼓勵理論務虛會，“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但他在這個會的結束時作了一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實際上是用“四個凡是”來代替“兩個凡是”，也就是宣佈思想解放運動的終結。

圖為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1979 - 1980)

隨着中共的路綫轉換，中國從一九七九年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時代那種連綿不斷的大規模思想鬥爭運動，已經遭到普遍唾棄。然而它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改取新的形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代替大規模運動的是曲折複雜的幕後鬥爭。其激烈程度並不亞于社會上的鬥爭，只不過局外人不大知道罷了。

一 分道揚鑣

理論界的分裂

理論工作務虛會剛剛開過，就傳出一種“權威”的指責：“他們和黨分道揚鑣了。”

“他們”是指胡耀邦所表揚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勇于打破禁區那些理論家。這些人全是共產黨員。對於黨員來說，“和黨分道揚鑣”是很嚴重的指責。不過，如果不去深究誰代表“黨”，那麼“分道揚鑣”是符合實際的。

當初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除了華國鋒的親兵之外，理論界是一致的。三中全會開過之後，華國鋒已經承認錯誤，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人。這時，統一的理論隊伍就分化了。這種分化，當然可以從理論界本身一些人的品格和作風上得到說明，比如權慾薰心或見風轉舵之類，但更深刻的原因卻在共產黨本身。即使這支理論隊伍一直保持一致，也會另外冒出一支“理論隊伍”和他們對立的，因為客觀上存在着這種需要。

先從中共三中全會說起。全會決定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

路。但是現代化意味着甚麼，這條路怎樣走法，中共黨內從來就不曾一致過。

三中全會公報是這樣寫的：“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①

這就是說，不光是發展生產力，而是要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改革。鄧小平曾經清醒地看到，改革是一場革命，必然有阻力。不過他沒有說出這阻力來自何處，其實恰來自共產黨內。

一黨專政造就特權階層

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名叫“人民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由共產黨一個黨獨自掌握。雖然政權機構中也有少量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但是這些黨派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因為它們並不是具有自己的政綱的獨立政黨，而只是在中共領導下團結某一方面人士的“統戰機構”或“聯繫紐帶”。而且，由中共獨自掌握的這個政權，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權。因為實際權力都掌握在黨的手中，而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不過是執行黨的指示的辦事機關而已。

由中國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這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格局。在戰爭年代，黨領導一切是取得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到了取得全國政權之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種戰爭體制本應轉變為和平時期的民主體制。然而中共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戰爭體制制定型化了，這就造成一黨專政的固定格局。

幾十年的一黨專政，造就了一大批壟斷一切權力的當權派。毛澤東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說錯了。共產

黨內掌權的官員是忠心耿耿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不光保證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而且壟斷經濟權力，並且控制着文化生活，能使社會上“輿論一律”，不會有異議出現，當然更不可能有輿論監督。很明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當一名執政黨的當權派，是很愜意的。他為甚麼要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呢？恰恰相反，如果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意味着共產黨將失去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壟斷。因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普選制，是三權分立，是思想多元，是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真走這條道路將使中共和其他政黨一樣，不但要受輿論監督，而且能否執政要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而且資本主義經濟既不受政府官員支配，當然更不會接受哪個黨的領導。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道路”如果真的成為現實，也就意味着掌權的共產黨員的特權將要喪失。因此，共產黨內的當權派絕對是熱心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不單單出于意識形態上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現實的物質利益所決定。

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格局

然而中共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改革，恰恰觸犯了黨內當權派的既得利益：

政治民主化將使他們不能再獨斷專行。經濟體制改革將使他們失去對“公有制”經濟的控制權。當然，思想解放對於他們習慣的“輿論一律”來說，更是不能容忍的異端。

在三中全會之前，中共黨內大多數舊有當權派，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而處於“在野派”的位置。“兩個凡是”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所以他們擁護思想解放。但是“兩個凡是”失敗之後，情況就變化了。當他們重新當權之後，鞏固手中的權力，維持傳統體制，便成為他們利益攸關的頭等大事了。這也就是為甚麼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之後，立即受到他們的擁護，並且理解為“糾正三中全會的右傾”的深刻背景。

和這種背景相適應，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後，原來聚集在“思想解放”旗幟下的理論隊伍發生分化，也就不奇怪了。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就不是一支獨立的力量。“士”的傳統出路是做官，也就是“仕”，要做官就必須服服貼貼給當權者効力。而當權者也確實需要這種人才。這也是一種利益上的結合，不足為怪的。

事實上被指責為“和黨分道揚鑣”的，正是堅持三中全會方針沿着改革的路綫繼續往前走的一批人。而以“黨”自居的，恰恰是害怕改革危及自己既得利益的當權派的代言人。

不幸的是，以“黨”自居的這些人，確實被當權者看成自己人。三中全會以後，他們逐漸控制了實權，並且一步步地排斥和打擊思想解放運動中走在前列、三中全會之後也不想停息的那些人，直到最後把他們全部淘汰出局。

這是觀察新時期思想鬥爭運動的一條基本綫索。

新時期思想鬥爭的特點

和這條綫索相適應，新時期的思想鬥爭常常是關起門來在黨內進行。這種鬥爭不但相當激烈，而且十分曲折複雜。那種縱橫捭闔，明爭暗鬥，局外人是難以體會的。雖然這種鬥爭有時在社會上也有表現，但是除了幾次“反自由化”高潮之外，一般都震動較小。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每次思想鬥爭的發動者都是他自己。新時期則不同了。最高領導人也親自發動過鬥爭，但為數不多。比較多的鬥爭，都是以“黨”自居的二三流“權威”人物發動的。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發動思想鬥爭的人物未嘗不想把運動搞得驚天動地，使全中國都跟着他的指揮棒團團轉，對“異端”思想群起而攻之。但是有三個條件限制了他們的意願：

一、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已經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能夠任意折騰中國的權威人物了。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二、中國人民已經不再是可以任意愚弄的老百姓。至少他們都已經厭倦于永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了。

三、“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不單單是執政黨的一句口號。它已經成為整個中國民族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否站得住腳的頭等大事。各界人等差不多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上面。在這種情況下，誰要是不這樣做，便無法過日子。熱心于折騰的人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便會沒有飯吃，如果是當政者，就會垮臺。因此，只要頭腦沒有發昏，任何當政者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這個風險的。

上面三條，就是新時期思想領域雖然有時好像“黑雲壓城”，但是終究沒有在社會上掀起太大的風雨的真正原因。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意識形態方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此冰消瓦解。不是的。只要政治制度不改革，新時期的思想鬥爭仍將繼續。而且，正因為難以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去對付思想異己，於是採用組織手段直到司法手段來懲治對手，倒是逐漸多起來，甚至在某個時候成為主要手段。

二 堅持甚麼樣的“四項原則”

“四項原則”成為反改革的法寶

按照權威人物之一鄧力群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分道揚鑣之後，曾經鬥爭了幾個“回合”。其中一個回合是“堅持和反對四項原則的鬥爭”。當然，以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堅持四項原則”的。

如果不論是非曲直，這種“回合說”是合乎實際的。自從中共制定三中全會路綫以後，特別是鄧小平宣布“四項原則”之後，鬥爭就沒有停過。雙方對三中全會路綫和“四項基本原則”各有不同的態度和解釋。理論上的鬥爭和現實的鬥爭完全是分不開的。胡喬

木和鄧力群所理解的“四項原則”，確實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也就是毛澤東那條“革命路綫”。雖然在毛澤東的“創造性地發展”下，這些原則多少有點走樣，但他只是沿着傳統模式往左邊走得更遠而已。在毛澤東路綫下薰陶了幾十年的各級中共領導骨幹的心目中，“四項原則”當然就是他們多年來走慣了的那條老路。按照這條老路，“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堅持“一大二公”的傳統模式，就是堅持老一套的計劃經濟。甚麼“包產到戶”，那是“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嚴加取締。所以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剛剛講完，一些省的掌權者立刻在農村“堅持”起他們那種“社會主義”來了。他們不但嚴厲制止包產到戶，甚至連農民的自留地都砍掉了。

這些當權者心目中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更沒有二話可說。對於“西單牆”，以及民間組織和刊物，他們早就恨之入骨。現在既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放手取締和鎮壓好了。果然，許多大城市和省會的所謂“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都被取締，許多青年被捕入獄。北京的魏京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而已。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地涌現了一大批思想活躍追求民主的優秀青年。在這個“第一回合”中，基本上都被打下去了。

至於“堅持黨的領導”，那更是當權者愛不釋手的法寶，因為他心目中的“黨的領導”就是“我說了算”。有了這一條，一切就都好辦了。

按照這種理解，三中全會剛剛決定要實行的改革，還沒有開始就要被斷送，一切都回到毛澤東時代，那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事實上這股風已經刮起來，農村尤其首當其衝。

用三中全會精神去解釋“四項原則”

顯然，必須對“四項原則”作出新的解釋，使它不致被保守勢力用來作為反對三中全會的工具，不致變成他們打人的四根棍子。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基于這種考慮，《人民日報》在請示胡耀邦之後，從一九七九年五月起，連續發表了李洪林三篇系列文章^②：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社會主義》(五月九日)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六月二十二日)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黨的領導》(十月五日)

這些文章用三中全會精神去解釋四項原則，受到擁護三中全會的人們熱烈歡迎。由于《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發表這些文章就等于給群眾吃了一顆定心丸，使大家知道三中全會精神沒有變，中國不會走回頭路了。

隨着這些文章的發表，報社收到大量讀者來信。他們紛紛反映當地的當權派怎樣利用“四項原則”去壓制擁護三中全會的人，特別是在農村禁止包產到戶。有的來信還反映，在真理標準討論中贊成實踐標準的人們，不久前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如今《人民日報》發了系列文章，使受壓的人又抬起頭來，敢于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觀點了。

但是這幾篇文章卻引起“權威”們的不快，甚至文章的標題就使他們無名火起。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會議上說：“社會上現在有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你一說‘黨的領導’，他就說‘甚麼樣的黨的領導？’”他不指名地批評李洪林說：“一個黨員，一個有很長黨齡的幹部，對於要堅持黨的領導發生懷疑，這就成為嚴重的問題了。”

李洪林這三篇系列文章，從一九七九年發表之後，一直成為胡喬木和鄧力群等“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自由化”的靶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都沒有停止。“六·四”後在《宣傳手冊》(一九八九年第十五期)上有一篇署名華夏的文章《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四次泛濫及其教訓》，就把李洪林的系列文章作為“自由化”思潮第一次泛濫的代表。華夏說，李洪林的系列文章是“針對”鄧小平的講話，“與社會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思潮相呼應，與四項基本

原則唱對臺戲，蓄意制造思想混亂。”

從批判者斷章取義摘引最多的言論看來，這幾篇系列文章中
最為權威們惱火的是下列幾個觀點：

“不要一聽說有人懷疑社會主義，趕緊就去批判。因為單是懷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壞事。要看懷疑甚麼東西。對科學表示懷疑，當然不對。對迷信表示懷疑，卻是一種進步。”^③

“必須使人民真正成爲國家的主人。”“民主從來不是誰恩賜的。”^④

“所謂堅持黨的領導，是不是說，共產黨具有‘絕對權威’，不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都是‘當然領導’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歷史運動中能站在前面，並能帶領群眾前進的政黨，就能擔當領導；否則，就不能擔當領導。誰能領導，誰不能領導，最後的選擇者是人民。”^⑤

其實這三篇文章連同它遭到指責的上述觀點，都是地道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絲毫沒有“離經叛道”之處。所以“權威”們雖然不滿，也無法公開批判。他們只好在“內部”做手腳，一是在各種會議上“缺席裁判”，一是在背地裏斷章取義加以歪曲印成“機密”簡報，既向中共中央告黑狀，又向全國散布誹謗。只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李洪林已經被逮捕起來，再無還手之力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才來到前臺。反正這時也用不着講甚麼道理，隨便怎麼信口開河都可以理直氣壯。比如《宣傳手冊》上那篇批判李洪林的文章，竟把一九七八年出現的“西單牆”，一九七九年三月的魏京生的大字報，都算在李洪林的帳上，說是受了李的系列文章的影響。其實這三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才開始發表的。

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討

除了圍繞《人民日報》系列文章的鬥爭之外，這個“第一回合”還包括中國處于甚麼樣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三中全會既然要使中國現代化，便要弄清中國目前究竟處于甚麼發展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過去毛澤東已經把這個問題弄得一塌糊塗：原來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得政權後卻不去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要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匆匆忙忙消滅了私有制之後，又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碰了個大釘子之後，又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當他撒手人寰的時候，中國已經被折騰得頰臨絕境了。現在既然要進行現代化建設，總得研究一下中國處在甚麼樣的歷史階段。

一九七九年，理論界就有人陸續提出，中國還沒有進入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最早的是蘇紹智和馮蘭瑞，他們提出，中國並未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只是“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哲學研究所一個青年陶德榮在內部刊物《國內哲學動態》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發表一篇《關於社會主義的一點淺見》，也抱有同樣觀點。

但是胡喬木卻下令禁止這種討論，因為按照他的觀點，對社會主義進行討論，就要動搖社會主義。于是他命人寫文章進行批評，並且規定，只准發表批評文章，不准發表反批評的文章。

其實這些探討社會主義的文章，並非懷疑“四項原則”，更沒有“動搖社會主義”之意。他們只是希望不要重犯毛澤東時代脫離中國社會實際，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充分認識中國國情而已。實事上幾年之後，中共中央已經正式確定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當時沒有這種禁令，而是展開切實的自由討論，中共中央完全能夠早幾年作出這個結論。

胡耀邦對改革派的支持

在這個“回合”的鬥爭中，胡耀邦是堅定地站在遭到胡喬木打擊的一方的。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洪林系列文章第二

篇的當天，他曾把李找去，談到當時左傾頑固勢力利用“四項原則”攻擊三中全會。所以他非常欣賞用三中全會精神來解釋“四項原則”，並要李繼續寫下去，“一定要在四項原則上和他們劃清界限。”^⑥

七月二十日，當胡耀邦得知胡喬木批評蘇紹智等人的觀點，並禁止討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時，在一份材料上批道：

“探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當然應當允許。我不相信喬木同志竟然不許。不能說我們黨對當前社會現狀沒有正確認識吧！說探討這些問題十分必要，我也看不出。十分必要的事是同心同德，聚精會神研究四化，大幹四化！”

這份材料還反映：因為胡喬木不准刊登反批評的文章，所以社會科學院有人說：“這樣做法還談得上甚麼雙百方針，這又是把理論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搞。”反映強烈者甚至說：“不準討論還有甚麼言論自由，簡直是封建法西斯！”有的人則惴惴不安，說“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

胡耀邦在這裏批示道：“我不相信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放這個空氣不好吧。”善良的胡耀邦和很多天真的人們一樣，以為知識分子挨整的日子終於過去了。他怎能想到，不但有一天知識分子還要倒霉，而且他這個總書記都會因為同情和保護知識分子而下臺呢？

三 郭羅基事件

最有爭議的理論家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郭羅基。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曾經起過重大作用。特別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之後，思想解放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和黨分道揚鑣”的帽子已經扣過來的時候，郭羅基連續發表了幾篇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提出的都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並且以精闢的見解贏得衆多讀者，同時也激怒了以“黨”自居的“權威”。因此，他成了這個時期最有爭議的理論家。

文化大革命中以“惡毒攻擊”罪慘遭殺害的張志新，一九七九年春得到昭雪。郭羅基爲此寫了一篇《誰之罪》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

張志新被害之前曾經在監獄裏受盡凌辱和折磨，她不但作爲政治犯備受虐待，而且作爲一個女性遭到侮辱。因此她當時憤怒地指出：“行凶者，幫凶助威侮辱者，你們可以逃之夭夭嗎？不，我要向黨向人民控告你們，要聲討你們。你們要不認錯，將會受到歷史的懲罰。”

郭羅基在《誰之罪》中問道：那些行凶者和幫凶者是否認錯了？“是不是應該給以懲罰呢？”

使“權威”和他所代表的當權者特別惱火的是《誰之罪》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張志新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但是“在新中國，爲真理而鬥爭，爲甚麼還要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難道這是合理的現實嗎？”所以郭羅基的結論是：“要改造那追求真理要以流血犧牲爲代價的環境，這才觸及問題的本質。”^⑦

在黨報上首次公開呼吁言論自由

郭羅基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政治問題爲甚麼就不能自由討論？》原來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內部刊物《未定稿》（第43期）上，後來修改一下，改名《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篇公開呼喚言論自由、批判以言治罪的文章。

他寫道：“政治上的發言權是言論自由的靈魂，如果在政治問題上剝奪了言論自由，在其他問題上的言論自由就沒有多大意義，而且也往往得不到保證。”^⑧

在當代中國，甚麼問題只要牽涉到政治問題，或被宣布為政治問題，便成為禁區。冒犯禁區者便要扣上政治帽子，便會由“人民”變成被專政的“敵人”。因此，知識界常常呼吁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不要混淆二者界限，不要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如此等等。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是掌權者的領地，是老百姓不能涉足的禁區。這不但是當權者的意願，而且也是老百姓自願遵守的戒律。只是老百姓都懇求當權者不要把政治的領地任意擴大罷了。

郭羅基是公然打破這個禁區的第一人。他說：“政治問題為甚麼就不能討論？”“現在要冲破這個禁區。是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獨裁政治、專制政治、法西斯政治。”^④

他還嘲笑了“發揚民主就是讓人講話”的流行說法。這是毛澤東所提倡並為中共內部較為開明的領導人所奉行的一則銘言。

他說：“讓人講話不過是一種開明專制，並沒有改變專制的實質。”“人民是社會的主人，國家工作人員是社會的公僕……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只是公僕讓主人講話，這不是笑話嗎？”^⑤

促使郭羅基寫出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大概就是胡喬木下令禁止討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當時理論界對這則禁令極為不滿，並引起胡耀邦的關注。前述胡耀邦的批示，就是給這種討論開的綠燈，同時也是對胡喬木的含蓄批評。郭羅基的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的。也正是在同一個背景下，《人民日報》把這篇文章發表了。

顯然，這樣一篇文章決不可能平安無事。它不但直接刺痛了胡喬木和所有習慣于“輿論一律”的掌權者，而且是向三十年來的壓制言論自由的制度公開挑戰。

無巧不成書。此文的發表(十一月十四日)恰恰在審判魏京生(十月十六日)之後。而郭羅基的文章中正好有一處說到不能“以言治罪”。

他寫道：“反革命分子之所以成爲反革命分子，是根據他的反革命行爲判定的。如果發表反革命的意見，也僅僅是一種意見，不等於反革命行爲，只能說是思想上的論敵。”“有人發表反革命言論怎麼辦？好辦，你發表革命言論同他辯論，對他批判就是了。對反革命言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法律懲罰的對象是行爲，不是思想，懲罰思想本身就是違法的行爲。”^①

人們都知道，魏京生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貼出批評鄧小平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三月二十九日被捕的。十月十六日法庭以兩項罪名判他十五年監禁，實際上主要是“反革命宣傳鼓動”。而這個“反革命宣傳鼓動”到底是“言論”還是“行動”，一直是有爭議的。從當代中國三十年的思想運動史來看，大體上都是以言治罪的。被治罪者都認爲自己只是發表言論。治罪者的邏輯則是：發表言論本身就是行動，因爲這言論是在施加影響於他人。在這種邏輯下，倒霉的只能是知識分子，因爲思想必須借語言來表達，一表達就可以被說成“行動”，因爲表達出來就是說給人聽或寫給人看的。當年胡風寫給中共中央的意見書和寫給友人的信件都可據以定罪，如今魏京生的大字報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郭羅基事件背後的胡喬木和胡耀邦

郭羅基的文章本是審判魏京生之前寫的。不過這無關宏旨，文章的鋒芒所向，確實包括此案在內。所以這篇文章一發表，就被胡喬木告到鄧小平那裏去了。他告的是郭羅基，實際上連帶着胡耀邦，因爲胡耀邦當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

這一下讓胡耀邦很爲難。他是愛護郭羅基的，他並不認爲郭的文章有多么大的問題，但又不得不讓《人民日報》再發一篇文章，把這個問題說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辮子。

《人民日報》當即約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高銘喧寫一篇《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爲問題》。因爲這件事是胡耀邦交代的，

所以他們十分慎重，下面是報社的報告：

“我們把文章的清樣送耀邦同志審閱。耀邦同志閱後作了指示：‘對於這個問題，要非常慎重，要考慮到各個方面。建議將高文送有關單位征求意见，然後修改發表。’耀邦同志這個指示是李洪林同志口頭傳達的。李洪林同志受耀邦同志委托，也看了這篇文章，提了修改意見。我們根據耀邦同志指示，把高文送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律系征求意见……修改後才發表的。”^②

這篇文章主要說明有些言論可以構成犯罪。“刑法上規定的誹謗罪、誣陷罪、教唆犯罪都是與一定的言論分不開的。”

文章幾經推敲，最後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發表。胡喬木仍不滿意，說是“非常沒有力量”。不過胡耀邦沒有再理會，《人民日報》也沒有再理會。這事好像就過去了，郭羅基好像平安無事了。

其實不然。“反革命言論也有自由”成了刺在郭羅基臉上的“犯罪金印”。“權威”們和黨內某些高層人士，只要想動手整肅“與黨分道揚鑣”的人們，差不多都要挂出這個靶子進行射擊。而郭羅基本人，也被“權威”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拔尖人物。”在最高當局的關懷下，他終於在一九八二年被強行趕出北京，調往南京大學任教，成為理論隊伍“分道揚鑣後”第一個中箭落馬者。（注一）

（注一）郭羅基到南京大學後，在哲學系任教授，一九八九年三月又獲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六四”後因郭反對鎮壓，在黨員重新登記時，被清洗出黨。一九九一年南京大學黨委以“政治不合格”為由，取消郭的教授及研究生導師資格。郭為此向法院起訴南京大學黨委，成為企圖通過法律途徑控告中共黨組織違法行爲的第一人。（詳見郭羅基著《共產黨違法案紀實》）

四 “生產目的”的討論

胡耀邦發動生產目的的討論

一九七九年曾經有一次重振思想解放運動勢頭的機會，可惜在胡喬木的扼殺之下中途夭折了。這次機會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

關於生產目的問題，最初是《人民日報》提出來的。幾十年來，由於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局面，再加上左傾路線和唯意志論，強制推行“先生產，後生活”和“重積累，輕消費”的方針，根本就不把人民的生活放在眼裏，因此反過來又損害了生產。到底是為生產而生產，還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這是兩種不同的出發點。在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之後，這個問題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胡耀邦敏銳地覺察到，這是真理標準討論之後一次難得的良機，可以使已經沉寂下去的思想解放勢頭重新振作起來。因此他果斷地決定發動一場“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他指示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根據《人民日報》理論部提供的材料精心起草一篇文章，以便發動全國進行討論。這個討論將會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重要的是，它一定大大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三中全會雖然決定要改革，但只是從路綫上指明方向。至於怎樣改革，樹立甚麼目標，採取甚麼模式，經過甚麼步驟，還完全沒有提上日程。胡耀邦當時抓住這個“生產目的”問題，確實抓到了關鍵。因為計劃經濟的出發點和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截然對立的兩極。計劃經濟的出發點是長官的腦袋。長官拍拍腦袋定出長期的和年度的計劃指標，這就決定了全國的生產，至於產品對不對路，消費者是否需要，那就不管了。因此，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生產和消費脫節，是它根本無法擺脫的困境。而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

消費者的需要，這只無形的手調節着全社會的生產。“生產目的”的討論如果自由展開並且深入下去，一定會接觸到經濟生活的深層機制，而且最終一定會找到市場經濟這條出路。

在胡耀邦的籌畫下，黨校理論研究室寫出一篇文章，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題目是《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這就揭開了討論的序幕。

全國各界對這個討論的反應十分熱烈，思想界一下子活躍起來了。首都和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參加討論。

可惜這種良好形勢只是曇花一現，一個多月之後，就悄然收場了。當時人們都非常奇怪，不知出了甚麼事情。

反改革勢力的反撲

原來這場討論觸犯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的當權派。因為《人民日報》的文章批評了他們“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說：“按照這個口號，似乎有一段時間可以只抓生產，不抓生活，或者重生產，輕生活。多年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只重視積累、不重視消費……與套用這個口號是有關係的。”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多年計劃經濟的方針。《人民日報》的文章批評這個方針，當然是在主管計劃經濟的太歲頭上動土，于是由石油工業部出面，對《人民日報》進行反駁。

石油工業部的文章刊登在《石油通訊》上，題目是《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副標題是《兼論大慶“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如果是參加討論，批駁對方的觀點，當然是正常現象。可是這篇文章卻超出了討論的範圍。它先把“先生產，後生活”和“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針等同起來，然後就指責說：《人民日報》批評“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是在“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發展生產引到追求個人生活上”，接着就把政治帽子扣過來了。這篇文章用指桑罵槐的口氣說：“現在社會上有極少數

人，利用群眾生活上的某些困難，把矛頭指向中央……嘩眾取寵，製造事端，對此決不能喪失警惕，決不能姑息遷就，決不能讓他們占便宜。排除一切干擾，集中精力抓生產，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文章最後引用鄧小平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對於來自‘左’的和右的，總想用各種形式搞動亂，破壞安定團結局面，違背絕大多數人利益和意願的錯誤傾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團結起來，抵制、譴責和反對這些錯誤傾向。”^⑬

很明顯，生產目的的討論已經被這篇反駁文章說成“干擾生產”甚至是“搞動亂”了。

這場討論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發起的，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它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權威性更是社會公認的。如果說“生產目的”的討論有甚麼“後臺”的話，那麼這“後臺”是很硬的。然而一個石油工業部居然能夠用這種“大批判”的筆法寫出如此強硬的反駁文章，顯然有更硬的後臺給它撐腰。這後臺是誰呢？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維護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力量。幾十年來，它一直控制着中國的經濟生活。“人、財、物”和“產、供、銷”，完全在他們手心裏掌握着。在這種體制下，長官意志不光決定着生產甚麼和生產多少，而且每個居民一月吃幾斤糧食，一年穿幾尺布，都由他們決定。也就是說，我生產甚麼，你就消費甚麼，我生產多少，你就消費多少。現在討論生產目的，就是說要把事情顛倒過來，讓消費者成為上帝，這樣一來，那一整套計劃體制不是泡湯了嗎？所以這場討論得罪的還不單是主管計劃經濟的個別大員，而是和這個體制命運攸關的整個利益集團。

當然，光是石油部這類扣帽子的文章，不可能改變討論的進程。《人民日報》就不為所動，而且主動把石油部的文章印出來送給中央領導人參考，準備繼續討論。

胡喬木搬出華國鋒使討論夭折

但是，發動這場討論的胡耀邦最後把討論停下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反對這場討論。當然，副秘書長硬不過正秘書長，所以胡喬木先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已經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會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的討論。況且他自己在“生產目的”的討論中的處境，和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處境可以說完全一樣，因為他正是舊經濟體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決策人，“要搞十來個大慶”，就是他定的。所以這個討論如果進行下去，等待他的一定是又一次檢討。所以他自然不贊成這場討論。

於是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裏，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的討論。鄧小平當然不會去維護舊的經濟體制，但他不能不考慮舊體制後面的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權衡。華國鋒的意見不能不占很大分量。而且“生產目的”問題畢竟不像解決“兩個凡是”那樣緊迫。所以，大概是出于維護團結，鄧小平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

最後胡喬木來到胡耀邦那裏，把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意見拿了出來。胡耀邦還有甚麼辦法呢？只好在強大的壓力下面妥協了。

《人民日報》得知這個情況之後，專門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要求繼續討論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面談，希望報社照顧大局，照顧團結，也照顧他的困難，把討論停下來。

“生產目的”的討論就這樣中途夭折了。一次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良機，就這樣錯過了。

事情都是事後看得更清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現在摸到了它的規律，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是中國人經過痛苦的經歷之後所找到的真理。在一九七九年，人們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這一點。但是只要思想界活躍起來，不設甚麼禁區，可

以自由討論，總會逐漸接近這個真理的。

這就是說，由于錯過這次機會，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被推遲了十幾年。

五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問題

思想戰綫上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一九八〇年，已經沉靜下去的思想解放運動又有一次重振的機會。這一年六月，鄧小平接受李維漢的建議，提出一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可惜這件事情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李維漢是中共元老（一九二二年的黨員）早年和毛澤東等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一九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共事。他以前擔任黨的重要領導工作多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不在第一綫工作，但勤于思考，很關心中共的建設。

一九八〇年五月，華國鋒在軍委總政治部一個會議上的講話中，忽然重新提出“興無滅資”的口號（即“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本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的極左口號，現在又出現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講話當中，不能不引起舉國關注。黨內外都議論紛紛。理論界有不少人向中央宣傳部提議，不要再使用這個口號。當時胡耀邦已經離開中宣部，專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宣部長改由王任重擔任。王任重把理論界的意見反映給鄧小平，因為華國鋒這個講話是經鄧小平看過的。

這時，李維漢也找到鄧小平，也向他提出“興無滅資”口號不宜再提。鄧小平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但是李維漢找鄧小平談話的主旨是批判封建主義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能如此深刻地揭示封建主義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嚴重影響，並把肅清這種影響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提出來，李維漢是第一個人。

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的意見。

李維漢談封建主義對中共的深厚影響

這兩位老戰友談了兩個多小時。詳細內容只有等以後公布檔案才能知道。現在只能從鄧小平事後向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記錄中看到它的要點。(注一)

鄧小平是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召見胡喬木和鄧力群的。他一共談了三個問題(有關李維漢談話的是第二部分),由他們兩人記錄下來,整理成文件傳達下去。但是後來編印鄧小平文集和黨的文獻時,第二部分不見了。世人看到的,只是同一天談話的第一和第三兩部分。而這兩部分則分別獨立成篇,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

好在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的阮銘手中存有中宣部印發的鄧小平講話第二部分的原文,後來他在《鄧小平帝國》中把它全文披露出來。這是一份珍貴的文獻,不可湮沒:

前幾天李維漢同志來找我,從“興無滅資”談起,談了兩個多小時。我看這個口號有缺點,不完全。……

李維漢同志主要講了一個問題:我們思想戰線上最重要的任務還不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而是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李維漢同志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很長,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很深的傳統,在黨內也有很大的影響。對它的影響不能低估。

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封建剝削制度消滅了。反封建主義的任務並沒有完成。毛、劉、周,都沒有完成。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它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

現在黨內為甚麼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還有到處搞紀念館，主席的，總理的，現在又搞少奇的。特別是家長制，嚴重影響正常的黨內生活。李維漢同志說，他希望現在的黨中央能完成這個任務。

李維漢同志的意見很好，很值得重視。比如家長制，這在我們黨內是有傳統的。陳獨秀後期搞家長制就很厲害。那時候選了八個大秘書，報到的只有我一個。每次中央開會我都參加。開起會來，不管別人怎麼講，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黨內一些同志說，他是“老頭子”。“老頭子”說的話才算數，你照辦就是了。

瞿秋白同志管了一段事，態度比較溫和，不過時間很短。

接着是向宗發，實際上是李立三同志管事，家長制也是很厲害的。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着的時候非解決不可。

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

李維漢同志建議我在十二大講話專講一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我看，這個意思首先要體現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④

政治局常委接受李維漢建議

鄧小平談話之後十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據胡耀邦傳達，常委考慮從政治制度和思想輿論兩個方面來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在制度方面，他說：“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

在思想輿論方面，胡耀邦說：“我們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的

洗禮。資產階級民主同封建專制來比是很大很大的進步。我們革命後無形中發展了封建的東西……我們現在的宣傳再不能搞封建這一套，再搞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他認為，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得搞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⑭

看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已經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了：這真是極其難得的好機會。知識界當然更是雀躍不已，理論界已經磨拳擦掌，準備把六十一年前“五四”運動打出的反封建大旗重新舉起。大家都認為，從思想上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掃清道路的時候來到了。

胡喬木一封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化為烏有

誰知中國的政治真是“天有不測風雲”，最高領導核心已經決定的事情都可以改變。

六月二十五日胡喬木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耀邦同志：對於批判黨內、政府內和社會上封建主義思想殘餘問題，需要有慎重準備，究竟反對甚麼，糾正甚麼，如何改革，需要明確規定，以免一轟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組織上的混亂。”他還提出：“現在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放鬆反對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和各種惡性腐化現象，也不妥當。”最後，他建議“指定幾個人先研究一下提出方案，經書記處討論後再定……”^⑮

中央宣傳部印發了胡喬木的信。這雖然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並不是中央文件，但卻把中央已經決定的事情束之高閣了。因為他規定的這一套“要慎重”，要“指定幾個人先研究”，要“提出方案”，要“經書記處討論”，等等戒律，已經把人們的手腳都捆住了，整個宣傳系統，整個思想文化界，包括各個新聞出版單位，在中央拿出“方案”之前，誰也無法動作了。那麼胡喬木寫完這封信之後是不是去“指定幾個人”或“提出”甚麼“方案”呢？根本就沒有。他從來就沒有“指定”過“幾個人”，當然更不會“研究”出甚麼“方案”。

書記處自然不可能去“討論”那並不存在的“方案”。幾個月過去了，政治局常委關於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決定，就這樣被束之高閣。“生產目的”討論夭折之後又一次解放思想的機會，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事實上，像肅清封建主義影響這件事，本是人民從舊思想束縛下的自我解放。這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對這種事情指點一下，給個方向，也就夠了。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根據李維漢的建議作了這件事。全國各界，特別是思想界，行動起來就是了。然而胡喬木在中央決定之外又給思想解放設下戒律，要群眾老老實實等候領導上指定的“幾個人”定出“方案”，這本身就是對“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極大諷刺。

當然，胡喬木這封信之所以能夠在實際上取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而沒有受到任何追究，也正好反映出中共內部封建主義積習之深，特別是權力壟斷對這個黨的腐蝕已經達到甚麼程度了。胡喬木的信和他把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工作擱置起來的手法，正是壟斷權力的當權派求之不得的。所以那封短短的信件竟能發生如此大的效力，這在中共黨史上都是少有的。

（注一）鄧小平有些言論，都是向胡喬木和鄧力群兩個人談的，有時是向其中一個人談的。這些談話由他們記錄下來，整理之後，經鄧小平過目，然後再向下面傳達。

這種格局的形成，有歷史淵源。胡喬木擅于文筆，是中共黨內公認的大秀才，抗日戰爭時期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以後也一直不離中央左右。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二度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專門讓胡喬木組建一個國務院研究室，集中一批精幹力量，成為鄧小平的得力理論班子和智囊團。

鄧力群早年在延安，後來在建國以後，都在中央機關工作，只是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作過地方領導工作，後來在新

疆和平解放上也起過重要作用。王震在新疆主持工作時，鄧力群是新疆區黨委的宣傳部長，兩人有良好的關係。鄧小平復出後，王震對鄧力群多有提挈。

一九七五年胡喬木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時，鄧力群為副主任之一。他曾負責為鄧小平起草一篇《論總綱》的重要文章。四人幫批判鄧小平時，《論總綱》被定為“大毒草”。但鄧力群沒有往鄧小平身上推，而是獨立承擔全部責任，因此得到人們尊重和鄧小平的賞識。而胡喬木則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惶恐失措，向四人幫揭發了鄧小平許多“翻案罪行”，因而為人所不齒。

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第三次復出。胡喬木無顏再見鄧小平，懇請王震和鄧力群代為求情。鄧小平倒是諒解他的苦衷，對鄧力群說，胡喬木的“揭發”，都是事實，還沒有捏造。於是重新起用胡喬木。

胡喬木長期給中共領袖當“筆杆子”，極善于領會精神，演繹成文，而且義理詞章，俱稱精到，故總是受到重用。

這大概就是鄧小平為甚麼常常單獨召見胡喬木和鄧力群並且授權他們傳達他的談話內容的原因。

胡喬木和鄧力群因此在中共領導核心內部居于關鍵部位，常常起重要作用。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是鄧小平所倚重的人物。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他們成為理論界的“權威”，並不斷在黨內發動思想鬥爭，以整肅被他們指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

六 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

鄧小平發動政治制度改革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工作雖然被束之高閣了，鄧小平並沒有

停步。他在繼續沿着這條思路往前走。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他指出現有的政治制度有五大弊端：一是官僚主義，二是權力過分集中，三是家長制，四是領導職務終身制，五是形形色色的特權。^①

所謂官僚主義，不只是中共通常說的“官僚主義作風”。他一口氣列舉了二十四種現象：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官氣十足，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腐枉法。

他指出，當代中國的官僚主義除了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和社會主義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有密切關係。應該說，他抓住了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根源。封建專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相結合，就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官僚機器。

關於第二個弊端，他也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

鄧小平在這裏已經接觸到中國政治的最大弊端：一黨專政，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共產黨手裏，而共產黨的權力又集中在少數人乃至一個人手裏。不過他沒有點破“一黨專政”這個要害，顯然他並沒有打算解決這個層次的問題。不過他已經提出制度的問題了，這是自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來，第一次由一個黨的領導人主動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在這一點上，他比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們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鄧小平所達到的頂點

他清醒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⑩他還說，毛澤東認識到：斯大林破壞法制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但毛認識到卻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尤其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下面這句意味深長的話：

“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⑪

這就是說，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人民就不會信任中國共產黨。所謂“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告吹。自從提出“四項原則”以來，特別是對於“黨的領導”，從來都是“決不許可”有絲毫動搖或懷疑的。如今鄧小平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作為人民接受黨的領導的前提條件，這就把中共從“絕對權威”的雲端放到地上，以人民的信任作為繼續執政的條件了。

應該說，鄧小平這個講話，是他在開拓中國新的歷史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最光輝的頂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鄧的講話，於八月三十一日正式通過。看來，長期支配中國的舊政治制度好像來到一個轉折點了。思想界由於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被阻斷而鬱鬱不暢的心情一下子又振作起來了。

胡喬木的又一封信

誰知中國的政局波譎雲詭，幾個月後，事情突然逆轉了。逆轉的表面起因是波蘭政治危機。一九八〇年七月，波蘭人民起來反抗共產黨的統治，反抗蘇聯的壓迫。這個事件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引起震動，因為它表明傳統的蘇聯模式已經走投無路。中國共產黨當時是支持波蘭人民鬥爭的，而且有信心波蘭式的事件不會在中國發生，因為第一，中國獨立自主，不像波蘭屈從於蘇聯霸權

之下。第二，中國正在改革，三中全會路綫深得人心。因此，雖然波蘭七月發生事變，中共中央八月決定進行政治改革，絲毫未受影響。

可是，胡喬木在九月二十四日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認為波蘭事件對中國有重大意義，要求黨中央和國家機關各個部門都要研究並制定對策，也就是認為中國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要求黨中央“引為殷鑒”。^④十月初他又叫中央秘書局把這封信印發中央各機關和政府各部門及群眾團體。於是中央宣傳部馬上通知宣傳系統：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了。

決定性的逆轉——政治改革中斷

停止宣傳，還只是第一步，決定性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八〇年底。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主題是經濟調整。所謂調整就是緊縮財政開支，減少投資。因為一九八〇財政出現了一百多億元赤字，物價上漲幅度較大。其實這是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惡果。對國民經濟指標和財政支出作些調整當然是必要的，不過根本出路只能是堅持把改革進行下去。可是當時實際上采取的對策卻是這樣二十四個字：“抑需求，穩物價。會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這個會議的主角是陳雲和新上任的總理趙紫陽。鄧小平也講了話，他除了“完全同意”陳雲和趙紫陽的講話以外，在政治上也往後退了。他並沒有說不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了，但是加了一句話：“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⑤後來的事實證明，政治改革實際上停頓下來了。

鄧小平在這次講話裏，對“四項原則”又回到了八月以前的地方：“對於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並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⑥八月份他講改革黨和國家

領導制度時，還把改革作為人民信任黨的前提條件。同時不言而喻，他認為黨的領導是建立在人民發自內心的信任上面的。現在他不但把“四項基本原則”當成人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的絕對原則，而且要使之成為法律，也就是具有強制力量，誰要不服從，便要受到法律制裁。到了這個地步，不但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必改革，而且連領導作風都不必改進，因為任何人要是敢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現出三心二意，予以鎮壓就是了，何必費大力氣去改進作風以博得人民信任呢？

果然，一九八一年開始，思想界的形勢緊張起來了。

在阻擋政治制度改革上，胡喬木用的手法和他阻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時候一樣，也是寫了一封信。信是寫給總書記的，總書記沒有理會，胡喬木就直接叫秘書局印發給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結果和上一封信一樣，又在實際上扭轉了中國局勢，使鄧小平改革中國黨政領導制度的宏願成為泡影，也使中央政治局關於政治制度改革的決定化為烏有。

同樣，這樣一封個人信件竟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為它投中了黨內壟斷國家權力的當權者的心願。

※ ※ ※

第九章 引文出處

- ①《三中全會以來》第4頁
- ②《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第110頁
- ③《理論風雲》第170頁
- ④同上，第184,186頁
- ⑤同上，第187頁
- ⑥《命運——李洪林自傳》第159頁
- ⑦《光明日報》1979年6月24日
- ⑧《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4日

⑩同上

⑪同上

⑫同上

⑬《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第 203 頁

⑭《石油通訊》1979 年第 36 期

⑮《鄧小平帝國》第 91 - 93 頁

⑯同上, 第 93 - 94 頁

⑰同上, 第 96 頁

⑱《三中全會以來》第 517 頁

⑲《三中全會以來》第 523 - 524 頁

⑳同上, 第 524 頁

㉑《鄧小平帝國》第 107 頁

㉒《三中全會以來》第 632 頁

㉓同上, 第 631 頁



一九七九年，郭羅基在鄧小平宣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後發表了幾篇繼續堅持思想解放的重頭文章，在全國影響很大，從而被說成“自由化的拔尖人物”。因為他的文章曾得到胡耀邦的支持，也就成為胡喬木和鄧力群着重打擊的對象，並被告到鄧小平面前，於一九八二年被趕出北京，成為思想解放隊伍中第一個中箭落馬者。

圖為一九九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的郭羅基。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1981 - 1982)

新時期的最初兩年，“分道揚鑣”雙方的鬥爭大體上處於拉鋸狀態。以胡喬木和鄧力群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以“權威”自居，但是力量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壓倒對方的程度。一九八一年，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年，改革停下來了，意識形態收緊了。圍繞着評價毛澤東的爭論，已經以“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方的勝利而告結束。接着一場新的思想批判運動就發動起來了：批判電影劇本《苦戀》。這是新時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一次高潮。剛剛建立起來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體制”出現了第一道裂紋。思想解放運動的旗手胡耀邦，蒙受了“渙散軟弱”的指責。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思想界的形勢就急轉直下了。

一 收緊意識形態

攻守易位，全局逆轉

一九八一年是中共黨內“分道揚鑣”的兩支隊伍攻守易位之年。在此之前，思想解放高潮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的餘波仍在不斷沖擊。這種沖擊當然是不斷受挫，沒有一次能夠成為氣候，但它畢竟比較主動，可以說處於攻勢地位。

一九八一年起，事情就變化了。

陳雲曾在波蘭事件之後提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①一九八〇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正式接受陳雲上述提法：這個會議不光調整經濟，同時也加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是個

全面“收緊”的會議。

加強政治思想控制的背景，除胡喬木給中央上書所說的波蘭“殷鑒”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國內狀況。在三十年來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激蕩下，民主空氣空前高漲，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特別活躍。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研究問題，出版手寫的或油印的報刊。雖然一九七九年“西單牆”已被取締，一些活躍人物如劉青、徐文立、陳爾晉等都被捕，一九八〇年“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為公民權利又被從憲法中取消，但是民主訴求並未減退。許多地方都有民間組織和民間刊物在活動。更令中共當局擔心的是一九八〇年在鄧小平“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倡議下，國內民主空氣異常高漲。這一年全面開展的縣級人民代表直接選舉（而且是差額選舉，即選民可在多個候選人中有選擇的自由，這比“等額選舉”民主多了），使有些地方的黨組織對選舉有“失控”之虞。特別使一些人緊張的是，有的地方居然出現了競選。尤其是北京大學，被目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郭羅基竟被選為人民代表。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控制，對於獨掌政權的中共意味着甚麼，是不言而喻的。

胡喬木扼殺《生活》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這就是“《生活》半月刊事件”。這是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的知識分子爭取開關言論自由陣地的一次大膽嘗試。

《生活》原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中國傑出的記者和政論家鄒韜奮主編的著名刊物。鄒韜奮所創辦的傳播新文化的陣地生活書店，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新知書店及讀書生活出版社合併成三聯書店，就是現在的三聯書店的前身。一九八〇年，也是在鄧小平八月關於政治改革講話的鼓舞下，三聯書店決定出版《生活》半月刊。取名《生活》自然有繼承和發展老《生活》周刊的意義。三聯書店總

經理、老出版家范用爲《生活》半月刊擬定的“發刊旨趣”這樣寫道：

《生活》是一個思想性的半月刊。它要求以生動優美、犀利簡明的筆調，寫出文理清新，汪洋恣肆，幽默潑辣，韵味雋永的簡短文章，來論述政治、經濟、哲學、教育、文藝、歷史、自然、社會生活、道德風尚、青年修養、思想方法、工作作風等諸般問題。凡散文、隨筆、雜感、記事、紀行、回憶、讀書筆記、社會調查、讀者來信、寓言警句等形式均可採用。……

思想性是這個刊物的靈魂，生動優美、引人入勝而又深入淺出的文體是這個刊物的表達形式。”

顯然，光是這個“發刊旨趣”就有強大的吸引力。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禁錮，忽然在眼前出現這樣一塊思想園地，自然得到思想界的廣泛支持。所以經過一個短期的籌備之後，一九八一年一月就印出了《生活》(試刊)第一期。

按照慣例，籌備組把《試刊》送給“有關領導人”。同時送去的，還有準備作爲這個刊物內部通訊的《生活通訊》第一期，上面有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爲籌備《生活》半月刊而召開的座談會記錄。出席的有：于光遠、馬沛文、阮銘、何匡、劉賓雁、張顯揚、嚴家其、胡平、項南、郭羅基、唐弢、蕭乾、廖沫沙、曾彥修、李洪林等。

籌備組大概沒有想到，當時掌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已經感到出版的刊物“太多了”，因爲他們的任務就是“偵察”和“控制”，刊物越多，就越難控制。何況這個《生活》所接觸的作者名單就足以把這些官員嚇住了。(除了上述參加座談會的人們以外，在《試刊》上發表文章的還有方勵之、鐘惦秉、聶紺弩和已故的傅雷等老“右派”。)

果然，別的“領導人”還沒有過問，胡喬木首先就對名單中的胡平提出異議。他認爲，此胡平是北京大學參加競選的青年人胡平。其實中國有許多個胡平。出席《生活》座談會的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胡平，並非北京大學那個“自由化”的胡平。不過這並不影響胡喬木一定要阻止《生活》半月刊出版的意圖。果然，在他的“勸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阻”下，《生活》半月刊夭折了。它只出版了一期《試刊》。胡喬木使這本《試刊》成了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絕版珍貴文物。

劉賓雁早在座談會上就預言了：“《生活》不會很順當。我看得作打兩種官司的準備：一、小官司；為每期刊物的這篇那篇文章打官司；二、大官司——維護《生活》的生存權利。會有人要扼殺它的。”

不過這官司並沒有打。因為對方是胡喬木，而中國還沒有能受理控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法庭。

消滅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

其實《生活》半月刊之被扼殺，原是整個大局的一部分。一九八一年一開始，中共中央就對新聞報刊“加強領導”了。一月二十九日發出《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決定》說：“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但是它們“存在着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經常和系統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言論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②

接着，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在中共和社會上民主運動的關係上是一個里程碑。粉碎四人幫後一直到三中全會，雙方一直合作得很好。社會上的民主運動一直堅定地支持鄧小平復出，鄧小平也明確地支持以“西單牆”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三月以後，關係開始惡化。不過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的《指示》發布以前，雖然社會上的一些民辦刊物已被取締，一些青年已被關押，但都屬於“個案”。這個《指示》的出臺，標誌着中共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已經完全決裂。

《指示》說：“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

略，是盡量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着‘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③

《指示》中對人的處理沒有甚麼新意，和一般“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策精神完全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對“非法刊物”的處理方針：“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指示》還有一項規定：“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④這大概是害怕國內外知道此事就會議論紛紛，特別是海外說三道四，使當局耳邊不得清淨。

這個《指示》本來要求制定“出版登記法”以控制“非法刊物”。但是後來陳雲制止了。陳雲說：“不要搞甚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⑤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沒有出版法。一切出版物都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出版局用行政手段控制。

二 重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非毛化的勢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中國就面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華國鋒作為中共第二代領袖，企圖用“兩個凡是”使中國繼續沿着毛的路綫走，所以被歷史淘汰出局。鄧小平和胡耀邦舉起思想解放的旗幟，沖出毛澤東的陰影，把人們引上一條走向現代化的新路，才博得人民的信任，樹立起領導的權威。

這個過程，叫作“改革”，海外輿論有時也把它叫作“非毛化”。

叫作“非毛化”，是很確切的。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綫固然把中國引向絕路，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十七年，也沒有太多值得留戀的東西。十七年間即使不折騰，頂多不過是把“蘇聯模式”搬到中國。那一套計劃經濟和極權政治照樣會把中國引入死胡同，只不過會比文化大革命那種胡作非為的後果來得晚一點而已。所以中共三中全會所實現的歷史轉折，實質就是擺脫毛澤東，也就是“非毛化”。這是中國人之幸。

如果趁熱打鐵，利用批判“兩個凡是”的勢頭，通過三中全會這個轉轍點，完全走上新路，雖然也會遇到毛派的阻撓，但是一定可以得到全黨和全國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套用秦朝末年農民起義時的一句話，可以說“天下苦毛暴政久矣！”這種人心所向，是無可匹敵的。

鄧小平怕作“赫魯曉夫”

可惜鄧小平沒有這樣做。海外“非毛化”的評論，無意中觸痛了他的心病——怕被指責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直是毛澤東終生擺脫不開的夢魘。因為他清楚，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斯大林的暴行，生前不可能有人敢說半個不字，但是死後必然有人清算。同樣，毛澤東預見到自己身後也一定有人會像赫魯曉夫那樣對待他。劉少奇因為被懷疑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被整死了。鄧小平則用“永不翻案”的保證獲得了毛澤東的寬恕。

其實赫魯曉夫掀開斯大林的蓋子是一步勇敢的行動。不管他的主觀意圖怎樣，正是這一步導致了蘇聯共產帝國的瓦解，使“大家庭”中各個被它控制的國家獲得獨立，也使俄羅斯人民最終獲得自由。當然，中國人好像特別愛從道德評價上責備赫魯曉夫，說他當面阿諛奉承斯大林，斯大林死後他又“鞭尸焚尸”，未免太有背于為人之道。其實在政治活動中，道德從來都無足輕重。鄧小平如果信守他對毛澤東許下的“永不翻案”的承諾，也就不會反對“兩個

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幟可能要由另外的政治家來擊起了。

批毛和擁毛的鬥爭

其實鄧小平不願作“中國的赫魯曉夫”，也不是從道德角度，而是從政治角度考慮的。他考慮的是中共內部“分道揚鑣”的兩股力量。作為領袖人物，他最好能團結全黨，但是在某個時期或某個問題上，他總有一個主導的傾向。自從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出現異議以來，圍繞這個問題的鬥爭一直不曾停止過。和這種爭議同時，社會上已經沖破禁區，多少年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原理”，已經成為人們公開批評的對象了。比如，報刊上這些文章，都是直接批毛的：

《“黨領導一切”的提法不科學》（《黑龍江日報》1980年10月29日）。文章說這提法不合邏輯，黨就不能領導太陽、月亮、刮風、下雨。

《“外行領導內行”的提法是有害的》（《北京日報》1980年12月5日）。文章說，這個提法使人甘當外行，成了官僚主義的一種借口，並容易造成瞎指揮。

《權力不能過分集中》（《人民日報》1980年11月14日）。文章批評毛澤東“大權獨攬”的口號，說它造成個人專斷。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科學？》（《人民日報》1980年10月30日）。文章說，這個提法意味着在民主之外有一個集中，而且高於民主，因而有資格指導民主。

《書記不等於“班長”》（《廣西日報》1980年11月17日）。文章批評毛澤東把書記比作班長。文章說：“班長和戰士是上下級關係，而書記和委員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關係。”

《“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口號不對》（《北京晚報》1980年9月2日）。文章說：現在我們有一千八百萬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的九十萬呢？再說“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群眾”，我國有九億人口，剩下百分之五是四千五百萬，難道都是壞人？

《經濟工作的生命綫是甚麼》（《解放日報》1980年11月5日）文章說，經濟工作的生命綫是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而不是政治工作。

還有很多文章，從標題上就是直接批毛的。比如：《“全民大辦”是反科學口號》，《“政治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提法是錯誤的》，《“反潮流”的口號是錯誤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口號應該摒棄》，等等。

公開評毛，公開批判毛澤東的錯誤，本來是使中國從毛澤東的陰影下解放出來的必經之路，但卻使一些人如喪考妣。鄧力群“痛心地”說：“他們在往毛主席臉上吐唾沫呀！”這是當時以“黨”自居的“權威”人士對評毛的控訴。這種語言是否由衷，外人當然不會知道。但重要的不是個人情感，而是現實利益。在這種情感後面，是一大批在毛澤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當年林彪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曾發出號召：誰在毛澤東去世後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種廉價號召雖然林彪自己都不相信，但卻可以用來打人。同樣，在中國擺脫毛的陰影走上改革之路時，反對改革的人照樣可以用“擁護毛澤東”作號召，組織起一支新的“十字軍”。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鄧小平不能不認真考慮並且謹慎對待。

毛澤東身後政治格局的形成

鄧小平的抉擇最終體現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中共有兩個《歷史問題決議》，一個是一九四五年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路綫，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另一個是一九八一年十

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的起草工作早在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了。當時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胡喬木負責的起草組。胡耀邦實際上過問的不多，主要是鄧小平直接掌握。他曾多次對起草工作發表意見，其中他最關心的是怎樣對待毛澤東。他對起草組的第一次談話就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⑥後來他又談到為甚麼非“高舉”不可：“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⑦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且改變了中央領導的構成：華國鋒辭去主席職務，改任副主席。胡耀邦被選為主席。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以此以前，趙紫陽已經接替華國鋒擔任總理。）

毛澤東逝世後經過五年的曲折發展，中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了，人稱“鄧胡趙體制”。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理想的格局。

可惜的是，作為“非毛化”的領袖人物鄧小平，沒有像毛澤東在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中那樣，用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的時代。毛澤東當仁不讓，把自己作為王明路線的對立面載入史冊。而鄧小平卻不敢把自己作為毛澤東路線的對立面載入新時期的史冊，雖然他實際上是這樣做的。

舉着毛的旗幟走非毛化的道路

於是，他就使自己處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當中：走的是“非毛化”的道路，舉的卻是毛的旗幟。這也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可是他既然“打着紅旗”，便使自己的“反紅旗”活動處於非法地位，別人就可以用他所打出的“紅旗”去討伐他的“反紅旗”活動。於是不管他是否願意，他都必須順應揮舞毛的旗號的反改革力量的要求。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高舉毛的旗幟已經成為黨的方針，他的政治傾向也就定型了。

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基本特點：一條腿走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而且連經濟也不可能順順當當改革，因為這種改革也常被指控為背離社會主義。這就決定了他不但和社會上的民主力量決裂，而且要不斷整肅黨內所謂“和黨分道揚鑣”的知識分子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就決定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將是新時期中國思想鬥爭的主要形式。

三 批判《苦戀》

《苦戀》的命運

《苦戀》是部隊作家白樺和彭寧合寫的电影文學劇本，一九七九年發表。一九八〇年由彭寧執導拍成電影，改名《太陽和人》，尚未上演。

劇本描寫一個畫家凌晨光漂泊海外成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畫家夫婦放棄海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他熱愛的祖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結果在逃亡中喪命荒野。劇中他女兒有一句臺詞：“您苦苦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畫家無法回答這個疑問。全劇結尾是畫家在茫茫雪原上用最後的一點力量爬出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的哪一個“點”，就是他冷卻了的身體。

這個劇本和電影的情節及藝術手法，都有可以商討的地方。但是應該說它忠實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懷着赤子之心回歸祖國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暴政下的悲慘命運。

中共一向重視文藝作品的“教育作用”。如果它真的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那麼《苦戀》就應該獲獎。但事實證明，中共當局是把文化大革命當作傷疤來護短，害怕人家來揭露它。所

以這個劇本不受當局歡迎，是注定了的。不過起初它並未引起注意。到了一九八一年初，要收緊思想控制的時候，《苦戀》被選中了。

或許因為白樺是部隊作家，批判是由部隊開始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韋國清等人談話，主題是“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是貫徹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為在思想領域全面收緊而作的重要布署。

鄧小平一共談了八個問題。最後一個專門談批《苦戀》的問題：“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③

粉碎四人幫以後，常有一些文藝作品或理論文章被認為有“缺點”或“錯誤”。但都沒有發起一場公開的批判運動。上海作家沙葉新曾寫了一個劇本《騙子》，有點像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描寫一個騙子自稱高幹子弟，結果受到某市官員破格接待。此劇上演後引起轟動，同時使一些官員大為惱火。胡耀邦沒有組織批判，而是召開一個“劇本創作座談會”，用和風細雨討論的方法說服作者不再上演，這使那些官員得以息怒。文藝界雖然並不滿意，但總算沒有掀起急風暴雨，沒有挨棍子，這一點，頗為人們稱道。

《苦戀》拍成電影後，內部就有不同看法。根據《百年潮》月刊所發表的張光年日記披露，一九八一年二月，文藝界領導已經對電影《太陽和人》的修改問題進行商談，並於二月二十三日取得一致意見。但三月二日的《日記》則記載着：“黃鋼借《太陽和人》電影事件向中紀委寫報告，要求調查出籠經過，追查支持者。”可見已經有人要借這個電影的由頭掀起一個政治風潮。所謂“出籠經過”，“追查支持者”等等用語，顯然已把《苦戀》的寫作和改編成電影《太陽和人》這種文藝工作當作“政治陰謀”，要制造一起新的文字獄了。張光年的《日記》還記載着：林默涵支持黃鋼，賀敬之贊成“調查出

籠經過”，而夏衍、陳荒煤、趙尋、陸石和張光年等則持反對態度。^②可見文藝界已經為《苦戀》發生分歧，鄧小平三月二十七日的談話，可能是對爭論做出裁決，決定對《苦戀》發起一場公開的批判。

新時期第一場大批判運動

這個決定的分量是很重的。由最高領導人親自布置對一個劇本進行批判，這在新時期還是第一次。它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三十年前對《武訓傳》的批判。那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由最高領導親自發動，也是對一個電影進行批判。自從批判《武訓傳》之後，中國大地就陷入了連續不斷的思想鬥爭運動。

軍隊的動作很快。四月二十日，《解放軍報》就打響了戰鬥的第一槍。它發表了長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文章說，《苦戀》的主要錯誤有七：

1. 把愛國主義和愛黨愛社會主義對立起來。
2. 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
3. 通過藝術形象散布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
4. 把祖國和四人幫，把黨和四人幫，都混淆起來。
5. 打着反對封建主義，反對現代迷信的旗號，詆毀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6. 以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題曲，反視中國大地上人的命運的悲慘，實際上是指責我們黨踐踏了人的尊嚴，制造了人間悲劇。
7. 借屈原的故事所鼓吹的“求索”，實際上是引導人們懷疑黨、懷疑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要突破四項基本原則框框的“求索”。

這篇長文發表後，電臺廣播，許多省級報紙轉載，一時風雲突變，舉國震動，海外吃驚，不知道中國又出了甚麼大事。因為這種

“大批判”式的文章，自從四人幫垮臺以後，已經沒有人再寫了。如今忽然重新出現，大概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運動又卷土重來了。

這個信號的強度可以從白樺妻子王蓓的感受中略見一二。批判開始之後，已故著名導演鄭君里的妻子黃晨去白樺家看望王蓓。王蓓一看見她就哭了，說：“在這種時候，你居然敢來看我，我實在沒想到。我非常感動，非常感謝，因為現在沒有人再到我們家來了。”^⑩

吳祖光挺身而出，語驚四座

《解放軍報》的文章發表後，周揚四月二十八日召開一次“老作家座談會”。劇作家吳祖光收到周揚的通知後準備動身赴會，但他妻子新鳳霞無論如何不讓他去。理由很簡單：吳祖光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也是周揚找他去上鉤的。現在歷史好像又要重演了。

不過新鳳霞沒有攔住，吳祖光還是去了，臨走時新鳳霞叮囑他：“絕對不能發言。”可是吳祖光到了會場就把夫人的叮囑忘了。他作了一個語驚四座的發言。他直率地指出：《解放軍報》的文章“邏輯上的不通、內容的蒼白、態度上的粗暴，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文章的再現。”“現在發表這樣的文章是給中國共產黨抹黑，給中國人民解放軍抹黑。”

而且吳祖光肯定地斷言：“人民群眾決不會由於看了或聽了這篇文章而認為作者白樺是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相反，會同情他，支持他。”^⑪

大批判走向反面，被批判者得到社會同情

果然，事情完全像吳祖光所斷言的那樣。《解放軍報》的文章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此時，還發生了一件同樣是幫倒忙的事：一份專門刊登報告文學作品的雜誌《時代的報告》，在一九八一年專門為批判《苦戀》出了增刊。這個刊物的主編黃鋼認為當前有一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股“反黨思潮”。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編者在“增刊”的《敬告讀者》中說：“我們決心與廣大工農兵及其幹部和愛國的知識分子站在一起。”他不但要組織階級隊伍進行征討，而且把知識分子劃分成“愛國的”和“不愛國的”，結果激起很多人的反感。北大師生在討論《苦戀》時，大多數發言都同情白樺，對《苦戀》表示理解和肯定。相反，認為黃鋼的文章如同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一樣，想把作者往死處打。

理論界的反響也很強烈，一些人說，許多人都沒看過這個劇本和電影，忽然開展這樣大規模的嚴厲批判，這是文化大革命遺風。這到底是“撥亂反正”還是“撥正反亂”？

所以，這場批判雖然一開始使人們緊張一下，但很快就轉為反感和冷淡。毛澤東時代那種一呼百諾的現象已經喚不回來了。對白樺的圍攻怎么也鼓動不起來。而且，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鮮事：許多人給白樺寫去了大量的慰問信，以致白樺發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的感嘆。這種事情，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是絕對不可設想的。

因為《解放軍報》的文章沒有奏效，對《苦戀》批判很不景氣，所以總政治部不肯罷休，要求繼續批判。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把中宣部長王任重，副部長朱穆之，顧問周揚，新華社社長曾濤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談話。

胡績偉頂撞鄧小平

鄧小平在談話中責問《人民日報》為甚麼不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胡績偉回答說，那篇文章不好，《人民日報》不能轉載。如果一定要批評《苦戀》，《人民日報》自己另寫文章。

建國以來的中共黨史上，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舉措上，一個黨員當面頂撞黨的領袖，這是極其罕見的。還好，鄧小平這一次並沒有堅持己見，而是和大家平等討論，他也承認《解放軍報》的文章

有毛病，最後“達成協議”：對《苦戀》，《解放軍報》不再批了，由《文藝報》寫出質量高的文章發表，《人民日報》轉載。

周揚領了任務回來，交給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張光年，張光年又布置給唐因、唐達成合寫。他們思想不通，根本不想接這個任務。後來勉強接受，結果是反覆修改，用張光年的話說，是“越改越亂”。因為這實際上不是文章，而是“共同綱領”。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可以對稿子提出意見；這篇文章必須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才能達到“高質量”的標準，所以十分難改，有時作者都不知所措。改到第五稿時，胡耀邦說了一句話：“我看第一稿就不錯。”這個稿子弄得兩位作者苦不堪言，張光年也焦頭爛額，都失眠了。後來一直改到九月底，總算定下來，發表了，這件事終於過去了。

四 思想戰綫座談會

鄧小平和胡耀邦裂痕初現

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看，就清楚了。胡耀邦一九八七年被迫辭職，是因為鄧小平不滿意他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太軟弱。從這個結局回頭來看一九八一年，就會發現，這時鄧小平已經明顯地不滿了。

鄧小平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找人談話的時候，沒有找胡耀邦，而是直接找中宣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他談的主題是黨對思想戰綫的領導，“存在着渙散軟弱狀態”。《苦戀》是一個例子。他還舉出別外四個例子，兩個是理論界的（注一）；兩個是文藝界的。其中一個是青年詩人葉文福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注二），一個是新疆烏魯木齊市文聯負責人丁一石“大鳴大放了一通”（注三）。這兩個人都猛烈地批評了一些人搞特權。所以鄧小平說他們“殺氣騰騰”，並據以得出結論，說黨的領導“渙散軟弱”，以致不得不由他親自出面來扭轉，使之堅強。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這兩個人講話確實有“出格”的地方。其實偌大一個中國要找出幾個講話“出格”的例子是很容易的。問題是誰促使鄧小平得出這種認識，作出這種決斷。

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一門學問叫作“簡報學”。差不多所有稍具規模的單位，都有自己編印的“簡報”用以交流情況，這裏面沒有多少學問。有學問的“簡報”有兩種：一是往上送的，可以影響領導人的思想；一是會議上發給大家的，可以影響會議的決定。這兩種“簡報”往往可以左右中國政局，那“學問”就在于：甚麼事情登“簡報”，甚麼事情不登“簡報”，以及在登簡報的時候怎樣進行“編輯加工”。

由于中國是人治，因此，用簡報對領導人作“思想工作”，便是用最小投資獲得最大效益的法寶。是誰把關於葉文福和丁一石的材料送到鄧小平手裏，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這個材料特地反映了丁一石如何贊美胡耀邦。而按照黨內慣例，這種不利于領導人的材料照例都要用“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剛剛開過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剛剛當上黨中央主席。鄧小平在這個時候把他擺在一邊，直接對中宣部和新聞單位下達指示，應該說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這種局面是怎麼形成的，“簡報”的作用恐怕不能低估。直接向鄧小平進言的作用當然更是不能低估。至于都是誰能把“簡報”或某種“材料”送到鄧的眼皮底下，又是甚麼人能 and 鄧見面去“反映情況”，那就只有等到中國檔案解密的那一天了。

胡耀邦召開會議，承擔“軟弱渙散”責任

鄧的談話使胡耀邦不能不有所警覺，他很快在書記處開會研究鄧的談話，並決定召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戰綫問題座談會”，不但思想界所有單位都派人參加，而且各省市和軍隊都派宣傳部門領導人前來出席。

這個會從八月三日開到八月八日。胡耀邦在會議開幕時發表講話，對鄧小平所批評的“渙散軟弱”主動承擔了責任。

座談會大部分時間都開小組會。總的看來，內容比較平淡，並沒有掀起甚麼“反自由化”的高潮。不過以作家協會為主的第四組曾經熱鬧了一下，據當時主持小組會的張光年在《日記》中記載：“黃鋼、李何林攻擊周揚，我在插話中指出其與事實不符之處。”（八月四日）“我先發言四十分鐘……接着介紹白樺的詩《春潮在望》給獎情況，說明這是對的，就此駁斥了黃鋼：究竟是我們的軟弱為敵人利用，還是你們粗暴批評引起軒然大波，使他人有隙可乘？還就李何林、黃鋼提出的“小集團、小宗派”，建議他們有根有據地向中央、中宣部提出報告，現在這樣是不嚴肅的，影響安定團結。對此李何林、黃鋼有所辯解，沒有內容。”^②

看樣子，思想運動一來，有人就要沿着“思想問題——政治問題——組織問題”的路子往前走，最後總要揪出一個甚麼“反黨小集團”或“反革命小集團”才算過癮。

吳祖光為《苦戀》的辯護詞

座談會爆出最大冷門的是第三組。這一組以戲劇家協會和電影家協會為主。劇作家吳祖光的發言成為整個座談會最精采的一筆。

他首先不僅為《苦戀》，而且為從事政治生活題材創作的作家當一回“律師”，為他們作一次辯護。他說，社會上各種黑暗和醜惡現象，都是客觀存在，決不是劇作家憑空編造。而且，電影與戲劇裏的描寫，與真實生活相比，還是大大沖淡和減輕了。“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最大的醜化是黨在多年來不斷進行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至于最後導致發生的這個萬惡的文革十年浩劫。說文藝作品醜化社會主義是一種誤解、歪曲；是因果顛倒。”

對於《苦戀》和影片《太陽和人》，他也認為存在相當嚴重的缺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點。他本人並不欣賞這個劇本和電影。不過對影片中最遭非議的兩個情節，吳祖光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一是影片中菩薩臉上被善男信女的香火薰黑了的情節。批判者說，這是打着反對“現代迷信”的旗號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吳祖光引用了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的批評，指出報刊中常說：“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就是說毛確實被捧到神化的高度。“既然如此，《苦戀》的作者用‘善男信女的香火把菩薩的臉薰黑了’的隱喻來批評對領袖的封建性質的吹捧，這不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允許的嗎？”這比黨的決議那種明確公開的批評“不是還要含蓄得多嗎？”

二是女兒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父親“無法回答”。這個情節使白樺遭到猛烈的批判。吳祖光卻不怕引火燒身，為白樺講了公道話。

吳祖光說，老舍的名劇《茶館》裏，常四爺也說：“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常四爺沒有得到回答，因為那是舊社會。文化大革命中，惡徒對張志新烈士說：“你愛黨，黨不要你了。”張回答說：“這不是黨，黨現在被壞人篡奪了。”但是《苦戀》中的凌晨光的確答不上來，因為這場“大革命”對他只能是個問號。在這場災難中無數死者，包括老舍，在臨終前的一刻，腦子裏也只有一個大問號。

吳祖光還用自己作例子。一九五七年響應黨的號召提意見，結果給打成右派，他不知道這是為甚麼。心裏也一直帶個問號。“直到二十二年以後得到全部改正之後，我才知道自己並沒有犯錯誤，而是黨錯了。”因此，吳祖光認為《苦戀》作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⑬

在新時期第一場“反自由化”的暴風雨中，挺身而出，為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者公開進行辯護的，只有吳祖光一人。

座談會的壓臺戲——胡喬木哭庭

思想戰綫座談會的壓臺戲，是胡喬木講話。

胡喬木先給《苦戀》定性：“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中國，否定了黨的領導”。他說，作者極力宣揚：“似乎‘四人幫’就是中國共產黨”，“似乎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並沒有得到解放和幸福”，“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國，存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那裏的知識分子自由生活的命運才是令人羨慕的。”“這種觀點，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種重要的典型表現。”^⑭

當然，白樺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他到底“實際上”怎樣想的，以及他是不是“似乎”宣揚了甚麼觀點，都不可能申辯了。

不過胡喬木講話的重點是批評黨的領導。

他說，“反自由化”不是新提出來的。他認為，有人“不承認存在這種自由化思潮，甚至想方設法加以掩護。”^⑮“極少數相當負責的幹部本人就對自由化的傾向表示同情和支持。”^⑯這些指責都是指誰，他沒有說。不過他說中央書記處“采取的切實有效的步驟還很不夠。”然後說：他自己應該作自我批評並接受批評。（因為他也是書記處書記。）不過他並沒有檢查自己是否“渙散軟弱”，而是檢討自己“沒有充分地始終一貫地負起自己的責任，提出的意見也往往不夠周到嚴密”。^⑰就是說，“軟弱渙散”沒有他的份，他的缺點是負的責任不夠“充分”，提的意見不夠“周到嚴密”。所以他所說的有人對“自由化”“同情和支持”甚至“加以掩護”，顯然另有所指。

最後，使參加座談會的人們不知所措的是胡喬木講着講着，忽然哭起來了。結果會場一片沉靜，聽眾目瞪口呆，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於是會議主持者只好宣布“休息”，等他哭完了再接着說。

據張光年《日記》，這個會開罷，作家協會黨組又開擴大會，接着中央書記處習仲勛又把他們召去開會，然後回去又接着開作協黨組擴大會，把他開得精疲力盡。他在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中有

個小結：

“會開太多了，緊鑼密鼓地大半個月，強為支撐。今天休息，翻閱上半年日記，回憶一些事情，消耗了大半年生命力，究竟于工作有甚麼補益???”^⑩

當然，這只是給他個人這大半年的經歷作個小結。他並沒有也不會給這幾個月的“反自由化”作甚麼小結。

（注一）這一次理論界受到鄧小平批評的是郭羅基和王惠德。郭羅基的《政治問題為甚麼不能討論》早已在中共領導層中聲名卓著，有關郭的材料，上報的頻率也比較高。鄧小平對他的名字是很熟悉的。

王惠德是新任中宣部副部長，主管理論工作。他受到鄧小平批評，是因為他有一個講話，對中國是否已完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看法與胡喬木不同。此材料被人上報給鄧小平，但鄧把王惠德的名字弄成“王若水”了，所以談話時舉出“社會主義”的例子，指責王若水。此誤會後已澄清。

不過王若水躲過了這一次，卻沒有躲過下一次。即中國俗話所謂：“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也。

（注二）青年詩人葉文福創作的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和《將軍，好好洗一洗》等批評軍隊高級幹部搞特權，受到一些青年人歡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八〇級學生請他去講話，有些話被學校黨委記錄上報，其中有：

“不管哪個時代的詩人，都對那個時代不滿。”

“毛的悲劇證明了這個時代是荒誕的。”

“我不聽從朋友的勸告，不為人所左右。我願意在詩中表現我自己。”

“我歌唱渺小的但是透明的芳香的靈魂。”

“偉大人物的靈魂不一定是透明的。”

“憲法一頒布，我就給彭真寫了信，我說這樣的憲法等於一張廢紙。因為我們國家只是共產黨執政的，這個憲法對共產黨中央領導未做任何限制，這就等於無用。”

據這份反映材料說：大多數學生對葉的講話十分贊賞，認為葉“敢講真話”，“敢于揭露特殊化”，是忠于人民的。一部分學生認為，“他反對官僚主義，反對特殊化是爲了黨好，爲了四個現代化早日實現。”

這個材料還說，一部分學生認為葉文福的講話“違背中央精神”。有的學生對校方說：“你們花了那麼大的氣力去抓思想教育，葉文福的一個報告就給吹掉了。”

(注三)丁一石的講話，被錄音摘錄上報，其中有：

“你要辦好文藝刊物，有兩個選擇，一個，你要想升官發財漲工資，平平穩穩，就要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工作。一條道路，就真正要去替人民說話，那就請你伸出雙手，準備迎接鍊錘！”

“我們的官僚主義，現在不是百分之零點幾，是百分之九十九，連我都有。大小給個官就有官僚主義。”

※ ※ ※

第十章 引文出處

①《鄧小平帝國》第 108 頁

②《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351 頁

③《三中全會以來》第 702, 703 頁

④同上，第 704, 705 頁

⑤《鄧小平帝國》第 117 頁

⑥《三中全會以來》第 444 頁

⑦同上，第 452 頁

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133 頁

⑨《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39 頁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 ⑩《吳祖光閑文選》第 6 頁
- ⑪同上，第 9 頁
- ⑫《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40 頁
- ⑬《吳祖光閑文選》第 14 - 15 頁
- 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160 - 161 頁
- ⑮同上，第 166 頁
- ⑯同上，第 179 頁
- ⑰同上，第 180 頁
- ⑱《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41 - 42 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怕當中國的赫魯曉夫，聲言世世代代都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並且把這種思想貫徹在《決議》當中。這就決定了中國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要繼續沿着一黨專政和思想統制的道路走下去。這就決定了新時期必需繼續進行思想鬥爭運動。

全會還正式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但這只是個形式。實際上還是鄧小平決定一切，同時，陳雲也有很大權力，足以和鄧小平相抗衡。胡耀邦得聽他們兩個人的旨意。上圖為全會休息時，陳雲和鄧小平坐在那裏，胡耀邦和趙紫陽趨候在旁。站立看文件者為李先念。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是思想解放運動落幕以後，改革和反改革展開拉鋸戰的時期。三聯書店總編輯、老出版家范用經過慘淡經營，組織起一支實力雄厚的作者隊伍，在一九八〇年底創辦了當代中國第一份思想性雜誌《生活》半月刊，準備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不料剛剛出了一期試刊，就被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扼殺在襁褓之中，從而使這一本《生活》試刊成爲希世珍本。《生活》的天折，標誌着思想界整個形勢完全逆轉，全面收緊的時期已經到來。

後來到了九十年代，范用的繼任者董秀玉又在高壓的夾縫中，終於使另一個《生活》得以出土，這是一份從多種角度反映社會生活的綜合性刊物。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閉幕，鄧小平就親自佈署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開展批判，從而拉開新時期第一場「反自由化」運動的帷幕。

不料出師不利，這場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抵制。《苦戀》作者白樺不但沒有「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許多讀者紛紛給寫信表示支持和慰問，以致白樺感動地說：「春天對我如此厚愛。」圖為白樺漫步在春暖花開時節。



新時期的第一場“反自由化”高潮中，吳祖光是唯一挺身而出公開為《苦戀》辯護的人。

劇作家吳祖光青年時期以《鳳凰城》一舉成名，抗日戰爭時期活躍於大後方劇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價值連城之家藏文物全部獻於國家。後雖屢遭打擊，但個性未泯，剛直如故，故為中共所不容，一九八七年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親自登門勸其退出中國共產黨。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1982 - 1984)

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過後，王任重曾在胡耀邦支持下，試圖使思想界重新活躍起來。不料此舉完全失敗，而且連他自己的中宣部長職位都落入鄧力群之手。從鄧力群出長中宣部之日起（一九八二年三月），就進入新時期“反自由化”的第二個周期了。

這個周期主要是剪除胡耀邦的羽翼。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阮銘、李洪林、王若水、胡績偉先後受到整肅並被免職。周揚雖然未遭免職但被迫登報檢討，受到極大精神創傷。洪禹、吳江、孫長江則被逐出中宣部和中央黨校，離開意識形態部門。

一 中央宣傳部易手

重新活躍思想界的嘗試

以批《苦戀》為標誌的第一次“反自由化”高潮過去了。這個“高潮”其實不太高，因為除了幾個人很興奮以外，人們大都很冷漠。連奉命寫文章批判《苦戀》的唐因、唐達成都非常冷漠，更不要說旁人了。

不過它的影響卻不小。思想界普遍感到壓抑。

繼胡耀邦之後擔任中宣部長的王任重對這種情況感到憂慮。他找胡耀邦商量，決定召開一次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座談會”，目的是解除顧慮，活躍思想，使理論界重新振作起來。

王任重過去在地方工作，是中共高級幹部中對理論比較重視的人物之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他在湖北省委書記任上曾率先提出“超過馬克思”的口號，因而震驚一時。一九八〇年他接任

中宣部長時，“包產到戶”大潮已呈不可阻擋之勢。但他上任後首先表態支持“大寨”，曾給人們留下左傾印象，反應不佳。不過他比較重視實際，也能聽得進批評，不固執己見。在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中，他表現得沒有多大興趣，並在這一波高潮過去之後，立即着手解決“反自由化”所造成的沉悶局面。召開“理論工作座談會”就是他的對策。他曾表示，希望這個會能像“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樣，對思想解放起推動作用。

為開好座談會，作了充分準備，主要是到全國各地調查理論界的思想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人們普遍對重新收緊意識形態很不滿意。吳江到上海召開一次調查會，帶回來的調查報告所提意見十分尖銳。有人說封建皇帝還能聽取批評，如今不能容許不同意見，連封建皇帝都不如。

座談會從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開始。參加者共三百多人，主要是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理論工作人員，還有北京市和一些大學的理論教學和研究人員。

王任重開幕式上有個講話，主要是解除人們顧慮，號召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曾經有人以為，召開這個會大概和“思想戰綫問題座談會”一樣，又要批判甚麼人了。王任重解釋說，這個會不批判任何人，鼓勵大家“敢想，敢寫，敢說”，並且許諾一定實行“三不主義”，保證決不“秋後算帳”。

這個開幕詞博得與會者普遍好評。有些熟悉王任重的人說，這是王任重最好的一次講話。

誰都不曾料到，這個會簡直太像廬山會議了，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王任重所作的“決不秋後算帳”的保證，不但立刻失效，而且連他本人也被推翻了。

牽動高層神經的敏感問題

事情的導火綫是郭羅基問題。

郭羅基被強行調往南京，引起理論界很多人不安，說是“發配充軍”。其實古代“充軍”的刑罰是把犯人押送邊遠地方去服苦役。郭羅基獲譴，從北京被逐往南京，並未“勞動改造”，況且所去之處是金陵勝地，比當年柳宗元(謫往柳州)或蘇東坡(謫往海南)的命運好多了。這顯示人民共和國已經比唐宋王朝文明多了。不過郭羅基是因言得咎，人們按照當代文明標準，又覺得不平，故有這等議論。

理論座談會的第三組是首都新聞界人士。《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在王任重講話“三敢”精神的鼓舞下，提出郭羅基的問題。他說，外界盛傳郭被調動，限期到南京大學報到，否則，戶口將被強行遷出北京。他還聽說，北大找郭談話時，郭要求知道調動理由。校方談話者答復說：“這由組織掌握，不能告訴你。”

馬沛文說：如果傳聞屬實，“理論工作者怎么敢想、敢說、敢寫呢？郭羅基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馬沛文不知道，這就又一次觸動了中共高層內部一個敏感的問題。他尤其不知道，“郭羅基問題”已經成爲中國政治牌局中被人用來打人的一張王牌。

前面講過，郭羅基是早就被人作爲“自由化的拔尖人物”送到鄧小平的桌子上挂了號的。鄧小平之所以批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渙散軟弱”，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待郭羅基這樣的“自由化代表人物”太“軟弱”。

胡喬木在“思想戰綫問題座談會”上指責“有極少數人”對自由化思潮“想方設法加以掩護”，那鋒芒顯然不是對着社會，而是對着黨內，對着領導層，而且是有所指的。顯然，這“極少數人”遲早要被擊敗，只看對手甚麼時候打出王牌罷了。

現在，出牌的機會來了。馬沛文的發言使牌局上出現了機會。而發起和主持座談會的王任重，被當作“極少數人”中的一個，結果成爲首先淘汰出局的領導人物。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馬沛文的發言登了會議簡報之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鄧力群立刻把座談會辦公室負責人李洪林找去，要求把郭羅基的文章印發各組以便批評。李拒絕了，因為會議主持人王任重已經宣布，這個會不是批判哪一個人，所以會議辦公室不能印這種材料。

於是鄧力群就叫書記處研究室自己印了郭羅基的材料，加上“編者按語”，發給會議各組。“按語”說：馬沛文同志“竟為郭羅基同志的錯誤辯護”。現把郭的兩篇文章刊登如下，請“仔細讀一讀，並請考慮，對這兩篇文章應該批評還是不應該批評”。因為會議辦公室拒絕印發這個材料，而書記處研究室又不是會議的主辦單位，所以這份材料是一個“無頭文件”。文件的題目是《郭羅基同志的兩篇文章》，下面沒有印發的單位，沒有地址和時間，雖有“編者按語”，但不知“編者”是誰。

這個材料發到各組之後，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沒有掀起一個批郭高潮，反而給會議澆一盆冷水。除了第一組（書記處研究室）和第七組（北京幾所大學）有幾個批郭發言之外，大多數人都感到空氣不對，有些人干脆不參加了。有人說：“剛剛保證決不秋後算帳，現在馬上就算帳了。”有人說：“保證的是決不秋後算帳，現在是存天，當然可以算帳。”

鄧力群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宣部

正在大家議論聲中，保證“決不秋後算帳”的王任重被免去中宣部長職務，改由鄧力群接替了。

在和平時期，一個重要領導崗位的更替來得這樣突然，是完全出人意外的。在正常情況下，即使王任重已不適宜此職，也總要等這個會開完之後再換也不遲。然而竟迫不及待到這等程度，可見一定是這個座談會本身使最高當局達到不能容忍的限度，才採取斷然手段的。而能觸怒最高當局的事情，只能是郭羅基問題。因為把郭羅基調出北京，早已不是郭本人的事情，而是黨內鬥爭的一

隻晴雨表或記分牌。要調他走，他不走，當時正鬧得沸沸揚揚。鄧小平是言出必行的領導者，他怎能容忍一件“小事”如此拖泥帶水反反覆覆解決不了呢？而王任重主持的座談會，居然又“鳴放”出馬沛文這種言論，這不是促使他立即改組中宣部的絕好機會嗎？

據阮銘在《鄧小平帝國》中披露，是鄧力群把馬沛文發言拿到鄧小平面前告了王任重的狀。“鄧小平大發雷霆，當場拍板決定由鄧力群接管中央宣傳部和這次理論座談會，讓鄧力群通知胡耀邦立即執行。胡耀邦急忙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按照鄧力群傳達的鄧小平的決定，通過任命這位連一個候補中央委員也未曾當過的鄧力群為中央宣傳部長，這在中共黨史上也是破記錄的。”^①

以阮銘和胡耀邦的關係，以及他和胡耀邦身邊工作人員的關係，他所揭露的這場中宣部長突然易人的內幕，是可信的。因為這個內部過程和人所共知的外部過程恰恰是互為表裏，恰恰能互相印證。

這樣，在理論工作座談會的第八天，即三月二十三日，鄧力群從王任重手裏接過部長的職位，開始主持座談會了。光拿過部長一職當然不夠，下一步首當其衝的是中宣部理論局，也就是理論工作座談會的辦公室。座談會第一組，即書記處研究室參加會議的人員，立即向座談會辦公室負責人猛烈開火，這“負責人”就是拒絕印發郭羅基材料的李洪林，他是理論局副局長。

鄧力群到任後發表就職演說，第一條就宣布“紀律”：“必須同中央保持一致”，“做不到這一點，隨時提出，隨時歡送，概不挽留。”他所說的“中央”，當然就是他自己。李洪林原是胡耀邦一九七九年調來的（那時胡是部長），此時趕緊提出調離中宣部的要求，但是晚了，鄧力群並未“歡送”，而是免了他的職，挂在那裏，慢慢收拾。

理論局的老局長洪禹，思想解放，在理論界頗有人望，在組織和協調理論隊伍貫徹三中全會路線方面，作了大量默默無聞的工作。他為人正直，從不阿諛權勢。因此鄧力群一上任，洪禹不久就

被“歡送”走了。

思想戰綫格局發生根本變化

在此之前，盡管理論界兩支隊伍“分道揚鑣”，盡管不斷有人被指控為“自由化”，但鬥爭畢竟是零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理論隊伍的主力尚未受到傷筋動骨的打擊。中宣部權力易手，事情就發生根本變化了。

中央宣傳部是中共三大職能部門之一（另兩個是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是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司令部。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理論，都歸這個部直接領導。人事任免雖然由中央組織部統管，但意識形態各部門的人事，實際上是中宣部掌握，中組部不過是履行任免手續而已。

鄧力群在此以前，只是中央書記處所屬的研究室的主任。它的前身是國務院研究室，集中了一批人才，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起了不小作用。思想解放運動落幕之後，它主要做兩件事情：一是用“簡報”的形式向上反映情況。一是用“通報”形式向下邊發布一些中央的信息或別的情況。當然它也到下面做些調查，也奉命起草文件或文章。但最重要的就是反映情況，而且它的學問就在這裏：反映甚麼，不反映甚麼，通報甚麼，不通報甚麼，都是由研究室的領導選擇的。這當然會起很大作用。當它的“反映”打動了決策人的時候，起的便是決定性的作用。（注一）

不過，研究室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它只是書記處的附屬機構，不是獨立的職能部門，也就是說，沒有行政權力。它沒有下屬單位，也沒有對口的部門。它不像宣傳部，即有下屬單位，又有對口部門（各省市委的宣傳部）。

鄧力群一當上中宣部長，這個缺陷就補足了。他仍然擔任研究室主任，因為這是他的基地，同時又是中宣部長。於是對於被目為“自由化”的分子就可以施行大手術了。

(注一)研究室在一九八一年就編印了《郭羅基同志部分文章摘錄》，專門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這份材料從郭羅基十二篇文章中摘錄了一些片段，並且加上畫龍點睛式的“附注”，以引起注意。

比如，郭羅基說：“對林彪、四人幫神化領袖制造迷信的批判，僅僅是退燒劑，還不是除病根。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曾致力於把神還原為人，馬克思說：‘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哩。’主要的事情是甚麼？就是要使產生宗教迷信的社會基礎‘在實踐中受到革命改造’。”

研究室的編者在這段文字後加個“附注”說：“關於反對神化領袖的問題，作者認為，主要地不是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而是要對現實的‘社會基礎’進行‘革命改造’。”這樣一來，郭羅基就可以被當作意欲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現行反革命”了。

再如，郭羅基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實踐中發展的，在歷史條件改變以後，有些舊的結論會被新的結論所代替，應當允許對舊的結論提出懷疑。”

研究室的編者在這段文字後面加的“附注”說：“鄧小平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此文卻以各種借口，提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在給中央領導人送的材料中，專門寫上這樣的“附注”，那“學問”也就很清楚了。

整個材料，都是這樣編排的。當時郭羅基本人根本不知道有人已把他告到中共中央，而以爲是教育部和他過不去，想把他趕出北京的。

二 軍人入主黨校

胡耀邦失策——黨校棄守

胡耀邦是以自己的膽識和業績贏得衆望而成爲中共一代領袖的。他對誰都一視同仁，身邊沒有一個特別親密的“班底”。只是由於傾向一致，黨內思想界有些人和他接觸多些，比較談得來。在這些年的思想鬥爭中，有些人在他的領導下做的事情多一些，所以很容易被人們看成是他的“智囊”或“筆杆子”，其實都談不上。不過中央黨校的理論研究室、《人民日報》的理論部、中宣部的理論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胡耀邦的三個“點”。在思想鬥爭中，這三個點，都處於關鍵部位，能起重要作用。因此，要剪除胡耀邦的羽翼，這三個“點”是必須攻占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鄧力群到中宣部一上任，首先就把理論局改組了。在理論工作座談會上向理論局進攻最勇敢的兩個人，成了理論局新任的局長和副局長。

第二個目標是中央黨校。黨校的理論研究室主任是副教育長吳江兼任，副主任阮銘和孫長江是理論戰綫上兩員名將。他們三個人是當年胡耀邦指揮思想解放大軍的得力助手。中央黨校原來的校長雖然是華國鋒兼任，實際負責的卻是常務副校長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改選中央領導核心之後，胡耀邦成了中央主席，華國鋒變成副主席。此時胡耀邦理所當然地應當兼任黨校校長，但他不去兼校長，而且辭掉副校長。這實在是政治上的一大失策。結果軍人出身的王震一九八二年四月到黨校當了校長。據吳江說，他後來得知推薦王震出長中央黨校，“原本就是某股勢力針對胡耀邦的策劃。”王震被任命後，有人給吳江打電話告訴他：“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來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準備啊！”^②

《理論動態》遭到暗算

黨校領導換人，胡耀邦辛苦創建的《理論動態》和理論研究室就失掉屏障，直接暴露在鄧力群的火力之下了。

其實要拔掉胡耀邦在黨校的這個“點”，早在一九八一年就開始準備了。

這一年初，吳江被告知：有人對華國鋒即將下臺抱不平，認為華謙虛謹慎，而胡耀邦說話隨便，不夠謙虛謹慎。因此，要求《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說明怎樣才算真正謙虛謹慎，說明我們的事業需要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而謹小慎微、墨守陳規，不是真正的謙虛謹慎。

吳江還被告知：陳雲的秘書王某（同時是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也認為應該寫這樣一篇文章。

於是吳江就讓孫長江執筆，經反復推敲，於八一年六月刊登在《理論動態》第二八二期上。

誰知這篇文章被說成“針對陳雲”的，並經胡喬木鄧力群之手到達陳雲那裏。據說陳雲很生氣，當着鄧小平的面指着胡耀邦說：“我是支持你的，你不要在黨校弄一幫人反對我。”結果胡耀邦承受了很大壓力，而且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因為他並未布置黨校的人寫這篇文章，當然更不知道原來是陳雲的秘書王某的主意。

被指控“針對陳雲”的還不只這一篇文章。《理論動態》第二九六期的《跳出圈子想問題》也蒙上這個罪名。這篇文章批評有人把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框子。”^③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國按照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的樣板：陳雲因為當時負責領導財經工作，被認為是計劃體制的權威。（注一）因此，批評“言必稱‘一五’”，也被認為影射陳雲，這當然更使陳雲感到不快。

思想解放指揮部終被拔除

在中國共產黨內，如果有人被認為反對某個中央領導人，這就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於是中央組織部專門派調查組進駐黨校，對吳江、阮銘、孫長江三個人進行調查（名義是“考察幹部”）。

調查從一九八一年下半年開始進行，只是搜集材料，並未觸動這三個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王震正式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他到黨校立即對他所說的“胡耀邦的智囊團”展開鬥爭。一方面通知中央組織部把吳江、阮銘、孫長江調離黨校，一方面在校內布署“清除”阮銘的事情。

要調出三個人，也不是一件簡單事。吳江是副教育長，校務委員會委員，這職務是中央書記處任命的，要調走，也不能完全由校長說了算。所以此事就擱淺了。但“清除”阮銘的工作在抓緊進行。阮銘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參加造反，但很快就被“王關戚”（注二）打倒，從此受審查七八年之久，也沒有審查出個甚麼結論來。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比比皆是，許多人起來造反，然後被打倒，而打倒這個人的又會被別人打倒。中共中央曾指示清理“三種人”（注三），但這和阮銘根本對不上號。然而在黨校這場鬥爭中，阮銘竟被扣上“三種人”的帽子。其實誰都可以看出，這是對着胡耀邦來的，因為阮銘是胡耀邦調來的。阮銘思想敏銳，文筆犀利，是理論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又因阮銘秉性剛直，心口如一，于官場中折衝周旋，非其所長，故主要以研究寫作為業。且其所寫多為黨內文件或“特約評論員文章”，故其名鮮為人知，但為胡耀邦所倚重。由於阮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一點複雜的經歷，便成為別人可乘之機。在黨內的政治風雲中，他就被選為一個突破口。

據阮銘所看到的一九八一年中央組織部對他的《考察報告》，其中有一份材料是《鄧力群同志談阮銘》。鄧力群是這樣說的：“阮銘是文革中的紅人，後來才挨了點整。說阮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一點也不冤枉。”^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王震在黨校各部室主任會議上宣布了對三個人的處理：吳江調離黨校。孫長江不進領導班子。阮銘這個造反派頭頭要清除。同時把阮銘的材料發下去給全校討論，但不准發給阮銘。（阮銘是從別人手裏看到的。）

阮銘立即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申訴，控告王震違反黨章，同時也給胡耀邦寫了信。中紀委負責人李昌接受了申訴，並告訴阮銘，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紀委常委研究處理。中紀委已決定派調查組處理此案。

然而中紀委剛剛開始調查，王震就向黨校傳達了陳雲的三句指示：“阮銘不能留在黨內，阮銘不能留在黨校，全國報刊不能發表阮銘的文章。”王震同時宣布：“誰不同意陳雲同志這三句話，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⑤

於是阮銘被開除出黨。吳江和孫長江也無法在黨校存身，調到其他單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被解散。

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批判極左思潮和“兩個凡是”，作為胡耀邦引導全國輿論走向的這個“指揮塔”，終於被拔掉了。

（注一）陳雲在建國以後長期主持財經工作。當毛澤東搞“大躍進”時，陳雲態度冷靜務實，被毛目為右傾。“大躍進”失敗後，陳雲又獲得發言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力群編輯《陳雲文選》出版。他去中央黨校作過長篇報告，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作經濟工作》。其中有這樣的提法：“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⑥此話傳到鄧小平耳中，引起他的不快。後來鄧力群整理稿件時，刪去了這句話。^⑦

（注二）“王關戚”是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簡稱。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極左思潮的早期代表，都是被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毛澤東和江青看中之後，平地飛升的暴發戶。他們忘乎所以，到處揪“走資派”，不小心揪到軍隊裏去了。軍隊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石，所以毛澤東先後把這三個人踢出去，成爲文化大革命中最早作法自斃的極左派。

（注三）“三種人”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後對這“三種人”進行過清理。但清理得並不徹底。在新時期的思想鬥爭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四人幫餘孽的存在。往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骨幹人物，至今還有受到重用的。

三 新的“共產風”

鄧力群的口號——“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

大概是爲了給自己樹立一個新的形象，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鄧力群被任命爲中宣部長的那一天，他在理論座談會上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目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

“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不像一個普通黨員的口氣，也不像一個宣傳部長的口氣。宣傳部長只是中共中央一個職能部門的行政首長，他的任務是在宣傳工作方面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應該在中央的精神之外另提甚麼政治口號。現在他忽然鄭重其事提出一個全局性的政治口號，顯然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針對目前的現實而發的。這等于向全黨宣布一個新的政治綱領。“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我們”，當然是整個中國共產黨。但是“旗手”只能有一個。幾千萬共產黨員，誰也沒有舉起共產主義旗幟，只有鄧力群，在改革開放致“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情況下，振臂高呼，獨自舉起這面紅旗。這是多么難能可貴！有朝一日，“黨變修，國變色”，改革開放使“資本主義復辟”成爲事實，中國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時候，大家回過頭來一看，

早在一九八二年就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人，自然是眾望所歸了。

他這個“發言”在理論座談會第一組受到高度重視。第一組全是書記處研究室的人，他們對鄧力群這篇綱領式的演說給以高度評價，並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不過座談會的其他各組，雖然都收到了這篇講話的全文，卻不怎么熱心，甚至根本没去理會。不過這並不影響鄧力群實施自己的“綱領”，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握有實權的中宣部長了。原來大家還以為他不過是說空話，後來的事實說明，他是要把中共的全部宣傳工作納入他的“共產主義”軌道，進而用共產主義指導全國的現實生活，結果使中國大陸又刮了一次新的“共產風”。只是這次“共產風”沒有後勁，雖然引起不小的思想混亂，卻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

用新的共產風曲解中共“十二大”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號召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耀邦的政治報告也貫穿了這個精神，並且把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作為鼓舞人們的奮鬥目標。

但是鄧力群卻把他的“共產主義”作為十二大的主要精神。在十二大召開前半個月，一九八二年八月中旬，中宣部召開一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鄧力群在會上提出：即將舉行的十二大，“貫串着實踐共產主義思想這條紅綫。”他要求各地，學習和宣傳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他並且指定要學習胡喬木在十一屆七中全會上的發言，因為胡喬木的發言對共產主義“進行了十分深刻的闡述。”

胡喬木八月間在七中全會的發言叫作《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後來在九月二十四日公開發表。他最主要的論點是：“共產主義”除了是一種社會制度，還是一種“運動”，即“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實踐”。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將來才能實現的。但在

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實踐，即共產主義運動，卻是當今的現實。用他的話說：“共產主義運動是指從有共產黨到共產主義最後實現的整個過程”。因此，自從中共成立以來，黨員和革命群眾所作的一切，都是“共產主義運動”。他還舉例說：“我們今天在這裏開會，也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自從鄧力群在宣傳工作會議上布署以後，特別是胡喬木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發表之後，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高潮在中國大陸興起了。不但中共十二大的精神被歸結為共產主義，而且全社會到處都“閃耀着共產主義光輝”。爲了批駁“共產主義渺茫論”，很多地方在宣傳中都強調“共產主義就在你的身邊”，“共產主義就在你的腳下”，甚至小學生拾到五分錢交給老師，都成了“共產主義運動”。

“共產風”造成思想混亂，引起普遍反感

這種鋪天蓋地的“共產主義”宣傳，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亂，同時也有人對這種新的“共產風”提出許多問題要求解答。有些問題實際上是些辛辣的諷刺和嘲笑。下面就是各地反映的一些問題。

“現在又把共產主義思想搬出來了，是不是說毛澤東思想不行了，鄧小平和胡耀邦那一套也不行了？”

“社會主義都還沒有搞好，現在又提倡共產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不靈了，要抬出共產主義招牌來？”

“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同實行按勞分配如何統一起來？”

“四人幫空喊共產主義，同現在高舉共產主義旗幟有甚麼區別？”

“怎樣劃清‘堅持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同‘精神萬能論’和‘空頭政治’的界限？”

“有些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的生活已經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要甚麼，有甚麼，真是‘各取所需’了。”

“宣傳共產主義是‘假大空’回潮。”

“有些中高級幹部，有些黨員，光為自己撈好處。他們不信共產主義，讓我們相信？”

“宣傳共產主義，不過是讓你多幹活，少掙錢。”

“現在說的和做的不一樣。說的是共產主義，做的是對外開放，扶持個體經濟，鼓勵少數人先富起來。”

“我們搞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至今還這麼窮，怎麼能對共產主義充滿信心呢？”

“中國古代社會甚麼主義也沒有，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走在世界的前列。現在我們一直講共產主義，卻落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信不信共產主義有多大用？”

除了這類反映之外，有些地方的宣傳部門並沒有跟着這場新的“共產風”盲目地跑，他們認為，現行政策應當是主要的宣傳任務。

因為社會上思想混亂，黨內的看法也不一致，特別是下面做實際工作的幹部的抵制，這場“共產風”刮了幾個月就沒有後勁了。但是鄧力群顯然不想把已經舉起的“共產主義”旗幟放下，所以又親自組織人力在一九八三年寫出一個《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研究提綱)》用“中宣部文件”的形式發往全國，要求各地按照這個文件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宣傳，“使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能夠真正開創一個新局面”。各地宣傳部門果然把它當作“中心任務”，很是忙了一陣，然而還是沒有起色。後來是中宣部自己按照鄧力群的“研究提綱”分頭寫了一些文章編成一本書出版了。可惜的是這本書和以前那些配合政治任務的出版物一樣，在思想界沒有引起任何漣漪。特別是在文化市場上，這本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苦心策劃出來的“共產主義”著作，還沒有來得及閃耀出

“共產主義光輝”，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于是由胡喬木和鄧力群發起的這場“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終於收場了。

四 人道主義公案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遭遇

人道主義問題，在中國是一樁老的公案。人道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想：它以人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重視人的幸福和尊嚴。從這種價值標準出發，自由，平等，人權，自然是人道主義的訴求。這種思想本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不過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他那著名的《講話》之後，人性和人道主義便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除了“救死扶傷”或“優待俘虜”可以使用“革命的人道主義”（因為這是毛澤東用過的）之外，“人道主義”都被貼上“資產階級”標籤，無產階級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國大陸短暫的“解凍”期間，人道主義思想曾經稍微活動了一下，但不久就被壓制下去。（注一）以後人道主義一直是個禁區。

以慘無人道為特徵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大陸的思想界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反思。一九七八年，朱光潛第一個站出來打破這個禁區。他寫了一篇《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發表在《文藝研究》第三期上，指出人道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嚴，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劉賓雁在作家協會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發言，理直氣壯地宣告：“無產階級既然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自然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者。”^③

以後人道主義問題引起理論界和文藝界很大興趣。同時引起注意的還有“異化”問題（注二）。王若水、汝信、阮銘、高爾太等都發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據統計，到一九八二為止，已經發表有關

“人”的文章四百多篇。這股人道主義熱已經引起中共高層某些人的不滿，不過尚未爆發出來。

一九八三年，這種不滿終於爆發出來了。

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學術報告會

這一年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決定隆重紀念。除了舉行紀念大會，由胡耀邦作報告之外，還要開個學術報告會，由中宣部邀請周揚作報告。周揚選了幾個人幫他起草講話稿，其中有上海的王元化(文藝理論家)和北京的王若水。

三月七日報告會在中央黨校舉行。周揚的報告最精采也是最惹麻煩的部分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問題。

周揚說，過去，包括他在內，一直把人道主義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這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對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批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他們滅絕人性的暴行制造輿論根據。這個教訓必須記取。他說：“人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

周揚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不過他沒有忘記和資本主義劃清界限，以免遭到非議。他說：“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現在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為了克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異化。”^⑨

黨校校長王震和中宣部長鄧力群都出席了報告會。周揚報告完畢，他們兩人都向周揚握手祝賀。王震說：“講得很好！”並向周揚請教“異化”兩個字怎麼寫。

胡喬木沒有出席報告會。但周揚報告後立即把講稿送給了他。他在三天後，即三月十日，約周揚和王若水面談。他對周揚的

報告提了一些“不足”之處，比如，周揚沒有談“學雷鋒活動”，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義高漲”，等等。但他沒有說周揚的報告有甚麼錯誤。

最後他建議周揚把講話修改一下，然後出單行本。其實後來周揚和王若水才明白，胡喬木的真正意思是不要發表了。可是他並不明說，周揚當時也沒有弄懂他的意思。原來《人民日報》已經預告，將全文發表周揚的報告。所以周揚對他說：“我還要交人民日報發表呢！”

胡喬木說：“那沒有關係……如果在報紙上發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個說明。”

最後他又說：“希望周揚同志能將論點搞得更完整一些，修改好了，再正式發表。”^⑩

其實在他們談話的兩天之前，即三月八日，胡喬木已經打電話給中宣部，主要的意思是：周揚的講話“難以處理，問題不少，不是加幾句話、刪幾句話能解決的。”^⑪這就是說，這篇講話是無法修改的，當然更談不到發表了。但這話他不對周揚說，而是告訴中宣部，意思是叫中宣部去“唱黑臉”，出面阻止周揚。可是中宣部接電話的副部長好像也不願意扮演這個得罪人的角色，所以並沒有把這個電話內容通知周揚、王若水或《人民日報》。

既然胡喬木當面只是建議周揚把講話稿修改一下再發表，而又沒有指出有甚麼錯誤，只是有“不足”之處，這當然就是可以發表。至於甚麼“不足”之處，本來無關大體，修不修改，那就是作者本人的事情了。所以王若水和總編輯秦川商量之後，在三月十六日把周揚的講話發表了，題目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周揚和胡喬木的鬥爭

結果引起軒然大波。胡喬木和鄧力群嚴厲批評了秦川和王若

水，不經請示就發表了周揚文章。中宣部並把此事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書記處同意後，中宣部在三月二十六日把周揚、秦川和王若水召去開會，向他們傳達這個〈報告〉，胡喬木也來了。

〈報告〉嚴厲指責〈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文章，並說王若水應負主要責任。這份〈報告〉的實質部分是“處理意見”，大意是：

一、人道主義作為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同時組織力量寫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

二、對〈人民日報〉的編輯部進行必要的調整。王若水調出報社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揚不修改自己的講話就發表，勢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亂。希望他對自己不負責的表現有所認識。

周揚聽罷大怒，當場和胡喬木吵了起來。周揚指責胡喬木不正派，因為他三月十日談話時說“可以發表”，現在又說“不可以發表”。胡喬木堅持他沒有說過周揚文章可以發表。

吵到最後，還是各執己見。

周揚說：“一個政治局委員說話不能這樣不負責！”^⑩

胡喬木說：“不能這樣說話，那我沒有人格了！”^⑪

王若水也在會上進行了申辯，秦川也不同意〈報告〉的處理意見。鄧力群答應把他們的意見上報給書記處。不過事情已成定局，不可挽回了。雖然拖了幾個月，後來到“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王若水畢竟被撤消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並被趕出報社。

其實這場“人道主義公案”的理論爭論並不是最重要的。據知情者分析，周揚錯在他不該去作這個報告。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這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動作。紀念大會由總書記胡耀邦作報告，當然合乎規格。學術報告會自然是由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來唱主角才能順理成章。然而周揚偏偏不識時務，沒有謙讓，所以就把禍惹

下了。要知道，周揚雖然資格較老，三十年代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時曾經領導過胡喬木，但時移事易，此時胡已經是政治委員，地位遠在周揚之上了。

胡喬木和周揚的矛盾，理論問題雖然不是主要的，畢竟要通過理論表現出來。中宣部給書記處打的《報告》中，第一點就是“組織力量寫文章”，對人道主義“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這任務當然非胡喬木莫屬了。他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寫作組，動員大量人力，前後寫了好幾個月（注三）。文章寫成之後，也是先作報告，然後正式發表。文章的題目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報告的地方，也是中央黨校。這時已經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了。時間雖然晚了一年，但是對人道主義畢竟有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闡述”，這就足以彌補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由周揚報告所造成的遺憾了。

這個講話不但在報刊發表，電臺廣播，而且出了兩千萬冊單行本，並譯成少數民族文字（但是沒有出版官方的外文譯本）。中央宣傳部為此專門發出學習和討論胡喬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說，胡喬木的文章已經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於是這場公案就以胡喬木大獲全勝而落幕了。

王若水和胡喬木的較量

不料王若水沒有認輸。他從已經落下的帷幕後面走出來了。因為胡喬木自己說過，他歡迎不贊成他的觀點的人“參加爭論”，所以王若水針對胡喬木的文章寫了一篇《我對人道主義問題的看法》，交給《哲學研究》雜誌編輯部。

一個黨員竟敢寫文章公開批駁代表黨中央講話的政治局委員，這在中國大陸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那後果是完全可以預料的。所以王若水周圍的人們紛紛勸阻，但王不為所動，堅持要發表。後來《人民日報》新任社長和總編輯聯名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啓立寫信，要求制止此事。

胡啓立立即回電話說：“同意你們的意見。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發表爲宜。請說服動員王若水同志。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⑭胡啓立同時也給《哲學研究》編輯部的上級中國社會科學院打了招呼。這樣一來，《哲學研究》當然就不會發表王若水的答辯文章了。

事情好像又可以畫上句號了。

誰知接踵而來的是一個更大的波瀾。

王若水沒有罷休。書記處既然不讓他發表文章，他就直接給鄧小平寫信。鄧小平沒有表態，把信轉給中央書記處。胡啓立很爲難，只好給胡喬木打電話，胡喬木回答說，王的文章可以推遲一期在《哲學研究》發表。

這個期間，王若水加緊把文章修改得更周密一些，打印了若干份去征求意见，準備讓《哲學研究》在六月號上發表。

誰知這時節外生枝，香港的《鏡報》月刊不知從甚麼渠道得到王若水文章的打印件，搶先在六月號的《鏡報》上全文發表了。《鏡報》在“編者按語”中稱王是“理論界有名的硬骨頭”，同時刊出王若水和胡喬木的照片。更令習慣於尊卑有序的大陸當局感到難以容忍的是：居然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喬木之上。

這一下炸了鍋。文章內容早已無關緊要，當局全力追查是誰把王若水的文章交給《鏡報》的。後來還動用了安全部門來偵查王若水。不過最後甚麼也沒查出來。有關方面還向《鏡報》調查。《鏡報》斷定稿件不是得自王若水，但拒絕說出送稿人名字，因爲編者有責任保護他。

由於《鏡報》發表了王若水的答辯文章，倒使胡喬木擺脫了困境。他當然不喜歡王若水對他的“科學回答”又挑甚麼毛病，所以指示中宣部說：

“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來了，國內就不發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應予以拒絕。”^⑮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這樁“人道主義公案”終於落幕了。

(注一)作家巴人(王任叔的筆名)受一九五六年短暫的“自由化”的鼓舞,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新港》月刊上發表一篇《論人性》。他敢于提出和毛澤東《講話》不同的調子:人們除了階級性以外,還有共同的人性。他說:“我們當前文藝作品中最缺乏的東西,是人性,是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巴人僥幸地躲過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卻在一九六〇年身陷重圍。姚文元和李希凡向他展開了大批判。姚文元特別會上綱,把倡導人道主義的作家扣上“反動文人”、“修正主義者”的帽子,說他們都在“向中國共產黨進攻。”^⑩

于是王任叔以“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被定為“反黨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叛徒”,遣送回鄉勞動,一九七二年去世。

(注二)據王若水解釋,“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反過來反對主體本身。後來他用一個通俗例子來比喻:母親生下孩子,孩子長大後變成逆子,反過來虐待母親。現實生活中,人民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就是“異化”。

(注三)奉命幫助胡喬木寫作這篇文章的單位有八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央黨校,《紅旗》雜誌,《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研究室。

五 清除精神污染

鄧力群的下一個目標——《人民日報》

“清除精神污染”是鄧力群掌握中宣部之後所掀起的一場波及全國的“反自由化”高潮。

在攻下中宣部和中央黨校的兩個“自由化”據點之後，《人民日報》便成爲下一個捕獵目標了。

粉碎四人幫以來，《人民日報》一直是堅持思想解放和堅持改革的主要障地，在整個新聞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改革派和反改革的力量都清清楚楚。因此，自從中共黨內兩股力量“分道揚鑣”之後，《人民日報》就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志在必得之地。

“人道主義事件”使他們找到了這個機會。就像在中央黨校從阮銘下手一樣，在《人民日報》要從王若水下手。在發表周揚文章這件事上，他們打開了一個缺口，于是就發生了前面說的那些風波。但是光拔掉王若水還不行。《人民日報》的主將是社長胡績偉，此人在反抗“兩個凡是”的時候，以“不聽話”著稱，如果不拔掉他，就攻占不了《人民日報》這塊障地。然而不巧的是：發生“人道主義事件”時，胡績偉正好不在北京，這事株連不上。

終於有了機會，不但能撤掉王若水，而且能撤掉胡績偉，同時還可以擴大戰果，把整個思想戰綫都“清除”一下，以便牢牢控在手裏。

挑動鄧小平清除精神污染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要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在開會前一個月，胡喬木和鄧力群繞過胡耀邦和書記處，直接找到鄧小平，向他匯報了思想界的“嚴重污染”情況，並且成功地使鄧小平相信“現在思想界一片混亂”。二中全會本來是解決整黨問題，這一來就插進一個“精神污染”問題，而且實際上成爲壓倒整黨的首要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十二日兩天，中共舉行二中全會。鄧小平作主題講話，題目是《黨在組織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迫切任務》。他的要領是兩句話：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綫不能搞精神污染。

在這個講話裏，有許多都是胡喬木和鄧力群這幾年以黨的“權

威”身分對理論界的指控。所不同的是這些指控都由胡喬木寫到鄧小平的講話稿裏，變成鄧小平的話了。

被鄧小平指控為“精神污染”的例子有：

“抽象地宣傳人道主義、人的價值”。

“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

“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

“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

“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

“認為我們這個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是社會主義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④

鄧小平講話時都沒有指名。但多少留心思想界的人都知道指的是誰。因為胡喬木和鄧力群早已在各種場合反復批判過這些人了：除了周揚和王若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以外，還有郭羅基（言論自由問題），胡績偉（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李洪林（四項基本原則問題），蘇紹智和王惠德等（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于光遠（“一切向錢看”問題）等等。

其實這些人的觀點都是被人斷章取義加以歪曲之後才匯報給鄧小平的。鄧小平本人對理論興趣不大，即使有興趣也不會有時間去看那些文章。因此對於這個領域，他只能靠看“簡報”或聽匯報來了解情況，決定對策。

除了重點批評理論界，鄧小平還批評了文藝界熱心寫陰暗的東西，鼓吹“現代派”思潮和“人性論”等等。

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領導軟弱渙散”，這顯然是又一次對胡耀邦敲起警鐘。

整肅王若水和胡績偉

鄧力群和胡喬木在二中全會上集中力量批判王若水。他用書記處研究室所提供的詳細材料，把王若水一九七八年以來所發表的言論，不但包括文章而且包括他所講過的話，都搜集起來，加上“人道主義”和“異化”，一共歸納成十大問題，目的在於說明王若水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拒絕中央領導的批評，即拒絕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批評，堅持不改正“錯誤”。

除了王若水的材料以外，鄧力群還向會上提供了書記處研究室編印的《幾年來〈人民日報〉理論版宣傳中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指控《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所發表的李洪林論述四項基本原則的系列文章是“從反面提問題，不是積極宣傳四項基本原則，而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製造了思想上的混亂。”更嚴重的指控是：李洪林的文章是“針對”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方針”而寫的。¹³

按照鄧力群在二中全會上的發言和所提供的材料，這個《人民日報》主管理論部和評論部的副總編輯老是和中央不一致，這份黨中央的機關報老是發表“反面”文章，而且居然敢把矛頭針對鄧小平，當然是不能容忍的狀況了。於是，不但王若水必須撤換，而且《人民日報》也必須改組。

果然，三月間沒有完成的任務，到了十月間“超額”完成了。中央書記處不但立即決定免去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調離《人民日報》，而且“同意”社長胡績偉“辭職”。（注一）

這樣，《人民日報》社裏這兩個“和黨分道揚鑣”的眼中釘，終於拔掉了。

不過並沒有“萬事大吉”。新任社長秦川原是胡績偉的老搭檔，雖然不像胡績偉那樣撈角分明，但在堅持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方針上，兩人是完全志同道合。而且在中國的政治風雲當中怎樣

周旋，秦川比胡績偉更在行些。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理論部，一直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三中全會路綫這一邊。因此，雖然胡績偉和王若水被拔掉了，《人民日報》並沒有被接管過去。所以對這塊陣地的爭奪並沒有結束。

整肅周揚和李洪林

除了胡績偉和王若水之外，周揚和李洪林也是胡喬木和鄧力群“精神污染”名單上應予“清除”的對象。周揚是中宣部顧問，本應到中宣部來接受批判。但他在二中全會期間已經在顧問委員會受到批判，本人又有病，就沒有再到中宣部來“受教育”。但是他必須公開承認錯誤，否則過不了關。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他被迫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一篇談話，其實這篇“談話”乃是新華社替他起草的，他被迫點了頭，就算是他的談話了。在這篇“談話”裡，他承認自己“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一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他違心承認“錯誤”的談話，登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全國的報紙上。這是在全國人們面前對他的公開羞辱。

周揚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藝界忠實地執行毛澤東的左傾路綫，傷害過不少人，最後自己也身陷牢獄，在鐵窗中苦度了十幾年歲月。平反後他誠懇地反省了自己的錯誤，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直走在前列，因而得到大家的諒解和敬重。但這一次打擊對他來說太重了，以致從此臥床不起，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含恨去世。（注二）

鄧力群又動員整個中宣部的人馬，經過周密準備，對李洪林開了五次批判大會。舉行這樣大規模的批判會，對一個人連續五次進行圍剿，這是三中全會以後的最高紀錄。不料李沒有檢討，反而在批判大會上批評了鄧力群違反中央決定和打擊報復的錯誤行為。此後，李即被調往福建。

在此之前，全黨和全國範圍內的“清除精神污染”，鄧力群早在

二中共會之後就布署下去了。這是在批判《苦戀》之後，由中央發動的又一次全國規模的思想鬥爭運動。批判《苦戀》雖然也引起全國震動，但對象很少，只是白樺一人。“清除精神污染”把社會各界都捲進來了，所以震動巨大。而且甚麼叫“精神污染”，界限也十分含糊；怎樣“清除”，更是各顯神通。許多文學名著和電影，因為有些情節和鏡頭涉嫌“污染”而被查禁。女子的鮮艷服裝和化妝，披肩髮和高跟鞋，也被當作“污染”而取締。甚至書刊封面的美女像都成了“污染”，更不要說美術作品中的人體像了。這樣弄得人心惶惶，有人以為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鄧力群的重點是理論界。在向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共會精神時，他布置了一個震驚全國知識分子的任務：各單位都要清理公開的和內部的報刊、書籍、文章。不但清理本單位發的各種材料，而且要清理“本單位工作人員在這個學會那個學會上的講話”。

這樣一來，所有在公開和內部場合，寫過的和說過的東西，都要清查。而且鄧力群還交代：“自己查，別人也查”。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一個接一個的思想運動已經把全國知識分子弄得焦頭爛額了。但是不論哪個運動，也沒有對文字和口頭的言論這樣徹底地清查過。

新的“專案組”和黑材料

為了準備和推動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力群領導的書記處研究室連續編印了許多“簡報”，把他們所選擇的“自由化”言論摘錄下來，一份接一份向中共中央報告，同時又從中選出一部分向全國通報。被他們當作獵物的人，一般是看不到這些“簡報”和“通報”的。這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專案材料”在對受害者保密這一點上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研究室所整的材料只是“思想材料”罷了。

在背後搜集和整理某些人的材料，經過“加工”以後向上控告，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使本人事先既不知情，事後又不能申辯，這種手法引起人們普遍反感，有人憤怒地把它叫作“克格勃”。

鄧力群也知道這種做法聲譽不佳。但他認為這是正確的，所以堅持這樣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他向首都部分理論工作者講話時，為自己作了辯護。他說：“書記處研究室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思想戰綫的情況。”他強調這種反映要準確，不過他用語很有分寸，叫作“力爭不出任何差錯”。這就是說，反正他已經“力爭”了，至于出不出差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指責有人反對他們向上反映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風氣”。他舉阮銘為例：“比如阮銘。摘了他若干文章中的一些錯誤觀點上報中央，而且反復查對，是負責的，嚴格實事求是的，他就抗議，說是整他的黑材料。”（注三）鄧力群還說：“最近有的討論會上也有人說，‘我們當中有沒有克格勃啊？’這樣的話，居然是共產黨員說出來的！不允許別人向組織、向中央報告自己文章、發言中的錯誤觀點，你要報告，你就是搞黑材料，就是克格勃。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夠這個樣子呢？應當襟懷坦白嘛。”但他沒有說，他們所整的那些背後告狀的材料，為甚麼不能“襟懷坦白”地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都見識見識，特別是讓被告者本人看看。

“達于極端，走向反面。”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走的太遠了，結果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廣泛的惶惑與不安。連國際上都弄不清中國究竟出了甚麼大事。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不斷努力限制它的範圍，使這場運動不要破壞經濟建設和安定團結的局面。他們的努力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這就使“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逐漸停下來了。後來的說法是“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胡耀邦下臺時，有一條罪名就是說他打斷了“清污”，才搞了二十八天就停止了。其實這個運動連頭帶尾不止這些天，不過它在大家的抵制下，還沒有泛濫成災就悄悄收場了，卻是事實。

這件事又一次證明，在新的歷史時期，再想發動一場大規模的

思想運動，已經很不容易了。

(注一)書記處關於《人民日報》問題的決定是十月二十日作出的，十月二十九日向報社領導人正式宣布。本來這就完事了。但十月三十日胡喬木和鄧力群兩人又專程到《人民日報》社召開大會，由他們兩人再向全體人員宣布這個決定。胡喬木在講話中又把胡績偉和王若水仔細批了一頓。

鄧力群在會上也講了話，他最後有一句話引起人們注意：

“我表示一種願望……就是願意來參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報的某些問題的討論，同報社新的領導班子一起合作，共同學習，共同提高，來實現黨中央對我們的希望。”^⑨

起初大家不知道為甚麼他要講出這幾句話，好像在拉關係，甚至有“一家人”的味道。後來才知道，胡喬木和鄧力群想把《人民日報》變成中宣部的下屬單位，並為此作了極大努力，那樣中國大陸這塊最主要的輿論陣地就完全歸他掌握了。

但是《人民日報》新任社長秦川和報社全體堅決反對這種企圖。在中央內部幾經折衝，《人民日報》終於保住了自己，仍和中宣部平行，都是中共中央直屬單位。

(注二)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胡喬木的文章正式發表時，周揚已經臥床不起。這一天胡喬木志得意滿，詩興大發，吟詩一首送給周揚：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亮大地
更美了：擁抱着一對戰士。

他還附一張便箋：

周揚同志：

近日寫了一首小詩，謹以奉呈。

祝春節好，靈揚同志並此問候。

胡喬木 一月二十六日^①

“靈揚”是周揚夫人蘇靈揚，此刻正陪侍在周揚病床左右。

胡喬木的“心”，到底是在流血，還是在發出勝利的微笑，別人永遠不會知道。但周揚卻不是傷了手指，而是被胡喬木一劍刺中心臟。這個傷口沒有愈合，而是致周揚于死地。

至于胡喬木對周揚的“友情”如何，周揚自然是深有體會的。這種“友情”，從蘇靈揚的反應中可以得到證明。她曾大罵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口氣罵了兩個多小時。

（注三）鄧力群所整的關於阮銘的材料，足以使阮銘被開除出黨。但是這份決定阮銘政治命運的材料卻一點也不“光明磊落”：一直對阮銘保密，使他無從申辯。所以阮銘說它是黑材料。

※ ※ ※

第十一章 引文出處

①《鄧小平帝國》第 142—143 頁

- ②《十年的路》第 138 頁
- ③同上,第 120 頁
- ④《鄧小平帝國》第 139 頁
- ⑤同上,第 140 頁
- ⑥《十年的路》第 112 - 113 頁
- ⑦《鄧小平帝國》第 111 頁
- ⑧《文藝評論》1979 年第 6 期
- ⑨《人民日報》1983 年 3 月 16 日
- ⑩《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第 49 - 51 頁
- ⑪同上,第 59 頁
- ⑫同上,第 74 - 75 頁
- ⑬同上,第 76 頁
- ⑭同上,第 247 頁
- ⑮同上,第 260 頁
- ⑯《文藝報》1960 年第 2 期
- 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269 - 271 頁
- ⑱《理論風雲》第 202 頁
- ⑲《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第 183 頁
- ⑳同上,第 228 頁

第十一章附圖



一九八二年王震入主中央黨校，首先拔掉胡耀邦指導全國理論戰線的旗幟——《理論動態》。主編《理論動態》的是理論研究室，它的主任吳江，副主任阮銘和孫長江是王震整肅的對象。吳江和孫長江被調出黨校。阮銘則被開除黨籍，成為“分道揚鑣”後第一個被清除出黨的“自由化分子”。上圖為阮銘遭清洗後，在李洪林家中與部份好友合影。（後排：右一為阮銘，右三為《新觀察》主編戈揚，左二為哲學家王若水，左一為法學家于浩成。）



第二場「反自由化」運動中人道主義公案的主角周揚和他的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講話稿起草小組合影。

前左一為周揚，左二為王元化，後排中為王若水。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1985 - 1987)

由于鄧力群的“清除精神污染”弄得怨聲載道，並被胡耀邦及時制止，所以它的破壞作用沒有來得及充分發揮，而且鄧力群和胡喬木也因受挫而有所收斂，所以從一九八四年下半年起直到一九八六年底，總的說來思想界較為平靜。

不過這種平靜只是表面現象。反改革的政治暗流從來沒有休止過，並且終湧現出來，形成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高潮。

這是第三次“反自由化”高潮，它是第二次“反自由化”高潮的繼續，不但完成了第二次高潮的遺留任務，而且沖垮了中共的“鄧胡趙體制”。

一 “反自由化”間歇期的平靜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又一次突破馬克思主義

“清除精神污染”被制止以後，據說鄧小平已經意識到鄧力群謊報軍情，以致弄得人心不安，輿論嘩然，因此決定撤掉他的宣傳部長職務。但此事因被海外傳媒提前曝光而擱置，所以鄧力群在宣傳部的位子又保住了一段時間。不過這個期間他已很難有所作為，實際上是拖延時日而已。這可以從兩件事情上明顯地看出：

首先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改革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這一年十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全面的經濟改革，把商品經濟引入社會主義。這是繼農村“包產到戶”之後，對馬克思主義框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注一)這件事在胡喬木和鄧力群的眼裏，當然是貨真價實的“離經叛道”。一向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

鄧力群，在中共中央這個決定面前能幹甚麼呢？作為中宣部長的他，當然不敢公然反對中央的決定，于是就只能是消極怠工了。專以鬥爭為職業的人既然不做事情，自然就天下太平了。這是當時思想界較為平靜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胡耀邦在這個期間得到鄧小平較多的支持，在宣傳工作上當仁不讓，抓的比較得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唱主角的不是鄧力群，也不是胡喬木，而是胡耀邦。

胡耀邦在會上作了主題講話，題目是《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裏所說的“部門”，實際上就是指鄧力群所控制的宣傳部。他針對胡喬木和鄧力群一九八二年以來背離中共的現代化路線，另搞一套的作法，要求宣傳部門必須為四個現代化服務，要克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消極影響。^①

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八五年一月初，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宣部照例“安排”了作協的領導人名單，結果被中央書記處否決。胡耀邦指出：像作家協會這樣的社會團體，其領導人選不應當由共產黨來決定，而應當由作家們自己選舉。大會實行自由選舉的結果，巴金當選為主席，劉賓雁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是《人民日報》的著名記者，又是廣大讀者喜愛的作家。他這幾年足跡遍南北，寫了幾十萬字的報告文學和通訊。他除了報導改革開放的新人新事以外，也勇敢地揭露為非作歹的當權者，伸張正義，為受害者鳴冤，因而得罪了不少權貴，備受他們指責，成為有名的“自由化”人物。這次在作協大會上，他以僅次于巴金的高額票數當選，大快人心。此事在知識界傳為美談。

這次作協代表大會，由胡啓立按照胡耀邦的意思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賀詞的主旋律是創作自由，這更使人們精神振奮。不光是文藝界，整個知識界都深表歡迎。

以“三寬”精神著稱的朱厚澤出長中宣部

一九八五年七月，鄧力群終於被撤掉中宣部長的職務。以開明著稱的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被調來接任中宣部長。不過鄧力群仍舊是中央書記處一名書記，再加上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兩人都是所謂“分管思想戰綫”的“中央領導人”。這使朱厚澤的中宣部長很難當，雖有胡耀邦的支持，他也不得不謹慎從事。

爲了使全國的思想界免遭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扼制，朱厚澤上任以後從不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因爲要開這種規格的會議，勢必要向胡喬木和鄧力群請示報告，他們也一定要來作報告，發指示，貫徹他們那一套左傾精神。如果不開這種高規格的會議，那就沒有必要去麻煩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的範圍以內，部長自然可以獨立負責，便宜行事了。

朱厚澤就是這樣開展工作的。他的指導方針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以促進這塊園地的繁榮。這是他在一九八五年七月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來的。他呼吁，對於不同的思想觀點採取寬容的態度，對於有不同意見的人寬厚一點，要創造一種寬松的環境。後來人們稱之爲“三寬”。

由于主管意識形態的新任中宣部長採取“三寬”方針，所以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到一九八六年間，思想界繼續保持一種較爲平靜的局面，甚至有點活躍。《人民日報》，《新觀察》，《讀書》，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都有爲改革開放立論的高水平文章陸續發表。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出版的理論刊物《青年論壇》。它是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間中國思想園地一朵奪目的鮮花，可惜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凋謝了。

《青年論壇》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一些青年人自發創辦的，雖然依附於社會科學院，實際上是自負盈虧的民辦刊物，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開始出版。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爲《青年論壇》創刊號寫了一

篇文章《為自由鳴炮》，把中共最害怕的“自由”作為主題，一炮打響，震驚全國。這份刊物不但為青年喜愛，而且迅速在理論界甚至整個出版界贏得相當高的聲譽。

當然，這樣一份旗幟鮮明的刊物不可能逃過胡喬木的眼睛：一九八五年《青年論壇》曾經受到很大壓力，鄧力群指名批評這個刊物，指責它發表了很多談自由的文章。不過這個雜誌還是硬著頭皮撐下來了。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宣部明確地給《青年論壇》以支持。朱厚澤率人到武漢時，專門去看望這個雜誌的編輯部，並和他們座談，這就使它重新獲得生機。曾在北大參加競選的青年學者胡平的著名論文《論言論自由》在《青年論壇》發表，更加擴大了這個刊物的影響。

胡耀邦的遺言

從表面上看，一九八六年確實是思想界的好年景。這好年景還體現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會議開到十一月一日，胡耀邦忽然來了。這是自從一九七九年理論工作務虛會閉幕以後他第一次和理論界人士會見。他在講話中非常明確地指出，阻礙社會科學繁榮的阻力，首先來自黨的領導：“不正確的干預太多”，“讓一些理論工作者坐冷板凳”，“拿着棍子在頭上搖晃”，等等。談到打棍子問題時，他說：“中央是決不會打棍子的。幾年來打的棍子不是黨中央的，這一點你們心中有數，不用我說。”他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就只剩下點出人名了。大家都清清楚楚，這是在批評胡喬木和鄧力群。這是一個重要信息，表明中央內部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變化，思想界的又一個春天快要來到了。當時在會場上就有人提出這幾年已經有人被撤職、有人被開除黨籍、有人被趕到外地。胡耀邦答復說：“寫報告來，我們就糾正。”^②

這次講話使人心大振。人們都認為思想界第二個春天快要到

了。

然而這個春天始終沒有來臨。更使人想不到的是，這次談話竟是胡耀邦和理論界的最後一次見面。那一席鼓舞人心的談話竟成了他的遺言。不但那些遭到大棒打擊的知識分子未能平反，而且這位總書記自己，都被大棒打下臺了。（注二）

（注一）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商品經濟是互相排斥的。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國民經濟一切部門都必須嚴格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生產。這種產品不是商品，不通過市場進行交換，而只能按計劃進行調撥，並按計劃分配給社會成員進行消費。每個成員都按自己付出的勞動量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不是使用貨幣到市場上去購買。

馬克思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通過市場自發的價格波動來調節的，它必然產生競爭，必然導致生產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導致工人失業，導致階級矛盾激化，導致社會革命。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就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全部生產資料收歸公有，實行計劃經濟。

（注二）胡耀邦和理論界這次會見，有薄一波陪同。他當時和胡耀邦完全一致，配合默契。

例如，當胡耀邦要大家給受打擊的人寫報告來，以便糾正時，薄一波插話說：“被打的同志頭皮要硬一點，頂住。”

再如，當胡耀邦談到“要說理，不要打棍子”時，薄一波插話說：“真理挨得起棍子”。

二 決戰前的外圍之戰

鄧胡趙體制的脆弱基礎

思想鬥爭從來都從屬於政治鬥爭，或者本身就是政治鬥爭。

而政治鬥爭的成果差不多都要落實在“組織”上，也就是人事安排上。總之，不管甚麼鬥爭，都是由人來進行的，因此人事問題歷來是戰鬥最激烈的所在。它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是決定勝負的標誌。

中國擺脫毛澤東路線，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是以“鄧胡趙體制”的建立為標志的。這個體制的建立，當然有黨內外民主力量的擁戴，但它不是民主制度的產物，而是專制制度的產物。當初總書記人選的確定，不是民主選舉，而是黨內一些元老挑選的。鄧小平挑選胡耀邦，當時就有人不同意。有人傾向於趙紫陽，因為趙紫陽主張“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不過最後還是胡耀邦入選。但是胡耀邦當上總書記那一天起，反對者的活動就沒有停止過。這些人的切身利益和毛澤東的傳統體制是緊密相連的。胡喬木和鄧力群是這股力量的代言人。他們的觀點無非是保守勢力現實利益的理論表現。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胡喬木和鄧力群對理論界“分道揚鑣”的指責和幾個“回合”的鬥爭，雖然都是思想界的風雲雷雨，實際上都是指向胡耀邦的。

任仲夷和項南中箭落馬

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平生光明磊落，政治上從不玩弄權術，組織上更不拉幫結派。可是他的對手卻不這樣，幾年來他們堅持不懈地把胡耀邦的陣地一塊一塊奪去，把他的羽翼一根一根拔掉。就在鄧力群政治上受挫，在思想戰綫處於守勢的時候，陳雲掌握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在一九八五年把任仲夷（廣東）和項南（福建）拔除了。（注一）這兩個人是在改革開放前沿省份掌權的最著名的省委書記，是“鄧胡趙”體制在地方上最得力的支柱。中紀委利用“海南汽車案”（當時海南未建省，屬廣東）和“晉江假藥案”（晉江是福建一個縣），追究省委責任，把他們兩人撤換下來，並給項南一個“警告”處分。（注二）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不但胡耀邦無力回天，就是鄧小平也只能作壁上觀，這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形勢。名義上的總書記是胡耀邦，但是鄧小平和陳雲是在胡耀邦之上“垂簾聽政”的兩位元老。這兩位元老之間雖然鄧小平為主，但是陳雲也足以和他分庭抗禮。他並不是鄧的下級，鄧對他還得尊重。如今陳雲已經從簾子後面走了出來，運用他直接掌握的中紀委的權力，志在必得地拔掉項南和任仲夷，鄧小平和胡耀邦也就只好認帳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反改革勢力的目標是胡耀邦。從控告郭羅基到撤換項南和任仲夷，都是在掃清外圍，一步步向核心逼近。當然最後解決戰鬥要以鄧小平的向背為轉移。因此，怎樣使鄧小平最後和胡耀邦決裂，就是能否打倒胡耀邦的關鍵。而鄧小平恰恰在“反自由化”的問題上不滿意胡耀邦，並且同反改革的勢力站在一起。這就是把鄧小平調動過來打倒胡耀邦的最佳切入點。

“反自由化”問題上的短兵相接

在“自由化”上挑起鄧小平和胡耀邦的矛盾的機會又一次來到了。

預定於一九八六年九月舉行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將通過一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一個決議稿，總的精神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稿裏沒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樣，倒是強調高度民主的重要性。這個稿子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時，遭到王震、彭真、薄一波、胡喬木和鄧力群的猛烈反對，他們堅持必須加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胡耀邦做了妥協，加上了一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③

但是陸定一堅決反對在決議中寫進“反自由化”。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中宣部長，知道這個名詞的來龍去脈。原來這是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為反對中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幫用它來打人，造成極壞的後果。因此陸定一主張不再使用。

這場爭論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會閉幕時達到高潮。《決議》即將提付表決，陸定一又一次重申他的主張，並得到萬里的支持。彭真、薄一波、王震等繼續反對陸定一的意見。結果鄧小平表態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④

鄧小平的話當然就是結論。於是這場爭論就結束了。胡耀邦在會後曾布置大家不必把會上的爭論向下傳達，以便集中精力領會決議本身的精神。他沒有料到，這正好給對手提供了一個挑撥他和鄧小平關係的機會。

鄧力群和胡喬木向鄧小平報告說，胡耀邦想隱瞞鄧小平的講話，不讓大家向下傳達。鄧小平大怒，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⑤

拔掉胡耀邦的鬥爭就這樣一步一步接近最後的決戰了。當胡耀邦在薄一波陪同下和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的參加者見面時，顯然對此一無覺察。他還滿懷信心要給遭到大棒打擊的理論家們平反，卻不知道反改革的勢力已經把大棒舉到他這位總書記的頭上，就要打下來了。

(注一)據《鄧小平帝國》揭露：“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利用晉江“假藥案”、海南“汽車案”打擊走在改革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開放前列的福建、廣東兩省，是陳雲親自策劃部署的，他堅持將項南、任仲夷調離福建、廣東兩省，並堅持給予項南黨內警告處分。”^⑤

(注二)這兩個案件是屬於經濟違法案件，應該處理。但是中紀委小題大作，目的就是整倒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從而削弱胡耀邦的力量。拿“晉江假藥”來說，這是晉江縣幾家鄉鎮企業，把一些“銀耳沖劑”之類的飲料冒充藥品(雖然不能治病，但也不是毒品，未曾致人死命)，當然應該取締。實際上福建省行政當局早已發現此事並且已經做了處理，假藥已經完停止生產和銷售。也就是說，這是福建省自己已經解決過了的問題。但是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忽然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給福建省委的《公開信》。這封信嚴厲指控省委對於假藥“竟然熟視無睹，聽之任之，甚至把大量制造假藥危害人民的鄉鎮加以表揚。”這完全是瞪着眼睛說瞎話，因為福建省早就發現並且處理了這件事。現在中紀委忽然這樣大張旗鼓，重新提起過去的事，把舊帳當新帳，而且由中紀委用“公開信”的形式譴責一個省委，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怪事。這封信發表之後，誰都看得清清楚楚，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三 三反“自由化”的背景

片面改革導致嚴重腐敗

中國自從走上改革道路以來，一直沒有把政治改革放到日程之上。經濟上逐步放開搞活了，但是政治制度依舊。這種跛腳走路的辦法不但拖延了改革的進程，而且必然引發許多社會矛盾。人們普遍能夠感受到並且也最不能容忍的是有權者的腐敗，比如大量揮霍浪費或直接侵吞國家資財，利用權力為子女親友謀取利

益，趁改革開放之機進行權錢交易，以及各種各樣的貪贓枉法行爲。

腐敗當然不是中國特產，凡有權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杜絕。但是在民主政治的環境裏，政治透明度高，權力受到制約，特別有強大的輿論監督，腐敗就不易藏身，一旦被揭露，便難逃法律懲處。而最終制約這一切的，是人民手中的民主權力。相反，在專制制度下，不管甚麼冠冕堂皇的招牌，實際上實行的是人治。政治上是“黑箱作業”，根本談不上分權制衡，更不會有甚麼輿論監督。在這種環境裏，腐敗現象就是必然的，中國就是這樣。

人民既然不能通過輿論監督來揭發和制止官吏的腐敗，又不能通過正常的民主程序和法律程序制裁和撤換腐敗的官吏，這種憤懣的情緒和改變現狀的要求便總得有個表達和宣泄的渠道。可惜這種渠道在中國很不通暢，因為一切傳播媒介都是官方的，它們只是“黨的喉舌”，而不是人民的喉舌。人們如果想通過官方媒體表達意見，也必須經過黨的過濾和選擇。原來的憲法還規定公民有貼大字報的自由。一九八二年以後這項權利也取消了。于是上街便是人民唯一能表達自己意見最直接的途徑了。

這就是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學生上街游行示威的真正原因。一九八五年示威的規模比較小，當局採取較為容忍的態度，也就過去了。一九八六年規模比較大，波及全國十八個省二十八個城市的高等院校。

一九八六年的學潮

學潮最初是從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當時合肥正在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科技大學校園內有人貼出大字報《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信中說，“人民代表大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們“爲真正的民主而鬥爭。”^①四日晚上，學校召開了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大會，有學生登臺演講。科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大副校長方勵之也講了話，他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議論好久了，真正自由的選舉就是一個突破口。他告訴大家，前不久青海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省長，結果欽定的省長幾次都選不上，因為代表們不投他的票。這表明民主意識的抬頭。方勵之還不指名地批評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連起碼的民主都不懂。周曾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大開會表決的票數是三千比零，這比美國的五十一比四十九要民主得多。

方勵之號召大家爭取民主，他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會被收回去的。”他的講話受到熱烈歡迎，不斷被聽眾的鼓掌和喝采所打斷。^⑧

科技大學學生第二天就在合肥市各高等學校串連，並在當天下午舉行示威。消息傳出，許多城市的大學生都動起來了。

方勵之的思想無疑在促進學生民主意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學生上街。然而學生還是去了。

據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估計，只有“少數學生上街游行，他們只占全國在校大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一二”。^⑨其實這就不是一個小數，百分之一，大約是兩萬多人，百分之二就有四萬多人了。

這些人一上街，那影響就不止幾十萬或幾百萬了。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規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共的傳統政治文化，除了官方組織的以外，一切群眾自發的游行示威都是“鬧事”。其實這本是民主政治的常規，是公民和平表達意願的一種方法，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就連何東昌在記者會上也承認：游行的學生是“熱愛祖國，支持改革”的，他們“關心民主和自由”，“希望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進程加快些”。他特別指出，只有個別人趁游行之機進行搗亂，有破壞活動，已被抓了起來，而這幾個人恰恰不是學生。^⑩

可見，即使從何東昌所表達的官方觀點看，這次學生運動的主

流也是好的。群眾起來要求民主自由，支持改革，這不正好是給中共的三中全會路綫撐腰嗎？然而這次學生上街引起的卻是反作用；最堅決的改革派胡耀邦被趕下政治舞臺。領導中國改革事業的“鄧胡趙”體制破裂了。

老人幫的戀棧和反胡聯盟的形成

本來在一九八六年夏天，鄧小平曾和胡耀邦商量過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換代問題，並且預定要在一九八七年的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實現。鄧小平對胡耀邦說：

“我全下，辭去一切職務，不再當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那個軍委主席職務，把總書記讓給年輕人當。趙紫陽也半下，當國家主席，把總理讓給年輕人當。這樣，可以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有利于幹部的年輕化。”^①

這種安排方法當然談不上“民主”，而只是封建家長式的安排。不過它確實是專制政體內部的一種改革，不但取消了終身制，而且可以把一大批干預政治的老人換下來。這批老人曾經是戰爭年代的英雄和功臣，如今到了新時期，除了少數站改革前列之外，從總體上說，不論從年齡還是知識結構上看，都很難和現代化的需要相適應。更何況有少數人固守舊的傳統和既得利益，成為現代化的包袱甚至是拌腳石。

胡耀邦完全贊成鄧的意見，並把它告訴趙紫陽。但是很快這個提議就傳出去了，立刻引起嗜權如命的一些老人群起而攻之。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小平同志不能下！”王震在中央黨校一次大會上竟破口大罵：“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②其實不便說出來的真正理由是他們自己不能下。為了避免在即將到來的“十三大”上被迫退下來，這些老人們加緊進行打倒胡耀邦的活動。如果能在“十三大”之前把胡拉下來，那麼“十三大”時整個大換班就可以避免了。因為胡是改革終身制最堅決的，他一下臺，別人就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未必那麼堅決了。爲了實現這個戰略意圖，他們的策略是“捧鄧，拉趙，打胡”。時機呢？學生們送上門來了。“學生鬧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煽動的”；“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濫，是胡耀邦姑息縱容的結果”；結論是“胡耀邦不能勝任總書記職務”。打倒胡耀邦的邏輯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事實證明，這種策略是有效的，反胡聯盟形成了。鄧小平完全站在反胡聯盟這一邊，趙紫陽也是這樣。

胡耀邦留下了孤身一人。

鄧小平的強硬決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李鵬、何東昌（國家教委副主任）到他家裏，就學生運動發表了嚴厲的談話。

他談話的主題是要用嚴厲手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指責胡耀邦“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③他以前曾指示，要開除老作家王若望的黨籍，因爲他被人指控散布“自由化”言論。王若望在上海，上海的黨組織沒有聞風而動，胡耀邦也存心保護，此事就壓下來了。這種事當然早有人向鄧小平打過報告，所以鄧小平質問胡耀邦說：“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爲甚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④

他又搬出老帳，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寫不寫“反自由化”的爭論來責備胡耀邦。“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起甚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

連他曾經打算從文集裏刪除的關於“精神污染”的講話，這時也成了好東西。他特地指出：“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

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⑮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這個談話裏已經明確表示，爲了平息學生運動，要有不惜流血的決心：

“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甚麼辦法？”^⑯

再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決心不顧國際輿論，並且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起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這一段話在發表時被胡喬木把魏京生的名字刪去了。）^⑰

講完話，他吩咐說：“今天講這些話，主要是明確方針，具體事情你們去辦。”

事實上這一次學生運動，由於學生和警察都相當克制，並未發生嚴重事端。北京學生在一九八七年元旦早上游行到了天安門，被警察拘捕。當晚有更多學生進城來到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公安部門不但迅速釋放了被捕學生，而且把來游行的學生全部用大汽車送回學校，和平地解決了這次事件。

其他幾個城市的學生運動也都先後平息了。

然而對於反胡耀邦的勢力來說，這僅僅是八股文的“破題”，這場戰略決戰的正式文章還沒有作呢。

四 “鄧胡趙體制”的破裂

反胡耀邦的宮廷政變

鄧小平召見後的第三天，即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一說一月一

日),胡耀邦向鄧小平提出辭呈。

他在辭呈中表示沒有聽鄧小平的話,以致犯了錯誤,並且講出這樣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話:“一些壞家伙居然把我當作他們的保護傘,蠱惑人心,毒害青年,制造動亂,使已經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不能更好地發展,這個後果是嚴重的。”“鑒于我的錯誤嚴重,我請求讓我下來,以便認真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代。”^⑩

胡耀邦此時亂了方寸。

他是黨的總書記。總書記是中央全會選出來的,要辭職也只能召集中央全會,由中央全會按照民主程序決定是否接受他的請求。而且他這個總書記正好有權召集中央全會,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辭職的請求交給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胡耀邦向排名第二的鄧小平遞出辭呈。有權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會議的總書記自己不召開會議,而是被別人召來召去。所有這些極簡單的程序都亂了套,可見胡耀邦事實上已經被中共強大的專制傳統壓垮了。或者更確切些說,他本來就不曾跳出這種專制傳統的框子。中共的“馴服工具論”培養出來的“黨性”,實際上是逆來順受的奴性。所以盡管胡耀邦本來有合法的權力,但事到臨頭還是跌到專制傳統的宗祠裏,在鄧小平這個大家長的壓力下面,完全失掉了自己,而把命運拱手送給別人。這“命運”還不單是他個人的去留,而是中國改革的前途。

接到胡耀邦辭呈的第三天,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鄧小平召集趙紫陽、彭真、王震、薄一波、楊尚昆到家裏研究。只要看看與會人的名單,就知道胡耀邦的下場了。此時,唯一能保護胡耀邦或至少能起緩沖作用的,是趙紫陽。當時在場的只有鄧小平和他是政治局常委,別人只是些反胡的老人,他們當然可以鼓噪,但在中共最高決策圈內沒有法定權力。然而趙紫陽恰恰主張罷黜胡耀邦,於是胡耀邦的命運就決定了。

“決定”做好了,怎麼實施呢?延安整風模式又派上用場了:先

進行思想批判，然後進行組織處理。這樣一篇文章做下來，才顯得順當。當然，那組織處理的結論早在鄧小平家裏做好了，現在的邏輯只是從結論出發，回過頭來找出“前提”而已。

非法圍攻總書記的“生活會”

經過準備之後，從一月十日到十五日開了六天“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這種“生活會”是專為罷黜胡耀邦而創造的“新生事物”。它既不是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書記處會議，更不是紀律檢查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的甚麼會議，同時也不是中央委員會特設的甚麼會議。就是說，這是黨章上根本沒有合法依據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會議”。誰能出席這個會議，誰不能出席這個會議，完全沒有章程可循，而是隨意挑選的。這個“生活會”的“生活”，就是圍攻黨的總書記。這個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由誰來主持？是薄一波，而他連中央委員都不是。

根據薄一波的報告，會議參加者連胡耀邦在內，大約三十人，其中發言的二十一人，書面發言的六人，沒有正式發言但有插話的二人。至于有沒有光參加會議而不發言的，就不得而知了。

與會者對胡耀邦的批評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 對“反自由化”一貫消極。而對“自由化分子”則採取縱容保護政策。胡在一九八四年作協“四大”籌備期間宣布“反對精神污染以後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不提了”，這就造成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一九八六年胡在“自由化”思潮面前繼續軟弱退讓，以致“自由化分子”提高了“自由化”要求的水平，這就為一九八六年冬天的學潮提供了思想準備。

2. 很少提“四項基本原則”，在言論和行動上，都是只反左不反右。

3. 在經濟工作方面，宣揚高指標，提前翻番。提倡刺激消費，促進生產，把消費放在生產前面。這是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那

裏拿來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相容的。

4. 在政法工作方面，宣傳國家大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5. 違反外交紀律，說了許多極不應該說的話。
6. 擅自發表許多“未經中央授權”的有關重大問題的言論。

這六個方面中，前三個“錯誤”應該說大體符合胡耀邦的實際。其實這三條恰恰是胡耀邦忠實執行三中全會路綫的證明，是他堅持改革開放方針的體現。其中第三條“刺激消費，促進生產”正是他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表現。在這一點上，他比中共中央領導層裏的任何人都看得更遠。

至于第四、五、六這三條“錯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純粹屬於無端尋釁。胡耀邦是中共歷任領袖中民主傾向最為堅定的一個，怎么可能去主張人治而反對法治？至于他平時說話，應該說是最坦誠的。他說話最少官腔，最少空話。包括他最受指責的與香港記者陸鏗的談話，也沒有甚麼可以詬病之處。中共甚麼時候為黨的領袖規定過甚麼話能講，甚麼話不能講，甚麼話要經“中央授權”？誰代表中共中央向他“授權”？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和鄧小平，有誰在張口講話之前經“中央”授過權？為甚麼胡耀邦就要有個保姆抱着他去接見記者，就要有人教導他如何說話？這真是天方夜談！

可惜的是，陷入重圍的胡耀邦已經失去還手之力。他作了一個《我的表態》的發言，表示“除了幾點事實有出入”之外，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按照中共思想鬥爭慣例，被批判者的檢討不管多麼深刻，永遠都是“初步的”，“不夠的”，永遠都不會讓批判者滿意，永遠都要“進一步檢查”，“繼續深挖”，如此等等。這些公式，在這個“中央一級生活會”上，當然要照搬不誤。所以批判者們“希望”胡耀邦“進一步”檢查時，思路要“再寬一點”，認識要“再深一點”，云云。

對於這樣一個違反黨章、臨時拼湊一些人馬向合法的總書記

發動圍攻的所謂“生活會”，圍攻者自己是怎樣評價呢？據薄一波說，“同志們”認為開得很好，“比黨的歷史上任何同類的會議都好。”趙紫陽事後向下邊布署“反自由化”時也講道：“這次對胡耀邦的處理，是歷史上黨內鬥爭最完美的一次。”^⑩

外國人到中國來，一般都埋怨中國人辦事太慢。但這次罷免胡耀邦，卻辦得非常迅速。一月十五日批判完畢，十六日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當天晚間播出了新聞公報：

1. 同意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之職。
2. 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3. 以上決定將提請下次中央全會追認。
4. 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職務。

曾經被海內外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一致看好的“鄧胡趙體制”破裂了。儘管鄧小平還允許胡耀邦留在政治局常委會內，以示寬大，但是胡耀邦實際上已經退出政壇，在家閉門幽居，過起寓公生活了。

趙紫陽最嚴重的戰略錯誤

鄧小平當然是親手打碎“鄧胡趙體制”的人，不過趙紫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早老人們選拔總書記人選時，趙紫陽和胡耀邦是同時被考慮的。論起領導才能，趙紫陽不會在胡耀邦之下。胡耀邦在總書記任內確實對政府範圍內的事情過問得多些。他曾在一九八四年提議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聯合召開各經濟部門匯報會。在這個會上他經常插話表態。但是趙紫陽精明強幹，不是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輩。況且胡耀邦比起趙紫陽，領導財經工作非其所長，然而又愛發表意見。這樣，胡趙之間在工作上難免會有矛盾。其實這正是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造成的。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曾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要求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而且要求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及早解決這個重大問題。”這封信主送鄧小平，並抄送陳雲，但沒有給胡耀邦。^②所以信中雖然沒有指名，實際上是要解決他和胡耀邦的矛盾，以利工作。當時鄧小平沒有理會這封信。到了一九八七年一月的“生活會”上，主持會議的薄一波忽然把趙紫陽這封信拿出來宣讀，以證明胡耀邦早就不適于當總書記了。黨內老人們是否由于趙紫陽這封信而決定罷黜胡耀邦，當然值得存疑，但一九八四年他們確想搞掉胡，則是事實。關於這一點，趙紫陽在接任總書記之後的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講話時，是這樣說的：“中央在一九八四年已經覺察胡耀邦不行，想去掉他，考慮到十二大開過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準備在十三大解決，更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了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提出辭職。在京政治局常委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由胡耀邦出面去解決學生問題已不適當，所以必須提早讓他下來。”^③

據說趙紫陽這封信在“生活會”上公開出來，使胡耀邦受到致命一擊。他沒有想到在黨內親密合作的同志之間，會有這種事情。

不過還有一則從可靠渠道傳出的消息說，下臺後閉門幽居的趙紫陽斷然否認他曾寫信“要求解決胡耀邦問題”。他說，一九八四年那封信的原稿尚在，信中寫的是關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制度，根本沒有針對胡耀邦的內容。

這件事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不過不管趙紫陽本人在倒胡的問題上有多少主動成分，客觀現實是唇亡齒寒，他們兩人都是改革派的領袖人物，胡耀邦倒了，趙紫陽也就孤立了。

鄧小平原來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耀邦和趙紫陽頂着。”現在胡耀邦這根柱子被拔掉了，剩下趙紫陽一根柱子，他不是必須承受雙倍的壓力嗎？

至少，沒有堅定地支持胡耀邦，是趙紫陽最大的失策。這個苦果他在兩年半以後就嘗到了。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一波清洗

執行鄧小平的指示，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的黨籍

作為“壞人保護傘”和“自由化縱容者”的胡耀邦被迫辭職之後，一場對“自由化分子”的大清洗開始了。

最早遭到清洗的當然是鄧小平直接點名的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

首先被清洗的是王若望。因為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談話中已經責問胡耀邦：“早就說要開除，為甚麼一直沒有辦？”所以上海市的行動最快，還沒有等到中央正式罷黜胡耀邦，就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把王若望開除黨籍了。

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關於開除王若望黨紀的決定》中列舉王若望的“主要錯誤”有：

“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

“妄圖取消黨的領導”。“污蔑共產黨就是喜歡權力鬥爭”，說“共產黨書記甚麼也不懂，靠整人吃飯”。

“造謠說從事改革的人‘大部分被打下來了’”。^②其實王若望一點也沒有造謠。事實上發表這個《處分決定》的時候，連改革派的領袖胡耀邦都被打下來了。

這個《決定》是中共上海市紀委直接作出並于一月十四日向王若望本人和他所在支部宣布的。（注一）

第二個被清洗的是方勵之，因為鄧小平已經說了：“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甚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③

於是中共安徽省紀委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作出開除方勵之黨籍的《決定》。在此之前，一月十二日方的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已被撤消。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這個《決定》說，方勵之的“主要錯誤”是：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

“宣揚全盤西化”。“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現代式的封建主義”，“基本上都是獨裁制、集權制”。

“主張大學擺脫黨的領導”。“主張大學應獨立于政府，成為獨立思想的中心”。

“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煽動學生鬧事”。“說學生是民主化的進步力量”。^④

劉賓雁是一月二十三日被開除的。

據說原來鄧小平談話時沒有提到劉賓雁，是當時一位聆聽鄧的談話者把劉賓雁給增補上去的。增補的理由是劉賓雁參與發起“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討論會”。這個討論會的發起人是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邀請一些人士參加，其中有北京大學教授費孝通和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這兩人都是當年的“右派”。不料他們二位把此事向中共中央“舉報”了。當鄧小平談話時，提議增補劉賓雁的人就把這件事匯報出來了。所以鄧小平一方面把應予開除的黨員名單加上劉賓雁，一方面表揚了兩位“舉報”的教授，說“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⑤

開除劉賓雁黨籍，也是不經過支部，由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決定並通知下去的。

《決定》說：“劉賓雁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是陳腐的、曾經把中國幾次引向災難的過時觀念，僵硬的、教條主義的東西”。

“詆毀共產黨墮落”。“誣蔑學習好八連和學習雷鋒、王杰、歐陽海、曲嘯等，都是爲了把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

“把新聞工作者接受黨的領導說成是當‘三孫子’”。^⑥

劉賓雁既是《人民日報》記者，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他的組織關係在《人民日報》社，所以開除黨籍這件事就由中共《人民

日報)紀律檢查委員會來做。至于他另一個職務,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時並沒有動,因為這是作協代表大會選的,而作家們又不是都聽話,很不好辦。

這一波清洗,來勢很猛。當時報紙上又是發消息,又是發社論,一時成爲時事焦點。黨員被開除黨籍,在全國範圍內造成這樣大的聲勢,還是很少見的。它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壓力。這三個人,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老作家,一個是自然科學家。人數雖不算多,但代表了方方面面,所以這次整肅,對各界知識分子都起了很大的威懾作用。

“敢于撫哭叛徒的吊客”——邵燕祥

魯迅早就慨嘆中國缺少“敢于撫哭叛徒的吊客”。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由于一連串思想運動的摧殘,有這種風骨的特立獨行之士更稀少了。每當運動一來,罹難者便成爲衆人爭相射擊的靶子,親友都躲之唯恐不及,又有誰敢冒險前來撫哭?

可是中國畢竟還有人在。第一次“反自由化”時有吳祖光挺身而出爲白樺辯護。現在,第三次“反自由化”的高潮裏又有邵燕祥仗義執言,爲劉賓雁講了公道話。

著名詩人邵燕祥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作協主席團總結工作的會議上,他作了一個震驚四座的發言。

對於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的戰績,邵燕祥從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兩方面略加評論。他說,在理論批評方面,沒有看到像樣的文章,“倒是出現一些帶有大批判開路色彩的黨八股。還有不耻于士林的人出來大談‘士氣’。”在創作方面,“現實主義作品幾乎斂迹”。他形容一九八七年的文壇是“一片叱咤吆喝聲”,這其實是對那一年整個“反自由化”喧囂的簡短概括。

更使在座者側耳而聽的是邵燕祥在引用了鄧小平對作家的期

望之後指出：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被鄧小平下令開除出黨的劉賓雁。

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詞中，希望文藝工作者“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鬥爭。”

引完了鄧小平的話之後，邵燕祥說：

“在中國作家中，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我認為應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寫作報告文學的劉賓雁。他在從《人妖之間》開始的大量作品中，表現了高度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人的黨性（不管他現在有沒有黨籍）。為甚麼這樣說呢？我認為是因為：他毫不隱蔽自己的觀點，敢于面對事實，講真話，披露和解剖社會的真相，並且總是從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的觀點出發，來伸張正義，打擊邪惡，維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抨擊一切與此相背離的壞事和弊端；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那些損害人民利益的官僚、腐敗現象，怎樣嚴重損害了黨的政治信用和社會主義的聲譽，只有維護人民的利益才是保衛黨的領導的唯一途徑。”^②

這個發言引起一些人的不悅。邵燕祥已經做了迎接打擊的準備，不過後來沒有甚麼下文，這也是一種進步吧。其實邵燕祥無非是把人們對劉賓雁的共同看法集中表達出來罷了。劉賓雁無情地揭露危害這個黨的腐化分子和官僚們，正是對黨的愛護，是對人民負責。劉賓雁並因此而被一些人稱為“中國的良心”。可惜的是中共當局自己不要這顆良心，硬說這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反黨”，一定要把他清除出去才甘心。其實這種倒行逆施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中國共產黨本身。這正是包括邵燕祥在內的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深感痛心的事情。

（注一）按中共黨章，處分黨員的過程是：由所在支部大會表決（本人也有表決權），“決定”作出之後要由本人簽字（或接

受,或不接受),然後報紀委批准。本人如果不服,還可以向上級申訴,直至向中央申訴。不過在“反自由化”的清洗中,這個程序都顛倒過來,由上級作出“決定”,向下級和本人“宣布”一下,就算完成了。本人認可與否,已無意義;向上申訴,更無必要,因為“決定”本來就是上邊來的。

六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二波清洗

理論界的境遇

隨着胡耀邦的下臺,他所配備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下臺了。鄧力群兩年前失去了這個意識形態司令部,如今該收復失地了。不過他沒有親自來,而是推薦《紅旗》雜誌總編輯王忍之來接替以“三寬”著名的朱厚澤。

在理論隊伍“分道揚鑣”以後,胡喬木和鄧力群有一支“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另一支所謂“自由化”的隊伍,本來應該成為胡耀邦推動改革的理論力量,但是胡耀邦既不知怎樣運用也不去認真保護,最多是在他們遭到打擊時,起一點緩沖作用,有時甚至還和這些人“劃清界綫”,以表示自己清白。所以這支隊伍已經被打得四零五散了。

趙紫陽對思想理論問題興趣不大,或許和他長期擔任地方黨政領導有關,到中央工作(取代華國鋒成為總理)以後,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具體操作的層次上。他有自己的幕僚班子,這一點和胡耀邦不一樣。他的幕僚主要集中在體制改革研究所,由他的秘書兼助手鮑彤領導,另外還吸收了政治學家嚴家其。他們都是胡耀邦時期思想解放的名將,也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除了這兩個人,趙紫陽對胡耀邦時期的理論界概不接觸。他的幕僚班子主要是由一批中青年組成,其中當然有優秀人才。不過,如果不去評論某些具體人物,而是從理論表現上來看這個整

體，那就可以說這個“智囊團”功底不深。他們較為傾心于自己也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術語，力求提出能夠博得當政者垂青的主張。比如，“新權威主義”就出自這個“智囊團”。他們主張由一個強權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範例就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一個政治強人的專制統治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因此中國大陸也應該這樣。這種“主義”很合乎趙紫陽的口味，他就是主張“經濟要放，政治要收”的。其實這種主張可以說是中共高層主流派的共識。問題只是這個“新權威”由誰來擔當。趙紫陽的幕僚當然把目光集中在趙紫陽身上，豈不知這正是給趙紫陽幫了倒忙，預先寫下了他將要被廢黜的伏筆。

這一場“反自由化”運動，在思想和理論上已經沒有多少新戲好唱，於是剩下的就是組織上的清洗了。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的黨籍，只是一個開頭，要清洗的還有一大批。當時鬧得滿城風雨，以致國內外都有人詢問中共領導，是否繼續清洗。鑒于人心惶惶，趙紫陽等領導人一再表示，除了王若望等三個人以外，不會再清洗第四個人了。

然而到了一九八七年夏天，第二波清洗開始了。

文字獄製造廠

這時，專門有一批人集中在一個招待所裏，搜羅和整理“自由化分子”的材料。這是一個新的文字獄製造廠。它的產品，有的印發全國，有的上報中央。比如，《方勵之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摘編》，《王若望言論摘編》，《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就是當作“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還有一本《若干言論對照》，是把“自由化分子”的言論和大學生的游行傳單和口號或大字報對照排印，以便證明“自由化”言論煽動學潮。例如，關於“黨的領導”問題，有一則是這樣對照的：

要實行多黨政治，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要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王若望言論)

一黨制有甚麼好處，兩黨制又有甚麼壞處？西方國家有甚麼不好。

(南京學生演講)^②

令人不解的是這些材料一律沒有編者和出版者，不知是那裏搞的，沒頭沒腦，應該說是地道的非法印刷品，或黑材料。然而這些材料卻是權威的，它被發往全國各個有關單位。誰的名字，誰的言論，只要被選入這些材料，“自由化”的帽子就戴定了。

除了這種綜合材料外，更厲害的是個人材料，即每個“自由化分子”的單行材料。這又恢復了文化大革命時“專案組”的辦法，背着本人整理材料。它極端機密，極端重要，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但是本人卻不知道，更無權去反駁或申辯。

因為這個整材料的招待所的地址是在北京的“廠橋”，和明朝的特務機關所在地“東廠”有一個“廠”字相同，所以有人又把它叫作“東廠”。

當時紛紛傳說要清洗一批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據說送到中央的名單是十三人，人稱“十三太保”。不過一九八七年七月，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實際上只討論了五個人。討論的結果是：

吳祖光——勸其退黨。如不退，則開除黨籍。

王若水——勸其退黨。如不退，則除名。

蘇紹智——撤消黨內外職務。

張顯揚——開除黨籍。

孫長江——開除黨籍。

“勸退”不是黨紀處分。按中共黨章第九條規定：“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黨的支部應當對他進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經教育仍無轉變的，應當勸他退黨。”對吳祖光和王若水這兩個名揚海內外的劇作家和哲學家，採用“勸退”而不是開除，大概是為了避免輿論大嘩，因為中共一直向海外媒體保證，不會在三個“自由化分子”之外再清洗第四個人了。

政治局委員親自登門勸“自由化分子”退黨

為了使“勸退”能夠奏效而不必動用“開除”的強硬手段，胡喬木於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自告奮勇親自登門去找吳祖光。

為了“勸”一個“不夠黨員條件”的人退黨，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出面，而且是親自登門拜訪，真是黨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聞。這是說明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重視”，還是問心有愧？還是怕把事情鬧大，無法面對世界輿論，而想悄悄了結？（注一）

不過對王若水的“勸退”，胡喬木就不出面了。這位政治局委員在和王若水的交手中已經嘗過一次苦頭：在人道主義的較量上，胡喬木很不體面地輸給了這位倔強的對手。現在雖然終於把他清除出黨，報了一箭之仇，但胡喬木畢竟沒有鼓起再次對陣的勇氣，於是改由中紀委把文件送給《人民日報》，由報社領導向他宣布了。

其實文件中所列的王的“錯誤”，都是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候的老“問題”，這些“問題”早就處理過（免掉了王的副總編輯職務），這時又重新拿出來，作為清除出黨的理由了。王若水當然不服，於是“勸退”就改為“除名”了。

基層黨委拒絕中央書記處的決定

對蘇紹智和張顯揚的處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執行的。蘇和張都在該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科學院先召開馬列研究所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蘇紹智和張顯揚的決定，當場遭到馬列研究所副所長兼黨委書記彭克宏的堅持反對。彭認為中央書記處無權直接處分黨員。處分黨員必須

經過支部大會，書記處此舉違反黨章。於是黨委擴大會的參加者群起批評書記處的決定，並拒絕接受。

當時事情鬧得很僵。過了些天，社會科學院把中央書記處的決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名義發下來，才把蘇紹智的所長兼分黨組書記的職務撤了，把張顯揚的黨籍開除了。（按中共黨章，紀律檢察委員會在必要時可直接處分黨員。）

蘇紹智是海內外有名的學者。對他的處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內引起強烈反響。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浦山曾經憤怒地提出抗議。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張顯揚是這個所的研究員，然而開除他黨籍的文件，除了政治帽子以外，舉不出任何具體事實，只是說張顯揚“一貫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毫無事實根據就整肅和清洗共產黨員的粗暴作法，使得群情大嘩。有人憤怒地指責這種作法“比四人幫還要墮落”。

聶榮臻仗義執言，孫長江虎口餘生

開除孫長江的決定沒有執行，這是因為聶榮臻元帥講了話。孫長江被王震從中央黨校趕出來之後，先是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書，後來到《科技日報》任副總編輯。原來中央書記處討論清洗“自由化分子”時，本來沒有他的名字，是討論張顯揚時被人臨時提出來加上去的。（注二）但在貫徹這個決定時，《科技日報》總編輯林自新站出來打抱不平，他給自己的老領導、主管過科技工作的老革命家聶榮臻元帥寫信要求“刀下留人”。聶元帥給中紀委書記陳雲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他不了解孫長江，但了解林自新是老實人，講話可靠。於是陳雲批示說，對人的處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實。這個批示到了趙紫陽處，趙還想趁這個批示一並挽救王若水等，但是已經晚了，除了孫長江以外，中紀委的決定都已經執行過了。（注三）在中國，真要處理一個重大腐化案件，常常需要牽延歲月，很難下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手，比如後來的陳希同案件，經年累月都不見動靜。但是收拾“自由化分子”，卻是雷厲風行，說到做到，毫不含糊的。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主要的任務是給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作準備。趙紫陽沒有把中紀委準備的全部“自由化分子”名單提交會議討論。討論了五個人之後，趙就把它擱置下來，最後是不了了之。這樣，其餘幾個人暫時沒有受到整肅，於是這一波清洗也就過去了。

(注一)吳祖光被“勸退”之後，曾給中紀委寫信申辯，披露了事件詳情，現撮要摘錄如下：

胡喬木到吳家後，將中紀委勸吳退黨的文件宣讀一遍，不給他看原件。吳曾幾次要提出意見，但胡喬木說“今天不辯論”，並強調“今天沒有時間”，頻頻看表，阻止吳祖光發言。

這份文件列舉的吳的“錯誤”有：

一、吳在五十年代就反對黨的領導。

二、吳八〇年入黨後曾說：入黨使他“啼笑皆非”。

三、吳認為“清除精神污染”是給中共丟了臉。

四、吳著文反對戲劇審查制度，認為有權勢者就能判定一部影劇的生死，是荒唐可笑。

五、吳著文說，戲劇審查制度是繼承了腐朽的國民黨政權的可耻傳統。

這些指控，前兩項是無的放矢，後三項是斷章取義。因為第一項是當年劃吳為右派的理由，此案本來就是冤案，而且已經平反。第二項是捕風捉影，本無其事，是中紀委根據香港刊物報導強加給吳的。

但是吳祖光還是接受了“勸退”。他說，這是出于三點考慮：

第一，“尊老”。胡喬木年老，親自爬上四樓來到吳家，使

吳“深感不安”，故接受。

第二，維護黨的“信譽”。黨中央已保證不再開除第四個人。如吳不接受勸退，將被開除，使黨再次失信于民。

第三，對黨失望。中共拒絕批評，摧殘人才，迫害忠貞敢言的知識分子，至今難以糾正，故吳願意退出。^②

(注二)據說書記處會議討論開除張顯揚時，宣讀他的材料，上面有這樣的記載：文化大革命中，張顯揚曾經打蕭前(人民大學教授)。孫長江在場，沒有加以制止。(按，文革中兩派武鬥，在人民大學亦然。當時張顯揚與蕭前均在人民大學。但並無“張顯揚打蕭前”之事。)不料書記處與會諸公把“蕭前”聽成“蕭乾”了。蕭乾為著名老作家，平白無辜被打，當然引起公憤。有人插話說，這比打人的還壞。於是會議決定把孫長江也一並開除。其實他們連“蕭前”並非“蕭乾”都未弄清。

(注三)趙紫陽雖然對胡耀邦時期的理論界人士沒有興趣，但是也不想把他們通通打倒。據《鄧小平帝國》揭露，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如何整肅這些人，是鄧力群通過王震向鄧小平進言，由鄧小平向趙紫陽施壓的結果。^③

※ ※ ※

第十二章 引文出處

①《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282-283 頁

②《命運——李洪林自傳》第 264-266 頁

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 1184 頁

④同上，第 1171-1172 頁

⑤《鄧小平帝國》第 186 頁

⑥同上，第 176 頁

⑦《國史通鑒》第 4 卷，第 65 頁

⑧《方勵之言論》第 93-94 頁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 ①《國史通鑿》第4卷，第66頁
- ②同上，第66頁
- ③同上，第187頁
- ④《十年的路》第211頁
- 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69頁
- ⑥同上，第370頁
- ⑦同上，第371頁
- ⑧同上，第371頁
- ⑨同上，第370頁
- ⑩《鄧小平帝國》第191頁
- ⑪《鄧小平帝國》第200頁
- ⑫《十年的路》第198頁
- ⑬《鄧小平帝國》第200頁
- ⑭《共和國歷程》下卷，第2078頁
- 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69頁
- ⑯《共和國歷程》下卷，第2077-2078頁
- 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71頁
- ⑱《共和國歷程》下卷，第2079頁
- ⑲《邵燕祥在中國作協主席團四屆六次會議上的發言》(原稿)
- ⑳《若干言論對照》第17頁
- ㉑《吳祖光閑文選》第49-53頁
- ㉒《鄧小平帝國》第209-210頁



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左上圖)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右下圖),是中國大陸思想最解放、在改革開放中走得最遠的兩個省委領導人。任仲夷原任遼寧省委書記,是他最早提出“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到廣東後,敢想敢幹,使這個省迅速走在全國改革開放的最前列。項南在福建堅定不移地貫徹三中全會路線,解決了這個省的歷史遺留問題,發揮地方優勢,給經濟起飛打下堅實的基礎,施政極得民心。但這兩位最優秀的省委書記,卻遭到保守派的打擊,在一九八六年都被撤換下來了。

第十二章附圖



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直接下令開除黨籍的三個中共黨員：最早被開除的是上海作家王若望(上右)，第二個是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下)，第三個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與作者合影)。





上圖為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高潮中第二波被清洗之王若水(右二)和張顯揚(右三)。孫長江(左一)本在清洗之列，因聶榮臻元帥建言，得免於難。

右圖為同案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之蘇紹智(與作者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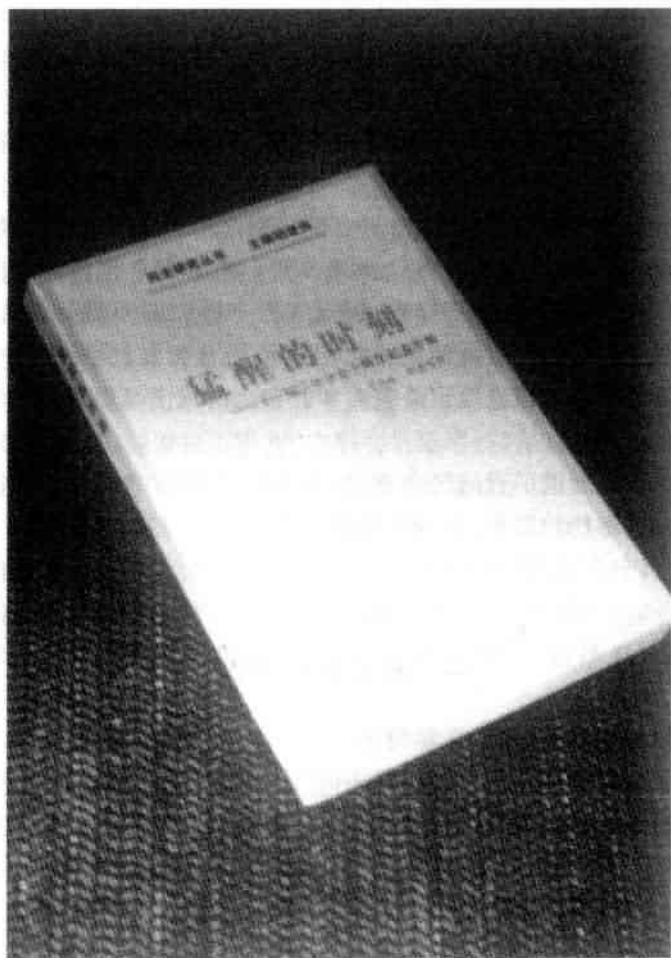
邵燕祥和吳祖光一樣，是中共高壓之下又一位“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魯迅語）。他在鄧小平下令開除劉賓雁一年之後，在作家協會主席團上發表評論，認為在中國作家中，對妨害四化的思想作鬥爭，劉賓雁做得最好。邵燕祥這個發言，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後鴉雀無聲的中國大地上第一聲驚雷。

圖為邵燕祥一九九八年與作者攝於北京。



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唯一真正傾向自由民主並真誠愛護知識分子的胡耀邦，和這個黨的本性不能相容。然而他的力量還不足以改變這個黨，所以最後是他自己被淘汰出局。在廢黜胡耀邦的過程中，鄧小平當然是起決定作用的人，然而他也不過是集中代表了這個黨強大的左傾傳統和頑固的保守勢力而已。

這是胡耀邦下台後在家中賦閒時所攝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滿面愁容表現了他胸中難消的塊壘。這次沉重的打擊無疑摧毀了他的健康，使他過早地離開人世。



這是胡績偉組織的和官方“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唱對台戲的一本書，幾經周折，勉強出版。出版後適逢“六四”，正好趕上四反“自由化”，被官方大批一通。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1987 - 1991)

趙紫陽和胡耀邦的矛盾，是在同一條改革路綫下的權力鬥爭。因此，胡耀邦下臺並沒有導致路綫改變。趙紫陽上臺後繼續推行改革，並且在思想上有所鬆動，因而和保守勢力的矛盾日益尖銳。不過趙紫陽在黨內政治鬥爭中比胡耀邦更有魄力，所以在新一輪鬥爭中曾經占有領先地位。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氣氛也因此活躍起來。

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民主運動，在五四以來的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並因此引發了獨裁勢力的暴力鎮壓，以及第四次“反自由化”高潮。

一 鄧力群的挫敗

趙紫陽控制局勢，左派未能得手

胡耀邦下臺使鄧力群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欣喜若狂。新上任的中宣部長王忍之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一個“第二次撥亂反正論”，(注一)表達了他們這種心情。他說，第一次是“撥”文化大革命之“亂”，這一次是“撥”自由化之“亂”。“這兩次撥亂反正，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一個是反左，一個是反右”。^①

按照“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心願，這次“反自由化”應該完成“清除精神污染”時沒有完成的任務，把它弄成一場大的運動，推向各個領域。

但是趙紫陽對這個問題很清醒。他顯然不想讓“反自由化”的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領導權落在鄧力群們手裏，以免他們搞得驚天動地，破壞安定局面，打斷改革進程。因此他上任之初就叫鮑彤起草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出（即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四號文件”）。

這個文件一方面強調“反自由化”多麼重要，要求全黨“把這場鬥爭作為今年的一件大事”，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另一方面又強調這個鬥爭的“長期性”。文件說，反自由化的鬥爭“存在於開放和改革的整個過程中”。這就是說，它實際上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沒有甚麼特殊的意義，也不具有壓倒其他工作的突出地位。而且這個文件還對“反自由化”作了些限制：“不要聯系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不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

把這些方方面面通通排除之後，“反自由化”的鬥爭就剩下中共內部了。所以文件規定：“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不過對於黨內也有限制：“農村不搞”，只搞城市。而城市的黨政軍和企業事業單位，也“主要是對廣大黨員進行正面教育”。^②就是說，不搞運動，不搞批判。

這樣一來，趙紫陽既把“反自由化”的大旗拿在手裏，表明他這一手很“硬”（胡耀邦就是因為這一手太“軟”而下臺的），但是又嚴格限制了它的範圍和做法，並且實際上把它化解在日常工作當中了。

鄧力群當然不甘心。不過趙紫陽此舉得到普遍歡迎，特別是得到鄧小平的首肯，所以中國的政局由於罷黜胡耀邦所產生的巨大震蕩，在較短的幾個月內就歸於平靜了。一九八七年夏季的第二波清洗，也因為趙紫陽的有意擱置而中止了。

百分之六的民主把鄧力群淘汰出局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舉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爆

出的最大新聞是鄧力群落選。

原來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後，按照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原則，在各種選舉當中，一向實行“等額選舉”。這種“選舉”是由領導上按照應選的名額提出“候選名單”，然後由選舉人去劃圈。從理論上講，選舉人可以不選這個名單上的“候選人”而另外寫上自己想選的人。但是，事先既沒有競選過程，各個選舉人也難以互通信息，即使大多數人都在選票上另外寫上自己要選的人，票數也必定非常分散，實際上不可能改變選舉結果。所以，只要是“等額選舉”，領導上欽定的“候選人”肯定當選無疑。中共就是用這種“無產階級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權力壟斷的。

然而“十三大”卻出現了例外。這次大會，在選舉上有了一點改革：給了選舉人一塊小小的選擇餘地：預選時實行“差額選舉”，在一百七十五名中央委員的名額之外，多加了十名候選人，共一百八十五名。這個差額其實也很可憐，還不到百分之六。但是這百分之六的餘地果然很有作用，鄧力群被選掉了。這樣，他就沒有資格被列入正式候選名單，自然就當不上中央委員了。

本來籌備“十三大”的“人事組”(注二)給鄧力群安排的職務是“政治局委員”。既然他連中央委員會都進不去，政治局委員也就沒有指望了。爲了挽救這個頹局，鄧力群又被安排到顧問委員會(注三)去當一名“常務委員”。顧問委員會由二百名委員組成，是“等額選舉”，鄧力群算是被選上了。但是到了選舉常務委員的時候，居然出了差子，鄧力群只得八十五票，不夠半數，又落選了。^③

鄧力群在中共“十三大”遭到慘敗的消息不脛而走，知識界許多人額手相慶。這個事實表明，即便黨內高層，多數人對於鄧力群所代表的左傾路線也都討厭了。

鄧力群的能量和他在黨內鬥爭中的位置

鄧力群的落選是他一生最嚴重的挫折。在中國共產黨內，他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是經受戰爭年代艱苦鬥爭考驗並有黨政工作經驗的老幹部，同時又充分了解理論工作的重要性並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在中共的思想理論隊伍中，不但那些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新貴不能和他相比，就是延安時期一些老的理論家，也因為缺乏實際鬥爭經驗而相形見绌。和學者型的胡繩或才子型的田家英不同，鄧力群讀書沒有他們多，自己也不大寫東西。但他思路清晰，能夠組織力量寫出大塊文章。他善于用人，也善于整人。他對於投靠者愛護備至，而對於異己者的打擊也絕不留情。他深沉持重，信念執着，不像胡喬木那樣朝三暮四。他又因長期身處最高領導核心，所以深諳中共高層內部政治遊戲規則。他是毛澤東路線所造就的骨幹人才，不管心裏是怎樣想的，反正手裏高舉的是“共產主義”旗幟，口裏念念不忘的是毛的教導。凡此種種，使他在黨內一部分高級領導骨幹中間頗有人望，不但像王震這樣只認得槍杆子的人對他言聽計從，而且在鄧小平面前他都有不小的發言權。

本來在批判四人幫和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鄧力群和他所領導的研究室一直是走在思想解放隊伍裏面的。或許是受了領袖欲的驅使，三中全會以後，他毫不猶豫地站到反對改革的傳統勢力一邊。而反改革者也正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鄧力群正是這樣一個得力的角色。恰恰他又是能向鄧小平進言的人，於是他的位置就越發重要了。以後在改革和保守這兩股力量的鬥爭中，不光是鄧力群影響鄧小平（例如謊報軍情，誘使鄧小平去清除“精神污染”），而且鄧小平也需要鄧力群。因為鄧小平要在全黨保持平衡。當他要改革的時候，就要傾向胡耀邦，當他要照顧保守勢力以便得到他們擁戴時，就要傾向鄧力群。所以鄧力群是他手上一張有用的牌。

鄧力群早就沒有把胡耀邦看在眼裏。事實上在政治波瀾裏，胡耀邦也的確不是鄧力群的對手。不過使鄧力群難以接受的是，胡耀邦下臺後，上臺的竟不是他鄧力群，而是一個務實的趙紫陽。更使他接受不了的是“十三大”竟把他淘汰出局，使他蒙受了一場

奇耻大辱，弄得從此抬不起頭。

其實這件事也不單單是鄧力群個人的挫折。它反映了歷史的趨勢。一向奉行毛澤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剛剛把束縛黨員手腳的選舉制度放松了百分之六，就被下面的“民主”犯上作亂，造了“集中”的反，把領導上安排的人給選掉了。這件事充分說明：不但鄧力群所代表的毛澤東的路綫已被黨內多數人所唾棄，業已無法挽回，而且中共傳統的黨內專制制度，也難以照舊維持了。

“十三大”後政治空氣的活躍

“十三大”還有一個新的進展，就是正式提出政治改革。雖然這個政治改革比起一九八〇年鄧小平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已經大為遜色，但是在沉寂七年之後能夠在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也是一個進步。這次提出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黨政分開”。雖然它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但是也觸及中國政治一個重大弊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如果真能解決這個問題，那倒真是在政治改革上前進了一步。

事實證明這個黨政分開的決定並沒有實行，而且以後還被“第三代”給取消了。不過當時對活躍政治空氣卻起了推動作用。“十三大”以後，特別是一九八八年，中國思想界又開始活躍起來。

這種活躍的氣氛甚至感染了鄧小平。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常委向鄧小平匯報“價格、工資改革初步方案”時，話題最後轉到有人說中共領導人“在海外有存款”的問題上。薄一波說：“對那些胡說八道、造謠誹謗、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要硬一點。”這時鄧小平說話了。他認為，造謠誹謗要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依法處理。但是對不同政見，不能這樣。他說：“有些人有不同政見，這是允許的，比如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見，不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如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把這個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太複雜，整個社會空氣都要變了。”（注四）

這是自從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不同政見表示寬容。

當然，在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在人治的條件下，這種話說了也可以收回；即使他不收回，下面也可以不照辦。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句話說了也等於白說。當局對不同政見的鎮壓反而變本加厲了。不過，這個時候由鄧小平說出這句話，畢竟反映了一九八八年的政治空氣確實是大大活躍了。應當把這種現象當成舉步艱難的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進步。

（注一）中共自粉碎四人幫以來，就提出“撥亂反正”的口號。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個口號一直是反左的。雖然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原則”是爲了反右，但是他始終把反左作爲主要方向，從未改變過。王忍之這個“第二次撥亂反正論”代表了極左勢力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針的，所以不久就在趙紫陽的批評下收回去了。

（注二）中共籌備每一次代表大會，都要成立兩個組：一是文件起草組，準備本屆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二是人事組，準備下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中央主席的名單。這兩個組都很重要，一個是確定黨的政治路線，一個是安排黨中央的人事。其中人事安排尤其重要，鬥爭也最爲激烈。而且這個人事安排還不限于黨中央，包括下一屆國家領導人，也都一併在這裏決定。至于在黨代表大會或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選，那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爲了免于在投票時失控，“等額選舉”是最穩妥的辦法。這就是爲甚麼中共不肯放棄“等額選舉”的真正原因。

(注三)顧問委員會可以列席黨的同級委員會，可以發言，但無決策權。這是中共為取消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實現幹部年輕化的一個過渡措施。它使一部分年老的領導幹部從黨的各級委員會和國家機關中退下來之後，在顧問委員會裏過渡一下，可以減輕驟然放棄權力的失落感。這樣可以減少領導機構新陳代謝的阻力。不過事實證明進入顧問委員會的老人們對中國政局起了很大作用，特別在關鍵時刻，比如廢黜胡耀邦這種事情上，可以說是起了決定作用。顧問委員會從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開始設置，到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時撤消，共存在十年。

(注四)這次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主要是為了解決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問題。要使中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必須進行價格改革，使價格從行政命令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在市場上按價值規律自由浮動。當然，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這種轉軌是很困難的，弄不好會引發經濟混亂甚至陷入危機。鄧小平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下決心要“闖物價關”。然而國務院在實行物價改革時用的是行政命令方法，對幾種商品實行提價。結果導致刮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漲價風，弄得價格改革半途而廢，並且換了一個政策：把整個經濟改革停下來，進行“治理整頓”。

二 “個人”的覺醒

社會在思想上的進步不可逆轉

一九八八年是真理標準討論十周年。雖然當年批判“兩個凡是”並堅持思想解放的理論界人士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但是整個社會在思想上的進步是不可逆轉的。當局可以動用政治的、組織的甚至法律的手段去阻擋先進思想的傳播，但是已經傳播開來

並為社會所接受的思想，卻無法從人們頭腦裏奪走了。

十年間，中國社會在思想上的收穫是豐盛的。這種收穫可以從不同方面總結出許多成果。不過，如果放在人類文明史這個大背景上來觀察，那就可以發現，“個人的覺醒”是這十年最大的進步。

從傳統文化看，中國是一個不承認個人價值的社會。除了天子，每個人都處于人身依附當中，沒有獨立的人格。五四運動是一次啓蒙運動，它對幾千年的人身依附發起一次勇敢的沖擊。但是在五四運動中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卻用集體的、階級的、組織的價值，壓倒了個體的價值。這種壓倒，是在革命的浪潮中實現的，因此能風靡一時。等到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集體主義便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個人主義被看作“萬惡之源”。這已成爲全社會普遍的價值標準。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現代迷信的氛圍中，就更談不到人的價值了。那時候只有一個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其餘的人簡直都不是人，可以任意侮辱和摧殘。

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只是從認識論上打破現代迷信，從“兩個凡是”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種解放意味着不再迷信偶像，而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當然蘊含着人的解放的意義，但它畢竟屬於認識論的範圍，即怎樣認識世界，還沒有涉及價值觀，即怎樣評價世界的問題。

“人”的覺醒的艱難歷程

一九八三年那場人道主義的論戰，標誌着人的價值問題已經正式提到全社會面前了。以王若水爲代表的知識界，站出來爲人道主義辯護，實際上是從理論的高度上喚醒人們意識到自己的主體位置和價值。人道主義的聲音在中國當然早就有了，但一則那聲音太微弱，再則以前也根本不存在把人當人看的社會條件。自從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經過短短幾年，就把中國大陸上所有的

個人都編織到一張無所不包的羅網當中了。每一個人都属于某個組織：或是機關，或是團體，或是部隊，或是學校，或是生產隊。即使某人不属于任何單位，他也必須属于“街道”，受居民委員會管轄。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游離于這張羅網之外。即使你甚麼行政關係組織關係都不要，也不能不要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沒有糧票就要挨餓。所以這種制度完全剝奪了個人的獨立性，怎么能談到人的價值？

只是改革開放以後，先是農村包產到戶，後是城市自謀職業，有了個人的經濟基礎，才能有個人的獨立地位，才能使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那張羅網，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正是社會條件的這種變化，使得人的價值問題真正能夠提到社會面前。但是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要使人的價值得到社會公認，是很難的。現行的社會制度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制度。中國共產黨高踞于金字塔的頂端主宰一切，黨的意識形態在全社會處于支配地位，每個人都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是馴服工具。“個人服從組織”不單是黨員的天經地義，也是全社會每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在這種條件下，凡為個人爭人格爭獨立的言行自然都是異端。而且這種社會條件是經過幾十年的鑄造，早已定型並且深入人心。在這種環境裏要在價值觀上為個人爭取地位，遠比在認識論上給實踐爭取地位要難得多。

不過，由于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中國畢竟來到重新認識人的價值的歷史關口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間，除了人道主義討論，還有一些表現個人覺醒的文化現象陸續出現，特別是在青年當中首先出現。它表明了作為主體的人的躁動不安。

對中共傳統“思想工作”的挑戰

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國青年》第五期發表了署名“潘曉”的青年

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從而引起了一場人生觀大討論。潘曉提出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人生態度，引起青年們的強烈關注。要是在毛澤東時代，潘曉肯定要陷入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滅頂之災。但是這一次卻不是。青年們對她的觀點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各舒己見，但都是在認真探討這個問題。從五月到十二月，編輯部共收到六萬件來稿和來信，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盛況。^④只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人人都“甘當螺絲釘”，“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年代已經過去了。青年們這樣熱切地關心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說明他們開始覺醒了。

這種覺醒，對於中共的“傳統優勢”——思想政治工作——是嚴峻的挑戰。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專門轉變人的思想的，也就是克服“錯誤思想”，樹立“正確思想”。其實從人的價值這個角度，說到底，這種思想工作無非是貶抑個人的價值，消滅獨立個性而已。但是，這種方法在新時期不大靈應了。特別是青年們，對這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從大學的公共政治課到黨團幹部的個別談話，都表現了明顯的厭倦。

“青年導師”蛇口碰壁

八十年代初，胡喬木發現了北京師範學院一位教師很有口才，便囑該校晉升他為“德育教授”，使之專門以德育人。（這大概是中國大學獨有的一門學問。有一種教授的專業是“德育”，其品德之水平可想而知。）後來遼寧又涌現出一位教育工作者，早年被打成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平反後以毫無怨言而著名。當代中國在左傾路線下，冤獄遍于國中。人性未泯，蒙冤者總難免略有怨氣，而這位右派竟甘之如飴，殊為難得，堪稱青年楷模。況且他也有口才，于是被調到中宣部，成為“局級調研員”，實際上也是被任命為德育專家。這兩位專家，再加上另外一位專家，常被一些地方請去，以他們的“德行”對青年進行教育，據說效果卓著。

但是一九八八年，這幾位青年導師卻在深圳的蛇口碰上了麻煩。一月十三日，蛇口舉行一個“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中宣部那位專家對青年宣講德育的時候，把蛇口青年分成“建設者”、“創造者”和“淘金者”，結果引起了一位青年的發問，要求專家解釋一下甚麼叫“淘金者”。

專家說：“我認為內地有少數青年到深圳、蛇口來，目的不是爲了創業，建設特區，而是圖這裏的生活好、工資收入多，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他們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並認爲特區不歡迎這樣坐享其成的淘金者。”

不料青年們沒有接受專家的這種德育，反而予以駁斥：“淘金者有甚麼不好？”“我們到蛇口深圳來爲甚麼不能賺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但客觀上也爲蛇口建設出了力。這樣的‘淘金者’有甚麼不好？”

於是這個座談會變成了辯論會。教育人的專家和被教育的青年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根本談不到一起。比如，青年喜歡深圳“比較自由”，專家認爲這是“錯誤言論”。專家在深圳看到許多外國車就感到“難受”，青年則認爲，在開放的主題下，“沒有一點外國的東西是落後的表現”。專家主張應“大力提倡”個體戶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獻給國家，青年則認爲個體戶已經爲國家作了貢獻，只有“理直氣壯地把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人相信黨的政策的安全性。

座談會的高潮是一位專家對質問他的青年說：“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訴我？！”他以爲會把這個不聽教誨的人嚇住，不料這位青年毫不在乎，當場掏出名片交給他。

這次事件，後來《人民日報》用《“蛇口風波”答問錄》^⑤予以發表，一下子轟動全國。它表明傳統的價值觀已經動搖，按照傳統模式鑄造馴服工具的思想教育，在開始覺醒的個人面前已經不靈了：

三 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

“毛”與“皮”的關係發生變化

毛澤東一直把知識分子比作一根根的“毛”，總得依附在一張“皮”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歷次思想運動，可以說都是用強制的方法把“毛”附在中共這張“皮”上的過程。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也真是在努力使自己能附在中共的“皮”上，以圖有個安身立命之處。就連被目為“反黨小集團”首領的胡風和幾十萬“右派”又何嘗不想附在中共的“皮”上？問題是中共一方面要求他們依附過來，一方面又不放心，老是把他們看成“非我族類”，因此又不斷地排斥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打入“另冊”才心裏舒服。就連理論工作務虛會後被指責為“和黨分道揚鑣”的理論家們，其實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他們並沒有想另樹一幟，只是希望黨在改革的路上繼續走下去而已。

但是這種情況在一九八八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直想攀附在中共“皮”上的知識分子，不但開始獨立思考，而且開始獨立行動了。

一九八八年，青年作家蘇曉康等編寫的電視系列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引起巨大反響。作者的主旨在於從文化的角度對中國歷史進行反思，熱情呼喚改革開放。影片顯示了以黃河為象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沒落，歌頌了以海洋為象徵的現代文明的興起，這種觀點和表現方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強烈的沖擊。特別是影片的解說詞第一次通過公共傳媒喊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依附于政治權力”，“沒能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並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這種痛苦的聲音，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壓抑了幾十年之後的覺醒，它應該說是延安整風以來首次向中共貶抑知識分子的政策公開的挑戰。

果然，就在這一年，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顯示了自己的獨立人格。

民間和官方的對臺戲

這一年是三中全會十周年。中宣部早就準備召開一次理論討論會來“紀念”它。但是當年為反對左傾路線和“兩個凡是”而沖鋒陷陣的理論戰士幾乎全部被清洗了，僥幸逃過清洗的幾個人也被打入冷宮閑置起來。而“凡是派”卻成了這個會議的主人和上賓。(注一)

針對當局這種排斥異己的做法，原《人民日報》社長，反對“兩個凡是”的主將之一胡績偉，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紀念三中全會。他自任主編，邀集于浩成、王若水、李洪林為副主編，編輯一套《民主研究叢書》，其中的一本，就是和官方針鋒相對的“三中全會十周年紀念專輯”，取名為《猛醒的時刻》，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這部書收入當年從思想上為三中全會做過掃清道路工作的二十位作者所寫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堅持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路線，繼續解放思想。有的文章呼喚五四精神，要求繼續完成五四運動未曾完成的民主使命。王若水和阮銘更在文章中提出“新啓蒙”的任務，以便根本改造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形成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

這樣，在同一個首都北京，便有兩個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的群體在唱對臺戲。一個是官方的，一個是民間的。民間群體的知識分子，既不畏懼官方的打擊，也不希罕官方的拉攏，而是自己聚集起來形成力量，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當代中國四十年來的第一次。雖然他們的力量還很微弱，但事情已經開始了。

王元化創辦《新啓蒙》叢刊

和《民主研究叢書》同時籌辦的，是《新啓蒙》叢刊。這是上海

著名學者王元化主編的一份刊物，本來要辦成一本雜誌，因為當局對報刊的嚴密控制，只好用“叢刊”的形式在夾縫裏出版。這叢刊大體上兩個月一期，每期一個書名，但封面上都冠以“新啓蒙”和順序號，這樣實際上仍是雜誌，但避免了申請“刊號”遭到扼殺的命運，只要每本有一個“書號”，就能出版了。（注二）

編者在《新啓蒙》第一期的“編後”寫道，“叢刊”“不打算兼收並蓄，而要選載表現叢刊個性的文章。”接着編者寫了一句話解釋叢刊的“個性”，這是在中共政權下面任何刊物都不曾說過也不可能說出的語言：“理論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誠，不屈服於權勢，不媚時阿世”。^⑥

從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新啓蒙》一共出了三本，書名分別是：《時代與選擇》，《危機與改革》，《論異化概念》。第四本還沒有出，就被“北京風波”淹沒了。

正如“叢刊”的名字一樣，它是繼承五四精神以啓蒙為使命的。這正是歷史已經擺在中國人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任務。王元化、阮銘和王若水在叢刊第一期和第二期上關於這個問題有精辟的論述。

呼喚個人自由

王元化在《為五四精神一辯》中寫道：“我國傳統觀念側重於共性對個性的規範和制約”，“但是，真正活的創造力是存在於組成群體的個體之中。沒有個體的主體性就沒有創造力，正如沒有個人的自由發展就沒有人類的自由發展一樣。”作者雄辯地說：“不能想像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個體都是無價值的，而由他們構成的群體竟會是有價值的。”^⑦這是對中共一貫用“黨性”消滅個性，以“集體”的名義抹殺個人價值的有力駁斥。

阮銘的《時代與選擇》從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生產力發生的根本變化談到人的解放問題。他說，現在已經到了人的智慧和創造直

接轉化為生產力的時代。“新生產力時代需要賦予每個社會公民獲得知識、信息和實現創造的自由權利。這是解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根本條件。”“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解放使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偉大的’獨裁者也阻擋不住人類向民主、自由、開放的歷史性進軍。”^⑧

他認為必須有一個“徹底鏟除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新的文化啓蒙運動。”而肩負新啓蒙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要實現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⑨

王若水在《論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中對馬克思一個命題作出與傳統觀念截然不同的分析。

“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注三)幾十年來，馬克思這個命題一直被理解為：人的本質是由一定的社會關係所決定。只能由社會關係來說明人的本質，否則就是宣揚抽象的人性。

王若水指出人的本質“是自覺能動性，是自由”。^⑩這種本質當然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但異化的社會關係使人的本質遭到壓抑，陷于不自由的境地，使人成為非人，需要通過革命的實踐來改造它。這才是馬克思的本意。

王若水指出，中共建國以後“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仍然是普遍的。這不是封建社會中那種依賴，但是變成了下級對上級的依賴，個人對組織的依賴，人民對國家的依賴。”不過他認為中國新時期情況已經變了，現在“需要獨立的個人，也創造着獨立的個人。”^⑪所以最後他呼吁理論和文學應當喚醒人的主體意識，使之投身于變革現實的鬥爭。

(注一)為了表示“寬宏大量”和分化“自由化”陣營，中宣部特地“邀請”了幾個“犯過錯誤”的人出席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的理論討論會：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對這種污辱性的“邀請”，于光遠和王若水予以拒絕。蘇紹智出席了，但他不是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去當花瓶，而是到會上作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發言。他理直氣壯地批評當權者對堅持思想解放的理論工作者的迫害，結果使當局弄巧成拙，狼狽不堪。

（注二）《新啓蒙》叢刊原定每月出版一期。但是為它找一個出版社十分艱難，許多出版社都不敢承接這個出版任務。主編王元化本是名人，在文化界有廣泛交往，並曾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但是在上海居然找不到一個出版單位。後來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朱正不畏風險，接過這個出版任務。這樣每期編校印發都要兩地跋涉，特別苦了責任編輯龍育群，為此空耗了許多時間，出版周期因之延長，實際上是兩個月一期。

（注三）馬克思這個命題是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來的。原話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②

四 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

知識分子獨立發出政治聲音

一九八九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又是《人權宣言》二百周年。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界普遍懷着興奮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這一年一開始就連續發生知識分子上書事件。最早是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然後是老作家冰心和哲學家王若水等三十三人發表公開信，支持方勵之的信件，要求釋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接着是老科學家王淦昌和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實行政治改革和取消以言治罪等要求。

從自中共執掌政權以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它的意義不比尋常：

首先，它表明知識分子已經不甘心充當共產黨這張“皮”上的“毛”了。一向乖乖聽黨的話的知識分子，如今要求黨來聽聽他們的聲音，而且表達意見的方式既非“交心”，也不是“匯報”，而是“公開信”，這就意味着他們要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了。

第二，被清洗出黨的方勵之，不但沒有被“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居然有這樣多的名人支持他的公開信，這不光使中共難堪，而且蘊含着更嚴重的政治意義。

第三，中共一向對文學家、藝術家、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存有戒心，在改造方面也抓的特別緊。但是對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中共一向優禮有加，比較放心，因為他們的專業是自然界和工程技術，離政治比較遠。然而這一波簽名運動卻有許多著名的老科學家都參加進來，這說明中共的政治舉措已經到了這個程度，連受到眷顧的科學家都忍受不住，覺得必須出來講話了。

在這些活動的前後，首都大學校園裏的民主空氣也一天天高漲起來。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組織了一個民主沙龍，許多名流被請去演講或與學生交談，影響很大。

胡耀邦逝世引發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民主運動

正在這個時候，胡耀邦突然在四月十五日逝世了。

中共有史以來最得人心的一位總書記，在平反了千千萬萬冤案，使政治重壓下數以億計的無辜者站起身來之後，自己卻被打倒在地，並且含冤離開了人間。這個消息像晴空霹靂一樣，震碎了每一顆善良的中國人的心。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率領他的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前獻上了第一個花圈。獻花圈的人為了對此事負責，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彭克宏。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當然，這個行動理所當然地給他帶來

可怕的後果：“六四”後被投入監獄。

第一個花圈引來了無數的花圈和數不清的人群。和一九七六年一樣，天安門廣場成了群眾的海洋。花圈和挽聯簇擁着人民英雄紀念碑，使它變成了海洋中聳立的高山，山上那巨幅胡耀邦畫像，憂傷地凝視着他生前為之獻出全部心血的悲痛的人民。

中共當局一開始就準備鎮壓

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也是最悲壯的民主運動開始了。

運動的主力是大學生。他們開始時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反對腐敗。真正促使運動擴大的是中共當局的某些人。他們通過三次無的放矢，或者說謊報軍情，一方面激怒學生，一方面激怒最高當局，既促使運動升級，又促成軍事鎮壓。

據陳希同事後向全國人大的報告，四月二十四日，李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已經把學生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且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⑬這就是說，在那些天真的學生剛剛開始運用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時，最高當局已經組織好指揮部，把他們的合法行動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來對付了。接着，四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肯定“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⑭

這種語言，人們都很熟悉。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來，凡是祭起“反黨反社會主義”法寶的時候，就是要對你實行政治打擊的時候。不料這一次這個法寶沒有把學生嚇回去，反而激怒了他們。社論發表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學生不約而同地走出校門，一次規模空前的示威游行發生了。他們沖破了警察的防綫，從郊外游行到天安門。和《人民日報》社論無中生有的指控相反，游行隊伍沒有去“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的口號是“擁護共

產黨”，“擁護憲法”，“消除腐敗”，“打倒‘官倒’”。

當局強硬立場促使事態惡化

以後學生運動始終堅持兩點最基本的要求，這兩點要求很簡單，只有八個字：“要求對話，不是動亂”。

如果從四月二十七日以後，不論哪一天，當局只要遵循三中全會的實事求是原則，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承認學生舉行是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的示威立刻就能平息下來。然後雙方坐下來理性地對話，這事情早就解決了，以後的種種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然而當局卻不這樣做，始終堅持《人民日報》社論的強硬立場，寸步不讓。這就是學生抗議示威曠日持久的真正原因。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已經是無的放矢了，然而當局忽然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這是第二次無的放矢。學生游行示威絕食靜座雖然給北京市內交通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這僅僅是公民在意法範圍內和平地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絕對沒有發生任何“動亂”。相反，那些日子北京的治安恰恰非常良好。交通堵塞是任何都市都難以避免的，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因此就實行戒嚴？顯然，如果不是蓄意使局勢惡化，也是神經過于衰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更嚴重的是第三次無的放矢。六月四日凌晨，忽然宣布北京市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實上直到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都沒有任何異常的表現。至于一些路口群眾阻攔軍隊進入市區，那是為了保護學生免遭屠殺，同時也是愛護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人民群眾所有這些舉動，哪裏有一絲一毫“反革命暴亂”的成分？相反，制造暴亂的正是奉命向和平居民開火的武裝部隊。

“六四”屠殺——中共在政治上毀掉了自己

在國際上，一切侵略者攻入別國的理由永遠都是“對方先開了

槍”。不幸的是這種倒打一耙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國內。當局宣稱手無寸鐵的和平群眾舉行了“反革命暴亂”，因此不得不用坦克為前導的野戰部隊予以平定。

這一次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當局收到了眼前的“功效”。他們也許明白，也許不明白，這種“功效”的代價究竟是甚麼。向敵國的和平居民開槍都是戰爭罪犯，如今向自己的和平居民開槍又是甚麼呢？暫且把法律問題放下不說，從政治上看，這場屠殺已經摧毀了統治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是永遠不能挽回的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身為十二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而不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那就說明他們的水平之低，根本不配當政。如果他們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而一意孤行，那就是已經喪失理智。不論屬於哪種情況，當局的合法性都被他們自己親手斷送了。

當然，當局的失敗並不等於學生運動的勝利。應當說，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學生運動最慘重的失敗。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一二一運動，分別遭到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但是都沒有這一次損失如此慘重。

痛定思痛，學生運動的當事人已經有過一些反思，但是存在分歧。從局外來看，也確有冷靜檢討之必要。

首先，總的說來，這次民運之失敗是雙方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結果。中共掌權四十年，在中國大陸已經建立起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黨的領導”使中央（實際上是一個人，最多是幾個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的意志能立即無條件地貫徹到所有的角落，指揮一切，調度一切。面對這樣一個超級對手，示威的學生簡直就像一個嬰兒和拳王泰森在臺上對壘一樣。“六四”坦克碾平了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實際演示。從這一點上說，民主運動遭到失敗，是必然的。

當然，事情發展到“六四”，也有一個過程。當局也並不是一開始就要動武的。當他們受到全世界譴責時，曾有“不得已而為之”

的表示。這也是事實，不過卻是在“決不退讓一步”(堅持《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的錯誤立場)的前提之下的“不得已”。前提就錯了，“不得已”當然站不住腳。不過政治鬥爭最後都是以力量對比來決勝負，而不是以非曲直來分高下的。

學生運動敗于無計劃和無組織

反過來再看學生這邊，就不能不為他們扼腕嘆息了。當局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極少數人”掀起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其實學生的失敗恰恰在於他們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特別是沒有領導。這場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只是胡耀邦逝世這個偶然因素，觸發了中國社會積累了多年的矛盾，才演變成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以來跛足改革(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所積累的矛盾，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路線統治所遺留的矛盾，以及一九一九年以來從未實現的民主與科學的訴求，都匯集到一起爆發出來了。

這個運動來得太突然了。不但官方毫無準備，學生也毫無準備。被指控為幕後操縱者的黨內外民主派知識分子，所謂“動亂精英”，更是毫無準備。人們都是倉促上陣，使這次運動一開始就處於無政府狀態。當然，學生們也有某種組織，比如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就有“指揮部”，也有談判代表，但是卻不具備應有的權威。比如五月十四日，談判代表答應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是廣場上卻有人不答應，結果就不撤。這種“有組織”，和無政府狀態有多大區別呢？以“烏合之眾”(不是在貶義上使用這個詞)對抗歷史上最集中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那勝負的格局早就注定了。

學生錯過了兩次良機

正因為學生運動是無組織的，所以有幾次可以爭取較好結局的良機都錯過了。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一次是五月十四日，十二位學者作家到廣場勸說學生撤離。一次是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學生發表書面談話。

十二學者作家，都是在學生中頗有影響的人，他們以學生的朋友身份出面呼吁，這本是結束絕食的絕好時機；不是在政府的壓力下屈服，而是接受了朋友的意見，並且保持了民主運動的勢頭，為以後開展和平和理性的對話，促進政治改革贏得了很大的空間。可惜的是這個呼吁最後遭到學生拒絕。（注一）

趙紫陽的書面談話代表官方立場。這個談話對學生運動有相當高的評價。他勸學生停止絕食，當局決不“秋後算帳”，並答應繼續對話。^⑤應該說，這是當時學生所能爭到的最佳結局了，可惜同樣被學生拒絕。顯然，學生運動的領袖們不懂得，政治需要妥協。現實的政治，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純粹，或百分之百地實現某一方的意圖。某種妥協，某種程度的適可而止，以便鞏固已經取得的陣地，或避免喪失更多的陣地，是一種高級的政治藝術。這種藝術，對於弱勢的一方尤其重要。當學生領袖封從德在廣場上用擴音器領導學生高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以拒絕撤離的時候，那氣氛的確很壯烈。但是當坦克車開進廣場的時候，能用這個口號鼓舞學生們用肉身去阻擋鋼鐵的履帶嗎？事實是“六四”凌晨學生們不得不在槍口下撤離廣場。這仍然是妥協，保全了廣場學生的生命。但它的代價卻是學運初期爭得的東西全部喪失，外加幾千人的死傷。

當然，下令開槍的罪責是沒有任何開脫餘地的。即使當局有權強制執行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也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既然有幾十萬大軍，那麼，兩個大兵抬一個學生，押上汽車送回學校，那不就完事了嗎？然而下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這就是蓄意殺人，將來此事是絕對逃不過正義審判的。不過也應該看看另一方面，因為雙方都有回旋餘地。當局有槍，“開槍”和“不開槍”之間，是他

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學生有腿，“走”和“不走”之間，則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只要雙方當中有一方採理智的態度，慘案就有可能避免。結果呢，當局做了錯誤的選擇，學生也做了錯誤的選擇。雙方的錯誤性質不同(官方有心，學生無意)，但學生畢竟為它付出慘重的代價。五月十四日或五月十七日學生領袖們如果從政治上考慮而不是從感情上考慮，就有可能體面地撤離，而不是在槍口下撤離，就有可能保住已經爭得的民主成果而不是全部失掉。這樣，構成當代中國歷史最黑暗一頁的“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

這次慘案的全部內情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真象不可能長久隱瞞下去。不過，如果不去猜測具體的人和他們的東窗密謀，而是從光天化日之下的政治形勢來分析，事情是很清楚的。連續三次謊報軍情，平空捏造所謂“有計劃的陰謀”，所謂“發生動亂”和“發生反革命暴亂”，正是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製造借口。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寫這幾個字，正是在演“賊喊捉賊”的把戲。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使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注一)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代表李鐵映(政治局委員)簡明復(書記處書記)與學生談判陷入僵局。他們要求光明日報記者戴晴邀請一些學者作家出面，勸學生撤離廣場。其中有于浩成、嚴家其、李洪林、劉再復、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溫元凱和李陀等共十二人。他們和學生代表對話，代表們接受了他們的“緊急呼喚”，但要求這十二位學者作家利用他們的影響直接到廣場去說服學生。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當晚這十二人到廣場上宣讀“緊急呼吁”，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但正要達成共識的時候，一位學生領袖忽然奪過擴音器，慷慨激昂地拒絕撤離，並且領導學生們宣讀“絕食誓詞”，最後連呼三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就這樣，使撤離廣場的談判完全淹沒在震耳欲聾的激烈口號當中而陷于失敗。這次絕食的良好結局機會，就這樣錯過了。據戴晴辨認，中斷這次對話的學生領袖，是柴玲和封從德。

五月十七日夜間，李洪林、于浩成和嚴家其三人又一次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指揮部，勸他們“見好就收”，在十七日全市百萬人大游行勝利結束之後，于次日結束絕食，撤回學校，轉入正常的學習，並和政府繼續對話，以促進民主。當時指揮部只有兩名成員，不能作出決定，但答應找其他成員一起討論三人建議。事後證明，這次建議也被拒絕。五月十七日的機會錯過之後，當局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學生們連體面地撤離都不願意，當然更不會在軍事壓力之下撤離了。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總清算

“自由化分子”全軍覆沒

“六四”的槍聲打響了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的信號。這場“反自由化”和以前不同。鄧小平總是嫌以前的“反自由化”太軟，這一次就非常硬，是用坦克開路的。

直到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一日解除戒嚴為止，半年多的時間裏，首都實際上處于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占領之下。大屠殺後的占領初期，士兵在街上巡邏都是幾十人一隊，排成方陣行進。所有的士兵都是平持自動步槍，槍口一律向外，隨時準備向前後左右四面射擊。為了能監視後面，並能向後方射擊，方陣最後一排士兵是面向後邊，退着走，這種景象成為當時北京市的一種奇觀。素有“人民

子弟兵”之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四九年是被人民群眾載歌載舞箠食壺漿迎進北京的。過了四十年，竟發展到必須動用坦克才能攻入北京，發展到用機關槍對自己的父老兄弟瘋狂掃射。凡是珍惜這支軍隊榮譽的人，都會對這種事情感到痛心。過去常說的“軍民魚水情”，是說這支軍隊在群眾中間就像魚在水中一樣自在。現在，當他們排成方陣惶恐地走在街上把槍口指向四周的群眾時，這不是和魚掉進開水鍋裏一樣不自在嗎？

構成人民共和國最黑暗一頁的，不光是首都遭到血洗和軍事占領，還有接踵而來的大搜捕和大清查。

學生領袖王丹等一大批人遭到通緝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歷年不斷被指控為“自由化”的知識分子也成了搜捕的對象。以陳希同六月三十日向人大常委所作的報告中點到名字的“自由化分子”來說，方勵之李淑嫻夫婦，躲進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沒有出逃，也不想出逃的曹思源、于浩成、李洪林、戴晴和溫元凱，都在六七月間先後被捕。包遵信是在逃亡中間被捕的。其餘的嚴家其、戈揚、蘇紹智、金觀濤、劉再復、李澤厚、蘇曉康和陳軍等人，先後都到了國外。列入陳希同名單中唯一沒有被捕的，只有張顯揚一人。當然，沒有列入陳希同名單的被捕知識分子還有許多，像王軍濤、陳子明和劉曉波就是其中著名的人物。王軍濤在鬥爭策略上並不完全贊同學生的行動，但他在法庭上勇敢地為學生運動作了辯護，挺身而出承擔了責任，並且因此受到法庭的重判，被處以長達十三年的徒刑。

一網打盡——消除政治隱患

除了大逮捕以外，中共中央還在六月十四日決定在“所有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深入開展清查工作”。^⑤這是繼五十年代“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以及六十年代的“清理階級隊伍”之後的第四次“肅反運動”，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停止“以階級鬥爭為

網”之後，專門以肅清“階級敵人”為任務的一場新的政治運動。

除了“清查運動”之外，還有一個“清理工作”，這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一些人在“動亂”中“立場不穩”等“錯誤”的思想批判運動（當然少不了組織處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又決定在“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堅決消除黨內敵對分子、反黨分子、消除政治隱患”。^①

中流砥柱——邵燕祥

除了逮捕法辦之外，凡是參加清理、清查和黨員重新登記的人，必須聲明擁護“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即擁護“六四”屠殺，才能過關。對當局屠殺手無寸鐵的居民的暴行，你想保持沉默都不行，必須舉手贊成。這是對人類良知一次空前的摧殘。它所加給人們思想上的傷害，遠遠超過歷次思想運動。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只有一個人，在黨員重新登記的時候拒絕擁護“六四”屠殺，那就是詩人邵燕祥。他拿出毛澤東建國後關於群眾“鬧事”問題的批示：“絕對不許向群眾開槍”，作為自己的依據。這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共黨組織目瞪口呆，對他無可奈何。

趙紫陽的悲慘結局

“六四”後的黨內整肅是從趙紫陽開始的。六月二十三日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他的總書記和黨內一切職務。曾經參與倒胡的趙紫陽，此時醒悟為時已晚。不過他在整個學潮中的理性和溫和的態度，特別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最後發言，使他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一個可以面對歷史而無愧的句號。他沒有像胡耀邦在失敗時的失態。在成為對手俎上之肉的時候，他拒絕作違心的檢討，而是保持了一個政治家的尊嚴，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並在被迫離開中央的時候，放棄了自己原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觀點，指出政治和經濟改革必須同步。當然，在當時那個全會上講

這番話，只能是對牛彈琴。

隨着趙紫陽的下臺，“鄧胡趙”體制就徹底破碎了。鄧小平挑選了江澤民組成新的中共領導核心。接下去是從中央到地方對領導幹部的整肅和清洗。凡是被認為在“制止動亂”中不夠堅決的幹部，都被撤換下來。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和閻明復，都被撤掉職務。在第三次“反自由化”中被撤消中宣部長職務的朱厚澤，原被安排在全國總工會，這一次又因為全總支援過學生運動而再度被撤了下來。文化部長王蒙則因為拒絕去慰問戒嚴部隊而受到壓力，他幹脆掛冠而去，辭職不幹了。

“六四”以前，許多學者專家擔心當局會對學生實行暴力鎮壓，紛紛發表聲明要求政府愛護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副院長丁偉志和李慎之等在戒嚴後發表聲明，一方面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一方面呼吁和平解決，意在規勸當局不可使用武力。這本是學者們防止發生悲劇的善良願望，完全是為了維護穩定，也是對中共的真誠愛護，絲毫沒有“煽動動亂”之嫌。然而他們竟因此而遭到嚴厲指控和處分。

奇異的金牌銀牌和銅牌

不過當時社會上的價值觀念發生了一種奇異的變化。官方和民間的標準截然相反。因“六四”事件而受到處分，已經被民間看作榮譽：開除黨籍是“金牌”，留黨察看是銀牌，嚴重警告是銅牌。這就表明當局在道義上已經徹底失敗了。

第四次“反自由化”鬥爭的主要特征是軍事手段，司法手段，行政手段和組織手段並用。首先是槍殺，接着是搜捕、監禁、審判，然後是撤職、開除和各種檔次的行政處分以及黨內處分。這是一次最徹底的清洗。一九七九年以來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的“自由化分子”，除了逃亡國外的，差不多已被一網打盡了。

在輿論陣地方面，深受讀者歡迎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

欽本立)和北京的《新觀察》(主編戈揚)都被查封了。王元化主編的《新啓蒙》不算期刊,也就不勞當局查封,因為它的生存條件已被封殺,自然不能繼續出版了。《人民日報》等等新聞出版單位,當然不可能一一查封,況且中共新的領導核心也需要自己的“喉舌”。所以通過“清理清查”運動,這些單位中所有“犯錯誤”的,以及雖無“錯誤”但新領導信不過的人,通通被撤下來,換上了可靠的人去掌握。

“大批判”的末日

至于這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中的“大批判”,那就太差勁了。

首先是人才的貧困。當局簡直拿不出一個多少有點知名度的人在“大批判”的舞臺上亮亮相,藉以壯大聲勢。所有在新聞媒體上出面聲討“自由化”的人,全都是些不入流的無名之輩。以致新聞報道只好用“大家”作為主語來編造幾句“大批判”的語言。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也大體都是筆名,這說明寫文章的人不敢露面,或不願出這種風頭。

其次是思想的貧困。這些“大批判”文章的內容,屬於思想理論的很少,絕大多數都是編造事實,揭露“自由化分子”怎樣“策劃”和“煽動動亂”。而他們所編造的事實,有的是平空捏造,有的是顛倒黑白。比如,五月十四日十二學者作家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次日已有新聞如實報道,人人皆知。但是“六四”後到了陳希同的報告裏,竟成了這十二個人“給動亂火上澆油”。^①再如,有一篇《上海動亂真象》的“大批判”文章說:陳軍和李洪林等人“密謀把所謂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簽名運動引向上海。”^②其實這兩個人根本就不認識,也從未見過面。還有一篇《他們宣揚了甚麼》的文章,批判了“于浩成、李洪林的‘民主演說’”。^③事實是這兩個人雖然會寫文章,卻不善于言詞,甚麼時候發表過“民主演說”呢?可見當局處心積慮要把學生運動誣蔑成少數“自由化分

子”“有計劃的陰謀”，已經到了動用造謠手段的地步了。

這一場“大批判”運動的致命弱點，是沒有思想，沒有理論。文章雖多，但理論性的極少，偶而觸及理論問題，也只是斷章取義摘引一半句話，加上幾個政治判決詞匯，就算完了。對比起來，當年四人幫的“大批判”雖然也是強詞奪理，畢竟還有不少假大空的廢話可供賣弄。如今“六四”後這新的一代，卻連假大空的廢話都搬弄不了幾句，這種可憐相，比起他們“大批判”的前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不過這一波“反自由化”的鬥爭，在理論上也有一個新貢獻，那就是把改革分成兩種：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這也難為中共新領導煞費苦心。因為被清洗的“自由化分子”都是人所共知的改革派，為了給清洗找理由，便只好說他們所主張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了。不過這種提法在鄧小平的理論裏卻不曾有過。相反，鄧小平一向主張“貓論”，即“不管黑貓白貓，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反對去爭論甚麼“姓社”“姓資”。所以對“資本主義改革”的批判不久也就悄悄收起來了。

另外在這場“大批判”中緊鑼密鼓批得最多的還有“和平演變論”和“全盤西化論”。好像中國的事件都是外國人在策劃和導演，而中國的“自由化分子”都是外國在中國的代理人。不過這一套公式實在太陳舊，不要說聽眾早已生厭，連“大批判”者自己也都覺得乏味了。

六 尾聲——思想運動的終結

思想鬥爭運動的周期

第四次“反自由化鬥爭”意味着當代中國延續四十年的思想運動的終結。

這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內部或社會上就再也沒有思想鬥爭了。

鬥爭肯定有，甚至可以說時時刻刻都在進行。

所謂“終結”，是指以延安整風為模式的，由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開展的群眾性思想鬥爭運動的終結。這種運動以“大批判”開始，以組織處理告終，接着就進入一個相對平靜的間歇期。間歇期實際上是給下一次思想運動作準備，然後就進入下一個運動周期。如此循環往復，但都不是簡單的重復，每一個周期都是在更高水平上的重復，不但內容花樣翻新，而且那鬥爭的深度和廣度也都超過前一個周期。

這四十年的鬥爭又可劃分為兩個時期，即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是毛澤東時期。這個時期的思想鬥爭運動在延安模式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文化大革命是它的極致。即使毛澤東在世，這種鬥爭形式也已走到終點，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樣了。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初批判左傾思潮和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本來使中國思想界獲得一縷生機，有望結束毛澤東時代那種沒完沒了的思想運動。但是這次思想解放很快就在中共傳統力量的重壓之下，中途夭折，接着就開始了新時期即鄧小平時期的思想鬥爭運動。

日暮途窮——思想日益空虛，鬥爭日益加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在鄧小平直接發動和領導下，先後有四次“反自由化”鬥爭的高潮。這四次思想運動也是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一次比一次鬥的更凶。不過鄧小平時期和毛澤東時期比起來，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運動的思想成色日益減少，而組織手段日益增加。到了第四次高潮，組織手段已經不夠用，只好採取大規模逮捕和判刑的手段來對付思想異己了。而用司法手段來對付的這些思想異己，大部分都是被稱為“同志”的共產黨員。

這種現象說明了甚麼呢？

思想鬥爭運動的思想成色減少，表明當局思想上的空虛和理論上的貧乏。

組織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的廣泛采用，表明領導的權威和思想上的感召力已日益喪失，不得不靠組織上行政上和司法上的強制來維持統治地位。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並不表示“堅持黨的領導”的中共的强大，而是說明它的虛弱。至於動用軍隊來對付自己治下的人民，那就更加清楚地昭告全世界，這個政權已經沒有群眾擁護，只能靠刺刀來維持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還能發動第五次“反自由化”高潮嗎？

不可能了。

思想政治工作的沒落

這要從“思想工作”說起。

中共認為“思想工作”是自己獨有的優勢。“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務是轉變人的思想，“轉變”就是“改造”。從戰略上或長期目標來說，它的任務是改造世界觀，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從戰術上的目標來說，是解決當前的思想問題。比如：軍隊在作戰之前，要作思想動員，使大家明瞭此次戰鬥的意義；某個黨員有甚麼錯誤或思想問題，支部書記找他個別談話加以勸導，或開會進行批評幫助，都屬於“思想工作”。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中共在物資極度困乏、環境極其艱險的條件下，能使自己的組織和軍隊團結一致，克敵致勝，確實有賴于這種思想工作。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把思想工作用于改換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領導而創造的一種大規模的群眾性的思想工作。

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學習運動和思想鬥爭運動，就是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的“延安模式”在和平時期的應用。

思想工作的唯一方法是說服：使對方自願接受，口服心服。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思想工作的目的：使人自覺自願用“正確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動，而不需要任何強制或懲罰。

從這個角度來看，只有建國初期的學習運動，部分地達到了這個目的。那時確實有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對他們初步了解的新思想，表示了由衷的佩服，並且也真的在努力改變自己，力求跟上新形勢。

但是事情也就僅僅到此為止。

從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訓傳》開始，強制或高壓就成為思想運動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特征了。

思想鬥爭運動的逆反效應

“強制”總是從“自願”終結的地方開始的。當強制的手段出現的時候，思想工作就宣告失敗了。高壓之下的“思想工作”就像重刑之下的審訊一樣，何求不得？但是已經掌權的共產黨和身處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毛澤東，在權力的腐蝕下卻全然不顧這些，而是用不斷增加壓力的辦法以取得日益擴大的戰果。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字獄不斷擴大，冤案不斷增多的原因。

然而人民的忍耐總是有限度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就是人民群眾不滿的總爆發。這次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批鄧”激起了人民的憤怒。

鄧小平時代的思想運動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壓力也是不斷增強，然而在運動的規模上卻遠遠比不上毛澤東時代。這是因為鄧的領袖魅力和動員力量比不上毛澤東，另外他對思想運動的偏愛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狂熱。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群眾對思想

運動早已厭倦，儘管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興致很高，卻也無可如何。

而且，群眾還不光是厭倦。在鄧小平時代出現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批判效應”：被批判者總是得到群眾廣泛的同情和愛戴。他的聲望必定隨着批判的深入而升高。而那些批判者卻遭到普遍的唾棄，成爲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後來有人用八個字概括了這種效應，叫作“批誰誰香”，“誰批誰臭”。這說明思想鬥爭的威懾作用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走向反面。當局對“自由化分子”的批判，已經成爲提高這些人聲譽的法碼，這實在是發動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社會條件的變化使思想運動失去物質手段

使思想運動走到盡頭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原因，這就是無所不包的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瓦解。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走上多元化的軌道。這種經濟制度使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人們可以自謀生計，不必再仰賴集體或國家的恩賜了，這是使個人得以擺脫思想強制的物質條件。

因此，在鄧小平時代，誰想再發動一次毛澤東式的思想運動，已經不可能了。中共的左派指摘胡耀邦和趙紫陽阻撓一九八三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反自由化”是江澤民就任總書記後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還不是照樣冷冷清清？

正因爲整個社會歷史條件都變了，所以鄧小平時代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沒有多少“思想工作”的成分，而只剩下不斷升級的強制手段。這種情況表明當局已經黔驢技窮，不但“說服”業已無人愛聽，而且強制的效果也日益減退，不得不一再提高“力度”。當各種招式都已用盡，而人們仍然既不擁護，也不害怕的時候，便只有乞靈于軍隊了。

既然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已經把十八般武藝全都用盡，下

一步還能祭出甚麼法寶呢？

沒有了。再也不可能拿出新的招數了。因此，構成共和國四十年思想史的那種大規模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走到盡頭，不會再度出現了。

不過，這並不是說中國思想界從此風平浪靜了，那是不可能的。

“自由化分子”在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中全軍覆沒之後，“反自由化”運動自然就該落幕，因為已經沒有鬥爭對象了。

思想鬥爭的餘波——左派批判鄧小平

但是批判“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改革”的鑼鼓卻是餘興未盡，繼續在臺上敲打。這是批判誰呢？

原來是批判鄧小平。鄧小平按照自己的“貓論”，在經濟改革上根本不管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甚麼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他支持市場經濟。他的理論是：“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④

“貓論”本來就是左派的批判對象，然而它正是鄧小平領導改革的理論基礎。在第四次“反自由化”已經沒有鬥爭對象之後，左派對所謂“資本主義改革”繼續進攻，並且一定要把“姓社姓資”問個水落石出，矛頭所向就很清楚了。

而且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中國經濟在“反自由化”和“治理整頓”之下，連續三年疲軟不堪。這種形勢使鄧小平不得不在退休之後再度出來，發表一個扭轉局勢的“南巡講話”。

“南巡講話”是從“治理整頓”下挽救改革使它重新起步的宣言。鄧小平嚴厲批評了想走回頭路的中共領導人：“誰不改革誰下臺。”他還對左派糾纏“姓社姓資”感到不快，不過他不是理直氣壯地去批駁，而是用消極防禦的辦法，呼吁“不要爭論”。

“南巡講話”最有意義的還是鄧小平對左和右的態度。他照例

要反右，不過這一次他很清醒地指出左傾的危險是主要的：“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

這樣，一九九二年以後，左派的喧囂暫時平息下去。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又重新出現了，這就是所謂“地下萬言書”。

到一九九七年為止，已經出現了四個“地下萬言書”，都是攻擊改革，攻擊鄧小平，批判中共現任領導的路綫的。

這些萬言書引起海內外關心中國事態者的關注。應當怎樣看待左派挑起的這種鬥爭呢？

左派的觀點無非是重復早已陳腐不堪的傳統教條。當然他們打的旗號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這正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授人以柄的結果。

左派通行無阻說明了甚麼？

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當局對左派和他們“萬言書”的態度。

按照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和對思想的箝制程度，不要說直接批評現任領導，就是被懷疑為影射都要受到追究。可是這些“萬言書”卻通行無阻，從未聽說受到甚麼追究。而且，也不只是這些“地下萬言書”，北京出版的幾份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刊物，時常發表和“萬言書”一個調子的文章，照樣也沒有人去追究。

這種現象只能說明左派的立場並沒有超過當局所能容許的限度。也有一種分析認為，左派的叫囂正是當局所需要的。有了這種更左的叫囂，才能襯托出當局還不太左。“兩害相權取其輕”，苦于左傾路綫統治的中國人，無不談虎色變，既然民主政治不可想像，那麼，與其左派上臺，還不如現在的班子不要下臺。這是一箭雙雕：既安撫了左派，又美化了當局的形象，使它可以獲得溫和派甚至“改革派”的稱號。當然，左派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和當局在反對“自由化”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只是批評當局左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得不夠而已。

一向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自詡的中共當局，應該知道鄧的反左指示。但是他們對於左派如此明目張膽反對改革和攻擊鄧小平的言論居然能夠容許，可見他們原是一個營壘中人。他們之間的“鬥爭”，不過是茶杯裏的波浪而已。以後這種爭吵當然還斷不了，甚至也許很熱鬧，但也至多是臉盆裏的風浪，這和歷次“反自由化”的思想鬥爭運動相比，根本不是一回事。

以延安整風為模式的，在中國大陸上空翻騰了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成為過去。以後當然還可能有批判“自由化”的節目上演，但是不會有甚麼觀眾了。歷史在向前走。條件變了，那種運動不會再出現了。

※ ※ ※

第十四章 引文出處

- ①《王忍之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1987年3月7日)
- 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84-385頁
- ③《鄧小平帝國》第211-213頁
- ④《國史通鑒》第4卷，第293頁
- ⑤《人民日報》1988年8月6日
- ⑥《時代與選擇》(新啓蒙叢刊之一)第92頁
- ⑦同上，第12頁
- ⑧同上，第37-38頁
- ⑨同上，第60-61頁
-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
- ⑪《危機與改革》(新啓蒙叢刊之二)第8頁
- ⑫同上，第18-19頁
- ⑬《人民日報》1989年7月7日
- ⑭同上。

⑮《半月談》1989年第11期：〈北京近期局勢紀事〉

⑯《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432頁

⑰同上，第436頁

⑱《人民日報》1989年7月7日

⑲同上，1989年9月24日

⑳《求是》1990年第7期

㉑《交鋒》第183頁

㉒同上，第194頁



“公道自在人心”，這是中國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是中共的新話。胡耀邦被迫下台，百姓心中極為不平。胡耀邦猝然逝世，使人民心中積怨突然爆發。天安門廣場立即變成悼念他的人群海洋。



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學潮，持續五十天。這是五月四日北京高等學校學生上街遊行。



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用三天三夜時間集體雕塑的民主女神像，五月二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樹起。她已成為這場民主運動的象徵。這座塑像正好和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對峙，不知毛作何感想。“六四”凌晨，解放軍攻入廣場，首先推倒了她。後來她被在香港和美國等地複製。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和平進入北平，民衆夾道歡迎，軍民是魚水關係，上圖為軍隊入城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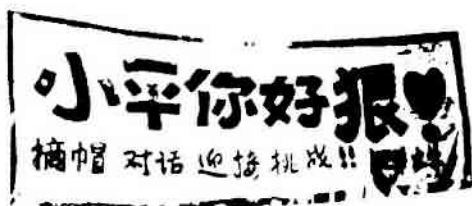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強行攻入北京，對和平居民展開血腥屠殺，民衆死傷枕藉。軍民之間變成刀俎和魚肉的關係。右圖為群眾抬着滿身鮮血的受傷者奔跑呼救。





上圖爲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時，大學生打出的標語。

下圖爲一九八九年五月學潮時，大學生打出的另一條標語。





第四次“反自由化”，除了坦克之外，就拿不出別的武器了。這是“六四”屠殺之後，當局能夠拿得出手的“批判材料”。除了歪曲事實和王婆罵街式的幾句批判以外，再也唱不出甚麼新調子了。

這種水平，連四人幫都不如。四人幫雖然強詞奪理，畢竟還有詞可說，能說出一大堆歪理。如今的“大批判”，連歪理都沒有了，這也正好說明，橫行中國大陸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走到末日了。

第十四章 結 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四十年的思想史，都是在鬥爭中度過的。除了毛澤東退出歷史舞臺之後有過一次短暫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外，其餘的鬥爭可以說都是思想禁錮運動。這些運動的鬥爭對象是知識分子，受害的是整個民族。

一 思想運動的根源

當代中國思想運動的發動者是毛澤東。不過這不是他個人頭腦的發明，而是有它的思想來源和社會基礎，特別是有它的政治需要。只要這種思想來源和社會基礎存在着，只要有這種政治需要，即使不是毛澤東來領導，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鄧小平剛剛復出的時候，未必意識到將會由他再來發動這種不得人心的思想運動。因為他雖然是毛澤東時代的整人者，卻也是受害者。本着人類良知，他會從心裏厭惡這種整人的運動。但是只要這個黨領導着中國，只要它繼續堅持傳統的理論基礎，只要國家的政治格局還沒有轉向真正的民主，這種思想鬥爭運動就是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是思想運動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這話千真萬確。

恩格斯曾用磁鐵作例子說明對立的永恒和無所不在：每一塊磁鐵都有南北極。把一塊磁鐵分成兩塊，兩塊又各有自己的南北極。列寧把辯證法歸結為“對立統一”，並且確定：對立統一是一相對

的，對立鬥爭是絕對的。斯大林概括出一個公式：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毛澤東完全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鬥爭哲學，不但運用於社會，而且運用到黨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都主張並且實行黨內鬥爭。但是把黨內鬥爭提到哲學高度的，是毛澤東。他認為“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這就是說，共產黨不但是爲了鬥爭而存在，而且要爲了存在而鬥爭。因此，在黨外鬥，在黨內鬥，和敵人鬥，和朋友鬥，最後還要和自己人鬥，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如果一旦不鬥，共產黨就要滅亡了。

事實正是這樣。自從馬克思主義問世，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地和各種思潮、人物和派別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曾使列寧感到苦惱，他嘆息道：“這就是我的命運！”據他夫人克魯普斯卡亞記載，每次鬥爭之後，列寧都精疲力盡，必須休息一段時間才能恢復。但毛澤東不是這樣，鬥爭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他年輕時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裏的“奮鬥”當是“鬥爭”的同義語。當然，被鬥者不會感到“其樂無窮”。這種樂趣只能屬於鬥人者。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在鬥別人，當然是“其樂無窮”。而且鬥的那樣頻繁，那樣厲害，大概也和這種樂趣有關係。

除了指導思想上的根源以外，中國這種大規模的思想運動還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社會基礎。

中國特色——東方專制主義傳統

世界各國共產黨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在他們執政的國家裏也都有思想鬥爭，但卻遠遠不及中國。這和中國的特殊國情是分不開的。

和希臘文明所代表的西方傳統不同，中國有悠久的東方專制

主義傳統。所謂《春秋》“大一統”，已經支配中國兩千多年。這裡的“大”，是動詞，即尊重之意。“大一統”不光指政治統一，而且包括思想統一。從禮樂教化到焚書坑儒，都是統一思想的手段。西方中世紀也有迫害思想異己的暴政。監禁伽利略，火燒布魯諾，都是著名的例子。可是和中國古代的文字獄比起來，那就差多了。從當代中國新文字獄的規模之大，鬥爭之殘酷，以及陷人于罪和致人于死的刀筆功夫，都可以明顯地看到古代文字獄的惡毒傳統。這真是“中國特色”。

另一個中國國情是它的社會階級結構，以及因此產生的矛盾衝突。

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矛盾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毛澤東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農民戰爭。中共的領導骨幹主要是農民和城市無產者出身的人們所組成。其中當然有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長期鬥爭中也都“工農化”了，至少也是農民利益的政治代表，否則他們就不會被推到領導崗位。這樣，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實質上是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過中共黨員和軍隊中產業工人很少。所謂“工農”其實就是農民。

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中共轉到農村進行土地革命的時候，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還不突出。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大量知識分子奔向共產黨，這個問題就突出了。毛澤東確實講過團結知識分子的必要，但他更強調的是改造。他用辛辣的口氣嘲笑知識分子，並且宣稱沾有牛糞的農民比知識分子乾淨，也比他們高明。他要求知識分子放下架子，和工農結合，甘當小學生。當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確實這樣做了。只有王實味等幾個人多少表現了某種不諧調，便遭到迎頭痛擊，此後便再也沒有不聽話的了。胡風在四十年代倒是保持了自己的觀點，但那時他在重慶，延安管

不着他。這筆帳後來在一九五五年清算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取得全國政權，革命戰爭結束了，和平建設開始了。但是黨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仍然和戰爭時期一樣，這樣矛盾就尖銳了。中國農民是淳樸而勤勞的，被“逼上梁山”以後作戰是很勇敢的。革命隊伍中還有一些游民或城市無產者，他們無牽無挂，打起仗來也非常勇敢。因此農民和這些無產者便是革命隊伍的主力，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們也有各種缺點，毛澤東曾注意到這些缺點，主張加強教育。但是在頻繁而殘酷的戰爭中，事實上很難做到。

還應該看到，由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和差別，工農和知識分子之間確實存在着歷史造成的矛盾。知識分子容易輕視工農。工農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比較複雜，尊敬、羨慕、妒忌、憎恨，各種情緒都可能有。作為一種階級關係，對立情緒是很重的。這種矛盾，當工農幹部掌權的時候就充分暴露出來了。建國以後歷次思想運動實際上都是批鬥知識分子的運動。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副校長痛心地说：“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

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分子叫作“臭老九”，就是這種對立的極端表現。所謂“臭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八種階級敵人之後：“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臭。”（叛，叛徒。特，特務。走，走資派。）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走資派”以外，遭到最殘酷的鬥爭的正是知識分子。其所以如此，除了鬥爭哲學的作用以外，以工農為主體的中共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應該說是它的階級根源。

其實中共的領導核心差不多都是知識分子，而且一部分人還受過西方教育，應該遠遠超出束縛農民的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但是為甚麼在他們領導下的這個黨，竟如此敵視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的復仇情結

有人試圖從毛澤東的特殊經歷和某種復仇情結去解釋這種現象。

毛澤東本人只有高等師範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中學程度，早年在北大大學圖書館充當一名小職員。在這所全國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裏，應該說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事實上毛澤東是很用功的，雖然學歷不高，但他的國學根柢和文史修養都是出類拔萃的。然而那些往來于圖書館的一流學者、教授、專家，或出入李大釗辦公室的座上客，大概誰也不曾留意他的才華，當然更不會對這位未來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預先表現出更多的尊敬，而且很可能無意間觸痛了他的自尊心。不單教授們對他缺少禮遇，恐怕那些自恃才氣的大學生們也未必把這個小職員放在眼裏。這種境遇大概在年輕的毛澤東心裏種下了仇恨的種子，總有一天會生根發芽，總有一天要一吐這口惡氣。正是這種情結，使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懷有某種復仇心理。不然的話，就很難解釋為甚麼一個國家的領袖竟能這樣肆意壓制和摧殘知識分子，而不珍惜和尊重國家的棟梁之材。同時也很難解釋為甚麼身為知識分子的他，會對自己的同類極盡欺凌、嘲笑、揶揄、污辱之能事？

這種心理分析，未必符合實際，不過也可能有某些道理。大概正因為有這種情結，中共黨內工農對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敵視，才能在毛澤東身上得到高度集中的表現，並且通過他的決策，把這種敵視變成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和摧殘，使知識分子一直生活在壓抑和恐懼當中。

反右派運動時，柯慶施對徐鑄成說的幾句話，把中共高層中敵視和鄙夷知識分子的心態表現得很透徹。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②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又被看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雖然還沒有得到多少實惠，但心情開始好轉。這時黨內有人就大叫道：“知識分子又翹尾巴了！”胡耀邦針對這種叫喊說了幾句公道話：“知識分子的腰還沒有直起來，哪裏談得到翹尾巴？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都是工農整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總是吃虧。”一個領導人如此坦誠地為知識分子鳴不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統一思想

除了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以外，這種大規模的思想鬥爭還有它的社會根源。

原來社會主義理想之所以吸引廣大群眾，包括許多知識分子，是因為它論證了：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私有制必然導致剝削，剝削又引起壓迫，有壓迫就有反抗，從此社會陷入紛爭，種種問題因之出現。一旦建立起公有制，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就停止了。代替它的將是一個共同富裕、沒有剝削和壓迫、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的平等的社會。但是現實的社會主義模式卻是：隨着公有制的建立，全社會就變成一架大機器，它按照中央的統一計劃運轉，每個人都成爲它的零件或螺絲釘。這是列寧的主張，也是蘇聯提供的樣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做的。這個社會不但沒有甚麼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且建立了一種歷史上最嚴酷的極權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處在這架機器的頂端，壟斷了一切權力。

集中統一的經濟，集中統一的政治，自然要求統一的思想。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這架大機器按照統一的意志順利運行。這也正是中國爲甚麼總是不停地進行批判鬥爭以便保持“思想一致”的原因。這是一種體制上的根源，不是哪個領導人能夠隨便改變的。當然毛澤東個人的品格和作風，可以使中國的思想運動帶上濃厚

的特色。但是體制比他個人的特點更有力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他提倡的，“三不主義”也是他許諾的。然而終毛澤東之世，這些許諾從來不曾兌現。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同樣提倡，同樣許諾，但是也同樣概不兌現。這確實不能簡單地歸之于他們個人的翻雲覆雨，應該說，主要是社會制度在起決定作用。

二 思想運動的後果

對精神文明最嚴重的傷害

四十年的思想運動史，在中國這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不過這“一瞬”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曾經通過一個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然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問題是連年的思想鬥爭已經把中國的精神文明破壞得體無完膚了。精神文明離不開人的精神面貌。而這些年來的思想運動恰恰摧毀了中國人的品格和操守。這個問題不解決，能談得上甚麼精神文明的建設！

思想運動對精神文明的破壞是全面的，文化、藝術、科學、教育、道德、宗教，沒有哪個領域能夠幸免于難。這裏只就它對中國民族人品方面的傷害略作回顧。

摧毀人的個性

首先，思想運動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最大傷害就是摧毀了中國人的個性。本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就嚴重束縛了人的個性，“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使每個人都處在人身依附的位置上。而現代文明的主體就是獨立的個人。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商品生產，也就沒有市場經濟；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自由公民，也就沒有民主政治；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自由思想，也就沒有文化教

育和科學藝術的繁榮。因此，打破人身依附，實現人的解放，乃是一個民族進入現代社會的前提。當歐洲進入現代社會的時候，中國還處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之下，這是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五四運動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出了個性解放即人的解放的呼聲，從此開始了中國人追求人格獨立的過程。個性解放和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科學與民主本來是相輔相成的東西。要使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就應該發展而不是束縛個性。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哲學裏，個人或個性與集體或黨性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因此在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裏，從來沒有個人或個性的地位。等到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毛澤東首先把“民主個人主義”拿過來當作靶子，並且把具有這種思想的知識分子當作西方代理人來批判。幾十年來，與個人有關的一切，都被打成落後、可耻、甚至反動的東西。個人主義被說成“萬惡之源”，成爲一切思想和歷次思想運動必須打擊和消滅的對象了。

秦始皇以來，中國人民雖然一直處在專制主義的重壓之下，但是中華民族歷來重視人格和氣節的傳統並沒有消亡。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歷經戰亂和外族蹂躪而不亡的一個原因。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就是這種人格的最高表現。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曾是中國士人的驕傲。然而當代中國的思想運動恰恰要摧毀這種人格。在思想改造當中，知識分子必須貶低和批判自己，必須放棄自己的信念，甚至用形象的話說，必須“脫褲子，割尾巴”，也就是必須以屈辱來換取生存。至於違心地承認自己並不存在的“錯誤”或被迫參加對別人的批判，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有這些批判和鬥爭的參加者，實際上都是在扭曲自己的人格。特別是奉命圍攻別人的人，他的心靈所受的創傷，實際上比被圍攻者更深。經過二十多年的反復鬥爭，中國民族的氣節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摧殘。這一點，只要看一看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就夠了。明明彭德懷是爲了愛護共產黨而提出正確的意見，明明有許

多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毛澤東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時，竟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恰恰相反，大家是群起而攻之！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它的領導核心都墮落到如此地步，怎么能指望他們給別人樹立甚麼可敬的榜樣呢？

在這種高壓下面，“無個性”成了最高的道德典範。當一枚螺絲釘，當黨的“馴服工具”，被規定為青年人的奮鬥目標和共產黨員的黨性楷模。

禁錮思想，消滅天才

以消滅個性為任務的思想鬥爭，扼殺了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也窒息了人們的創造性。因為有個性的頭腦和有特色的精神活動都被當作異端，剩下的便只是沒有思想的腦袋了。毛澤東雖然曾經鼓勵過獨立思考和講真話，鼓勵過“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鼓勵過“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但這只是他個人的獨白。實際上他不容許別人有獨立的思想，並且通過一連串的運動予以消滅，在社會上是這樣，在黨內尤其是這樣。

旅美學者胡平關於極權統治對一個民族思想上的摧殘所造成的後果，有一段很精辟的論述。他寫道：“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就是在當權者們聰明、能幹，對全社會實行了慈父對幼兒般的無微不至的控制和統治時，它也會造成整個民族在意志力和創造精神方面的退化。一個極權社會，搞得好，可以造就少數幾個偉大的，或者更準確些說——顯得偉大的（因為別人都被迫跪下或砍倒）的個人，但是它一定會造成一個渺小的民族。”^③

按照中國人的天資和悠久的文化傳統，聰明才智決不亞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按理說一九四九年以來應當在精神領域有更多的創造性成果。但是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方面的成果太稀罕了。在政治思想上能夠成為先行者的孫中山、康有為和梁啟超等，

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產生的人物。能夠稱得上思想家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則是五四的風雲人物。連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者毛澤東本人，也是五四運動使他走上歷史舞臺，並在曲折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突破教條主義而成爲中國革命領袖的。這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

如果從文學藝術領域來看中國民族的精神活動，思想僵化的後果就更明顯了。魯迅已經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人們當然不應該要求一九四九年以後再產生一個魯迅。但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人又如何呢？曾經給世界文化貢獻出《子夜》、《家》和《雷雨》的茅盾、巴金和曹禺，解放後幾十年竟不曾寫出一部同等水平的著作。是甚麼原因使這些大作家江郎才盡了呢？一九九四年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他六十年的老友曹禺，回來後寫了一篇短文《六十年交情》，其中有一段發人深思的話。當他在病榻前拉着曹禺的手談話時，有一句對白把問題一下子說透了。吳祖光是這樣寫的：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在一生寫作上的失落，我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句憋了多年從來沒有說出口的話：‘你太聽話了！’”

吳祖光接着寫道：“曹禺的反應出我意料！幾乎是在喊着：‘你說的太好了！你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甚麼，我馬上去辦，有時候還得揣摩着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么能聽領導的？……’他的激動過去了，聲音漸漸低下去了。顯然，他明白過來了。但是歲月不居，餘年衰朽，錦綉年華已經過去了。”^④問題就在這裏。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曹禺，經過思想改造，已經不再是劇作家曹禺，而是變成只會“聽話”的曹禺，變成一個“馴服工具”了。曹禺的悲劇正是當代中國許許多多有才華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因而也就是中國文化思想界的悲劇。

有沒有在思想重壓之下挺住了腰板，保持住自己個性的知識分子呢？有，只可惜太少了，而且不見容于當世。吳祖光就是一

個，但他被逐出中國共產黨。顧准也是一個，但他被打擊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只剩下孑然一身，並在一九七四年淒然棄世。他去世二十年後，當他留下來的斷簡殘篇被貴州人民出版社印為《顧准文集》出版之後，人們才痛心地發現，原來中國還有這樣一位走在所有理論家前面的思想家。他早在幾十年前就敏銳地看到中國制度的弊端並在探尋出路。顧准只是被發現了的天才。大批大批被壓成“螺絲釘”的人們當中，甚麼人才沒有呢？這是整個中國民族的悲劇。

培育敗類，製造訟師和打手

消滅人的個性，只是思想運動的一項戰果。另一項成果，是造就了一批專以整人為職業的密探、訟師和打手。他們的良知已經泯滅，然而嗅覺極端靈敏。凡為人類所唾棄的惡劣品行，在他們身上無不具備。諂媚，欺詐，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翻雲覆雨，見風轉舵，落井下石，都是他們得心應手的“革命”哲學。每次思想運動，都需要這種打手，而且每次運動也總是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這樣的打手。雖然這些打手為廣大的善良人們所不齒，但是他們總能成為每次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骨幹，並且總是官運亨通，飛黃騰達。平心而論，這種人其實也是共產黨的敗類。黨內這種成分的增加，只能加速黨的腐敗。它使對黨懷有感情的人傷心，使群眾對黨疏遠和失望。而這正是共產黨的致命傷。這也正是“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的事情。然而這種人是極權體制和“鬥爭哲學”的伴生物。只要中共堅持極權體制和“鬥爭哲學”，這種伴生物就不會絕迹。

全面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

思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最大惡果，是普遍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

中國古代的所謂三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人身依附關係,自然應該打破。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特別是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後這些封建關係已經走向衰落。但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中也形成許多良好的人際關係。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愛相敬,朋友互相忠信,尊師愛生,濟困扶危,特別是孔子“仁者愛人”這個道德準則,應該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隨着西方文化的東漸,人和人的平等關係和相互尊重,也和自由民主思想一起輸入中國,成爲青年特別是知識分子向往的境界。可惜的是,這些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之下,幾乎遭到徹底的破壞。在“鬥爭哲學”的指導下,對立鬥爭成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和特征。不光在社會上,就是在家庭裏也是這樣。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當然必須和父母劃清界限,就是革命幹部家庭,誰如果在社會上或黨內遭到批鬥,那麼他回到家裏便也會被自己的親人當作敵人。

在這種關係下面,人和人之間談不上互相信任。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則成爲“有覺悟”的象徵。因此人們必須學會互相提防。“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成爲有用的格言。一九五五年舒蕪發表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使人們互相更加戒備。文化大革命中,張志新因爲一位好友揭發了她的知心話而付出生命,給人的教訓就更深了。

人們只能在“鬥爭別人”和“被人鬥爭”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這樣的人際關係當中,人們只能在“鬥爭別人”和“被別人鬥爭”之間選擇自己的位置。爲了免于被人鬥爭,只好去鬥爭別人。本來社會生活中的鬥爭關係只在某些人和某些事情中存在。但是把它普遍化和絕對化以後,整個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就遭到徹底破壞了。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所經受的一場最大的人倫災難。

在這種普遍化的鬥爭當中,沒有被人鬥過或沒有鬥過別人的

人，幾乎是沒有的。有的是一面鬥爭別人，一面被人鬥爭。有的是今天鬥爭別人，明天又被別人鬥爭。就像賭場上沒有贏家一樣，在鬥爭場上鬥來鬥去的結果，幾乎沒有人不受鬥爭之害。（注一）當然，被迫鬥爭別人的人，和前面說的職業打手完全是兩回事。打手們已經失去人性，鬥爭別人是他的一大享受和進身之階。而被迫鬥爭別人的普通群眾，因為天良未泯，所以內心感到痛苦，時時受着良心的譴責。

顧頡剛是中國史學界的著名專家。他的學問得自胡適真傳。他在過去出版的《古史辨》（這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自序中，懷着極其感激的心情反復陳述“適之先生”（胡適字適之）對他治學的教誨，並坦誠地把自己的成名歸功于“適之先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的學習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他就公開和胡適劃清界限了。這種態度其實是在運動壓力下的自保，並不是出自真心。這一點，可以從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證。這封信談到他的弟子童書業等對他的批判時寫道：“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苟我之學術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來二君又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諒者也。”^⑤原來童書業等二人，學習顧頡剛批判他的老師胡適的榜樣，也撰文批判自己的老師顧頡剛。但一面批判，一面又請他為自己主編的刊物寫稿。可見批判是為了應付思想運動。顧頡剛對這種矛盾心情深有體會，因此並不責備自己的學生，而是將心比心，原諒了他們。

但是原諒歸原諒，它沖不掉人格分裂的痛苦。胡適之子後來所以自殺，恐怕和他被迫批判胡適並宣布劃清界限所造成的內心傷痛是分不開的。

（注一）一九五七年吳祖光被劃成右派，是他的發言被人

畫龍點睛的結果。他被請去在文聯整風座談會上發言，其中提到：“那種辦事粗暴，又不懂文藝的人，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這句話本來很普通，也很正確，不可能挑出甚麼毛病。但是這個發言在《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發表時，標題卻成了《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一字之差，變成吳祖光“反對黨的領導”了。其實這個“黨”字是田漢給加上去的。^⑥不知田漢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是這一個字竟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而且使這人美滿的家庭從此陷入苦難。而傷害了吳祖光的田漢本人呢？後來也受到傷害，而且是致命的傷害。這位三十年代在中國戲劇和電影史上寫下過光輝篇章的詩人和劇作家，《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只因爲後來寫出過反抗暴政和反映民間疾苦的《關漢卿》和《謝瑤環》，就身陷自己的黨所設的文字獄，臨終前想見一眼白髮親娘都辦不到！

三 沒有主旋律時代的前夜

馬克思主義是整個社會唯一的主旋律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開始進入一個一元化的社會。經濟上一元：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政治上一元：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上一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簡稱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個龐雜的混合物。其中有馬克思的，也有列寧和斯大林的，更多的是毛澤東的，後來又加上鄧小平的）指導一切。整個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四十年之所以思想運動連綿不斷，用一句話說，就是要把全國的思想都統一於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統一於領袖的思想）之下。爲此就要改造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消滅一切異己思想。思想都存在于人的腦袋裏，所以必須對人加以改造。知識分子腦袋裏各種各樣的思想最多，因此便成了思想

運動的主要對象。

其實思想是消滅不了的。强制性的改造更是南轅北轍。不過用壓服的辦法可以把異己思想壓住，使它不能發表。所以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國思想界便只有一個主旋律：馬克思主義。這主旋律一直持續了四十年。

四十年之後，事情有了變化。

主旋律陷入最嚴重的危機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自由化”全軍覆沒，“馬克思主義”大獲全勝，再加上中共“第三代”對意識形態實行了空前嚴厲的鉗制，使得任何“自由化”的聲音都透不出來，舞臺上已經沒有一點雜音，主旋律應該說進入最好的時代了。

然而此時馬克思主義恰恰陷入最嚴重的危機，因為人們不相信它了。

宗教的存在依賴于人們對它的信仰。因為它的許諾在天堂，無需在人世加以驗證，而且人世也無法驗證。但馬克思主義不同，雖然中共一直把它當作一種信仰，但它的許諾在人世：要給人世一個最美好的社會。可是在二十世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這種主義的指引下都走進了絕路。最後是“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陷于瓦解。中國倒是沒有垮臺，但那只是仰仗于改革。中國共產黨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以便證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正確。其實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清楚，改革乃是大膽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結果。“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乃是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的基石。然而中國正是在農村拋棄公有制，在全國拋棄計劃經濟，才從困境裏走出來的。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的失敗，使馬克思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國共產黨雖然繼續把它作為高于一切的指導思想強制人們信奉，但是毫無作用。思想只

有通過人們自願接受才能發生作用。強制填鴨是可以的，強制灌輸一種思想是絕對辦不到的。當然也有作用，那就是引起反感。現在很多青年對這種官方理論棄之如敝屣，就是把它當作信仰強制灌輸的直接結果。

尤其是“六四”一役，當局一舉消滅了“自由化”，也一舉摧毀了自己的形象。平時演奏主旋律時所彈出的動聽音符，已被炮火聲完全吞沒。可以說，是“六四”的槍聲給這種信仰以致命的一擊，使它在人們心中本來已所剩不多的影響，徹底烟消雲散了。

於是中國來到了一個沒有主旋律的前夜。其所以叫作“前夜”，是因為主旋律的曲調並沒有終止，仍在通過大功率的喇叭繼續播放，只是已經沒有人聽了。不但沒有人聽，連樂隊都懶得演奏了。人們聽到的只是一遍又一遍重複播放的老錄音帶。

這是一種進步。

主旋律的沒落，預示思想自由的時代即將來臨

思想只在人的頭腦裏產生。它當然要反映外部的世界，但也要表現自身。思想不單單是認識，同時也包含感情，意志，審美觀念和道德判斷，以及主觀世界其他的方方面面。思想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最為豐富多采。因此，社會的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作為主旋律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處於壓倒一切的地位，思想界的多元化就成為可能了。承認這種多元，承認思想自由，對自由思想的表達給以法律上的保護，即言論自由，是現代化社會的必要條件。

其所以必要，那着眼點還不單單是人權或公民權利，而且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尤其是當今這個信息時代。

毛澤東很重視人，他說過“人是最寶貴的”。但他是把人當作他大搞群眾運動的工具來使用的。“人海戰術”當然需要人，而且多多益善。

第十四章 結 語

鄧小平提倡“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比毛澤東前進了一大步。不過他尊重的是自然科學家 and 工程技術人才，因為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可惜他不知道，或不願承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科學和技術，只能產生于富有創造性的腦袋。而創造性只能存在于自由思想之中。這自由思想不單指人的個體，而且指整個社會的思想生活。社會的思想生活又離不開它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只有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才能孕育出富有創造性的人才。這個“人才”不是“人海戰術”中的“材料”之“材”，而是有自己獨立人格和杰出才華之“才”。這種人不單指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而且指思想家，政治家，理論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出版家，記者，以及各方面的社會活動家，等等等等。

胡耀邦生前曾經希望中國知識界能夠為中國的繁榮攀上三個高峰：思想理論高峰，文學藝術高峰，科學技術高峰。如果政治體制不變，即使在他那樣開明的領導下，中國人也只能接近而不可能達到那三座高峰。因為沒有民主，這一切都談不到。

現在，思想領域一個沒有主旋律的時代即多元化的時代快要到來了，它是走向思想自由的前夜。由于政治民主還很遙遠，思想控制又毫不放鬆，這個前夜可能很長。但是歷史的腳步總是往前走的。前夜再長，也總有看見曙光的時候。回顧四十年的思想運動史，再看看已經沒有人聽的主旋律的現狀，就知道那個時代已經不會太遠了。

※ ※ ※

第十四章 引文出處

①《毛澤東選集》第 294 頁

②《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86 頁

③《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第 44 頁

④臺灣〈聯合報〉1994年10月20日

⑤《顧頡剛年譜》第352頁

⑥《共和國洗冤錄》第84頁



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茅盾(沈雁冰),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包括《蝕》三部曲,《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腐蝕》等名著。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只寫了幾則《夜讀偶記》,再就是在思想運動來臨時,跟着別人作檢討。昔日那位文思泉湧、才華橫溢的大作家,已被運動的浪潮吞沒了。

圖為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書市上和讀者見面。



這是青年時期的曹禺。

曹禺在二十四歲時寫出《雷雨》，成爲中國話劇史上劃時代的不朽劇作。同一時期創作的劇本《日出》及《原野》等，也都是經典之作。

這位戲劇大師進入盛年(四十歲)以後，本來應該有更好的精品問世，但是經過“思想改造”，竟然寫不出一部傳世之作了。他自己晚年對此深爲悔恨，臨終前在病榻上沉痛地喊道：“我太聽話了！”



以上三人左起依次為冼星海，田漢，聶耳。

聶耳和冼星海為現代中國最傑出的音樂家。他們的代表作《義勇軍進行曲》(田漢詞，聶耳曲)和《黃河大合唱》(張光年詞，冼星海曲)，以及許多其他作品，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不朽的文化遺產。他們逝世已經半個多世紀，至今中國無人能出其右。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田漢有過重大影響。詩人、劇作家田漢是三十年代上海影劇界巨匠。他的創作活動，對促進中華民族解放意識的覺醒，起了重要作用。可惜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人晚年身陷黨的冤獄，臨終前想見老母一面竟不可得。



寫出不朽名作《家》的巴金，解放後再也沒有同等水平的創作問世了。他僥倖度過文化大革命，虎口餘生，痛定思痛，倡議設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以警示後人。但此建議竟遭扼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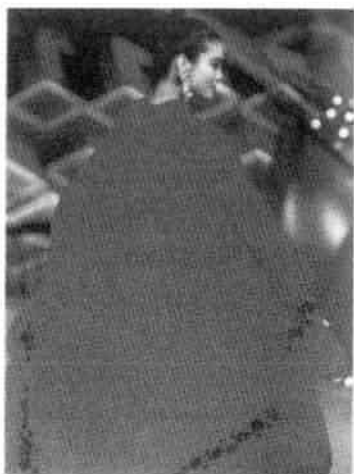


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說：最近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其實中共從上到下，思想工作都是很積極的，反自由化尤其努力，然而收效甚微，應該說是思想政治工作不靈了。

有鑒於此，“六四”後對大學生實行一年軍訓，以便端正思想，增強對“自由化”思潮的免疫力。

圖為一九八九年入學的北京大學學生結束一年軍訓生活時所攝。為首的女生不知為何如此傷心。是軍營生活使她滿腹委屈，還是思想端正之後已經捨不得離開軍營？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的價值標準發生巨大變化。享有特權的當政者要求老百姓“艱苦樸素”的說教，已經不靈，對所謂“超前消費”的指責，更沒有人愛聽。現在美化生活，追求新潮，已經成為青年人的時尚。他們崇拜的已經不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而是名星名模。上圖為在國際上獲獎的名模彭莉。下圖為北京一個美容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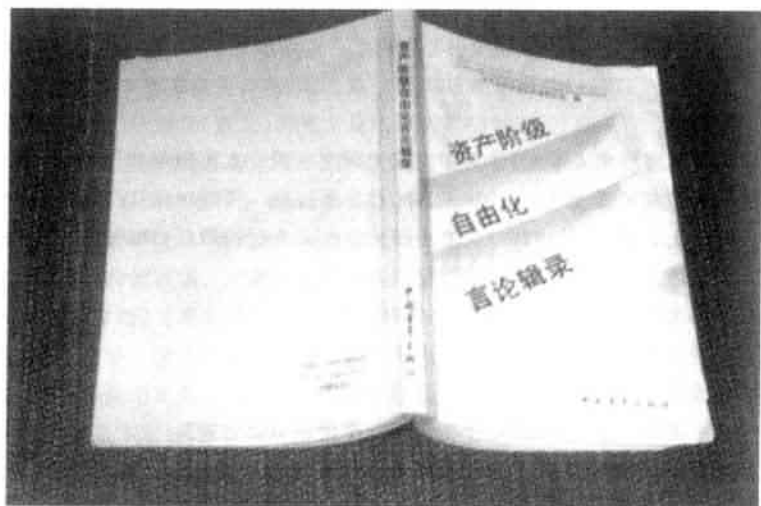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初，影星劉曉慶在上海《文匯》月刊上發表自述《我的路》，敘述她個人奮鬥成長的歷程，引起讀者強烈共鳴，也引起官方批判。但劉曉慶不為批判所動，繼續走“我的路”，並且以藝人身份下海經商，打開了一片天下。這是一九九三年她在杭州創辦“劉曉慶飲皇食品有限公司”的成立慶典上。

劉曉慶的“路”深刻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根本變化：個人不再依賴“組織”，這表明傳統集權社會體制的瓦解。過去人們之所以必須被迫服從思想運動的擺佈，是因為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都只能仰賴集體，因此必須服從“集體”的意志，即“聽黨的話”。當人們能獨立地走“我的路”時，“集體”的強制力就消亡了。



儘管中共繼續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尊為高於一切的指導思想，並規定為學校必修課，它卻再也無法重振往日雄風了。事實上中共自己也在實踐上把這種主義的許多原理都拋棄了。至於社會上，特別是青年人，對它已經毫無興趣。書店裏最中心的檔位（擺放馬列毛著作），也是最冷清的所在，除非有關於毛的軼聞瑣事有些吸引力，一般都乏人問津。

相反，各種科學知識，古今中外文藝作品和歷史以及生活用書，文化娛樂書籍，倒是琳琅滿目。外國的社會科學和政治書籍也多了起來。這預示着一個思想多元化的時期快要來了。



“六四”以後，“自由化分子”的著作全面被禁，所有出版社不准出版，所有書店不得銷售。但有一個例外，就是經過中共專門編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輯錄》可以出版，公開發售。內容是經過斷章取義，目的是供“大批判”當“反面材料”用。其實這本摘錄倒是起了幫助“自由化”觀點廣為擴散的作用，故很快就不再印了。

參 考 書 目

-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9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新華社編 新華出版社(1982)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66)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6)
《毛澤東選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
《國史通鑒》有林主編 紅旗出版社(1994)
《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楚序平主編 華齡出版社(1993)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記實》紅旗出版社(199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
《廬山會議實錄》李銳著 春秋出版社(1989)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
《中國“左”禍》文聿著 朝華出版社(1993)
《“左派”理論家浮沉錄》齊力編 團結出版社(1993)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劉曉主編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共和國洗冤錄》曹英等編 團結出版社(1993)
《蒼涼的訴說》張小琳編 團結出版社(1993)
《風起雨落幾鴻儒》丁力編 團結出版社(1993)
《蒼涼的回眸》芭 茶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
《梁漱溟評傳》馬勇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三松堂自序》馮友蘭著 三聯書店(1984)
《最後的年月》丁隆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我的哲學罪案》楊獻珍著 人民出版社(1981)
《走出現代迷信》陶鎔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猛醒的時刻》于光遠 胡績偉 主編,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 《共和國歷程》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
- 《中國共產黨大典》羅正楷主編 紅旗出版社(1996)
- 《七君子傳》周天慶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 《無地自由——胡適傳》瀋衛威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 《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邱石編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 《鄧小平帝國》阮銘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
- 《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王若水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 《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胡績偉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 《我的人獄》戴晴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1990)
- 《顏頤剛年譜》顏潮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 《吳祖光閑文選》吳祖光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
- 《交鋒》馬立誠 凌志軍著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 《十年風雨》蘇紹智著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
-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87)
-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朱育和等主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 《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李少民主編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
- 《共產黨違法案紀實》郭羅基著 (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社(1997)
- 《胡適言論集》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編印(1955)
- 《田漢傳》董健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6)
- 《延安日記》(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 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
- 《老肖像新打量》姜威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名目索引

1. 按首字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2. 同一字母之下,按首字筆劃排列
3. 同一首字之下,按字數和筆劃排列

A

- 按勞分配 123
按照思想劃階級 105-106

B

- 《白皮書》(美國國務院) 34-35
白專道路 126
《北京之春》 238
百分之六的民主淘汰了鄧力群
379-380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87
拔白旗,插紅旗 127
波蘭匈牙利事件 89-90
撥亂反正 377,382

C

- 吹牛大賽 117
查禁民間刊物 293,295-296

- 陳雲制止出版立法 296
從民主派到走資派 225

D

-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154
大民主 91
大批判的末日 405-406
大連座談會 158
大煉鋼鐵 117
大躍進 115-116
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
145-146
地下萬言書 412-413
東方專制主義 416
毒草小說 157
毒草電影 156-157
鬥爭哲學 415-416,426
第三個里程碑 189-190
鄧力群巧奪中宣部 317-318

- 鄧小平怕作赫魯曉夫 297-298
 鄧拓之死 191
 鄧胡趙體制
 300,350,359-364,403
 敵我矛盾 37,90-91
 黨天下 96
- E**
- 《二十五條》 168-170
 《二月提綱》 183
- F**
- 反革命 9-10,76,77,78,80
 反胡聯盟 356-357
 反胡宮廷政變 359-362
 反美親蘇教育 34-35
 反修防修的背後 175-177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166,168,171
 非毛化 296-297
 法家呂后 216
 馮友蘭“修辭立其僞” 216-217
 廢止終身制 251
- G**
- 《工作方法六十條》 126
 工宣隊 197
 工農兵佔領學校 197-198
 工農與知識分子的矛盾
 417-418,420
 公共食堂 139-142
 《公安六條》 208
 共產主義
 119-122,174,325-329
 共產國際 1,3,5,6-7
 《光明日報》 190,233
 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格局
 265-266
 供給制 120-121,124
 鬼戲 154-155
 個人主義 67
 個人迷信 251
 個性之摧毀 421-423
 《高教六十條》 148,149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86,166
 敢于“撫哭叛徒”的邵燕祥
 366-368
 過渡時期 52-53,169
 過渡時期總路綫 52-53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8-9,300-301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 300-301
 顧問委員會 383

名目索引

H

- 合二而一 160
- 《河殤》 388-389
- 和平演變論 169,406
- 《紅旗》 131,202,220,234,235
- 紅學 58
- 《紅樓夢》 58,61
- 紅衛兵 192-193,196-198
- 胡風《意見書》 72-73
- 胡風反革命集團 76,80
- 胡喬木哭庭 310-311
- 胡喬木吟詩贈周揚 343-344
- 胡喬木勸說吳祖光退黨
371-374
- 胡適思想 63-64,66-69,71
- 胡績偉頂撞鄧小平 306
- 胡耀邦的遺言 348-349
- 胡耀邦和鄧小平的裂痕
307-308,352,357-358
- 《海瑞罷官》 180-182
- 華國鋒失去機會 228-231
- 禍國殃民的兩個觀點 36
- 禍起蕭牆——獨裁制的隱患
204-206
- ### J
- 《九評》 169-170

- “九一三”事件 207-208,210
- 江青《文藝座談紀要》 183-184
- 軍事俱樂部 137-138
- 進化論 67
- 教育革命 196,197,199-200
- 階級鬥爭 30,36,88,100,
105-160,137,150-151,170
- 階級鬥爭為綱 150-152,245
- 《解放日報》(延安) 16,17
- 《解放軍報》 182,190
- 解放初期的知識分子 31-33
- 經驗主義 221-222
- 精神文明的破壞 421-427
- 講假話的圍攻講真話的
137-138
- 舉毛旗,走非毛化道路 301
- 簡報學 307
- 《鏡報》 334-335

K

- 《科學十四條》 148
- 可怕的懲罰 141-142

L

- “六四”慘案 396-397,399
- 呂焚為胡風辯冤 77-78
- 老人幫 356-357
- 老人政治 210,223,351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老實人的下場	138 - 139
《李慧娘》	154 - 155
林彪的升起	177
林彪“五一八”講話	186 - 188
兩個宗派	6
“兩個凡是”	230
兩報一刊	189, 230
兩類矛盾	90 - 91
兩個司令部	235
兩支理論隊伍	235 - 236
兩種“魚水關係”	401
《理論動態》	233, 235, 322
理論界的分裂	263 - 264
理論工作務虛會	248 - 255
理論工作座談會	314 - 318
糧食衛星	117 - 118
《劉志丹》冤案	152 - 153
輪流執政(坐莊)	96
《歷史研究》	236
歷史唯物主義	36
廬山會議(一九五九)	135 - 137
廬山會議(一九七一)	206 - 207

M

毛式民主	91, 253
毛林關係	177, 184, 205 - 208, 211
毛劉關係	153, 176 - 178

毛澤東思想	8 - 9, 187 - 190, 250 - 251
毛的平均主義	124 - 125
毛的偉人情結	45
毛的復仇情結	419
毛的理論遺囑	219 - 221
毛對文藝的批示	155, 156 - 157
《毛選》印數創記錄	202
毛和斯大林的關係	166 - 167
毛和梁漱溟的鬥爭	54 - 58
毛親手制造文字獄	78 - 79
民主個人主義	35
民間和官方的對臺戲	389 - 390
沒有主旋律的時代	428
馬寅初誓以生命捍衛真理	132 - 133
貓論	411
鳴放	95 - 98

N

南巡講話	411
聶榮臻：“刀下留人”	372

P

平反委員會	95 - 96
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	217 - 218
批《苦戀》	301 - 304

名目索引

批判效應	405 - 410
批林批孔	214, 221
批林整風	210 - 211
批陳整風	206
批判《海瑞罷官》	181 - 182
批毛和保毛的鬥爭	298 - 299
批鄧, 反擊右傾翻案風	224 - 226
破壞人倫	425 - 426
培育敗類	425
評毛	242 - 243, 250 - 251
評《水滸》	222 - 223
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137

Q

七千人大會	147
奇異的金牌	401
《青年論壇》	347 - 348
青年導師碰壁	386 - 388
啓蒙社	243
《清宮秘史》	60, 62 - 63
清除精神污染	337 - 342
搶救運動	11 - 15

R

人性論	335
人民公社	119 - 120, 141

《人民日報》

	38, 39, 40, 59, 74, 78,
	115, 118, 141 - 142, 191,
	192, 212, 236, 269, 276,
	336, 342 - 343

《人民教育》

	44
人的價值	385 - 386
人道主義	329 - 330
人民內部矛盾	37, 90 - 91
人生觀大討論	386
任仲夷項南中箭落馬	350 - 351
儒法鬥爭	214, 216

S

十人小組(知識分子問題)	84
十二學者作家	398, 400, 405
十次路綫鬥爭	211
三種人	325
三不主義	148 - 149, 421
三面紅旗	115, 116, 142
《三家村札記》	184
“三反”“五反”運動	33 - 34
三中全會路綫	244 - 247
三十年代結怨, 五十年代清算	71 - 74
“四大”	91
四清	175
四人幫	222, 227, 229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四五”運動	226-227
《四五論壇》	238,239,240,242
“四個凡是”	260
四個“念念不忘”	262
四項基本原則	258-259,267-268
生活集體化	119-120
《生活》半月刊事件	293-295
生產目的討論	277-281
《世界經濟導報》	404
收和放	92,257-258,292-293
社會主義	31,52,83,88, 253,245,349,429
社會主義陣營	86,166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75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	115
社會主義時期基本路綫	151
思想改造運動	45-48
思想政治工作	408
思想自由的時代	430-431
思想運動的終結	406-410
思想戰綫座談會	307-311
孫冶方的三對待	165
孫冶方的利潤觀	162-163
孫冶方張聞天反黨聯盟	164-165
蛇口風波	386-388
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	345,349

斯大林	1,8-9,86
舒蕪倒戈	74-75
新共產風	325-329
新舊“紅學”	58-59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283-284
審幹	9-10
《實踐論》	45
實用主義	66-67
雙反運動	126
蘇共“二十大”沖擊波	86

T

土地革命	2
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	226-227
天下第五到天下第一	187-189
田漢之死	247-248
《探索》	238,239

W

五不怕	423
五七道路	196
五子登科	148
《五一六通知》	185
五反(一九五二)	33
五反(一九六三)	175
文字獄	179
《文藝報》	43,59,60,62,72

名目索引

- | | |
|---|---|
| <p>《文藝八條》 148, 149</p> <p>文化大革命
174 - 186, 211, 249, 252</p> <p>文字獄制造廠 370</p> <p>文化遺產的浩劫 195</p> <p>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83</p> <p>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74 - 175</p> <p>文藝界整風(一九六四)
155 - 156</p> <p>王明左傾路綫 2 - 4</p> <p>王明和毛澤東的權力鬥爭 5 - 6</p> <p>王實味和《野百合花》 15 - 19</p> <p>王若水和胡喬木的較量
333 - 335</p> <p>外行領導內行 99</p> <p>吳祖光為白樺辯護
304 - 305, 309 - 310</p> <p>《武訓傳》 37 - 40</p> <p>《武訓歷史調查記》 40 - 41</p> <p>唯生產力論 225</p> <p>唯一的反左鬥爭 228</p> <p>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219</p> <p>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89, 252</p> <p>魏京生向鄧小平開戰 256</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X</p> <p>西單民主牆 237, 238, 256</p> | <p>先生產, 後生活 278 - 279</p> <p>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220 - 221</p> <p>修正主義 99, 168, 221, 222</p> <p>香花和毒草 37, 110</p> <p>消滅民間組織 293, 295 - 296</p> <p>虛與實 219</p> <p>現代迷信 187 - 188, 238, 251</p> <p>習仲勛反黨集團 152 - 153</p> <p>《新啓蒙》 390, 392</p> <p>新華社 35, 233</p> <p>《新觀察》 404</p> <p>新人口論 36, 131 - 132</p> <p>新專案組 341 - 342</p> <p>新民主主義 31, 53</p> <p>新的反動階級 104 - 106</p> <p>新時期思想鬥爭的特點
266 - 267</p> <p>興無滅資 127, 282</p> <p>《學習》 30</p> <p>學習委員會 2, 48</p> <p>學習的變質 48 - 49</p> <p>憲法保護不了人民代表 77</p> <p>《謝瑤環》 157 - 158</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Y</p> <p>一邊倒 36 - 37, 87</p> <p>一條腿走路 301, 354</p> <p>一天等於二十年 115 - 116</p> |
|---|---|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 一九八六年學潮 355 - 356, 358 - 359
- 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 393 - 401
- 一黨專政造就特權階層 264 - 265
- 一九五六——僅有的自由化
年份 84, 87
- 又紅又專 126
- 又一個講真話的人 139 - 141
- 引蛇出洞 98 - 99
- 以強制為後盾的思想改造 25 - 26
- 右派 99 - 108
-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 - 20
- 要不要“反自由化”的爭論 351 - 352
- 陰謀和陽謀 100 - 102
- 異化 330, 335
- 《野百合花》 15 - 19
- 樣版戲 202 - 204
- 《園丁之歌》 204
- 壓不彎的腰——傅雷, 章乃器, 新鳳霞 108 - 112
- 《燕山夜話》 184
- 延安整風中的知識分子 15 - 20
- 中共“八大” 88 - 89
-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50 - 153
-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205, 249
- 中共“九大” 205
- 中共“十大” 212 - 213
-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244 - 247
-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 345
-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351 - 352
- 中共“中央一級生活會” 360 - 362
-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 186
- 中共的共運理論和策略 169 - 171
- 中共和蘇共矛盾的由來和發展 166 - 170
- 中宣部 57, 64, 77, 317 - 320
- 《中國青年》 236, 238
- 中流砥柱——邵燕祥 402 - 403
- 左和右 212, 228, 229
- 自由化分子全軍覆沒 401 - 402
- 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 346 - 347
- 忠字舞 203
- 忠誠老實運動 49
- 周揚和胡喬木的鬥爭 331 - 333, 343 - 344
- 知識青年下鄉 197 - 198
- 知識分子摘帽 84 - 85, 149

Z

中共“七大” 8

名目索引

- | | | | |
|---------------|--|------------|---------------|
| 知識分子戴帽 | 93, 104 - 105,
128 - 129, 193 - 195 | 專案組 | 247 - 248 |
|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 84 - 85 | 最後決定權 | 7 |
| 知識分子與中共的矛盾 | 15 | 尊法批儒 | 214 - 215 |
| 知識分子發出獨立聲音 | 388 - 389, 393 | 資本主義改革 | 406, 411 |
| 政治學習 | 30 - 31, 48 | 資本主義復辟 | 170 |
| 政治設計院 | 95 | 資產階級法權 | 122 - 123 |
| 政治思想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 | 102 | 趙紫陽的結局 | 403 |
| 造神運動 | 187 - 188 | 趙紫陽的戰略錯誤 | 362 - 364 |
| 真理戰勝權力 | 236 - 237 | 遵義會議 | 4 |
| 真理標準大討論 | 231 - 237 | 整風模式 | 26 - 27 |
| | | 整風運動(延安) | 1, 8, 23 - 26 |
| | | 整風運動(一九五七) | 93 - 94 |

人 名 索 引

1. 按姓氏拼音首位字母順序排列。
2. 同一字母之下,按姓氏筆劃排列。
3. 同一姓氏之下,按名字字數和筆劃排列。

A

艾思奇 30,65

B

巴 人(王任叔) 335

巴 金 201,346,424

冰 心 393

白 樺 301,304,308

包遵信 400,402

博 古(秦邦憲) 3,4,7

鮑 彤 236,369

薄一波 53,349,352

C

柴 玲 400

陳 軍 402

陳 雲

292,322,324,350-351,373

陳 毅 133

陳子明 402

陳伯達 186,206-207

陳希同 394

陳荒煤 303

陳獨秀 424

曹 志 236

曹 禹 424

曹思源 402

儲安平 96,103

D

丁一石 307,313

丁偉志 236,404

杜 威 45

董 謙 140-141

董輔弼 236

鄧 拓 65,184,191

鄧力群 235,286-287,

人名索引

鄧小平 213, 219, 224, 231,
243 - 244, 286,
287 - 289, 297 - 298

端木蕻良 193
戴晴 400, 402

F

方勵之 355, 365, 393, 402
範文瀾 65
範榮康 236
封從德 400
馮友蘭 65, 216 - 217, 218
馮雪峰 60
馮蘭瑞 235, 253
傅雷 109, 194
費孝通 32, 97, 365

G

戈揚 402, 404
郭沫若 40 - 41, 60, 61 - 62
64, 68, 77, 195
郭維基
236, 273 - 277, 316, 320 - 321
關鋒 186, 325
關志豪 236
顧准 165, 425
顧頡剛 427

H

何匡 236
何其芳 65, 72
洪禹 318 - 319
侯外廬 65
胡平 295, 423
胡風 71 - 80
胡適 63 - 69, 70, 71, 424
胡繩 65, 404
胡思杜 69 - 70, 71
胡啓立 403
胡喬木 17, 20, 235, 244,
269, 271, 272, 276,
280, 284 - 287, 289 - 291,
331 - 335, 343 - 344
胡德平 348
胡績偉
212, 233, 306, 338, 339, 389
胡耀邦 232 - 233, 248, 249,
261 - 262, 272, 276,
277 - 278, 348 - 349
黃鋼 303, 305, 308
黃心平 96
黃振旅 79
黃紹竑 96
黃藥眠 65, 97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 | | | | |
|----------|---|-----|------------------------------------|
| 華國鋒 | | 李大釗 | 419 |
| | 228 - 229, 230 - 231, 280 | 李士釗 | 40, 41 - 42 |
| 賀龍 | 17, 21 | 李玉田 | 236 |
| 賀敬之 | 303 | 李何林 | 308 |
| 賀綠汀 | 201 | 李希凡 | 59, 61 |
| 赫魯曉夫 | 86, 167, 170, 171 | 李洪林 | 238, 251, 269 - 271, 276, 400, 402 |
| J | | 李慎之 | 404 |
| 江青 | 40, 59, 186, 193, 195 | 李維漢 | 16, 281 - 284 |
| 金日成 | 176 | 李澤厚 | 400, 402 |
| 金觀濤 | 402 | 林子力 | 235 |
| 賈霽 | 43 | 林自新 | 373 |
| 蔣介石 | 70 - 71 | 林澗青 | 235 |
| 蔣南翔 | 12 | 林默涵 | 72, 75, 303 |
| 翦伯贊 | 68, 179 - 180, 184 | 陸石 | 303 |
| K | | 陸定一 | 352 |
| 康生 | 2, 10, 11, 18, 133, 152, 155, 163, 169, 183, 186, 195 | 梁漱溟 | 54 - 58, 217 - 218 |
| L | | 雷海宗 | 97 |
| 老舍(舒舍予) | 65, 193, 194 | 廖沫沙 | 184 |
| 呂莢 | 77 - 78, 80 | 黎澍 | 236 |
| 李陀 | 400 | 駱賓基 | 193 |
| 李達 | 104 | 魯迅 | 424 |
| 李鵬 | 394 | 劉青 | 238 |
| 李氓 | 44 | 劉大年 | 58 |
| | | 劉大杰 | 63 |
| | | 劉少奇 | 6, 7, 122, 153, 176 - 178, 223 |
| | | 劉再復 | 400, 402 |

人名索引

劉志堅 186

劉賓雁
346, 356 - 366, 367 - 368

藍翎 59, 61

羅常培 33

羅隆基 95, 103

M

茅盾(沈雁冰) 60 - 61, 424

毛遠新 223

毛澤東 1 - 2, 4, 5 - 6, 7, 8,
35 - 37, 45, 55 - 57, 78, 86,

134, 153, 178 - 179, 210 - 214,

221 - 222, 223 - 224,

226 - 227, 415 - 416

馬沛文 236, 316

馬連良 181, 192

馬叙倫 44

馬寅初 46, 129 - 133

N

聶紺弩 65, 104

聶榮臻 372 - 373

P

彭真 13 - 15, 183, 352

彭克宏 372, 394

彭德懷 135 - 139, 159

潘梓年 65

Q

千家駒 97

秦川 236, 339

戚本禹 179, 186, 325

欽本立 404

錢俊瑞 47 - 48

錢偉長 365

R

阮銘
235, 244, 262, 321 - 324, 391

任仲夷 350 - 351

任弼時 7

芮杏文 403

S

邵荃麟 65, 158

邵燕祥 366 - 368, 402 - 403

孫瑜 38, 40, 41 - 42

孫冶方 162 - 165, 236

孫定國 161

孫長江 233, 235, 321 - 324,
372 - 373, 374

舒蕪 74 - 75

斯大林 86, 166, 170

蘇紹智
236, 253, 338, 372, 392, 402
蘇曉康 388, 400, 402

T

田 漢
157, 247 - 248, 427 - 428
唐 因 306
唐達成 306
陶 鑄 186
陶大鏞 103
陶行知 42 - 45
童大林 236
童書業 427

W

王 力(北京大學教授) 68
王 力(中央文革成員)
186, 325
王 丹 394, 401
王 明(陳紹禹) 2 - 3, 5, 7, 8
王 蒙 403 - 404
王 震 17, 321, 323, 324
王元化 330, 390, 391
王任重 186, 306, 314 - 315
王忍之 368, 377
王若水
212, 236, 251, 333 - 335,

371 - 372, 389, 391 - 392
王若望 357, 364 - 365, 370
王洪文 212 - 213, 224
王軍濤 238, 402
王費秀 236
王惠德 312
王實味 15 - 18, 20 - 22
汪子嵩 236
汪東興 233, 234, 238
吳 江 235, 321, 322, 323, 324
吳 晗
180 - 181, 184, 191 - 192
吳大琨 63
吳明瑜 236
吳祖光 111 - 112, 304 - 305,
371, 373 - 374, 424
吳景超 97
吳敬璉 236
武 訓 37 - 40
溫元凱 400, 402
萬 里 352
魏京生
238, 239, 256, 261, 275, 358

X

邢賁思 236
夏 衍 303
荀慧生 193

人名索引

- | | |
|----------|--|
| 徐文立 | 238 |
| 徐璋本 | 97 |
| 徐鑄成 | 98, 103, 108 |
| 項南 | 351 |
| 新鳳霞 | 108, 111 - 112, 304 |
| 熊復 | 235 |
| 蕭軍 | 20, 193 |
| Y | |
| 于光遠 | 236, 338, 392 |
| 于浩成 | 236, 389, 400, 402, 405 |
| 尹達 | 65, 186 |
| 余煥春 | 236 |
| 姚文元 | 181 - 182, 186, 212, 220, 222 |
| 俞平伯 | 58, 62 |
| 葉文福 | 307, 312 |
| 葉聖陶 | 108 |
| 葉劍英 | 229, 244 |
| 楊耳 | 43 |
| 楊西光 | 233, 236 |
| 楊獻珍 | 133 - 134, 159 - 161 |
| 楊榮國 | 216 |
| 閻明復 | 403 |
| 嚴家其 | 236, 251, 369, 400, 402 |
| Z | |
| 朱德 | 4, 14 - 15, 38 |
| 朱厚澤 | 347, 368, 403 |
| 朱穆之 | 306 |
| 周揚 | 64, 201, 306, 331 - 333, 339 - 340, 343 - 344 |
| 周信芳 | 192 |
| 周恩來 | 4, 6, 38, 56, 84 - 85, 110, 212 - 213, 215, 221, 225 |
| 章乃器 | 96, 109 - 111 |
| 章伯鈞 | 95, 102 |
| 張天翼 | 65 |
| 張百生 | 79 |
| 張光年 | 303, 306 |
| 張志新 | 254 - 255, 275 |
| 張香山 | 236 |
| 張春橋 | 122 - 123, 181, 212, 220 |
| 張聞天(洛甫) | 3, 4, 7, 137, 164 - 165 |
| 張顯揚 | 236, 372, 374, 402 |
| 曾濤 | 236, 306 |
| 曾昭掄 | 97 |
| 趙尋 | 303 |
| 趙紫陽 | 362 - 364, 377 - 378, 403 |
| 鄭振鐸 | 108 |
| 鐘沛璋 | 236 |